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

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張堂錡 教授

台灣報導文學獎傳播現象研究（1970-2010）



研究生：林家儀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提 要

長期以來的報導文學研究傾向將「台灣報導文學」視為一個統一的完整文類來進行歷史源流上的討論，卻不免忽略「台灣報導文學」這集合名詞下的多樣異質性，因此僅單純從線性時間做發展史的斷代切割並不足夠，更需要從各個時間點切入，來釐清台灣報導文學文類內涵的不停變動，進一步解釋為何直至今日我們仍無法對「什麼是報導文學」做出確切的答案。而報導文學作為一個與社會緊密連結的實用型文類，顯然必須被放置在更複雜、多重的文學傳播網絡之中，從「影響」與「被影響」的文學社會學模式著手，方能看出其千絲萬縷的發展脈絡。本論文以台灣報導文學獎為線索，分析台灣報導文學在不同時期、不同勢力的介入之下，從繼承中國報告文學傳統的宏篇巨製、主題明確的軍中報導文學，進展到副刊推動時期較為輕薄短小的議題設定模式，再到兩大報文學獎時期以結構完整的散文形式書寫台灣風土歷史與民情，乃至傳媒發達後由專門性雜誌如《人間》充滿圖文搭配的專題模式，最終進展到地方性、社區性的各地文學獎與在地文史書寫——台灣報導文學的內涵意義隨著四十年的時間遷移以及文學場域內部的權力轉移隨時發生著質變，並不斷在文學的場域中變換其位置，持續地發聲。

關鍵字：台灣文學、報導文學、文學獎、傳播現象、文學社會學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概念界定.....	4
第三節 前行研究與文獻回顧.....	6
第四節 研究方法.....	11
第二章 多重角力下錯綜的報導文學面貌（1970年~1980年）.....	19
第一節 走在民間之前的軍中報導文學：國軍文藝金像獎.....	21
一、1930年代抗戰報告文學的脈絡延續.....	22
二、國軍文藝金像獎中的報導文學.....	25
三、軍中報導文學的封閉性.....	27
四、自成道路的軍中報導文學.....	29
第二節 台灣報導文學的興起：民間兩大報副刊的革新與推進.....	30
一、官方勢力下的「侍從報業」.....	31
二、兩大報的副刊改革.....	33
三、作為「文學守門人」的副刊主編.....	36
四、民間媒體型塑下的台灣報導文學啓蒙.....	38
第三節 官方控制下的報導文學：嘉新新聞獎與文藝獎章.....	42
一、嘉新新聞獎報導文學類.....	43
二、中山文藝創作獎報告文學類.....	46
三、國家文藝獎章.....	47
四、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	49
五、官方對報導文學的收編與利用.....	50
小結.....	52

第三章 報導文學的場域位移與再建構（1981 年～1990 年）	54
第一節 燦然輩出的報導文學獎.....	56
一、時報報導文學獎（1978 年～1982 年）	56
二、1980 年代的國軍文藝金像獎.....	62
三、官方報導文學文藝獎的民間化.....	66
四、文學獎對報導文學的衝擊與建制.....	68
第二節 高舉報導文學旗幟的《人間》雜誌.....	70
一、《人間》的創刊與緣起.....	71
二、《人間》的社會運動與報導文學雙重實踐.....	73
三、《人間》熄燈下的報導文學尾聲.....	76
四、透過《人間》看報導文學的深化與轉型.....	80
第三節 大眾媒體對報導文學的介入與重構.....	82
一、報導文學在媒體推動下的精英化與專業化傾向.....	82
二、報導文學對媒體的高度依賴性.....	86
小結.....	88
第四章 兩大報報導文學獎下的世代組成與雙重性	92
第一節 兩大報報導文學獎中的 1990 年代報導文學.....	94
一、報導文學獎下的報導文學轉向與分流.....	95
二、虛構性與真實性的實踐及挑戰.....	100
三、主題與形式的雙重鬆綁之可能.....	105
第二節 報導文學獎的評審班底與作家世代.....	108
一、文學獎權力規則下的報導文學.....	108
二、兩大報的評審班底與組成.....	112
三、文學獎中形成的班底與世代雙面向.....	118
第三節 報導文學的式微危機／轉型契機.....	121
一、報導文學的困境與式微.....	122
二、報導文學的轉型與重生.....	125

三、轉型與式微：互生的雙重性.....	128
小結.....	131
第五章 新世紀報導文學的議題化與地方化（2001年~2010年）.....	135
第一節 21世紀以來的報導文學獎.....	136
一、兩條線索：全國性報導文學獎與地方性報導文學獎	137
（一）全國性報導文學獎.....	137
（二）地方性報導文學獎.....	140
二、報導文學獎中的三大現象.....	142
（一）字數篇幅空間增大.....	142
（二）強調功能性的主題.....	143
（三）得獎者的高重複率.....	145
三、報導文學獎的侷限性.....	146
第二節 新世紀報導文學獎背後的運作與型塑.....	149
一、評審組成的世代交替與其意義.....	150
二、評審與得獎者、得獎結果間的聯結關係.....	154
三、報導文學獎的昨日、今日、明日.....	158
第三節 新世紀報導文學的新風貌.....	160
一、透過報導文學獎所呈現的發展趨勢.....	161
二、新世紀報導文學的「單一議題化」與「在地書寫化」.....	165
（一）單一議題化.....	165
（二）在地書寫化.....	167
（三）社區大學中的報導文學	169
小結.....	170
第六章 結論.....	173
參考書目.....	178

附錄一：1990 年代時報報導文學獎得獎列表	194
附錄二：1990 年代聯合報報導文學獎得獎列表	196
附錄三：1998 年～2011 年 全國性報導文學獎得獎列表	198
附錄五：1997 年～2011 年報導文學獎獲獎者得獎紀錄列表	219
附錄六：1997 年～2011 年報導文學獎評審列表	226
附錄七：社區大學報導文學相關課程開設情形列表.....	232
附錄八：社區大學報導文學相關課程內容簡介列表.....	237



第一章 緒論

1975 年高信疆在其所主編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推出第一個報導文學專欄「現實的邊緣」，這個專欄的出現揭開台灣報導文學在台灣文壇上風光燦爛的序篇。台灣報導文學於 1970 年代紅極一時，配合當時台灣整體政經環境的變化、傳播媒體文化的興起以及文學思潮的崛起，種種文學性的或非文學性的因素塑造出台灣報導文學的巔峰。隨著文本的累積與研究的深化，投入報導文學研究的學者日益增多，對於報導文學文體本身的界定、報導文學的議題區分、報導文學刊物等皆有所挖掘、討論，而展望著新世紀台灣報導文學的書寫，破除絕對客觀化、學術化與散文體式的迷思是當前的要務，而回歸田野、深思報導文學的目的性與方法論，亦是當前報導文學論者的關鍵課題。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前行多數的報導文學研究普遍認為，台灣報導文學的興盛起於 70 年代，此前經過《傳記文學》、《綜合月刊》的承先啓後，至 1970 年代適逢高信疆於 1975 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開闢「現實的邊緣」專欄，進而在時報文學獎設立報導文學類，隨著《聯合報》的跟進，遂掀起報導文學的一股熱潮。然而筆者不禁懷疑，僅僅是一個專欄的設立、一個副刊的推動為什麼可以造成一個文類在台灣的「流行」？一個文類在特定的時空可以造成特定的現象，必然還有其他相關聯的社會因素去支持，而這個社會因素不只是宏大的解嚴、解除報禁等可以全部解釋，副刊編輯與副刊所掌握的文學權力，以及文學獎所篩選建構的文學審美口味、代表性作家，包含出版社控制的出版權力等等，是一個巨大而千絲萬縷的社會關係在運作整個文學場域，而報導文學的興起與寂然也自然不單純是報導文學內部因素，必須以它為中心同時垂直、平行的觀察整個「文學社會」的建構與變動。

報導文學研究之初，在代表性作家的專論研究外（如陳銘礪、藍博洲、古蒙

仁)，多半集中試圖建立「台灣報導文學史」與解決「報導文學是什麼」的文類問題。其中最關鍵的討論專書是楊素芬的《台灣報導文學概論》，然而從楊素芬這本號稱「第一也是唯一」的報導文學研究專書出版以來，若以該論文寫作完成之時的 1999 年為內容研究範圍底線，則至今已經過了十年，在這十年間，報導文學的研究卻並沒有因此深化，僅有張堂錡的〈體系化的探索、建構與可能——台灣報導文學理論研究綜述〉¹一文是較為全面的再討論。從 1937 年楊逵的登高一呼，到 70 年代高信疆引領的風潮，乃至今日「報導文學死了嗎」，報導文學在台灣已然發展了七十個年頭，然而今日的報導文學研究是否還「只能」停留在文類與源流的爭議上妾身未明呢？新近的研究者雖開拓出更多研究的新話題，無論是方法論的改變，或是研究議題的集中深化，但回到報導文學在文壇上的定位此一無解問題，仍然無法對報導文學的脈絡歷史做出更具體的安排。從 1970 年至今，四十年間的媒體環境與文化、文學環境不斷在轉變、重新建制，而被視為消逝的文類的報導文學，事實上仍在邊緣不斷活動，惟其姿態與發表形式的不同，導致其益發為人所忽視，這些發生在報導文學本身的變化，以及作為文壇中的一支，與整個文學場域的相互影響、轉化，都必須被發現、被注意而加入討論的範疇中。為深化報導文學的討論，應該深入瞭解此一文類的成型其背後龐大、複雜的社會現象，這並非直觀的連結報導文學文本中的主題與時代事件，而是指在文學發展的模式下，每一種類型的文學皆是社會集體概念、思想的具象化，報導文學的蓬勃在特定時代、寂靜在特定時代之意義便是在此。

隨著近年來報導文學的本土化，報導文學在全國性獎項上也許逐漸消逝，但在各縣市自行舉辦的地方文學獎卻依舊有一席之地。在地方性的文學獎項上，常態舉辦的屏東大武山文學獎、苗栗夢花文學獎、雲林縣市的文化藝術獎、彰化縣市的磺溪文學獎、台中縣市的台中文學獎與大墩文學獎，都屬於有持續性報導文學獎項競賽的地方文學獎，此外亦有部份大學的文學獎設有報導文學獎，如東海大學的夔鳳文學獎。隨著各縣市地方意識的抬頭，報導文學獎項雖然從全國性的文學獎中退下舞台，然更在地方文學獎中活躍，顯示新世紀以來的報導文學已經過蛻變而以不同的姿態在不同文學場域中活躍。此外在全國的各地方社區大學，每年所開設的課程當中也有不少地方文史的報導文學寫作課程，或文字或影像地

¹ 張堂錡，〈體系化的探索、建構與可能——台灣報導文學理論研究綜述〉，《政大中文學報》第 5 期，2006 年，頁 167-195。

吸引著無數在地民眾的參與，²這些寫手的作品或許也僅是發表在地方性的刊物上，然而不啻為報導文學的另一種新生。但不得不解決的問題是，這種社區大學與地方文學獎項顯現出的「報導文學在地化」、「報導文學的新生」，這種轉型過後的書寫模式還是不是報導文學？與 70 年代的報導文學在內涵與訴求上有何差異？以及報導文學在面對這樣的轉型，究竟是益發活化還是益發僵化？³隨著報導文學場域的變遷、發表環境的轉變、寫手的年輕化與素人化、文學獎評審的集中化等，這些現象帶給報導文學在文學場域的結構與發聲之影響或轉移究竟為何？這些問題都必須獲得處理。

一般以為台灣傳播媒體的庸俗化、大眾化，致使報導文學過度崇高而嚴肅的「理想主義」顯得格格不入，也因此導致 1980 年代引領報導文學的《人間》雜誌最終走向停刊的命運，同時也為台灣今日報導文學的沈寂做出結語，但這解釋並不能解決報導文學全部的問題，筆者認為仍須追問的是：沒有消失的報導文學去了哪裡？在所謂「庸俗化、大眾化、商業化」的今日台灣，如果堅持報導文學並非「消失」，它又是以何種姿態被創作、出版、繼續存在文學界呢？這當中關係著多個文學場域的轉移，不僅是作家群，同時包含著媒介與出版，甚至是作為受眾的閱聽人是否也有所轉型？報導文學作為一個與社會緊密連結的實用型文類，是否更應該將之放在更複雜、多重的網絡，而非作為一個單純的文類在討論其消亡與否？寫作報導文學的作家必須是有其對社會發聲之目的，才會以此文類寫作，「發聲」的目的在於有一個與之相對應的「受者」，這「影響」與「被影響」之間，正是文學社會學對文學生產之討論的關鍵模式。作為報導文學此一文類的研究者，在面對報導文學似乎逐漸走向邊緣文類的同時，重新審視此一文類在整個社會與文學界的互動變遷更有其必要。

² 如南港社區大學在 98 學年度由李志蓄開設「南港在地文史寫作」，課程理念為「讓學員理解報導文學的內涵與定位以及報導文學創作的面向之外，藉由報導寫作，強化學員對地方的認同感和向心力，進而擴大對公眾議題的關心，以及對人文世界的思考與關懷。」

³ 如張耀仁在第 4 屆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東華大學主辦，2010 年 3 月 26、27 日）所發表〈新世紀以來報導文學在台灣之論述分析－以地方文學獎得獎作品為例（2000-2009）〉一文中便提出，地方文學獎的報導文學獎項多半限制與當地風土民情相關，長年下來有過度聚焦在該縣市特色的刻板化書寫現象，如苗栗的夢花文學獎便常見木雕、蛇窯此類傳統產業等。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概念界定

在研究的時間斷代上選擇 1970 年代作為起點，並非此前在台灣沒有報導文學的存在，很多論文篇章皆已經討論過楊達在日治時代對報導文學的提倡，且同時討論自大陸 30 年代以降便開始發展的報告文學隨著國民政府的來台，在同時間的平行空間上與台灣文壇的互動影響，以及垂直時間順序上台灣文壇的承先啓後之可能，然而楊達當時的登高一呼一直到 1970 年代以前皆未能獲得文學界的響應與支持，正如陳映真所說「回應他的竟是漫長的沉默」，沒有足夠的歷史資料證明這段時間的報導文學作為一種文體類型，已有形成一個傳播意義上的文人圈或文學消費圈。故，以台灣 1949 年以後的文壇發展而言，1966 年國軍文藝金像獎與嘉新新聞文藝創作獎⁴二者雖開台灣報導文學之先聲，但沒有引起文壇的注目或跟隨，而在進入 1970 年代後，國軍文藝金像獎持續對報導文學進行徵選，加以此時高信疆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開闢「現實的邊緣」專欄，進而在時報文學獎徵選報導文學，方進入台灣報導文學引領風潮的時代，正如鄭明嫻所說：1966 年，國軍文藝金像獎設立報導文學獎，1976 年《中國時報》設立報導文學獎，其他如《台灣時報》副刊、《戶外生活》雜誌、《綜合》月刊等等，許多傳播媒體的推動，形成台灣報導文學的興盛期。⁵因此固然在 1970 年代以前並非沒有報導文學存在，而是 1970 年後才凸顯出報導文學與傳媒的密切關聯性。作為台灣自身文學環境下的產物的「台灣報導文學」，以此為一個起點展開與台灣社會環境、文學生態密切交流的過程，本論文選擇 1970 年代作為起點，正是著眼於當時的傳播媒體環境足夠成熟，與隨之成形的文學消費圈。這種文學的消費化、商品化導致無論大眾文學或純文學都走向重視市場以及行銷的必然，「文學」與「傳播」之間便產生千絲萬縷的關係，文學再也無法自外於社會而僅以美學價值存在，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為營利而存在的商品，⁶此時出現的報導文學作為一種以「理想」、「針砭」、「暴露」為目的的文類，相形之下則顯得相當另類，這當中的反差與作用十分值得思考。

在現有的報導文學前行研究中，大多花費極大篇幅討論報導文學的文體類型

⁴ 蔡豐全，《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分析》，政治作戰學校新聞所碩士論文，2002 年，頁 5。

⁵ 鄭明嫻，〈新新聞與現代散文的交軌〉，《現代散文現象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 年），頁 146。

⁶ 相關研究可參見莊麗莉，《文學出版事業產銷結構變遷之研究——文學商品化現象觀察》，國立政治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1995 年。

以及定義問題，可惜這類定義多是創作者本身的經驗式分析⁷或是論者的自說自話⁸，這些分歧的說法雖有其開創報導文學各類可能的貢獻，然而在經過眾多研究者的爬梳與整理後，這類文體、定義問題不但沒有獲得解決卻只顯得更加模糊曖昧，論者如須文蔚等傾向歸因於文學理論的批判隨著環境改變而減弱，加以媒體環境轉變，導致過去刊載報導文學的報紙副刊，影響力大不如前，再者台灣報導文學在 1980 年代後沒有更多成熟的作品以供分析討論，顯得後繼無人，因此隨著報導文學熱潮的消退，不少曾擔任報導文學重要寫手或是批評家等俱也日益沉默，理論的論述不足又加以報導文學本身定位的尷尬，結果報導文學成為既非新聞學、也非文學、亦缺少方法論的「三不管地帶」。⁹面對此一窘境，須文蔚與向陽共同編寫的《台灣報導文學讀本》提出「報導文學鬆綁論」¹⁰試圖為報導文學解套，以求新的活力。然而報導文學研究真的鬆綁了嗎？在近年的研究當中，大多仍將研究眼光集中在不具有爭議的研究題材上，如公認的報導文學刊物、具有相當地位的報導文學職業作家、常見的報導文學素材議題等，如此「安全」的篩選研究範圍的結果，顯示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不斷深入挖掘，然而卻無法擴大報導文學的範疇或是注入新的可能，因此筆者在本論文中，將採取須文蔚「藉由解除絕對客觀書寫、學術式書寫以及體式偏向散文等迷思，擴大書寫者的空間，讓報導文學能回歸到文學創作的場域，累積與民間社會的緊密臍帶關係。」¹¹之說法，以比較寬鬆的報導文學定義，藉此企圖涵括更多可能的報導文學作品樣式，而對於過去報導文學「定義」的種種爭議與眾家說法因前人已多有著墨，便不再討論。

相對於台灣近年報導文學研究的趨於寂靜，大陸學界則在報告文學¹²研究上著力甚多，審美的文學分析與理論建構俱較台灣完備。借鏡大陸學者周綱鳴在《怎

⁷ 如林清玄的「竹筍說」。

⁸ 如高信疆的「借火說」、或是「史記說」。

⁹ 須文蔚，〈報導文學在台灣，1949-1994〉，《新聞學研究》第 51 期（1995 年 7 月），頁 132-133。類似說法也出現在張堂錡的〈體系化的探索、建構與可能：台灣報導文學理論研究綜述〉一文中。張堂錡認為報導文學理論研究存在四個必須面對的困境：其一，文體定義、本質、特性莫衷一是；其二，欠缺方法論；其三，缺乏典範力作；其四，研究人力不足。

¹⁰ 須文蔚，〈導讀：再現台灣田野的共同記憶〉，收錄於向陽、須文蔚主編，《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 年）頁 7-8。

¹¹ 同上註。

¹² 本論文為區分台灣報導文學與大陸報告文學之不同，故將大陸的作品統稱為「報告文學」作為區別。但這並非表示台灣的報導文學與大陸 30 年代以降的報告文學發展沒有淵源關係，僅以名詞區別以示「今日」兩岸報導/報告文學之分。

樣寫報告文學》¹³的說法，他認為報告文學必須具備：真實性、時效性、新聞性、目的性四個要件，似乎在台灣亟欲為報導文學鬆綁的同時，大陸的學界卻更加嚴密的界定「怎樣叫做報告文學」，若是採取相同的界定方式，在台灣卻勢必將為數並不多的報導文學作品更加排斥在外。因此，雖在近年的報導文學研究中，論者常引述大陸報告文學圓熟的理論成果作為對照，但在本論文中考量到討論關鍵不在純文學的審美分析，亦非報導文學的類型理論，目的在於集中討論台灣的文學生態與媒體圈對「報導文學」此一文類的交互影響，以「傳播模式」、「文人社會」、「文學生產過程」為主軸開衍，在全然不同的媒體環境與文學生態下，若是加入對岸報告文學的討論，意即牽涉兩岸社會與文學、文化內涵的相異，則非本文所欲處理的問題，故限制以「台灣報導文學」為內容，時間上以台灣近四十年為範圍。

在討論的文本對象上，筆者在本論文中將以報導文學獎的得獎作品做為主要觀察對象，包含國軍文藝金像獎、嘉新新聞獎、各文藝獎章、時報報導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各縣市地方報導文學獎等，並加入《人間》雜誌以及社區大學報導文學相關課程做為文學獎以外的切入點，一方面避免在報導文學定義問題上的糾結，另一方面也透過文學獎機制以及文學媒體的運作，以及此二者在社會間的迴響與共鳴等現象，觀察報導文學在其中呈現的歷時性發展與趨勢。

第三節 前行研究與文獻回顧

在文學研究的大環境中，報導文學雖被視為沈寂的領域，但仍有不少學者持續對這塊尚未開發完全的土地進行開墾。整體而言，早期無論單篇論文或學位論文的討論重點多在報導文學源流說、文體特色、寫作特色、議題內容與專家作品批評中打轉，不免是因企圖建立報導文學在台灣文學史的脈絡而導致的必然。因此，近期的研究者則試圖在過去落入僵化的報導文學批評中找出其他新焦點、新視野，提出其他報導文學的載體，或是尋求新的方法論。

專書方面，從陳銘礪《現實的探索》¹⁴中經驗式的漫談與概論，到楊素芬

¹³ 周綱鳴，《怎樣寫報告文學》，香港：朝陽出版社，1982年。

¹⁴ 陳銘礪，《現實的探索》，台北：東大出版社，1980年。

的《台灣報導文學研究》¹⁵，體現了報導文學批評已從較粗糙的經驗論述，到學術化的深度討論。作為號稱「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報導文學研究著作」，楊素芬的論述頗為要義的綜合此前報導文學散見的論述，條理清晰分明，往前亦論及報導文學的各家源流說，試圖為台灣報導文學找出一個可供上溯的歷史脈絡，進而為報導文學所以在 70 年代盛行，提出社會、傳播與文學的三重因素，並釐清屬於台灣報導文學的文類特色與文類義界，最後以總結方式概論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現象，提出所期待的報導文學寫作模式，對於代表性作家也加以篇幅簡介整理。全書涵蓋層面極廣，作為「第一本」的企圖心與史料用功十分值得肯定，如張堂錡所說「走向系統，就成為這部著作最重要、最有價值的特徵」¹⁶。然而正因作為第一本，不免有其不足，隨著日後資料與論述的逐漸深化、累積，本書難免顯得侷促，「社會、文學、媒體」的區分受限於篇幅或其他因素而未能進行更深刻的討論，例如忽略了《人間》雜誌等報導文學的重要刊物。此外，文中大量引用眾多報導文學作家及研究學者的說法，在系統整理歸納後，在眾說紛紜之中卻無法提出綜合性的意見或個人的創見，最終稍微流於駁雜。

碩博士學位論文方面，亦有十餘篇的產量，或是綜合性的建構台灣報導文學史的發展系統、比較性的對照兩岸報導／報告文學的差異，亦有針對公認的報導文學代表性作家之作品討論者，近年較常見者是以報導文學中的議題作為主軸進行討論，以及以報導文學重要性刊物、副刊為討論核心者。

謝明芳的《當代台灣報導文學興起與發展》¹⁷為綜合性的討論，此論文透過台灣報導文學在文壇的流變過程、在現代文學的定位、在傳播學上所扮演角色以及現階段的危機與重生，將台灣報導文學的討論往前推至日據時代，並對光復後、解嚴前的發展也有關注，但可惜謝明芳的論點大抵不脫楊素芬的範疇，令人不禁憂心：在《台灣報導文學研究》經過十年的今日，報導文學的研究是否在某些層面上停滯了？是否有突破前人僵局的可能？而吳薇儀的《兩岸當代報導文學比較研究》¹⁸恰可說是回應了僵局，改以同時性兩岸報導／報告文學的發展開拓新的討論空間，該論文著重兩岸報導／報告文學史的建構、創作現象的差異，以

¹⁵ 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研究》，台北：稻田出版社，2001年。

¹⁶ 張堂錡，〈體系化的探索、建構與可能——台灣報導文學理論研究綜述〉，頁 185。

¹⁷ 謝明芳，《當代台灣報導文學的興起與發展》，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2年。

¹⁸ 吳薇儀，《兩岸當代報導文學比較研究（1976-200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4年。

及理論批評的特色與比較，在內容、形式、題材選擇、寫作態度、傳播現象上具有論及，規模宏大且有新意，在台灣的報導文學理論顯得停滯不前的同時，對岸蓬勃的報告文學發展與台灣形成有意義的對比。

此外，尚有集中作家作品論的論文如郭曉萍《陳銘礪報導文學作品研究》¹⁹、薛麗珠《古蒙仁的報導文學作品研究》²⁰等，俱在兩位有相當成就與作品累積的報導文學作家著墨。亦有以相關雜誌或獎項紀錄為主之論文如張明珠《《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研究（1978-2000）》²¹、許振福《人間報導·文學人間——《人間》雜誌及其影響研究》²²、劉依潔《《人間》雜誌研究》²³、胡文嘉《《綜合月刊》報導文學作品之敘事分析》²⁴、蔡豐全《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分析》²⁵。張明珠的論文對報導文學發展的兩大重要推手得獎作品進行研究，分析寫作風格特色與議題類型歸納，以此為脈絡線索再次整理台灣報導文學的緣起、發展、功能等，兩大報作為台灣報導文學熱潮的關鍵，以此輻射觀之台灣報導文學在 1970-1980 年代的歷史自有高度意義。劉依潔的論文在兩大報之外，對報導文學刊物《人間》雜誌作全面的討論，從《人間》的靈魂人物陳映真的創刊理念與媒體觀點談起，再深入刊物本身，對發行的四十七期之主要題材與反映的時代性做出分析，最終以停刊的原因及代表意義作結，在整體的理念、時代關鍵性、歷史定位上做評述，接續了兩大報的討論延伸出 80 年代報導文學發展的軌跡。許振福的論文則在劉依潔的基礎上，討論《人間》雜誌的承先與啓後，從《綜合月刊》到《新故鄉》為《人間》雜誌的地位建立一個立體的繼承譜系，再從敘事學角度切入《人間》的主要作家寫作特色與雜誌整體風格，為以陳映真為主體靈魂的辦刊風格做出具體的分析。兩大報的副刊與《人間》雜誌在 1970-1990 年這二十年間是報導文學活動的主要場域，對於這三者

¹⁹ 郭曉萍，《陳銘礪報導文學作品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²⁰ 薛麗珠《古蒙仁的報導文學作品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²¹ 張明珠《《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研究（1978-2000）》，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²² 許振福，《人間報導·文學人間——《人間》雜誌及其影響研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²³ 劉依潔，《《人間》雜誌研究》，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9 年。

²⁴ 胡文嘉，《《綜合月刊》報導文學作品之敘事分析》，國立東華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6 年。

²⁵ 蔡豐全，《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分析》，政治作戰學校新聞所碩士論文，2002 年。

的整理與討論有其必要與必然，在「台灣報導文學史」的直線歷史建構上，橫向的發展出以文學載體討論報導文學發展現象的模式。而蔡豐全的論文在報導文學研究集中討論在文壇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兩大報文學獎同時，首先突出了作為「事實上」²⁶台灣第一個徵選報導文學獎項的國軍文藝金像獎的特殊性與其意義，並在向來被理解為反共、戰鬥的軍中文藝內，討論軍中報導文學與民間報導文學兩者互相交流影響之下風格與訴求的異同與淵源關係，而藉由受到較嚴格的文藝政策規範與影響的軍中報導文學，也更清楚顯示出報導文學作為一個時代下的產物，是如何隨著制度、政府、文藝社區／社群等產生變異。胡文嘉的《《綜合月刊》報導文學作品之敘事分析》集中於報導文學的新聞性與文學性，新穎的採取敘事分析角度為報導文學提供另一種研究途徑，並提出在兩大報副刊與《人間》雜誌之外，足以填補報導文學從楊逵到高信疆之間四十年落差的《綜合月刊》，無論在研究手法或研究題材上，都開啓新的視野。

以性別議題為主的相關碩士論文則有陳柳妃，《台灣女性議題報導文學：以文學傳播理論為核心的初探》²⁷、張卉君，《寫在邊緣：台灣女性報導文學中的性別政治》²⁸。陳柳妃的論文試圖證明「女性報導文學並不以文學獎或副刊為主要發表場域」，藉由女性議題來走出報導文學研究對媒體載體的迷思相當具有突破性，也許可以視為「報導文學鬆綁論」的一種實踐。張卉君的論文則以女性報導文學作家為核心，討論在報業職場乃至報導文學中身為女性作家的被侷限與窘境，進而討論文學場域中女性作家的發聲／失聲，以及這群較少被關注的女性作家書寫的特質、關注議題和策略化訴求等，故可說此論文乃立足在女性身份之上對報導文學進行另一種視野下的脈絡建構，提出「女性報導文學史」。

以原住民為議題的相關碩士論文有陳震《原住民報導文學與原住民運動之聯繫—從公眾行動的角度探討報導文學的社會功能》²⁹與林秀梅《台灣原住民報導文學作品研究》³⁰。陳震論文的貢獻在於提出許多過去為人所忽略的原住民主辦

²⁶ 過去學者通常以時報文學獎的報導文學項目作為台灣報導文學獎設立的起點，如鄭明嫻、蔡源煌。

²⁷ 陳柳妃，《台灣女性議題報導文學：以文學傳播理論為核心的初探》，國立東華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年。

²⁸ 張卉君，《寫在邊緣：台灣女性報導文學中的性別政治》，國立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8年。

²⁹ 陳震，《原住民報導文學與原住民運動之聯繫—從公眾行動的角度探討報導文學的社會功能》，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³⁰ 林秀梅，《台灣原住民報導文學作品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雜誌，擴大了報導文學場域的可能性與視野，並將報導文學的功能性突出，將原住民報導文學寫作視為原住民運動的一部份。林秀梅的論文以《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為主要對象，選取 14 篇原住民報導文學作品，兼論及劉還月等³¹四位作家對原住民報導文學的貢獻，作者以原住民議題的關懷作為核心進行探討，惟擇取標準模糊以及報導文學內部的討論較少。

在報導文學理論批評上，可惜目前尚未有學位論文出現，但單篇論文則有胡文嘉的〈台灣報導文學批評初探〉³²與張堂錡的〈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的困境〉³³。在胡文嘉的〈台灣報導文學批評初探〉一文中，他將台灣報導文學批評史的討論主題區分為台灣報導文學的緣起³⁴、報導文學的文體特色³⁵、寫作方法的探討³⁶以及報導文學式微³⁷的探討四個方面。此文大抵上總結了七十年來台灣報導文學各方論文的意見，做了比較明確的區分，並且提出報導文學批評所以停滯不前的幾個可能因素以及批評上的盲點，如報導文學的源流問題仍未有更詳細的相關爬梳、台灣的報導文學關於文類的討論缺乏系統性論述、新聞與文學間的尷尬關係以及討論文本的日益缺乏。張堂錡在〈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的困境〉中將困境歸納為四：文類定義的模糊不明、媒體應用性的過度干涉、意識形態的僵化牢固、題材的未能推陳出新，進而在其後的另一篇專文〈體系化的探索、建構與可能——台灣報導文學理論研究綜述〉中再進一步深化討論原先提出的台灣報導文學四個問題：1、文體定義、本質、特性的莫衷一是 2、方法論的欠缺 3、典範性力作的缺乏 4、研究人力的不足。此三篇批評的綜觀性文章，為近年來的報導文學研究下了結論式的註腳。

綜合前言，此前的報導文學研究在楊素芬的基礎上已有初步的擴大與精化，然而有許多困擾未解的問題也並沒有隨著時間的累積獲得答案，如文體的定義與文類的曖昧不清，在缺乏更多報導文學作品、或說缺乏學者對更多不同類型的報

2000 年。

³¹ 各章提及者有瓦歷斯·諾幹、王蜀桂、劉還月與陳銘礪。

³² 胡文嘉，〈台灣報導文學批評史初探〉，《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 5 期，2007 年 6 月。

³³ 張堂錡，〈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的困境〉，《空大學訊》第 242 期，1999 年 11 月。

³⁴ 新新聞的影響、《史記》源頭論。

³⁵ 虛構與非虛構、散文或小說、主觀或客觀。

³⁶ 與第二項息息相關的，「報導文學該如何寫作才『是』一篇報導文學」的相關討論。所提出的各種方案包括 1、向新聞學借火 2、向歷史學求佐證 3、田野調查找線索 4、照相攝影窺真相。

³⁷ 提出林耀德、須文蔚、張堂錡三者的說法為主，但認為雖然三位都提出報導文學應回歸到報導、理論鬆綁等，但依舊沒有拋開既有的論述對報導文學可能的型態之文章（如採訪報導）做出評論。

導文學進行分析之前，仍舊懸而未決。而部份的論文已經跳出這些無法解答的基本定義困擾，試圖為報導文學研究走出新的方向。

第四節 研究方法

由於本論文試圖從傳播、社會與文學的三方面討論報導文學，意即透過文學社會學角度，將報導文學視為一種文學產物來開展環繞於其周圍的文學場域之變遷，假設在此中有「論述」(discourse)在場域中交織著，那麼規約的生產與傳播又是以何種面目在作用？³⁸隨著波爾多學派³⁹的文學社會學研究方法興起，在文學研究之中加入對傳播、社會、文化的研究成為文學研究的另一種可能，其中代表者如林芳玫的博士論文《解讀瓊瑤的愛情王國》⁴⁰，在瓊瑤小說的文本分析之外，加入大量文學傳播與社群、歷史環境的外緣分析，成為一種具體的、新的文學社會學研究模式；又如向陽的《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⁴¹一書，便以台灣文學的「傳播現象」作為研究主軸，討論其與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關係，將文學傳播現象視為文化變遷與社會變遷所孳生出來的共享過程，探究這過程中產生何種意義。

在埃斯卡皮 (Robert Escarpit 1910-2000) 的實證社會學方法中，提出「傳播」與「出版行為」的重要性，以「社會實體觀」、「集體意識與集體表象」、「社會事實」與「道德規範與道德權威」來解釋社會自行動乃至意識對個體的支配、影響，他在《文學社會學》(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⁴²一書中，將全書分為四個部份：

原則與方法 (如何研究文學事實)、生產 (時代中的作家、社會中的作家)、傳播 (發表行為、發行圈)、消費 (作品與讀者、閱讀與生活)，這四個部份所說明的是文學誕生之運作過程，他認為文學是以兩個形式出現：一種是藉由中介物將作

³⁸ 倪炎元即曾對此作一耙梳，指出「論述」的運用有兩個大致方向，一是與語言學選擇性的親近，主要在於處理特定脈絡下一組文本的語言使用；另一則與哲學、文學及社會學選擇性親近，旨在處理一組被規約陳述的生產與傳佈。倪炎元，《再現的政治：台灣報紙媒體對「他者」建構的論述分析》(台北：韋伯文化，2005年)，頁51。

³⁹ 代表人物為 Robert Escarpit (1910-2000)。

⁴⁰ 林芳玫，《解讀瓊瑤的愛情王國》，台北：商務印書館，2006年。

⁴¹ 林淇瀟，《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2001年。

⁴² 埃斯卡皮 (Robert Escarpit) 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台北：遠流，1990年。

者與讀者連結的「過程」形式；一種是確保中介物運作的「機構」模式。「過程」是指文學作品從作家創造，透過印刷使作品成為大眾傳播的手段，由語言將之串連，而書籍便是中介物。「機構」則是指全面性的考察整個文學的生產、市場和消費，是社會化的過程。因此在《文學社會學》的開頭便寫到：

任何文學事實都須有作家、書籍和讀者，或者說得更普通一些，要有創作者、作品和大眾。於是產生了一種交流圈，透過一部極其複雜、兼具藝術、技術和商業特點的傳送器，把身份明確（甚至往往是享有盛名的）的一些人和一個多少是匿名的（但有限的）集體結合在一起。⁴³

艾斯卡皮繼承鄧納的三元論⁴⁴，認為每個「世代」會因其共同的歷史經驗、社會背景而產生專屬於該時代的技術手段，文學作品是個性化的作家透過這個手段與公眾之間的對話，他在三元論之外又強調「大眾讀者」的存在角色，並提出文學書籍的生產、流通與消費這一連串「發行行為」的傳播問題是一個文學事實，亦即他所關心的是文學的「現象」而非「範疇」。同理運用在報導文學的研究上，關於報導文學的「範疇」仍眾說紛紜，且又缺乏持續有力的作品以供分析的今日，在前人已經爬梳多次的文體定義上繼續鑽研，並沒有辦法為報導文學獲得更新或是更好的答案，因此筆者轉移焦點，從「文學現象」的角度重新審視報導文學從過去到現在的發展所圍繞的變動因子，跳脫文學藝術抽象的辯證，而從較實證主義的方式入手，以期待藉此為報導文學的討論提供可能的另一路線。

關於文學作品與社會學之間的研究方式，有兩種主要的研究方向：一種是以作品的內容來檢視當代社會現象，在這種模式下，文學被看作是社會集體概念、思想、現象的具體化，這類研究事實上是透過文學瞭解社會現象，並且將文學中所描寫表現的人事物等諸多面相，皆視為必然的社會事實，換言之是單純且直向的文學反應現實論。第二種研究取向則是探討社會環境與結構如何影響文學作品的生產與流通，研究內容包括：作家的來源及其社會地位、文學贊助的形式、出版業的結構，甚至是閱讀群眾的人口分布與社經地位組成等。綜合上述兩種所謂「文學社會學」的方式，筆者試圖組成一個更為有效的報導文學研究方法架構，

⁴³ 同上註，頁3。

⁴⁴ 鄧納 Hippolyte Taine（1828-1893），其主張為科學主義決定論。鄧納的方法是以實證方法與具嚴格體系精神的理性主義，形成為科學主義決定論的文學研究方法，提出種族、環境和時代三者為文學家的特點、文學創作或文學現象的限制因子，此為三元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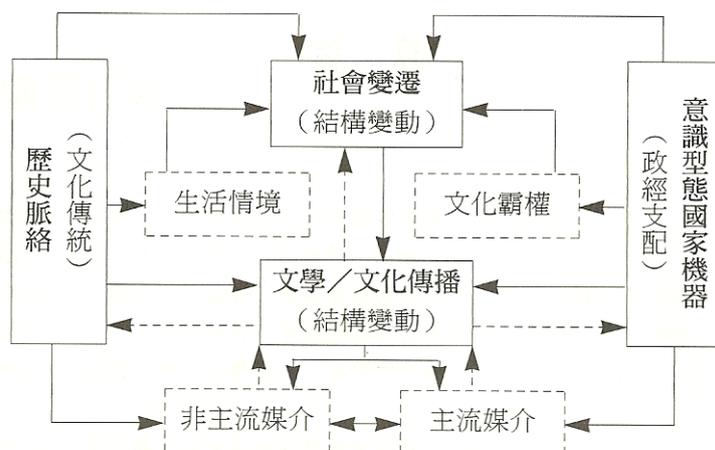
力求綜合處理「文學」其內在及外緣的每一面相：從內在的文本形式到它的生產者、發表地與讀者群的接受、迴響過程，以及在整個流動的社會時代下集體意義的建構。因此本論文乃是企圖透過文化分析與文學社會學的方式，結合傳播學中的傳播／接受與文學本身所自有的生產特殊性，盡可能在「報導文學」這一自文類、定義乃至存續與否的一團曖昧中，找出新的研究途徑。

在研究方法的架構上，筆者主要採取向陽的《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以及林芳玫的《解讀瓊瑤的愛情王國》二書的研究策略。向陽在《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一書中，根據葛柏納的傳播模式，融合文學社會學，對「文學傳播」提出以下的定義：

文學傳播，乃是文學傳播者（作家或編者）掌握某一事象，加以描寫（或反應），在某一情境中，透過某一媒介，提供某一訊息，並以某一表現形式（小說、詩、散文等），在某一情境架構中（文本或文學情境架構）中傳遞內容（或文學訊息），而產生某種效應的傳播過程。⁴⁵

在這定義中強化了艾斯卡皮所說的「文學現象」或「文化活動」中的「傳播」內涵，因「文學傳播」事實上就是作家、媒介與讀者三者間構築的文學現象之發生過程，故文學傳播現象的研究，便是探究這過程中的意義與產生模式。而為進一步釐清文學傳播現象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可圖示如下：

文學／文化傳播與社會變遷關聯模式圖⁴⁶



來源：林淇瀟，1993：220

⁴⁵ 林淇瀟，《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頁 14。

⁴⁶ 同上註，頁 10。

由上圖可知，「文學／文化現象」受到「社會變遷」、「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及「歷史脈絡」不同程度上的影響，三者關係著文學／文化傳播的內容與媒介運作，進而文學意義的產生與製造也間接受此三者變動因素的影響，這是以傳播角度探測文學變遷的三個重要切入角度。

再者，借用林芳玫在其博論《解讀瓊瑤的愛情王國》中所分析出的文學社會學研究模式⁴⁷，其所建立出的研究模式對於探討文學與社會間的互動有全面且深刻的效果。湯普森在《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⁴⁸一書中提出文化分析模式四階段：形式／文本分析、制度分析、社會／歷史分析、／批判／二度詮釋，再將此四階段細分為八個單位：文本、作者、讀者、類型、文學社區、文化工業、制度以及社會。

形式／文本分析在過去前行的報導文學專家論文中已經進行過不少討論，這類的文本詮釋屬於文學內在的問題，但本論文中並不以文本內部的詮釋，或是報導文學的文類與內容定義等眾多爭論為主軸，而是藉由外在文學場域對報導文學形式、體裁、篇幅、寫作模式的影響作為主要討論的核心，因此在文本內容上將以前人的論述作為參考，而著力於其與外緣的交互影響。

制度分析牽涉到的是文化產品如何被生產、傳遞、接受及評估。這可以再分為兩方面，第一是文化生產的組織層面：初級生產者（作者）和次級支援生產者（編輯、出版社）之間的合作或衝突、生產過程中可得到的資源或限制、市場結構與競爭、讀者組成方式等，這是在台灣的副刊學中時常以「守門人」（Gate）角度討論的議題，這是屬於文化生產的問題。第二是研究文化社區的理念及傳統如何影響其中的成員之定義與培養，並進而影響到資源和聲譽的分配，這類研究偏向馬克思主義中的階級問題，如近年布迪厄（P. Bourdieu）的論述。這種文學社群所形成的階級，嚴重地在文學團體中發揮效應，以台灣來說最明顯的例子便是鄉土文學論戰中現代派與鄉土派的論辯⁴⁹，在報導文學研究中，必須注意的

⁴⁷ 林芳玫，《解讀瓊瑤的愛情王國》，頁 6。

⁴⁸ 約翰·B·湯普森著、高銛譯，《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江蘇：譯林出版社，2005 年。

⁴⁹ 當然鄉土文學論戰所涉及的不僅是審美上的，同時包含政治意義上以及文學利益上等等的問題，前人對此已有諸多評論。

是專業作家們所處的社會階級以及職業環境、自覺的身份也絕對的影響著他們創作時的偏好。

社會／歷史分析所要討論的是社會結構與時代的關係，但並非單純的將社會現實套入文本，或是逆向的將文本中的內容衍伸到外在社會；固然報導文學由於其「報導」的性質、「求真」的特色，必然會與當時社會事件有直接的對照與關聯，但正因其與社會事件的對照性之毋庸置疑，因此不在本文所討論範圍內。而同時，此處的社會／歷史分析也同時包含著歷史結構如何影響文學作品的生產、傳遞與接受之流程，此部份與前述的制度分析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是藉由出版市場的結構、作家來源、讀者組成是如何與當代社會結構互動互生，而這個結構又是如何根植於當時的政治、經濟等大幅度的活動等，作全盤的析論。

最後一個階段是批判／二度詮釋，意義的生產是服務並增強著社會的支配關係，而文化分析是創造性的整合，文本、制度、社會歷史分析都構成詮釋的一部分，最後的綜合分析乃根基於前面已形成的詮釋，可能是二度甚至三度的詮釋。至於批判性則是在於探討意義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意義生產的結果如何建造並維持宰制，而透過批判性的揭露，這種分析將具有動搖人們對周遭世界認知的可能性，然而又時有成敗。報導文學作為鄉土運動下的產物，寫作報導文學者的「喚醒」之企圖與當代社會之「迴響」，二者作為對照與再詮釋，正隱藏著一種「高」對「低」、「社會良心」對「待啟蒙的百姓」之間的權力支配，藉由對現實的報導或說揭露，達到重塑人民對社會、環境乃至政府、政策的認識與思考，並同時也逆向的移動著人民、社會、環境與政府、政策之間的固定關係，透過這種分析方式正可以重新審視報導文學所聲稱的「效果」。

而若進一步將報導文學置於文學社會學的八項分析單位之下，則有以下分析角度與討論主題：

- 1、**文本** 過去針對報導文學文本的內容分析，多數傾向為「主題」的歸納，因此被分類為教育問題、原住民問題、環境生態問題等等，這種分類固然有其凸顯報導文學社會現實性的意義，以及在單一作家作品研究上的必要，但長年累用的結果卻無法看出「報導文學」此文類內部的變遷，因此必須更深入的分析近年報導文學在過去固定幾類主題的分項下，隨著社會的轉型、媒體的興起、文類自身的轉變等，出現什麼樣的焦點轉移或書寫策略上的改變。

- 2、**作者** 隨著報導文學刊登、獎項、刊物等的多方面轉移，過去集中在記者與編輯群的專業寫手局面，逐漸轉向非職業的素人作家。這種作者群的變化，必然的影響報導文學本身內容的變化以及寫作風格的不同。
- 3、**讀者** 讀者的身份以及閱讀活動在他們整個生活情境中的地位，因之「閱讀」是積極主動的行為，是認知的形成與意義的詮釋，而非被動單一的接受訊息，這種具有能動性的閱讀過程，反而正是報導文學在創作之時的期待，這一文類訴求的互動性遠高於其他文類，積極要求介入讀者的思考，達成某一目的。
- 4、**類型** 類型作為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共識，它規定著某一特定寫作的方式，這些成規則形成了讀者的期待視野，但類型規則的模糊與曖昧亦可能會引起紛雜的多重詮釋。然而如報導文學的文學類型，作為當時一個新興起的文類，報導文學至今仍未有一個存在文本內、被公認、共識性的規範，而是經過不同的作者或發表形式與讀者之間的互動與交涉逐漸成型也不斷變形。
- 5、**文學社區** 這是象徵性權力鬥爭的場域，文學作品不只是被讀者私下閱讀，也受到文學社區成員公開的評鑑，這種賞析活動同時牽涉著酬勞與聲譽的社會運作。在台灣社會，文化界從被絕對的官方干涉到今天的相對自主，然而過程中過渡著官方機構的逐漸淡出，因之官方的勢力影響也是過渡性的而非一夕翻盤，即便在現今，官方機構也並未全面退出文化舞台，而是與民間文化機構同時並存，這是討論文學社區時不能忽視的一點。不同的生產、評鑑組織，眾多的文學獎與刊物，當中互異的文學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也顯示著社會上不同文化社區的角力。官方機構一面固然穩定地長期存在，但民間機構如《聯合報》、《中國時報》才是報導文學興盛之時最領風騷的關鍵，而小型刊物如《人間》、《新故鄉》即使起落不定、壽命不長，但作家群往往是文類中的核心人物。
- 6、**組織與文化工業** 相對於「文學社區」作為自發性的象徵社群，寫作畢竟必須透過組織來生產、傳遞其成果，這些組織在追求商業利潤的訴求下形成「文化工業」。文化工業在最初被動的製造源於文學社區的文化產品後，經過縝密的發展以動員更多資源、成本，反而能影響或整合文學社區，使得文學社區成為受制於文化工業的上層結構。報導文學的出版，從早期單一的報紙發表到雜誌的專題，乃至結集的出版，顯示其文學社區的自主性益發減弱，受制於文化工業的情形，或是因此消亡的現象則日漸明顯。

7、**制度** 文學典律化之後，必然形成所謂「代表性」的作品與「作者群」，整個抽象的過程是依靠學院的課程、文學獎的設立與文壇、官方機構等所共同使之具體化。報導文學目前缺少學術上的支持與建制，因此典範性的作品都是由文學獎與文學社區所產生，其間也受到官方組織與社會媒體的影響。

8、**社會** 社會結構對文學的影響是透過文化機構及作者與讀者社群的中介。例如社會的人口組成影響著作者及讀者的來源。此外，經濟發展影響印刷品的生產製造，識字率及教育水平影響讀者對文學作品的接受等，因此文學與社會的關係並不是文學被動而直接的反應社會現狀，而是社會結構本身就積極的涉入文學生產與接收的過程。報導文學的興起很大部份也關聯著台灣的教育狀況，1970年代的台灣正開始逐步向工商業社會轉型，中產階級與受教育人口達到一定程度，報導文學所關注的社會議題才能獲得迴響與社會的支持。

綜合上述，因此作品的意義並不只是存在於文本之中或是讀者心中，組織與制度的分析不僅是要顯現文學作品如何出版、流通，也為了其中間接或直接的詮釋了作品意義。報導文學的作品意義來自其批判性，作者藉由文中的批判隱藏著「喚醒、喚起」的目的，然而作者與讀者兩造所處的環境與社會位置，很大程度地影響著兩方的共鳴與相互理解，作者所設想的期待視野與讀者的前理解是否有重疊與呼應，也就是報導文學的「實際效用程度」問題，然而在報導文學的社會關聯性中這點卻很容易被忽略，假設兩者之間有達到一定程度的相合，這又是出於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背景？又假設兩者之間實際上存有落差，這又是因為社會環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文章意義絕非被動的存在，而是社群成員在互動過程中所共同構築，報導文學的意義也在這個由多個單位組成、互動的軌跡中不斷位移、重新建構，而非僵硬的停留在文類的界定與內容的層面上，必須獲得更活潑、生動的文化解讀。這種互動的流程是：文本意義由作者首先創造，經過文化工業的傳播，經過讀者的二度詮釋，再由文學社團轉化為意識形態，最終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被接受、遺忘、死亡或復活。以報導文學此文類本身而言，文化社區與文化工業的重複操作，是否造成報導文學內容上公式化、甚至僵化，這些都有待進一步釐清。

而須文蔚在《台灣文學傳播論》一書中，將台灣現行的文學傳播研究社群的成果分為六類：作家與傳播、文學媒體與傳播、文學內容型態與傳播、文學讀者

與傳播、文學評論者與傳播、文學傳播與社會。⁵⁰其中文學媒體既象徵著某種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同時也是文化價值生產的機器。⁵¹文學社群透過文學媒體的運作建構自身的典範系統，加以各媒體的編輯們處於守門人（**gatekeeper**）角色，對傳播內容的篩選、形成往往有關鍵性影響，由此可見文學內部典範的衝突與融合、爭奪發言權也是透過文學媒體的傳播情境在進行著，諸如文學獎、選集、論戰、副刊等皆屬於文學媒體研究的範圍。此外在文學社會學的研究上，也需要考慮到新的傳播工具、大眾媒體的變革等變化，媒體通路、社會環境乃至國家政策亦對作家與作品產生影響，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學場域理論便說明文學的發展同時也受到政府、宗教及市場等力量制約、支配，一個文學家並非單純的放棄經濟資本、「為藝術而藝術」，而是透過文學獎項、文學補助等機會來增加自己的文化資本，以獲得文學場中的聲譽，因此文學場的獨立、自主只是個假象。

筆者在本論文所欲達成的研究目的並非橫向地對當代報導文學發展現況做出切面，而是較偏向試圖在報導文學發展至今的縱向時間軸中以傳播模式為思考重心，重新爬梳出在此文類傳播的過程中有何已形成趨勢的傳播現象以及與社會社群相關的發展特色，分析報導文學文類運作、生產、傳播過程中文化資源與權力的分配及過程。依前言所敘述林芳玫的八項分析單位之理論架構，即集中強調「文學社區、文化工業、社會」這三者之間的互動與牽制、影響，其背後牽涉的文學社區與社群、傳媒的介入又是如何運作？最終期待建構出近 40 年的報導文學傳播模式傾向與現象。

⁵⁰ 須文蔚，《台灣文學傳播論》（台北：二魚文化，2009年），頁 46-58。

⁵¹ 同上註，頁 48。

第二章 多重角力下錯綜的報導文學面貌（1970年～1980年）

在討論 1970 年代前，有必要對當時的文壇環境及社會情況先做基本釐清。在國際上，1970 年代的台灣逐漸走向孤立，隨著 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保釣運動開始、1972 年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1978 年中共與美國正式建交，台灣內部則發生 1975 年蔣中正逝世、1977 年中壢事件、1979 年美麗島事件等，一系列的外交挫折加以國內政治局勢的微妙變化，台灣社會的危機意識與主體意識都隨之升高。社會影響所及，一方面對政府所聲稱的「中國正統」失去信心，但對於「台灣」的概念卻依舊模糊，經歷此前 20 年充滿禁錮的白色恐怖時期，此時的社會雖較此前略為開放，但黨禁、報禁乃至戒嚴皆尚未解除，官方的勢力仍緊緊掌控著社會輿論，國際政治的動盪則使原本建築穩固的集體意識形態產生瑕隙與質疑的裂縫。在文壇上，鄉土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以 1970 年前後為分水嶺，1973 年的現代詩論戰象徵性的結束現代主義文學此前的文壇主流地位，展開鄉土文學掛帥的十年。社會上的左翼思潮逐漸萌芽，加以保釣運動等關乎台灣國際地位的事件作用下，年輕的知識份子陸續走出上個時代蒼白無力的虛無感而燃起對社會改造的信心與熱情，進而走進鄉土，帶起民間文化的復興，這是一場「左翼思想與黨國的角力」。¹國際政治上的挫敗進而影響文壇的風氣，台灣文學的定位、何去何從都成為新的議題。1977 年鄉土文學論戰的發生不啻為這個問題的延伸，思考上述問題帶來台灣文學的主體意識覺醒，但卻與官方的大中國正統論述無法相合，文壇反映著社會上部份民眾意識形態的轉向，兩方的意識型態不得不爆發衝突與對抗。但事實上，此時所謂的「本土」存在著兩種意識，一是民族主義論的中國，以台灣鄉土為中國鄉土的一部分，回歸文化意義上的民族傳統；二是台灣的本土與人民，傳統並非關心的重點，而以台灣的土地與社會為主要關懷，但尚未涉及認同的衝突。游勝冠對此即言道：「基本上，70 年代還不是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分裂、對立的時代，對大部分推動文學本土化的文學工

¹ 見朱雙一，〈從個人叛逆到集體反抗：六〇、七〇年代台灣文學主潮的更疊——當代台灣多元文化思潮的視角〉，收錄於東海中文系編，《苦悶與蛻變：六〇、七〇年代台灣文學與社會》（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 年），頁 585。

作者來說，他們只是單純地回歸習以為常的『中國』的土地與人民。」²在這樣的內涵下，「鄉土文學」最終被定位為「民族文學」，以此緩和「工農兵文學」的攻訐，亦為官方所逐漸容忍。

與此同時，1970年代可說是台灣報導文學由蓄勁而起乃至風起雲湧的關鍵時刻，經過楊逵在日治時期提倡報告文學後長年的沈寂，台灣報導文學在1970年代開始重新現身在文學的舞台上，1975年由於高信疆的刻意提倡，最終才有進入1980年代搭上傳媒列車的繁花似錦時代之契機。誠如上段所言，當時的台灣社會實際上尚未進入言論自由的時代，但本土意識的抬頭——無論在何種「本土」內涵下——都引起對社會現實的關注、並期待更多的報導與真相，在一定程度內暴露黑暗、報導具本土色彩人事物的報導文學正是以此為契機誕生、茁壯。而基於1970年代社會的特殊性，報導文學的討論在論及民間媒體如何催生此文類的同時，也必須涉及當時勢力依舊龐大、穩固的官方與軍方陣營，並在這多重的交雜中還原此十年間報導文學的面貌。

屬於軍方的國軍文藝金像獎開始對報導文學項目進行徵獎始自1966年，在時間點上先於高信疆的腳步約十年，且在國軍文藝金像獎以前，軍中的報紙如《軍友報》便已有報導文學的徵選，³但因軍中作品的封閉性而無法讓普遍的民間讀者瞭解，然而作為台灣報導文學實際上的先鋒，軍中報導文學的歷史性意義與貢獻實有必要做出更清楚的爬梳。而在1975年7月14日，高信疆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⁴開闢「現實的邊緣」此報導性專欄，提倡「以文學的筆、新聞的眼，從事人生採訪」，隨之《中國時報》於1978年的第一屆時報文學獎中徵選報導文學獎項目直到1982年第五屆時報文學獎，在高信疆於《中國時報》的期間，《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都持續提攜這個新興起的文類，對報導文學的型塑與未來發展都有著極大的關鍵作用，深深影響著日後台灣報導文學的寫手、評審、寫作風格等各層面，但同時也預告了日後台灣報導文學發展可能陷入的僵局與侷限。在官方勢力尚且龐大的1970年代，國民黨控制下的政府以各種文藝獎章與控制下的獎項名目操作著報導文學的發言權與取向，然而這種消解報導文學批判

²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頁295。

³ 可參見蔡豐全對姜穆的訪談紀錄：「……，在軍中報紙《軍友報》時就有報導文學的徵選，它分好幾級的徵選，也是在國軍文藝金像獎之前就有這個報導文學的徵文，在民國四十幾年時就有了這個徵選，……。」。蔡豐全，《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作品分析》，頁174。

⁴ 以下皆稱《人間副刊》。

性的作法最終在邁向 1980 年代前夕不得不做出妥協、讓步與轉向，但官方確實如同其轄內的軍方勢力一般，在民間媒體以前便關注到報導文學此一文類的潛力。須文蔚在〈報導文學在台灣 1949-1994〉一文中論及台灣報導文學的源起道：

報導文學在台灣的源起，部份推動者試圖由中國文學史中溯源，甚而以史記、詩經為報導文學之濫觴（高信疆，1979），然而報導文學在臺灣的出現實基於特定的時空背景與意義，如此的溯源方式，不免將焦點模糊。探究直接的因果關係，台灣報導文學自宜以中國三〇年代的報告文學、通訊，以及美國七〇年代的新新聞學為源頭。⁵

而 1970 年代這十年做為台灣報導文學發展史上的啓蒙期，官方、軍方、民間媒體三者勢力在報導文學場域中的權力角逐與各自詮釋，正顯示出須文蔚所說的「中國三〇年代報告文學」與「美國七〇年代新新聞學」的兩條道路之脈絡。

綜合上述，本章企圖處理的是關於 1970 年代，各有哪些關鍵勢力加入報導文學的型塑過程，而在軍方、官方、民間這樣多重的文學勢力、各種文學社群的介入後，台灣報導文學的面目是趨向模糊抑或更加明朗？台灣的報導文學又在這個關鍵發展的過程中被引導向何種趨勢？又，一向在報導文學研究中被視為決定性時間點的 1975 年高信疆開闢專欄此一「事件」，又是否真能標誌報導文學在台灣文壇的誕生？

第一節 走在民間之前的軍中報導文學：國軍文藝金像獎

1965 年，國防部總政治部於復興崗舉辦為期兩天的國軍第 1 屆文藝大會，並成立「國軍新文藝運動委員會」，通過「國軍文藝金像獎設置規定」的徵獎章程。此文藝大會、委員會，乃至文學獎的成立，與隨後 1966 年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實為同一政策下的產物。1970 年起，依照軍種又各自設立有空軍文藝金鷹獎、海軍文藝金錨獎、陸軍文藝金獅獎等，1971 年國防部警備總部並另外成立文藝金環獎，一時之間軍中文藝獎大盛，然而皆是為「反共抗俄」、「復興中華文化」的政府文藝政策做鋪墊。

⁵ 須文蔚，〈報導文學在台灣 1949~1994〉，《新聞學研究》第 51 集，頁 121-122。

1966 年第 2 屆的國軍文藝金像獎開始徵選報導文學項目，這是台灣首次出現報導文學獎項的文藝獎項目，可以說國軍文藝金像獎的這個創舉，顯示出軍方比起文化界更早的注意到具有實用性或者說是宣傳性的此一新興文類。故，藉由觀察國軍文藝金像獎中報導文學獎的徵選以及得獎作品、審查委員，可觀察到報導文學在軍方陣營是以什麼有異於高信疆時期的面貌出現。蔡豐全在其碩士論文《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分析》寫到：

「報導文學」的定義，論者仍有不同看法。軍中首創「報導文學」設獎，應無疑義。然而，以軍中「報導文學」為國內「報導文學」的發源與啟蒙，未必能獲得學者普遍的認同。其原因在於：軍中的「報導文學」作品，甚少於民間刊物上發表，傳播對象多為軍中官兵。基於對軍中文學「反共」、「戰鬥」的一般認知，而作品又不可得的情況之下，學者難有機會真正閱讀軍中「報導文學」的作品，也未能瞭解軍中與民間在「報導文學」創作上的異同。⁶

此說一方面強調國軍文藝金像獎為台灣首度設立報導文學獎的歷史意義，但同時也論及國軍文藝金像獎因參賽者資格的限制與在議題上可能的侷限，學者在研究台灣報導文學史的過程中往往將之輕輕放過。然而國軍文藝金像獎與民間的報導文學究竟是平行發展的兩條脈絡、抑或是有著潛在的相互影響？走在民間報導文學之前的軍中報導文學又帶給新生的台灣報導文學何種色彩？軍中報導文學作為台灣報導文學起步較早的一股伏流，顯然有重新定義、挖掘其價值之必要。

一、1930 年代抗戰報告文學的脈絡延續

蔡豐全指出，軍中報導文學項目的徵稿、設獎並非僅始自 1966 年第 2 屆國軍文藝金像獎，而可推前至遷台初期的《戰友週報》、《軍中文摘》，⁷因此可知軍方在報導文學的使用上並不陌生，可說是起步甚早，但對此文類的認識與使用習慣又是從何而來？從歷史線索上便不得不追溯到 1930 年代的抗戰報告文學。

1920 到 1940 年代，從五四到抗戰時期的中國文壇在報告文學的作品上已

⁶ 蔡豐全，《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作品分析》，頁 2。

⁷ 同上註，頁 29。

有頗多成果，如朱自清在 1926 年的三一八慘案後寫下〈執政府大屠殺記〉等，阿英進而在 1932 年選編了《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1930 年代隨著對日抗戰的全面爆發，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左翼思潮傳播，描寫戰爭現實、暴露社會及悲慘生活景況的報告文學紛紛出現，如夏衍的《包身工》、蕭乾的《流民圖》、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等，可知在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之前，中國的文學界已經在報導文學上開出豐碩的成果。隨著晚清、五四以降許多作家的嘗試，加上選集的出現，可知當時的報告文學已是被普遍所認識、創作的一種文類。從這個歷史脈絡來看 1949 年後的台灣文學發展，當時台灣本土作家因日本統治而對中文不甚熟悉、失去文學的話語權，面對 1937 年楊逵對報導文學寫作的呼喚也始終沈寂，這時在台灣從事報導文學創作的作家便集中在軍中作家此一羣體。一方面基於軍中作家的外省身份故皆具備中文的寫作能力，加以台灣社會處於白色恐怖之下，一般作家不敢或也不願創作容易觸動禁忌、以「暴露」為目的的報導文學，而軍中的報導文學創作因主題上的限制，反成為宣傳軍威、鼓勵士氣的利器而被提倡、獎掖。另一方面，若是沒有 1930 年代抗戰報告文學作為前鋒，軍中報導文學的開始就顯得突兀，因此可以想像的是，基於遷台以前便已經對報告文學的創作有所認識，才有軍中報導文學的誕生。在蔡豐全對長年擔任軍中報導文學評審的姜穆進行的訪談中，姜穆亦表示：

……報導文學老實講是很新的名字，是出了報紙以後，其實是出現在抗戰期 1930 年代時，左翼作家誘導年輕人參加通訊組，但國民黨就比較不重視這些，到台灣之後我們檢討，就是因為這些原因，導致報導文學在國民黨不太流行。這個時候出現許多優秀的報導文學作家如白樺等。國軍文藝金像獎好像第二屆就有了報導文學的徵選，是國內最早的，但是這類作品的性質是介於新聞、散文和雜文之間，但又不是照著新聞六個 W 的程序來，但是它寫事實。⁸

但必須注意的是，做為與中國共產黨對立的中國國民黨，在遷台後的政戰系統中絕不可能容許所謂「左翼文學」的存在，因此姜穆的敘述應當被理解為：1930 年代抗戰時期因共產黨左翼文學鼓吹這類寫作，帶動了抗戰報告文學的寫作風

⁸ 同上註，頁 173。姜穆這對話中的「抗戰期 1930 年代」在時間點上疑似有所誤解，抗戰時期應為 1937 年到 1945 年，但為尊重原文，筆者在此保留原句，不做刪改。

氣，然而遷台後的國民黨所以繼續在軍中鼓勵報告文學的寫作，繼承的是「抗戰報告文學」的脈絡，而非左翼報告文學以暴露社會、描寫底層生活的路線，這也是形成軍中報導文學在長時間的發展中始終主題單一，且與之後根據「新聞 6 個 W」創作的、受新新聞影響的民間報導文學距離遙遠的主因。

從形式上來說，1930 年代的抗戰報告文學作品，除少數為散文創作外，大多為字數較多、篇幅較長的單本作品，與 1970 年代後台灣報導文學主要以散文為表現形式、字數大多在 5 千字左右的結構相差甚遠，然而這種「宏篇鉅製」的創作形式卻與軍中報導文學極為類似。從 1966 年國軍文藝金像獎首次徵選報導文學項目開始至 1980 年之間，國軍文藝金像獎對報導文學項目的字數規定維持在「5 萬字以上」，中間甚至有出現過約百萬字的作品，⁹可見軍中報導文學與 1930 年代作品的形制上較為接近。多次擔任報導文學獎評審的尹雪曼，對於日後民間報導文學降低字數門檻至 5 千字曾經便表示：「以前的作品絕不止這個數量，我不知道學校或有關單位根據什麼觀點訂了五千字來作為標準，就我認為，五千字絕對不夠。」¹⁰尹雪曼的說法也顯示軍中報導文學在原來的形制上與民間報導文學走在不同的道路上，而這種從最早便開始的不同路線，也成為軍中報導文學與 1970 年代後興起的報導文學無法混為一談的關鍵因素，即使 1980 年後隨著國軍本身制度上的轉變（大專兵的加入）、以及黨禁、報禁陸續解除、台灣進入解嚴時代，而導致國軍文藝金像獎逐漸與民間報導文學合流，但必須強調在 1970 年代這時間區塊上兩者的不同。

張耀仁在〈再思考「報導文學在台灣 1949-1994」〉一文中亦談到，他認為國軍文藝金像獎首屆報導文學類的得獎作品〈勇士們〉、〈枕戈待旦〉為中國 1930 年代「報告文學」作品的延續，以此反駁學者們普遍以《中國時報》的「報導文學獎」為台灣報導文學設獎之始的說法，他進而說明道：「報導文學並非與 50、60 年代的歷史發展全然無關，特別是 60 年代以降，『報導文學』承續抗戰時期之『報告文學』而來，於官方與軍中文學獎已見其舉辦。」¹¹以張耀仁之說，他將國軍文藝金像獎視為報告文學的承續，台灣民間的「報導文學」則為 1970 年

⁹ 1975 年由胡秀等人集體創作的《一百個見證》，訪問一百位反共義士，每篇皆一萬字上下共百萬字，並獲得該年的國軍文藝銀像獎。

¹⁰ 蔡豐全，〈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作品分析〉，頁 179。

¹¹ 張耀仁，〈再思考「報導文學在台灣 1949-1994」〉，中華傳播學會年會暨研討會會議論文，2001 年。

代後的產物。因此即使作品與訴求不同，但所看重的都是報導文學的「實用性」與「寫作價值」。張耀仁將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做出歷史上的切割。作為 1930 年代抗戰報告文學延續的台灣軍中與官方報導文學，在時間點上實走在 1970 年代的台灣報導文學之前，而在 1970 年代後報導文學引起注目、形成寫作熱潮之時，這些軍中的報導文學作品一樣平行地參與著，因此若要討論今日台灣報導文學的樣貌就必須將這兩條線索一併討論。

二、國軍文藝金像獎中的報導文學

在報導文學研究多集中於文壇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中國時報》、《聯合報》兩大報文學獎同時，做為「事實上」¹²台灣第一個徵選報導文學獎項的國軍文藝金像獎自有其特殊意義，並在向來被理解為反共、戰鬥的軍中文藝內，討論軍中報導文學與民間報導文學兩者互相交流影響之下風格與訴求的異同與淵源關係，將能更清楚顯示出報導文學作為一個時代下的產物，是如何隨著制度、政府、文藝社區／社群等因素產生變異。國軍文藝金像獎的報導文學徵選，自第 2 屆（1966 年）設獎後，中斷數屆，至 1972 年的第 8 屆再次舉辦，往後則較為穩定，少見停辦數屆的情形。但此時於 1970 年首次徵獎的空軍文藝金鷹獎則有「報導散文」一類，¹³顯示以軍方內部而言，對報導文學的徵選與鼓勵創作始終未曾斷絕。而自徵選的主題與內容說明來看，國軍文藝金像獎設立報導文學獎項明顯帶有特殊性與目的性，也證明報導文學文類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從 1966 年的第二屆到 1980 年的第 16 屆，中間共有 9 次報導文學的徵選，得獎作品共計 29 篇，惟因軍方早期對這類文藝作品的結集不甚在意，故今日能取得原文者僅共 10 篇，表列如下：

表 2-1

1966 年～1980 年 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類 得獎清單				
屆別	獎別	作者	作品名稱及字數	作品簡述
第 2 屆	銀像獎	桑品載	勇士們（約 5-6 萬字）	以 14 個主題，描寫前線金門官兵志

¹² 過去學者通常以時報文學獎的報導文學項目作為台灣報導文學獎設立的起點，如鄭明嫻、蔡源煌。

¹³ 1970 年 8 月，第 1 屆空軍文藝金鷹獎，「報導散文」類得獎者為：第一名李效顏〈銀翼生輝〉、第二名楊御龍〈勝利協奏曲〉、第三名張濤〈豐收〉。

1966 年				願留營之報導作品，其中有單一人物的描寫，亦有針對部隊之敘述，取材廣泛。
第 2 屆 1966 年	銅像獎	孫 光	枕戈待旦(約 5-6 萬字)	以 20 個主題，描寫馬祖外島官兵生活、戰鬥的故事，每個主題之下，另有標題分類，井然有序。
第 10 屆 1974 年	金像獎	謝白雲	金門、金門(約 5 萬字)	描述金門戰地的風光，及軍隊努力的情形。
第 10 屆 1974 年	銀像獎	林祥金	英雄島(約 5 萬字)	描述金門的人、事、物，取材廣泛。
第 11 屆 1975 年	銀像獎	胡秀等 集體創作	一百個見證(約 100 萬字，共分四冊出版)	以多位記者採訪一百位反共義士的報導為主題，描述中共的暴政史實。
第 13 屆 1977 年	銀像獎	張家麟	向黃埔敬禮(約 5-6 萬字)	描寫陸軍官校之校史及人事物的合輯
第 14 屆 1978 年	金像獎	王生雲	兵工兒女(約 5 萬字)	以多篇故事描寫聯勤工廠中之報導，除了人物、團隊之外，更有新式武器的介紹。
第 15 屆 1979 年	銅像獎	王兆銘	百鍊成鋼憶蛙訓(約 5 萬字)	描述在接受蛙人訓練時的甘苦談
第 16 屆 1980 年	銀像獎	陳性耀	南沙憶舊(約 5 萬字)	描述在南沙群島上的生活點滴
第 16 屆 1980 年	銅像獎	范俊勛	英勇的駝群兒女(約 5 萬字)	描寫聯勤台南化工廠員工生活的點滴及愛國事蹟。

※ 本圖引自蔡豐全，《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分析》，表四之四「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內容簡述」，頁 60-61

在國軍文藝金像獎的得獎作品主題上，固然因國軍文藝金像獎本身的性質與徵獎對象的限制，在徵獎主題上不免有部份規範，但如曾獲獎且參加過國軍文藝大會的桑品載表示，其實此徵獎的主題並沒有絕對的侷限：「當然是要以積極、光明面的創作為主，但是其實主題有其廣義性，也不會有侷限在政治或反共等的要求，範圍其實很廣，只要是講軍中進步、奮鬥的事物，大概都是很歡迎的。」¹⁴姜穆對此也曾表示：「早期的作品意識形態比較嚴重是事實，愛國的訴求是比

¹⁴ 蔡豐全，《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作品分析》，頁 168。

較重視，到後期大概就比較不注重了，也開放了，但是台獨的作品是絕對不接受的。我想大概在民國六十幾年後期時慢慢的轉變了，作品當時就鬆綁了，……。」¹⁵由上述兩位對國軍文藝金像獎主題的敘述，可以得知雖然主題上不免限制在「光明、積極」且與「國軍相關」的範圍，在「愛國情懷」上亦有要求，但「反共」訴求並不如大眾以為的強烈。由此對照 1966 年至 1980 年之間的 10 篇得獎作品主題，描寫金門、馬祖等前線戰地的作品 4 篇，且集中於 1966 年、1974 年的頭兩次徵獎，此後有訪問一百位反共義士結集而成的《一百個見證》，據得獎者、亦是主要籌劃者胡秀所說，這時是國軍新文藝運動推展的巔峰期，加以此企劃是由時任總政戰部處長的王國琛將軍所提出的大型構想，最終方能完成。¹⁶因此《一百個見證》是較為「非典型」的作品，帶有較強烈的反共、政治正確立場。此後的得獎作品則皆為描寫某地的軍旅生活與軍事訓練回憶，逐漸遠離「中共暴政」、「頌揚領袖」等一般被認知為文藝政策下「戰鬥文學」的基本主題的寫作訴求，而以確切且詳實的報導為主。

據上述可以瞭解到，軍中報導文學一開始便與日後出現的民間報導文學在主題與體制上並不同調，而是以深度採訪與結構龐大的製作為訴求，在主題上雖限制於「與國軍相關」的「積極面、光明面」、並以「愛國情懷」為主要敘事策略，但並非一般對「戰鬥文藝」所以為的充滿反共意識、歌頌領袖等僵化的主題，而能在劃定的範圍之內進行許多積極的開發，無論是戰地風光、前線民情、企劃性訪談、軍中訓練的精實、後勤工廠的生活等皆有嘗試，能在相對民間較受侷限的範圍內開創出這許多議題實屬不易，且動輒萬字以上的規模讓軍中報導文學具有更深入、鉅細靡遺的採訪可能，對於人事物的敘述也不僅是情感上的煽動或問題的暴露，而在「採訪」的部份做出更多實踐，從成果上而言，相對 1970 年代後方才興起的民間報導文學已可說是結實纍纍，和民間報導文學以「喚醒良知」、「揭發問題」為訴求的模式相比，軍中報導文學顯然有著自己的風貌與特色。

三、軍中報導文學的封閉性

軍中報導文學雖在開發的腳步上走在民間媒體前方，且繼承 1930 年代報告文學的脈絡，已然開創出軍中的報導文學寫作路線，且成果頗豐，但為何在 1970

¹⁵ 同上註，頁 175。

¹⁶ 關於成書過程可參考蔡豐全對胡秀進行的訪談，同上註，頁 171-173。

年代卻仍是要等到民間媒體由高信疆登高一呼，報導文學方才一舉躍上文學的主要舞台？這當中涉及的便是軍中報導文學的封閉性。

首先以傳播模式中的傳播者、訊息內容、傳播管道、傳播對象（閱聽人）及徵獎對象、傳播效果（目的性）幾點的比較，來分析軍中報導文學的代表「國軍文藝金像獎」與民間媒體所舉辦的文學獎之差異：

表 2-2

傳播者	傳播訊息內容	主要傳播管道	傳播對象	徵獎對象	傳播效果
國軍文藝大會	徵獎訊息 徵獎得獎作品	軍中報刊 軍中佈告	軍人	現役或後備軍人、軍校學生、撫卹中之軍眷遺族	鼓舞士氣及戰鬥意志
民間媒體報紙	徵獎訊息 徵獎得獎作品	民間報刊媒體	社會大眾	社會大眾	提高文學風氣，獎勵優秀作者

一個傳播過程的概念同時包含著「作者」（傳播的起點）與「讀者」（傳播的終點）兩個因素，由上圖可知，國軍文藝金像獎的「作家」與「讀者」處於同樣的身份、職業、文化圈之中，形成一個在封閉圓圈中自給自足的特殊社群，由軍人寫作以提供軍人閱讀，這與一般民間媒體文學獎最大的歧異處便在於傳播對象（讀者）與徵獎對象（作家）上，並且因此形成徵獎目的上的差異。再者，早期國軍文藝金像獎的得獎作品結集缺乏規劃亦不連續，且成書之後僅發送各級軍事單位傳閱，與一般文學獎在結集後便在市場上普遍發行販賣極為不同，亦即設定的「讀者群」不同；從讀者的設定不同，反過來便影響著整個傳播過程中作者的創作意識與主題設定。故，從國軍文藝金像獎的傳播模式可以進而理解軍中報導文學的傳播運作——由於作家與讀者的同樣社會身份，在傳播的往返之間、起點到達終點的「目的性」變得單一，兩者間能共鳴的主題產生侷限，遂形成此一具封閉性的文學社群。

誠然，軍中作家在民間媒體中成就名聲者大有人在，惟軍中報導文學卻始終只在國軍文藝金像獎及軍中報紙之間流動，雖有因長期擔任軍中報導文學獎項評審進而也擔任民間媒體評審者如尹雪曼，但仍屬於少數，而以「軍中報導文學作家」身份持續在文學界活躍者則幾乎絕跡。推測其中緣故，筆者認為可能是由於

1970 年代時身兼軍中作家身份者幾為職業軍人，加以當時隸屬於軍方與官方的刊物、報紙為數眾多，¹⁷而這些發表空間本身便是以提供軍人發表作為前提，具有如此充足的發表空間，軍中作家的作品便相對地較不需要依靠民間媒體提供發表空間，這方面導致軍中作家的作品大量地在僅提供軍方閱讀的軍中媒體上出現，形成與民間文學界的隔閡，尤其軍中報導文學與後起的民間報導文學具有不同的書寫形式與主題訴求，加上主題與字數的限制，更難以在民間媒體尋求發表的機會，遂封閉在軍方內部的體系之中。

由上述可知，軍中的報導文學由於傳播管道、作者、讀者三方面的封閉性，以及在主題上的限制，最終導致整個文類的發展無法跨出至民間，而民間報導文學勃興後與軍中報導文學產生明顯的差異性，更加使軍中的報導文學固守在軍方的媒體之中，即使在 1980 年代後因大專兵加入軍方而在報導文學的主題上逐漸放寬標準，但傳播過程的限制卻仍缺乏相對的大開方便之門，傳播管道依舊侷限在軍方媒體之中，作者（徵獎對象）與讀者（傳播對象）只能跟隨軍方媒體特殊的限制，因此即使在主題與字數、文體形式上逐漸與民間報導文學合流，軍中報導文學的封閉性卻依舊顯著。

四、自成道路的軍中報導文學

蔡豐全在其碩論中與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首屆獲獎者桑品載先生¹⁸進行訪問後寫到，桑品載「並未同意國軍之『報導文學』與現今文學創作之『報導文學』文類完全相同」¹⁹，這是因為當時的徵選「字數限制為 5 萬字以上，內容十分具有份量；而其徵選之目的，則是以『報導』性質之採訪為主，所以，與近代之『報導文學』略有不同」²⁰。由此可發現，在報導文學以軍中文學之姿出現之始，所採取的是與 70 年代後的報導文學不同的路線，當時的軍中報導文學偏向以「採訪報導」為主，字數要求也較高，近似今日的「深度採訪」；而此後再度出現的報導文學則走向字數較為精簡的散文類型。故可知，國軍報導文學的作品要求目標及對象，皆與民間報導文學不同，國軍報導文學作品偏向於「新聞

17 如《青年日報》、《青年戰士報》、《台灣日報》等。

18 其作品〈勇士們〉獲得第二屆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的銀像獎（該年金像獎從缺）。

19 蔡豐全，《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作品分析》，頁 52

20 同上註。

性」，而民間報導文學則偏向「文學性」，因此二者可說是走在報導文學的兩條道路上。換言之，若說 70 年代後風騷一時的報導文學始終是以「散文的輕騎兵」姿態立足文壇，是「向文學借火」、較偏重文學性的文類，則軍中報導文學是以較素樸而結構龐大的深度報導性作品為主。

由上述論述亦可得知，1970 年代時代表軍中報導文學的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項目，與論者一般認知中必然「反共抗俄」的「戰鬥文學」存在著一定的認知差異，固然國軍文藝金像獎基於軍中徵獎的封閉性，導致其在主題上有一定的侷限，但並未偏離「報導文學」的「報導」宗旨，甚至是因此更加深入的進行「報導」的實踐，在限制的主題相關範圍內對可能的主題都有涉及，無論是事件、人物、歷史都有詳實的紀錄，在民間報導文學興起之前擴大了報導文學的形制、書寫模式的可能性。可惜軍中報導文學不如軍中文藝那般有更多普遍可發表的園地，國軍文藝金像獎的得獎作品結集後也僅是發送各級連隊，一般社會大眾難以一睹內容，造成徵獎對象與閱聽受眾兩者的雙重侷限。這種傳播過程的封閉性，加以題材上的特殊性，導致軍中報導文學在文學界中必然的隱形與缺乏影響力，於是在民間媒體捲起報導文學的旋風之時，軍中報導文學最終也只能為民間的洪流所吸納，從篇幅到主題都逐漸合流，終與民間的報導文學走上相同道路。²¹

第二節 台灣報導文學的興起：民間兩大報副刊的革新與推進

本節筆者想討論關於《聯合報》、《中國時報》此二屬於民間媒體的兩大報在官方勢力的無孔不入之下，是以何種方式與黨國妥協或抗爭？兩大報在報禁尚未解除的 1970 年代擁有的自主性與服從性之真相為何？兩大報在此十年間的迅速成長與積極搶灘所造成的副刊爭霸與巨大轉型，對此後台灣報業的副刊、副刊編輯，乃至報導文學埋下何種可能的深遠影響？副刊主編號稱「文學守門人」，在文學界的權力場域中又是擁有著何種資本？這種資本從何而來？高信疆正當此副刊激烈轉型的過程中，以一個「守門人」之姿對報導文學的獨愛與提倡又是出於何種背景與可能？當時建構的報導文學概念與寫作模式對此後的台灣報導文學起了或正或負的何種變化？以上皆為筆者欲在本節尋求解答的疑問。

²¹ 關於國軍文藝金像獎在民間媒體帶起的報導文學效應出現後，合流現象表現在哪些層面，將在下一章做綜合論述。

一、官方勢力下的「侍從報業」

關於《聯合報》、《中國時報》兩大報的副刊之爭、《聯合副刊》主編痲弦與《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的紙上爭霸一直是 1970 年代的熱門話題。但筆者首先想先拉回《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大報的發跡與處境做一前導論述。在林麗雲的〈台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 1949-1999〉一文中論到：

正如意識形態國家工具說所言，這種民營報業並不是「自由報業」，而是受到國家威權主義的控制；並與統治者發展出「保護主與侍從」的關係。在這個關係中，統治者是位高權大的「保護主」，而報老闆則是位階較低的「侍從」；統治者會提供給報老闆生存上必要的資源；而報老闆則會提供統治者所需意識形態上的支持，以作為交換。²²

由此可知，1970 年代尚處於威權體制下的台灣並不存在真正的「自由報業」，報禁尚未解除，表面上雖提供社會人士申請「報證」，但仍存在各種「關切」與干預手段，嚴重者「報證」亦隨時有沒收之虞。惟《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挾著官方所提供的各種優惠：提供更多的報證以供兩大報業集團新報發行（《民生報》及《工商時報》）、兩報創辦人（王愷吾與余紀忠）進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增加報紙張數為三大張以容納更多廣告、配合高速公路通車而准許發行地方版，在短時間內成長驚人，兩大報壟斷台灣約七成以上的報業市場，廣告收入更是呈現跳躍性增加。²³這種互利的「保護主」與「侍從」關係一直到 1970 年代晚期才稍有鬆動。隨著林義雄血案、陳文成事件、美麗島事件等黨外運動引發民眾同情，兩大報處於「報導或不報導」間時有搖擺、立場難定，也顯示兩大報對「保護主」的忠誠度已經隨著時代與社會的變化以及民眾口味的經濟考量而逐漸發生矛盾與轉型的傾向。在此特別說明當時兩大報實際上處於國民黨的控制與培育的雙面力量之下，目的是為釐清 1970 年代報業的真實處境，還原真正的時空環境之後，顯然不能單純以為兩大報副刊的積極搶灘、轉型或是新型企劃是媒體高自由度的表現，因為顯然在當時的時空下所謂自由度其實相當有限，從報業主與其報業受制於政府、國民黨的現實，才能同時理解副刊在此中力求多元、求變、求新的難

²² 林麗雲，〈台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 1949-1999〉，收錄在張芷雲主編《文化產業：文化生產的結構分析》（台北：遠流出版社，2000 年），頁 99。

²³ 以上詳細敘述可見林麗雲，〈台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 1949-1999〉，頁 109-117。

處與意義，而延伸到《聯合報》涉入鄉土文學論戰又再一次證明黨國勢力的「保護主」地位與箇中的無可奈何，顯示民間媒體實則並非全然獨立於官方勢力之外。

而在兩大報的文學活動上，亦可以看出這種「非完全自由」的侍從性。鄉土文學論戰的主要戰場在《聯合副刊》，當時的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一連三天在《聯合副刊》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批判王拓、陳映真、尉天驄引發鄉土文學論戰，在整個論戰的過程中，《聯合副刊》採取的立場較為鮮明、攻擊的力度亦十分猛烈，《聯合副刊》的介入，一定程度上擴大了鄉土文學運動的規模和影響。而反觀《人間副刊》，從鄉土文學論戰前的企劃內容與副刊風格而言，《人間副刊》扮演著促使鄉土文學風生水起的鼓動角色，落實著「台灣的」、「鄉土的」內涵路線，然而在論戰期間卻不見《人間副刊》有所回應或支持，相較《聯合副刊》在論戰中的積極，《人間副刊》卻選擇緘默。無論是高分背的證明立場之堅決，或以沉默表達消極的抗議，在一顯一晦之中正顯示出當時傳媒的「自由」假象，所謂的媒體自由仍是一種控制內的自由，仍未能脫離國家機器的勢力管轄範圍。向陽在〈戰後台灣文學傳播困境〉一文中也曾提及，此時期的文學媒體受到政治力的支配與介入所導致的現象之一便是文學媒介守門人的自主權缺乏：

從 50 年代以至 80 年代的台灣社會變遷中，我們看到的是台灣文學傳播之備受「政治力」干擾，……尤其是在 70 年代末期「鄉土文學論戰」爆發階段，台灣文學界以及文學傳播媒介都仍然受到政治力的宰制，部份文人及文學傳播媒介甚至代政府執行控制文人的角色，一如孔特（Contor）所說，這種控制表現在媒介內容的選擇、創作上的獨立決定能力受到束縛或限制之上，也表現在文學媒介守門人缺少自主權之上。²⁴

從 1963 年林海音離開主編十年的《聯合副刊》，繼之高信疆因為碰觸到政治當局的禁忌而離開《人間副刊》，這段時期的副刊歷史人事更迭，便是整個報業在 1970 年代仍屬於「假獨立、假自由」的真實寫照，在這種侷限之下，副刊主編必須極有手腕的處理政治上的敏感問題，又同時適度地保有副刊的自由度，在自主空間並不甚大的情形下，高信疆與痙弦於此時對副刊的積極轉型更顯得意義重大。

²⁴ 林淇養，〈戰後台灣文學傳播困境〉，《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頁 60-61。

二、兩大報的副刊改革

隨著政府給予兩大報的種種優惠，台灣的報紙訂閱人口開始激增，加以高速公路通車使報紙的南北運送更加通暢，使得獨大的兩報在爭取廣告費用的競爭上更加激烈，因為廣告費用直接牽涉到報份的訂閱量。在報業日益發達的同時，報禁仍未解除、報紙仍因「限張」政策而停留在三大張，加以政治上的介入使兩大報在新聞與評論性文章上大同小異，此時在扣除廣告版面後佔全份報紙八分之一的副刊儼然成爲吸引讀者、爭奪閱報市場的關鍵。在以上背景下，副刊開始脫離過去僅供「娛樂」的「附庸」身份，轉變爲各家報紙爭取訂閱量的兵家必爭之地，既然是報業集中目光的關心焦點，副刊主編的選任之舉足輕重遂浮出檯面，此時被委以大任的高信疆與痙弦，在兩大報副刊所肩負的重任與所表現的積極搶灘可以想見，亦因之使 1970 年代成爲台灣報紙副刊邁向「現代新型副刊」的關鍵轉型期。

陳義芝在〈副刊轉型之思考——以七〇年代末《聯副》與《人間》爲例〉一文中論道：「所謂的『王高爭霸戰』雖持續至 1983 年 2 月高信疆離職時，但許多白熱化較勁、創發的舉措事實上在 70 年代末那兩年即已底定。」²⁵由「創發的舉措」可知，兩人的副刊戰爭更大的意義上是推動了台灣副刊的現代轉型，賦予原本僅供消遣娛樂的副刊，在林海音的文藝副刊基礎上做出再上一層的提升。1973 年《中國時報》延攬高信疆接任《人間副刊》主編，1977 年《聯合報》聘請痙弦接任《聯合副刊》主編，從此拉開「副刊王」與「副刊高」的時代，以副刊爲戰場的這場競爭被向陽稱爲「報業史上未曾有過的嶄新爭奪，象徵了媒介霸權對於文化霸權的開始重視。」²⁶兩位主編依個人風格與對副刊的期待所引導出的不同副刊風格，向陽在其碩士論文中將高信疆帶領下的《人間副刊》定位爲多元的「文化副刊」典型，表現在積極介入社會與文化，是「鼓吹者的角色，透過突破與試驗的實踐，來闡揚副刊對社會的公共論壇論述」²⁷；痙弦所領導的《聯合副刊》則是偏向純文學的「文藝副刊」典型，對於文學傳統的開發與繼承上著力較多，「居於中立型的反映角色，依循蛻變與修正的實踐，遵守其社會責任論

²⁵ 陳義芝，〈副刊轉型之思考——以七〇年代末《聯副》與《人間》爲例〉，收錄於痙弦、陳義芝主編，《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綜論》（台北：行政院文建會，1997 年），頁 153。

²⁶ 林淇瀟，〈副刊學的理論建構基礎〉，《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頁 40。

²⁷ 林淇瀟，〈文學傳播與社會變遷之關聯性研究——以七〇年代台灣報紙副刊的媒介運做爲例〉，文化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1993 年，頁 184。

述」。²⁸關於兩大報副刊共同的轉型趨向，陳義芝與向陽皆做過綜合性的歸納，²⁹筆者將兩人的意見統整如下：

一、副刊編輯的權力大幅提昇：自傳統副刊的「靜態編輯」改為新型副刊的「動態編輯」，使得副刊編輯在文學場域中擁有的權力大幅提昇，副刊編輯成為稿件的邀約者、發掘者和組織者，「文學守門人」的身份與權力更加鮮明，而副刊編輯亦藉由這種控制權做出製作上的突破，一方面運用新聞編輯中「議題設定」³⁰（agenda-setting）功能，從而成功讓部份社會與文化議題引起大眾關注；另一方面亦藉此開發新的文類，「報導文學」、「傳真文學」、「新聞詩」、「極短篇」等新文類的嘗試與開展藉由編輯的鼓吹而帶起新的創作風氣。

二、企劃編輯的文化與思想精神：藉由「企劃編輯」的主動性與組織性，將傳統副刊的「文藝／消遣」取向，轉為新型副刊的「文化／思想」取向。引進學者專家對學術、文化與思想等問題進行討論，各種經過企劃的專欄、活動、座談陸續推出，副刊編輯們延攬台灣學術界、文學界的要角撰寫專文，並推出由系列專文連續而成的「專輯」，進行更深入的對話與探討，「他們言談之壟罩，形成 70、80 年代之交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公共領域。」³¹這種公共性的文化精神內涵讓副刊在精神、影響力與重要性上與新聞版面得以一較長短。

三、現實環境與台灣本土的參與、關懷：相對傳統副刊與社會議題採取疏離的態度，新型副刊則積極介入現實、關懷本土，試圖建立台灣的文化形象；過去傳統副刊所盡量迴避的禁忌話題，新型副刊則試探禁忌的底線，雖不免仍在政治力的壓力下有所侷限，但在心態上已經轉消極為主動。

四、美術編輯概念的抬頭：過去傳統副刊大致是「文字編輯」的版面模式，新型副刊則相對注重「美術編輯」的版面模式，圖文搭配與版面美化的「美術編輯」概念提昇，副刊不再只是單純的文字內容，而求取在版面安排及內容上能有所呼應。因此，新型副刊無論在內容的安排、預告，甚至欄位、邊框的裝飾上都採取

²⁸ 同上註。

²⁹ 可參考陳義芝的〈副刊轉型之思考——以七〇年代末《聯副》與《人間》為例〉，以及林淇濱的〈戰後台灣文學傳播困境〉二文。

³⁰ McCombs 和 Shaw 在 1972 年提出此一大眾傳播理論，透過對 1968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研究，發現大眾傳媒的報導焦點與受眾認為重要的議題成正相關，而這種關係是互相影響的，傳媒較常報導的事件也會引起受眾對該議題的重視。

³¹ 陳義芝，〈副刊轉型之思考——以七〇年代末《聯副》與《人間》為例〉，《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綜論》，頁 159。

較過去更爲繁複、精細的美學風格。

綜合上述可知，高信疆與痲弦的共同目標表現在對社會現實的參與以及計劃性的副刊專題上，而計劃性的副刊編輯模式一方面加強了主編對副刊的控制，從僅僅是汰選來稿文章，轉而加入更具編輯個人意識導向、經過「企劃」的「主題」，自此副刊擁有的主編個人色彩益加濃厚。

而若探究 1970 年代副刊的共同轉型所以朝向對現實社會積極參與的原因，林民昌在《當代台灣小說文本的知識及其操作》³²中指出，原先稱霸 1960 年代文壇的現代主義思潮，面對 1970 年代閱報人口的激增、讀者對象不再限於較少數的精英而是社會大眾的報紙副刊來說，是「沒有必要的複雜表現」，因此現代主義的作品日漸失去副刊上的版面位置，但「其所建立的權力場域並未潰散，而在後來的文學獎機制裡尋得復辟的契機」，這個退場的過程顯示著台灣的報紙副刊逐漸從「純文學副刊」轉型爲綜合性的「文化副刊」、「文藝副刊」，此時儼然偏向大眾口味的副刊遂與審美門檻較高的現代主義文學拉出距離，留下更多空間給「鄉土的」、「寫實的」、「社會的」、「文化的」作品與專題。這種對現實社會的參與亦表現在各家副刊對報導文學的推動上，一如須文蔚所說：

在 70 年代末期，《聯合報》的〈聯合副刊〉主編痲弦也評估，現實性的副刊文章較受讀者歡迎，報導文學也在其中之列，因之聯副亦加入了鼓動報導文學的風潮中。同一時段，在民國 69 年與 70 年之間《民生報》副刊〈天地〉也成為報導文學發表的重要園地。³³

這段話顯示報導文學並非僅僅是因爲高信疆的推動而形成熱潮，更大程度上是呼應整個時代對文學的要求而產生推動的力量，是 1970 年代的整體社會開始「向內」思考台灣本土的問題，期待更瞭解其所生存的土地與現實真相。職是之故，在高信疆積極於《人間副刊》設立專欄、引介報導文學後，其餘副刊亦察覺大勢所趨，先後紛紛投入報導文學的開發中。

³² 林民昌，《當代台灣小說文本的知識及其操作》，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3 年。

³³ 須文蔚，〈報導文學在台灣 1949-1994〉，《新聞學研究》第 51 集，頁 128。

三、作為「文學守門人」的副刊主編

在研究「副刊」的文學傳播活動與「副刊學」的建構中，光憑作家、作品與讀者三者所互構而成的關係中尚且無法完整涵蓋、詮釋，作家與讀者之間必須通過「編輯」的篩選作用達成連結。在前述討論中已初步論及副刊主編在副刊轉型的過程中，在文學場域中擁有的權力與掌握的資源較傳統副刊時期更為提昇，副刊編輯不再僅是自眾多的來稿文章中做淘汰與擇取稿件如此單一的角色，而成爲各種文類稿件與文化、社會議題的組織者、企劃者，扮演著作家到眾多讀者間文學傳播過程中關鍵性的角色，在副刊轉型的前提下，副刊編輯做爲「文學守門人」(gatekeeper)的身份亦隨之確立。

副刊主編一方面是大眾傳播媒介中的一員，受政府的政策、報業意識形態的雙重制約，在這個層面上誠如前述所言，受限於報業擺蕩在國家機器下的宣傳工具與社會的公眾民意論壇之間，副刊主編也不得不受此拉鋸影響；而另一方面，副刊主編亦是文學結構中的成員，在自身文壇人脈、審美經驗、文學傾向等的綜合因素之外，亦同時受到在此結構中所處的身份、位階、立場等複雜的可能所動搖。因此，一個副刊的風格與走向，除先天上牽涉政府的政策及報紙媒體的意識形態外，同時亦取決於主編在文學結構中所處的位置與身份，副刊編輯不能避免地受到文壇權力結構的影響。林耀德對此描述到：

副刊在台灣形成獨特的傳播整合型態，它們所整合的對象是個別作家、文壇和不確定的實際讀者群，副刊編務執行者納編在報業行政系統之中，既是傳播者的一部份，也是文壇結構的一部份，成爲雙重身份的組織化個人。³⁴

副刊主編在此整合的過程中扮演的「雙重身份」、「組織化個人」，便是其做爲「文學守門人」的角色，同時受到兩方身份的控制，屬於傳播的組織之中，然而又以個人身份處在文學場域的某一座標。但也是正因此兩者身份的重疊，方才使副刊主編擁有「守門人」的可能，他以這種雙重身份連結了傳播媒介與文學界的單獨個人，以其身份的穿梭性串接兩個場域，在這層意義上的副刊主編可以被視爲文學的捐客，惟副刊主編所獲得的「佣金」是在文壇中獨特的權力。

副刊的編輯過程受到市場壓力及版面有限的限制，主編在這些前提下選擇

³⁴ 林耀德，〈聯副四十年〉，《聯合文學》第 83 期，1991 年，頁 10-19。

「適於刊登」的作品，這個行動一方面實踐著主編的個人意志，同時引導著文學發展的趨勢。然而，「適於刊登」與否，其審核標準完全是主觀且見仁見智，並無顯而易識、被公眾所承認、可絕對遵循的規則，而副刊編輯之所以能掌握這種決定權，是來自於讀者對作品傳播權的讓渡，這種讓渡是迫於副刊版面的有限而不得不然，副刊編輯也因此被推上文學傳播過程中「權力菁英」的角色。這種在有限版面下對作家作品刊登與否的取決權如同蝴蝶效應，藉由報紙廣大的閱聽人口宣傳某一文學品味、文學意識形態，往往能造成極大的後果與反應。既然副刊版面是個領土有限卻又讀者眾多的發表空間，當某一作品取得刊登的權力，同時排擠其他作品的發言權，便是為自己的作品佔領文壇中勢力最大的發聲位置，透過這次鬥爭的勝利為自己累積更多身為作家的象徵資本，誠如薩依德所說，在文學傳播的本質上，所有文本皆在排斥其他文本、或以取代其他文本為目的，這是個權力競爭的場域，而非民主交流的事實。故，可以說讓副刊主編獲得「文學守門人」此一「權力菁英」角色的前提，正是「副刊版面有限」，這當中的文學傳播權力關係，表現著「掌握版面者掌握權力」的傾向。廣大的作家群為取得作品登上副刊，完成與讀者間交流的可能性、獲得知名度與迴響，不得不「爭奪」副刊版面的刊登權力，而刊登與否的最終決策者則是副刊主編，這才使得副刊主編得以站在自己所隸屬的、由作家組成的文學界金字塔相對上層。

然而上述所言並非意指副刊主編在文學場域中享有絕對的權力，若說「副刊有限的版面」使得編輯獲得權力，但同時副刊主編亦因自身無法外於文學場域存在，不得不在某些時候受到文學界「金字塔頂層」作家的限制。當某一作家累積的象徵資本足以支撐其名聲與價值，他便不再需要與其他作家一般爭奪副刊的發言權，不再受限於任何有限的發表空間，此時反是副刊主編們必須爭奪該作家以達成報紙本身銷售量的增加，同時增加管轄下副刊的聲譽與資本。因之，這種透過傳播的特質而擁有的權力是雙向的，既賦予主編權力、亦相對給予限制，「文學守門人」的說法強調其權力，但如何穩固的支撐背後那扇「門」卻是副刊主編另一個負擔與必然。綜言之，副刊編輯的身份價值實際上是建立在文學傳播的整體機制上，若是缺少作家或讀者其中一環，編輯便失去存在的意義與掌握的權力，副刊主編的權力是來自雙方面的承認與讓渡的，這種壓力與危險性使得編輯不得不時時觀測文壇的趨勢、新銳作家的潛力以及讀者的口味風向等，在其所負責溝通、連接的雙向領域皆必須保持敏銳度與成功的聯繫。

報導文學的大量出現乃至形成風潮，正是副刊主編透過「守門人」的身份有意識的進行推介／推銷，因之也證明了這種守門人身份具有的權力高度。林淇瀆在〈副刊學的理论建構基礎〉中以傳播學者馬奎爾(McQuail)延伸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文化霸權(hegemony)所提出的「媒介霸權論」(hegemonic theory of media)解釋副刊主編透過媒介賦予的「策劃性編輯手段」將意識形態滲透到讀者的生活，進而控制文學場域中的社群、階級、審美傾向，³⁵報導文學的專欄、專文的撰寫，皆經由副刊編輯的「企劃」，通過事先擬定特定議題以達成引發關注的目的，毋庸置疑的，這些議題必須被認可為具有明顯的社會性，由此可見報導文學的議題設定其實已經先經過編輯的篩選、擇取，這種負責過濾、把關的守門人角色，其實也就決定著哪些議題「值得」被關注，在這個過程的進行上，編輯們已經先預設立場，亦凸顯出編輯因「守門人」角色而獲得的最高權力——他們決定哪些社會議題「值得」被討論、他們潛移默化社會大眾在此事件上的「應該立場」——報導文學因本身具有的社會性，在印證媒介霸權論上更加突出。誠如向陽所分析：

他們（主編）在整個媒介組織運作中，以其掌握的文學資源，決定來稿「值不值得刊登」（價值判斷）、「要不要刊登」（權威選擇）、「該不該刊登」（社會控制）以及「如何刊登」（理念實踐），在在左右著文學生態與文學活動方向。³⁶

四、民間媒體型塑下的台灣報導文學啓蒙

1975年7月14日，高信疆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推出「現實的邊緣」專欄，言明「以文學的筆，新聞的眼，來從事人生探訪以及現實生活真實報導的生動寫作模式」，當時亦在《中國時報》服務的李利國曾言：「系列報導給社會最大的震撼是：我們要熱愛自己的土地，我們要相互關切不同生活方式與環境中的人。」由此可見此專欄的特性以及背負的期許。高信疆將「現實的邊緣」專欄分為「域外篇」、「離島篇」、「本土篇」，³⁷為台灣社會大眾介紹洪通、朱銘、雲門

³⁵ 林淇瀆，〈副刊學的理论建構基礎〉，《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頁 37。

³⁶ 同上註。

³⁷ 「域外篇」報導海外華人的生活情況及環境；「離島篇」介紹離島的人文風情及自然景觀；「本土篇」則是關於台灣本土的社會現實及發展。

舞集、雅音小集等台灣本土的藝術家，也同時引進大陸的抗議文學、傷痕文學，形成多元的新型態文化副刊，將報導文學帶向整個文學界與民間，進而掀起鄉土熱潮，成為對應於當時社會回歸本土思潮的文化形構場域。「現實的邊緣」在台灣報導文學史上的意義也可以從陳映真在〈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上）〉³⁸中的一段話得到印證：

「現實的邊緣」以《中國時報》為強大的後盾，自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陸續收穫了相對可喜的成績。但總的說來，依據熟悉當時情況的黃春明的評價，75 年以降的報導文學有啟蒙和初創的意義。今天絕大多數人知道有「報導文學」這個文類，都與 75 年《人間》副刊的宣傳有關。³⁹

「現實的邊緣」既是《人間副刊》的代表作，1978 年重掌副刊的高信疆再次推出「報導文學系列」，並於該年 5 月 14 日重刊「由愛出發」的編按，更進一步在 1978 年第一屆時報文學獎中徵選報導文學項目，高信疆對此言到，期使透過報導文學「直接有力、融合新聞與史觀、結合事實與思考的新形式能為文學注入新的血脈。」⁴⁰。《聯合報》雖然並沒有同時在該年的聯合報文學獎中同樣加入報導文學項目，但 1978 年的《聯合副刊》則先後推出「啄木鳥專欄」與「大特寫」專欄，並在後者的編按寫到「對於事實，我們求助於新聞的報導；對於人性，我們求助於文學的描寫」，⁴¹雖未言明此專欄為報導文學，但從編按則不難發現「報導加文學」的結論，可以說此二專欄的陸續推出是與《人間副刊》互別苗頭，也顯示報導文學當時在副刊中的受寵。

從上述可以確知《中國時報》在推動報導文學上的前瞻性是公認的事實，但陳映真在〈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上）〉進一步論述到，從世界報導文學史來看，報導文學的興起與發展和蘇俄成立、左翼文學思潮的勃興、反法西斯風潮有關，因此身處 1930 年代殖民困境下的楊逵會對報導文學產生共鳴，而 1970 年代的台灣在尚未具備上述條件的環境之下，橫向的宣傳報導文學則難免產生困境，此困境的起因就是當時的台灣缺乏足夠的、堅實的左翼思潮，導致這樣憑空出世的報導文學「缺少了報導文學所不可或缺的傾向性——即某種批判性和改造論」

³⁸ 陳映真，〈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上）〉，《聯合報》第 37 版，2001 年 8 月 18 日。

³⁹ 同上註。

⁴⁰ 高上秦主編，《時報報導文學獎》（台北：時報文化，1979 年），頁 1-2。

⁴¹ 陳義芝，〈副刊轉型之思考——以七〇年代末《聯副》與《人間》為例〉，頁 168-169。

42，導致當時作品呈現「作者們對其所描寫的生活現場的驚詫和興奮之情，多於對生活現場深入的研究與理解，有時甚至淪為獵奇，僅僅表現了作者對於生活的陌生、新奇所造成的『境內的異國情調』。」⁴³陳映真將這種侷限性的結果歸結為「報導文學理論的闕如」以及「沒有深植人心、思想上深刻、藝術上傑出的典範性報導文學可資創作的借鑒。」⁴⁴。考量陳映真的意識形態及立場，這番說詞不見得完全符合真相，但確實道出 1975 年後興起的台灣報導文學的癥結問題，批判性的僵化與欠缺造成作品深度與存續的困難，題材與寫作手法的重複進而造成典範性作品的難產，而這些問題迄今未能完全解決，⁴⁵陳映真的論述固然或有過度依靠左翼社會思潮詮釋的嫌疑，但這確實是可能的解釋之一。然而還必須反詰的是，回到 1970 年代的時間現場，高信疆的鼓吹不能僅僅是個偶然，若說台灣的 1970 年代未能有支撐報導文學順利成長的左翼基礎，那麼報導文學在該時間點上所以誕生的線索又何在？從陳映真、黃春明等左翼、鄉土作家在 1970 年代隨著鄉土文學論戰而引起的關注，可以想見台灣社會當時確實相比於此前的保守右傾，正悄悄發生著「左轉」的跡象，也唯有在這樣的轉變下，報導文學的被提倡才有可能發生。

透過本節的論述，報導文學於 1970 年代在民間報業異軍突起，實有其風雲際會的特殊時間意義。一方面由於社會上禁忌未開，報導文學因此擁有許多仍等待撞擊、揭發的社會真相可供書寫，報社亦樂於藉由這種有限範圍內的公共性議題達成提高銷售的目的；另一方面適逢大眾的社會意識與文化藝術思潮轉向台灣本土與寫實主義，報導文學同時具備兩者特質而成為新的實踐方式，完全適合於當時社會讀者的需求，亦呼應著期待走出學院、接觸時代的新興知識青年的理想，故有其文學市場，亦有更多寫手投入創作。而隨著報業興起而在文壇聲勢高漲的報紙副刊，亦因其有限的版面空間以及廣大的作家與讀者群，賦予副刊主編「文學守門人」的權力，副刊主編在推動舊式副刊朝向具有更多文化精神且經過

42 陳映真，〈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上）〉，《聯合報》第 37 版，2001 年 8 月 18 日。

43 陳映真，同上註：「黃春明以為作者們對其所描寫的生活現場的驚詫和興奮之情，多於對生活現場深入的研究與理解，有時甚至淪為獵奇，僅僅表現了作者對於生活的陌生、新奇所造成的『境內的異國情調』。其次，黃春明認為，這一時期的報導文學作品，一般地缺少思想。」

44 同上註。

45 如張堂錡在〈體系化的探索、建構與可能——台灣報導文學理論研究綜述〉中便指出目前台灣的報導文學研究有三個必須面對的困境：「文體定義、本質、特性的莫衷一是」、「方法論的欠缺」、「典範性力作的缺乏」，歸結為「不管是創作還是研究，台灣報導文學都陷入了難以克服的困境中」。頁 191-193。

企劃、議題設定的新型副刊轉型之過程中，亦藉由此一刊登取決的權力，對社會大眾宣傳、仲介部份作家及其個人的意識形態及文學品味，由此加速將報導文學推向文學舞台的最前方。

綜言之，誠然《中國時報》與官方的接近使其在代表民間媒體的身份上有著曖昧的空間，⁴⁶但憑藉其創辦人余紀忠對高信疆的完全信賴，在 1970 年代媒體尙未能脫出官方控制的時間點下特殊地獲得相對《聯合副刊》較為獨立、寬廣的發言權，因此在許多企劃的表現上也相對同時期的《聯合報》更加前衛。而報導文學的誕生與成長過程中，高信疆帶領著《中國時報》全力孕育，從新專欄、新文類的各種嘗試中可見高信疆確實讓《中國時報》走得更遠，⁴⁷而當時隸屬於其下的編輯們如古蒙仁、李利國、翁台生、馬以工等，經過這段時期的磨練，在下一個十年隨著各自專書的結集出版、獎座與獎章的加持，陸續成為報導文學中的專業寫手與中堅份子，亦進一步影響下一個世代報導文學寫作者的寫作傾向與風格，而這些層層影響的源頭都是來自高信疆。固然筆者不認為台灣報導文學的興起可以單純的化約到高信疆及《中國時報》二者，因為還與時代、社會與文學內部的轉向都有時間點上的配合息息相關，然而推波助瀾、推廣普及之功，高信疆與《中國時報》當之無愧。即使同時間的軍中報導文學已有相當豐厚的成果，民間也並非沒有作家自發性地持續創作報導文學作品，但若沒有高信疆的登高一呼，報導文學或許仍囿於軍中及個人寫作的封閉性而持續隱沒在文壇的潮流中，而高信疆藉由專欄所創造的較短小、濃縮的報導文學形式，加上多樣化的寬廣主題，亦開拓出與軍中報導文學截然不同的寫作路線，創造出此後脫離 1930 年代報導文學的台灣報導文學基本形式。然而屬於台灣報導文學的創作「新路線」在缺乏持續的批判性思想以及持續深化的理論後，究竟是否是個健康、適切的發展道路，評論者亦日漸缺少答案。

⁴⁶ 林麗雲，〈台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 1949-1999〉：「當國民黨延攬了《聯合報》發行人入中央委員會時，也同時把《中國時報》的發行人納入。」「《聯合報》王惕吾雖然曾對進入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裹足不前，但是當《中國時報》余紀忠的後腳才踏進去，王惕吾的前腳也只好跟進，以免『引起誤會』。」，頁 113、114。

⁴⁷ 《聯合報》也開發出「極短篇小說」、「新聞詩」、「傳真文學」等新文類，但由於痠弦相對高信疆的傳播出身則偏向較文學性質的主編，在編輯、企劃、美編安排等的嘗試與開發上相對較少，採取的是文藝副刊的路線。

第三節 官方控制下的報導文學：嘉新新聞獎與文藝獎章

獎項的制定本身即具有鼓勵、推動某一文藝風氣的作用，台灣早期文學獎、文藝獎幾乎全為官辦，主要緣由便是當時的文藝政策為政府所把持、操縱，因此獎勵、鼓吹特定文學風氣的文學獎辦理對政府而言乃是理所應然，加以官辦文學獎並不公佈評審過程，不公開的評選讓官方文學獎得以在選拔得獎人選上強化其目的性，藉獎金及聲譽達成推動所指定的文藝風氣之結果。

1950年，政府成立由張道藩、程天放、陳雪屏、狄膺、羅家倫、張其昀、胡建中、陳紀滢、李曼瑰等九位委員組成的第一個獎助文藝機構「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以張道藩為主任委員，簡稱為「文獎會」。此機構的主要任務在接續「三民主義文藝論」的文化實踐工作，定期辦理徵文，並刊行《文藝創作》月刊，徵求之作品「以能應用多方面技巧發揚國家民族意識及蓄有反共抗俄之意義為原則」⁴⁸，於每年5月4日文藝節及國父誕辰紀念日11月12日頒獎，獎項範圍包括詩歌、曲譜、小說、文藝理論、話劇、平劇、漫畫及木刻等。文獎會以其優厚的稿費鼓勵、吸引作家創作，在1957年以經費不足、由張道藩提請中央結束運作前，文獎會7年間「投稿作家計三千餘人，投稿的作品計萬件，獲獎及從優得稿費的作家約在一千人以上。王藍、尹雪曼、上官予、應未遲、段彩華等人都是曾受文獎會獎助的作家。」⁴⁹但文獎會的結束並不表示官方管控下的文藝獎就此減少，與此相反，中國文藝協會獎章、國軍文藝金像獎、文藝金環獎、國家文藝獎等官方、軍方、半官方等文學獎陸續開辦，顯示官方勢力對文藝環境的管理、目的性的文藝風氣之推動依舊強勢。

1970年代在《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文學獎、國軍文藝金像獎外，曾經設置報導文學項目的文學獎尚有吳三連文學獎⁵⁰、中山文藝創作獎、中興文藝獎章⁵¹、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等，以及與國軍文藝金像獎同年（1966年）舉

⁴⁸ 莊宜文，〈從文獎會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訊》第143期，1997年9月，頁25。

⁴⁹ 同上註。

⁵⁰ 「吳三連獎」於1978年首次頒發，基本分為「文學獎、藝術獎、人文社會科學獎、醫學獎」，屬於「終身成就獎」，性質似國家文藝獎，是民間性的獎項，以在各獎項領域內有傑出成就，有繼續創造潛力，並認同台灣之人士或團體為贈獎對象，每年在11月15日前後正式對外公佈得獎名單。然而吳三連本身雖歷任國大代表與台灣省議員，與政府關係密切，但吳三連文學獎仍屬於民間獎項，並非官方所設立，加以雖然設獎在1978年，但其中報導文學項目的頒發在1983年方才首見，又多自《中國時報》、《聯合報》兩大報文學獎的得主中選拔，故將在下一章與兩大報文學獎一併討論。

⁵¹ 中興文藝獎章為台灣省作家協會所頒發，然中興文藝獎章雖亦有頒發報導文學類的獎項，但

辦徵獎的嘉新新聞獎報導文學類。然這類官方、或帶有官方色彩的文學獎，楊素芬在《台灣報導文學概論》中便指出這類獎項中的得獎者與得獎作品「不難發現其中摻雜許多似是而非的作品，不乏有人物傳記、平面的人物報導、遊記等多類尚可進一步與報導文學再做區分的作品」⁵²，蔡素芬認為這同時顯示出報導文學在文學界場域中模糊的位置。但在這些數量不少的文學獎與文藝獎章中，許多背後的舉辦單位實際上帶有官方的色彩，或是隸屬於官方、受到官方直接的控制，因此從文學酬庸、資源分配的角度來看，這些獎項的分配事實上不僅只關乎作品本身，「得獎者」的身份跟所屬文學社群往往比作品更值得探究，這種暗盤下的操作性與哄抬性亦更有可觀性，這種酬庸或是贈與性的獎項卻又在 1970 年代不約而同的設立了報導文學獎，這種現象究竟單純顯示著報導文學獎選拔在該時間點上的時勢所趨、又或是官方有所操作與暗示？

一、嘉新新聞獎報導文學類

「嘉新新聞獎」的設立是嘉新水泥公司與當時台灣省政府的《台灣新生報》一起推動而成，該獎項於 1966 年的「第 2 屆嘉新新聞文藝創作獎」頒發報導文學類，與國軍文藝金像獎徵選報導文學類的時間相同，在報導文學的發展上因此具有意義。為求對此次頒獎進行特殊性的標記，則必須先回到嘉新新聞獎在 1970 年代的獎項頒發狀況做討論。因為嘉新新聞獎缺乏統整性整理的資料，故筆者自《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⁵³中的歷年文壇大事紀錄，對此獎項的頒發做出大致的爬梳整理。⁵⁴ 表列如下：

中興文藝獎章自 1978 年首次頒發，前幾屆的頒發並未有報導文學類的得主，在 1980 年代中後期才開始針對報導文學進行頒獎，因此在此章不予討論。

⁵² 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頁 202。

⁵³ 文訊雜誌社編，《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增訂本），台北：行政院文建會，1995 年。

⁵⁴ 筆者經查詢嘉新水泥公司及文建會的網站，並去信嘉新水泥公司詢問後，皆無法獲得嘉新新聞獎的相關資訊，此獎項在歷史資料的保存上不如一般文教機關有妥善的存檔，加以未能尋得相關的研究或討論篇章，故僅能從有限的二手資料對嘉新新聞獎做大致的整理。惟此書的資料亦有不盡完全之處，部份年度未有嘉新新聞獎的頒發紀錄，但依照下一次的頒獎屆數看來，實際上有持續頒獎，所闕漏部份待後者補充。

表 2-3

1964 年~1979 年 嘉新新聞文藝創作獎 得獎清單			
時間	屆數	獎項別	得獎者
1964 年	第 2 屆	嘉新優良著作獎	馮馮等 7 人
1966 年	第 2 屆	嘉新新聞文藝創作獎	報導文學類：鍾梅音《海天遊蹤》
1967 年	第 3 屆	嘉新文藝創作獎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
1968 年	第 4 屆	嘉新新聞文藝創作獎	鍾肇政《沉淪》
	第 6 屆	嘉新優良著作獎	上官子等 14 人
1969 年	第 5 屆	嘉新新聞文藝創作獎	孟瑤《這一代》
	第 7 屆	嘉新優良著作獎	左景清《長夜》 趙文藝《萬里前塵》
1972 年	第 10 屆	嘉新優良著作獎	楊乃藩《遊屐天涯》等
1973 年	第 11 屆	嘉新優良著作獎	李葉霜《石濤的世界》
			翁一鶴《赤馬謠》等
1975 年	第 13 屆	嘉新優良著作獎	郭嗣汾等 12 人
1976 年	第 14 屆	嘉新優良著作獎	朱建民等 15 人
1977 年	第 15 屆	嘉新優良著作獎	黃彰建等 13 人
1978 年	第 16 屆	嘉新優良著作獎	葉基棟等 8 人
1979 年	第 17 屆	嘉新優良著作獎	蔣一安等 5 人

※本表根據《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1964 年至 1980 年之紀錄整理。

由上表可知，嘉新水泥公司所頒發的文學獎可基本區分為「嘉新優良著作獎」與「嘉新新聞文藝創作獎」，1963 年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董事會成立，該年便頒發首屆嘉新優良著作獎，但嘉新新聞文藝創作獎的首屆頒發則始自 1965 年，在時間上約有兩屆的落差。而根據《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資料中可見的最後一次頒發嘉新新聞文藝創作獎是在 1969 年的第 5 屆，從 1972 年後便不再有嘉新新聞文藝創作獎的頒發紀錄，由此可知最晚在 1972 年便開始停止頒發文藝創作獎，而僅頒發優良著作獎。自上述觀之，從 1965 年首屆頒發文藝創作獎至 1969 年最後一次頒發，嘉新新聞文藝創作獎共 5 屆，然資料紀錄中有確切以「報導文學」為名目頒發獎項者，也僅 1966 年的鍾梅音《海天遊蹤》⁵⁵。

⁵⁵ 《海天遊蹤》為鍾梅音於 1964 年隨夫旅行出國，共環遊亞、歐、美等 13 個國家，在 25 個城市停留，回台後她將旅遊的所見所聞所感寫成遊記，先在《中央日報》副刊連載，後集結成書出版《海天遊蹤》二冊，受到熱烈的迴響，總共再版 16 次，被譽為「最完美的遊記」。

鍾梅音此次獲獎有幾點特殊性值得討論：僅此一次的報導文學類獎項頒發、獎項時間點與國軍文藝金像獎相同、為台灣文學獎首次以民間名義頒發報導文學獎。

然而嘉新新聞獎的「民間性」本身值得爭議，嘉新水泥公司雖為民間企業，但在 1970 年代之時，從事水泥業必須擁有特許經營權，在本質上屬於與政府共謀的聯合壟斷性產業。而「嘉新新聞獎」的設立又與省政府下的《台灣新生報》有關，正因水泥業的特殊性，以及此文學獎聯合辦理的單位之隸屬，故嘉新新聞獎雖為民間公司所頒發，但在歸屬上仍被劃分在官方勢力下的文藝獎，而不如《中國時報》、《聯合報》的文學獎具有相對客觀的民間正當性。在這樣的層層推演之下，若說同個時間上因政府的「文藝指導傾向」而推動了嘉新新聞獎頒發「僅此一次」的報導文學類，亦不能說是不可能的推測。由於嘉新新聞獎的官方色彩，或有論者將「嘉新新聞獎」視為「反共戰鬥文藝」的民間表現，⁵⁶但若觀察上述頒發的得獎作品，又會發現得獎作家或作品與反共文藝並無絕對關聯，如鍾梅音的作品《海天遊蹤》屬於較傾向於旅行報導的散文創作，隔年得獎的於梨華作品《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亦是以在美留學生為主題的長篇小說，與反共抗俄的「戰鬥文藝指導」似乎並無關聯。對此筆者以為，或許不必過度詮釋官方的文藝政策，1970 年代的文藝控制基本上以相較此前十年鬆動，因此方有民間副刊的轉型與嘗試，民間自發性的刊物與文藝活動也相較此前十年更為活躍，因此嘉新新聞文藝創作獎的頒發一定程度上還是以當時表現傑出的文藝作品為主，只要在作品概念的表達上與文藝政策並不相違背便不會引起官方的反對。

而下一個問題便是，為何要以「報導文學」的名目頒發給以今日對報導文學要素區分來看，並不屬於報導文學、而更屬於旅遊文學的《海天遊蹤》？筆者對此以為有兩種可能的解釋方向。首先一如前述章節論及軍中報導文學所分析，國軍文藝金像獎的得獎作品亦並非全然在主題上相合於「反共文藝」，但「報導文學」的項目顯然是具有規劃性、目的性的在受官方控制的獎項中出現，考量到嘉新新聞文藝創作獎的官方背景，「報導文學」一詞出現在文藝獎中並不是偶然，透過官方的鼓吹，「報導文學」陸續出現在軍方以及官方的文藝獎項中而為人所認知、接受。再者，《海天遊蹤》一書暢銷、獲獎在 1970 年代，當時對報導文學尚未有深入的文類討論，亦即當時文壇對於何種文類屬於報導文學的相關「界

⁵⁶ 許育嘉，〈重新建立文化戰線的歷史武器〉，本文網址：
<http://www.xiachao.org.tw/?act=page&repno=293>。

定」仍十分模糊，故對報導文學此一新的文類勢必採取較廣泛的認定，而《海天遊蹤》既為作者周遊各國所寫之見聞、思考，加以「旅遊文學」此文類名稱尚未誕生，《海天遊蹤》的被歸屬為「報導文學」似乎也是不得不然與應然。

二、中山文藝創作獎報告文學類

中山文藝創作獎由 1965 年成立的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辦理，獎項分類大致分為文藝理論、文藝批評、小說、散文、新詩、傳記文學、報告文學等，首屆於 1966 年頒發。莊宜文曾對中山文藝創作獎做過下列說明：

……，民國 55 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兩岸政治較勁下展開，綱要中明舉「繼續提倡戰鬥文藝，輔導各種文藝運動，成為文獎會（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後另一次政府提倡文藝的強力行動。該年六月為紀念國父百年誕辰，「中山文藝創作獎」正式成立，……。⁵⁷

由此可知中山文藝創作獎的成立背景是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下，亦可進而推知此獎項的立場隸屬於官方。

中山文藝創作獎在 1980 年以前頒出兩次報導文學的獎章：1969 年（民國 58 年）耿修業《非洲見聞錄》與 1971 年（民國 60 年）喬岳衡《非洲新面貌》。⁵⁸在 1975 年這個時間點以前頒發報導文學的獎項，一定程度上也說明官方同軍方的國軍文藝金像獎一樣，在更早以前便對報導文學投入了相當的關注。但值得玩味的是，此時的頒獎項目名稱是「報告文學」。或有論者以為高信疆在「現實的邊緣」專欄開啓後使用「報導文學」一詞而不使用「報告文學」一詞，是為與大陸習稱的「報告文學」劃清界線、不得不然，⁵⁹實際上高信疆所以稱為「報導文學」的原因現已無法探究，但若真如論者所言，這時再對照中山文藝獎章以「報告文學」名目進行頒獎，則出現論述上的矛盾。筆者以為，一方面與大陸文學劃

⁵⁷ 莊宜文，〈從文獎會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訊》第 143 期，頁 28。

⁵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網站 <http://www.syscf.org.tw/indexhome.php>。

⁵⁹ 如許育嘉在〈重新建立文化戰線的歷史武器——論台灣報導文學〉論到：「高信疆在人間副刊推動的報導文學專欄——『現實的邊緣：本土篇』，基本上反映了當時代對文藝上現實主義的要求，但其捨棄可能造成危險的『報告文學』用語，改用『報導文學』作為名稱是可以從時代上予以理解。」，本文網址：<http://www.xiachao.org.tw/?act=page&repro=293>。

清界線的行爲在鄉土文學論戰前後方才有此必要，由於「工農兵文學」、「紅色文學」等攻訐不斷，高信疆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相對《聯合副刊》對鄉土文學論戰一直採取不涉入的立場，但正值敏感時節則小心行事，另外高信疆認爲報導文學是學習自美國的新新聞「報導」，因此在翻譯上採取較接近美式的「報導文學」亦不難理解。而當中山文藝創作獎頒發的 1969 年與 1971 年則尚無在這類詞彙上斟酌的必要，但更可能的因素則是，官方一向視己爲大中國正統的傳承，因此在文化及文學上都以賡續五四以降的傳統爲準，在 1930 年代的中國是以「報告文學」稱呼，延續到台灣來的正統自然也以相同的名詞，一直到近期最後一次頒發此獎項的 1997 年，共 9 次頒出，皆使用「報告文學」一詞，顯然以維持正統之說較爲可能。

三、國家文藝獎章

1968 年召開全國第 1 次文藝會談後，1974 年「國家文藝基金會」成立，交由國民黨文工會管理。1975 年，由此基金會創立國家文藝獎，但爲避免政黨色彩過重引人爭議，改交教育部管理，由教育部自相關機構、文教社團聘請審查委員審辦國家文藝獎的頒發，以「獎勵優良文藝創作，宣揚國家建設」爲宗旨，獎助分 12 類：文藝評論、詩歌、散文、小說、新聞文學、傳記文學、兒童文學、美術、音樂、舞蹈、戲劇、演藝。1997 年起廢除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改由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辦理，並將獎項改稱「文藝獎」，以便與舊制時期的「國家文藝獎」區別，然於 2001 年經文建會又更名爲同舊制的「國家文藝獎」。舊制的國家文藝獎在 1997 年設置辦法廢除前已辦理 22 屆，相較於新制偏向終身成就而非當年度成就，在頒獎項目上亦改爲力求涵蓋「文化範疇」並與時俱進地增加新興的類別，如電影、建築等；舊制的頒獎標準則偏向當年度成就以及「文學範疇」，故舊制的國家文藝獎在類別與項目的分類上較爲細密，如文學部分細分爲小說、散文、兒童文學、新詩、舊詩、歌詞、傳記文學、新聞文學、戲劇、文藝理論、電影劇本等項目，涵蓋文學範圍內各種文類，每屆該項若有達到水準之申請人者則頒發，若無則從缺。

在 1974 年 6 月 27 日發布，1997 年 12 月 16 日發布廢止的「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 條寫到：「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由教育部就中央及有關機關、文藝團體，聘請委員十一人至二十一人組成之，聘期兩年。」第 4

條則寫到：「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教育部部長兼任或由教育部就委員中聘兼之。」⁶⁰從設置辦法可知，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基本上由教育部管轄，乃屬於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的文藝獎項，可知在 1997 年的改制以前，國家文藝獎基本上是屬於官方對文學界的評價風向球。而在 1970 年至 1980 年之間，尚屬舊制的國家文藝獎在報導文學項目在同一年頒發出 2 次，另外有 4 次的新聞文學項目頒發，表列如下：

表 2-4

1976 年~1980 年 國家文藝獎報導文學相關獎項 得獎清單				
時間	屆數	獎項名稱	得獎人	得獎作品
1976 年	第 2 屆	新聞文學、雜誌獎	彭 歌	成熟的時代
1977 年	第 3 屆	新聞文學獎	趙玉明	飛向白日青天
1978 年	第 4 屆	報導文學特別獎	吳望堯	越南淪亡瑣記；越共煉獄九百天等
			廖威威	天安門抗暴事件；我家在天安門後面
1979 年	第 5 屆	新聞文學獎	趙滋蕃	十大建設速寫
1980 年	第 6 屆	新聞文學·雜文獎	歐陽毅	餘園淺論

※本表根據行政院文建會資料整理。

從上表可知，國家文藝獎在「報導文學」外尚有「新聞文學獎」，然而兩類獎項並不會在同一年以不同名目頒發，並且在「新聞文學」的頒發後往往加註文類的說明：「雜誌」、「雜文」，或可再次推論出 1970 年代對報導文學未有深入的文類界定，因此對報導文學、新聞文學的區分仍處於模糊地帶，在名詞的使用上也未能臻於精確。然而既然區分為兩類獎項頒發，顯然審查委員有其一套的審核判別標準，但早期國家文藝獎並不公開審查過程，也未能獲知審查委員當時的審查意見，殊為可惜。若自得獎作品篇目做出可能的推測，早期國家文藝獎對報導文學的界定或許接近軍方國軍文藝金像獎的認定，以字數規模較大、結構嚴謹的長篇敘述作品做為報導文學，相較於新聞文學接受更大程度的作者主觀色彩，因之得到「報導文學特別獎」的兩篇作品，一方面獎項名稱被冠以「特別」，顯示並非為「常規範圍」內的得獎之作，且自篇目名稱觀之顯然帶有「親身經歷」成份，與其他以「新聞文學」得獎的四篇作品偏向評論性、較為客觀的新聞報導似乎有明顯的區別。

⁶⁰ 資料來源：台灣大百科全書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index>

另，再從得獎作品的寫作主題可知，除彭歌《成熟的年代》以及歐陽毅的《餘園淺論》，一則為「雜誌」、一則為「雜文」，在性質之外主題也因此較為駁雜，然其餘得獎作品則帶有「反共」或「愛國」的主題傾向，相較於軍方的國軍文藝金像獎，國家文藝獎對報導文學項目的主題似乎有更多「思想正確」的要求，反不如受限於軍方題材的軍中報導文學，對「反共」、「愛國」、「國家建設」的議題有明顯的傾向，這類被國家文藝政策指導的題材顯得較為討好，由此可見在直接屬於官方管轄範圍內的國家文藝獎報導文學項目，在一定程度上被官方用以「導向」部份議題，傳播意識形態的意圖更加鮮明。

四、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

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由中國文藝協會所頒發，此協會由張道藩、陳紀滢、王平陵、王藍等發起，簡稱「文協」，與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文獎會）同時於 1950 年成立，成員達到千人，乃 1950~1960 年代相當活躍的文藝團體。文協於 1960 年訂定「文協獎章贈予章程」，確立每年的五四文藝節頒發「文藝獎章」，獎項分為新詩、散文、小說、報導文學、文學評論、翻譯文學、美術、攝影、戲劇、舞蹈、海外文藝工作等，可見此文藝獎章力求包含各文化與藝術的層面，頒發的種類較多。然此獎章既與文獎會同時成立，加以發起成員亦有重疊，如當時主導政府文藝政策的張道藩便是關鍵發起人，可知文協的背景與文獎會有一定的關聯性，不過是脫去「政府輔導」的明顯官方說法，而委婉的採取較為民間自發性文藝團體的立場。

在 1970 年代間，中國文藝協會共頒出 4 次報導文學項目的文藝獎章，以及 1 次的新聞文學項目文藝獎章：

表 2-5

1977 年~1980 年 中國文藝協會報導文學類 得獎清單			
時間	屆數	獎項別	得獎者
1977 年	第 18 屆	報導文學	程榕寧
		新聞文學	胡有瑞
1978 年	第 19 屆	報導文學	林鎮遠
1979 年	第 20 屆	報導文學	盧申芳

1980 年	第 21 屆	報導文學	李元平
--------	--------	------	-----

※本表根據《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1964 年至 1980 年之紀錄整理。

由上表可知，文協首次進行報導文學的頒發是在 1977 年，與 1978 年《中國時報》的時報文學獎設立報導文學獎在時間上頗為接近，此時高信疆在《人間副刊》所推行的報導文學也已經引起廣大的迴響，由此推測文協是受到社會上報導文學的興盛風潮而頒發報導文學獎項是可以理解的。再從得獎者名單觀之，得獎者亦不如上述較早進行報導文學獎頒發的官方或軍方文藝獎為立場傾向較為鮮明、或軍中作家身份者，而是較為年輕的、新一輩年輕寫手，顯示作協在受到文壇風氣所引導下對報導文學進行評選，在標準上亦隨之與民間報導文學較為接近。

五、官方對報導文學的收編與利用

1965 年，國民黨舉行第 9 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央常務委員會所提修正「加強戰鬥文藝之領導，以為三民主義思想作戰之前鋒」一案，而一向從事文藝工作的國大代表等人如王藍、孫如陵、熊公哲等，聯合簽署「運用文化力量，以加強文化作戰，而利反攻復國」案，表示將加強文藝評論工作以為支持、響應。所謂國家文藝體制意指文學的成規和體制，如美學的標準、出版、各種雜誌、文學教育、文學評論、文學獎助、文學社團、以及官方或半官方的文學團體，乃至於翻譯與各種書籍的交換和領受，這些構成國家文藝體制，以鞏固某種國家文藝的利益，國民黨此次的會議結果便是一次構築國家文藝體制的示範。

由時間的線索觀之，自 1965 年後軍方與官方的文藝獎陸續出現顯然並非偶然，而是上述政策影響下的產物，可見官方勢力範圍內各種報導文學名目的徵獎背後都有複雜的政治因素在操作，官方早於民間便已經在報導文學上投注關切，同時反映著官方對這個文藝類別的顧忌與謹慎，以及由上而下的政治上層操作的性質。在一個當時仍屬文類中冷門的報導文學上設立獎項、獎章顯然是有心而為之，事實上，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文藝獎，其背後的基金會成員、發起委員與董事大致重疊，如張道藩既為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文獎會）的主任委員與發起人，同時亦是中國文藝協會（文協）的委員及發起人，並且在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成立之時，也擔任副董事長的角色暨評選委員。自張道藩個人的經歷可知其濃厚的

官方文化人身份，⁶¹而在上述多個文藝獎項擔任要職，便不難理解這些文藝獎背後色彩與意識型態。

許育嘉在〈重新建立文化戰線的歷史武器——論台灣報導文學〉⁶²一文中，試圖以左派的立場重新檢視台灣報導文學發展下被遮蔽的另一面，他認為 1970 年代的報導文學興起固然深受時代、鄉土文學論戰的影響而有暴露現實、左翼啓蒙的意義，但僅依賴少數作家零星的寫作最終仍不免被國家所收編，實際上都是「國府透過國家機器對台灣報導文學寫作的反向運作，以及透過對如中國文藝協會、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等數十文學藝術團體的掌握，撲天蓋地的消解報導文學作為文化戰線上暴露資本主義社會剝削本質的可能性」⁶³，因此他認為國軍文藝金像獎是「反共文藝的操作手段」，而時報文學獎培養出來的寫手如陳銘礪、翁台生等雖有暴露現實的意義卻終究杯水車薪，其他左翼現實主義的雜誌如《夏潮》雖也刊登報導文學作品，卻因屢次被禁而無法與國家所掌控的機制抗衡。許育嘉最終結論為，國府實際上全面佔領台灣報導文學的理論與創作，而報導文學在內在的抵抗性上既被消解，也難免走向衰弱。筆者在此提出許育嘉的看法並非想對「國民政府是否收編了報導文學」做出評論，但試圖提出另一種左翼的看法來討論這些官方勢力下的報導文學。確實在早於民間以前，政府就已經注意到報導文學的特殊性並給予關注，因此無論在軍方或是官方都更早一步的進行徵獎，加以得獎作品主題在配合官方的文藝政策之下，不免傾向特定議題：反共、愛國等政治正確的主題，確實相較民間後來興起的報導文學在主題上顯得缺乏暴露真相的勇氣。

而官方所頒發的獎項之得獎者頗值得討論的是，當時的得獎者大多並非此後文壇知名的報導文學作家，反而湮沒在之後風起雲湧的民間報導文學中，這顯示的是官方所支持的報導文學路線根本上與民間有所落差，而當民間媒體興盛、席捲社會之後，原本軍方與官方所認可的報導文學寫作主題與形式便隨此巨浪被淹沒。另外較特殊的現象是，帶有官方意識的這些報導文學徵獎大多以「單本作品」為獎勵對象，而非如兩大報文學獎以「單篇作品」為徵獎對象，且也與國軍文藝

⁶¹ 張道藩（1897 年～1968 年），1928 年至抗戰前後，曾擔任中央執行委員、社會部副部長、中央宣傳部及海外部部長，交通、教育、內政等三部次長，來台後亦擔任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立法院院長、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等。

⁶² 此文資料來源：夏潮聯合會 <http://www.xiachao.org.tw>

⁶³ 此文網址：<http://www.xiachao.org.tw/?act=page&repno=294>

金像獎的徵獎要求有所不同。這當中的原因，筆者推測是國家類的獎項以面對全部作家、作品為訴求，因此在作品「量」的要求也相對較高，亦較傾向「成就獎」而非「文學獎」的性質而致，而這種特色亦更清楚地劃分出官方文藝獎與民間文學獎在立場性質與徵獎本質上的差異。

小結

在上述軍方的國軍文藝金像獎、民間媒體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與官方的嘉新新聞獎、中山文藝獎章等之外，還有一值得討論的刊物：《綜合月刊》。張任飛所創辦的《綜合月刊》發行時間自 1968 年 11 月發刊至 1982 年 2 月停刊，共發行 159 期，主要發刊活躍期間亦位於 1970 年代。《綜合月刊》相較於其他同樣受到評論者肯定但創刊時間在「現實的邊緣」之後的雜誌為早，⁶⁴因此具有先驅性地位，並且早於被視為報導文學刊物代表的《人間》雜誌十七年，《綜合月刊》承先啓後的地位放在此時間脈絡下顯得更加突出。諸多論者討論台灣報導文學史時，《綜合月刊》曾多次被提及，如陳光憲、鄭明嫻、須文蔚皆曾經提及《綜合月刊》在報導文學發展史上推動的意義，⁶⁵但直至胡文嘉的碩士論文《《綜合月刊》報導文學作品之敘事分析》⁶⁶方才有較全面且深入的論述，胡文嘉歸納其風格為「以高水準為目標、強調新觀念的撰稿角度、重視本國讀者及文化，並兼顧放眼國際的眼光、講究文章的易讀清晰，以及在報導手法與呈現方式上的特殊性等。」⁶⁷熟稔國外傳媒運作，並同時具有引導當代新聞寫作地位的《綜合月刊》，其深度報導寫作的模式對台灣報導文學發揮相當的前導作用。1970 年代以後的報導文學一改原本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式精神濃厚的特色，變得較為嚴謹及客觀，便可從《綜合月刊》的寫作模式上窺探出來。⁶⁸但《綜合月刊》在內容上

⁶⁴ 如 1976 年 7 月創刊的《戶外生活》、1978 年 1 月創刊的《漢聲》，以及 1983 年 10 月創刊的《大自然》等。

⁶⁵ 如鄭明嫻在〈新新聞與現代散文的交軌〉：「1966 年，國軍文藝金像獎設立報導文學獎，1976 年《中國時報》設立報導文學獎，其他如《台灣時報》副刊、《戶外生活》雜誌、《綜合》月刊等等，許多傳播媒體的推動，形成台灣報導文學的興盛期。」《現代散文現象論》，（台北：大安，1992 年），頁 146。陳光憲之說可見陳光憲〈二十世紀報導文學的回顧〉，《應用語文學報》第 1 期（1999 年 6 月），頁 161。須文蔚之說可見須文蔚〈報導文學在台灣，1949-1994〉，《新聞學研究》第 51 期，頁 136 之註 11。

⁶⁶ 胡文嘉，《《綜合月刊》報導文學作品之敘事分析》，東華大學中國語文所碩士論文，2007 年。

⁶⁷ 同上註，頁 80。

⁶⁸ 同上註，頁 12。

仍較偏向報導類的刊物，並未標榜「報導文學」的旗幟，固然在報導文學史上有特殊的意義，但受限於時代因素，1970年代傳媒通路尚未完全發達，加以讀者群與1980年代的《人間》雜誌一樣被限制於知識份子導致銷量不盡理想，⁶⁹隨著張任飛的逝世而不得不停刊，實為遺憾。

綜上所述，1970年代的報導文學同時為軍方、官方、民間三者所影響，然而此時軍方報導文學的路線與民間由高信疆所帶起的報導文學卻有著相當的差異，但受限於軍方報導文學在徵獎以及傳佈上的限制，文學界的話語權終究還是落在民間媒體手上，隨之影響1980年代軍中報導文學在體制與主題上向民間報導文學靠攏，文學作品終究不能只是被讀者私下閱讀，也必須受到文學場域中所有成員公開的評鑑，這種賞析活動同時牽涉著酬勞與聲譽的社會運作。在1970年代的台灣社會，文化界從被絕對的官方掌控逐漸透露出相對的自主之可能，過程中過渡著官方意識形態的緩慢淡出，然而這種官方的意識形態思想控制與操作下的文學品味傾向影響亦是過渡性的、非一夕翻盤的。官方的黨政勢力，軍方的內部操作皆與民間媒體機構同時並存，這是不能忽視的一點，這三者勢力彼此各有一批不同的文學生產者、不同的評鑑組織，各自擁有控制下的文學獎，最終造成互異的文學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正顯示著報導文學發展中不同文化勢力的排斥與融合。

⁶⁹ 見施祖琪、臧國仁〈再論風格與新聞風格——以《綜合月刊》為例〉：「《綜合月刊》的發行量不高，每一期銷售情況不同，多則一萬多本，也有僅兩、三千本的時候……。整體而言，《綜合月刊》仍是長年虧損，靠《婦女雜誌》與『現代關係社』的盈餘補貼。」《新聞學研究》第77期，2003年10月，頁143-185。

第三章 報導文學的場域位移與再建構（1981 年～1990 年）

接續上一章所論及的 1970 年代民間開始初步試圖鬆動政府的管控，到 1980 年代終於全面完成，然而面對一個「自由」的時代，爭議性的問題與過去被隱藏的社會黑暗面亦隨之曝光。在這種蓬勃發展中，報導文學似乎獲得許多「可寫」的題材，過去不能被討論、批判的問題已經逐步解禁，報導文學在這十年間獲得了起飛的契機，亦確實獲得極大成果，楊素芬便曾論及報導文學自 1978 年時報報導文學獎¹設立開始受到矚目，到 1988 年之間這十年「可說是報導文學的黃金期，這一時期之間所出版的報導文學集有著開路先鋒的貢獻，受到文評家的重視，也較為所知。」²顯示 1980 年代整體而言確實是報導文學最為風光的一段歲月。然而報導文學做為隨著媒體一同興起的新興文類，在蓬勃成長之時，亦受到積極擴展勢力的文學媒體介入日深，報導文學的發聲場域從讀者群龐大、但發揮空間有限的報紙副刊，被推向象徵著文學桂冠、但相對讀者群較為小眾的文學獎，這種轉移固然是出於高信疆對報導文學的高度期待，然而對於社會性的需求強烈且文類體系尚未建構完備的報導文學而言，究竟是推力或是阻力？而在文學獎以「文類上難以定義」³不再青睞報導文學後，報導文學再次藉由本身特殊的社會參與性轉戰到民間的雜誌刊物，回到社會中的報導文學，反而更能發揮其實踐社會運動的特性。

從 1978 年開始徵選報導文學項目的時報文學獎，自 1978 年至 1982 年連續 5 屆徵選報導文學，對於自副刊轉戰文學獎場域的報導文學而言，是一次從「大眾文學」升級至「精英文學」的機會，讓報導文學從原本介於「報導」與「文學」之間尷尬的地位，得以提昇與「純文學」的三大文類相提並論，可說是一次內涵意義上的轉化。而文學獎的設立，對於侷限在副刊有限欄位、無法做出更大發揮的報導文學寫手，或是雖有作品卻缺乏媒體管道曝光、進而出版的報導文學工作

1 在此將「時報報導文學獎」視為一個整體性的名詞，故不在「時報」加註書名號。

2 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頁 75。

3 1983 年接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的金恆煒在第 6 屆時報文學獎以「報導文學在文類上難以定義」為由，停辦報導文學徵選。

者來說，不啻為一個絕佳的試煉場與加冕的契機。連續五年的徵獎吸引眾多報導文學作者投稿，創作的數量既多，隨之而來的評審意見與討論亦迅速增長，因之成為報導文學審美範式的確立與文體理論初步建構的關鍵時期。然而 1983 年接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金恆煒卻在當年的第 6 屆時報文學獎以「報導文學在文類上難以定義」為由停辦報導文學徵選，這股熱潮似乎硬生生嘎然而止。

1985 年堅持左派立場的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被認為延續了報導文學的生命⁴。《人間》做為旗幟鮮明的報導文學刊物，確實將報導文學的社會參與性發揮到最高，引起讀者對台灣眾多不為人知的黑暗角落之重視，進而能對社會事件產生重要的影響，如湯英伸事件藉由《人間》的報導，曾一度讓當時的蔣經國總統下令重新審查，⁵顯見《人間》對社會大眾有一定的影響力。陳映真的個人意識與精神將《人間》、進而將報導文學帶向一個具有鮮明「社會良心」定位的文類，賦予這個文類更高的使命感與定位，然而這樣的定位卻似乎也使此後報導文學的寫作空間與可能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捆綁。

隨著 1987 年解嚴、1988 年報禁解除，台灣逐漸全面解禁，新興黨派紛紛成立、國會進行改選，環保議題、勞工問題、族群認同等陸續浮上檯面，社會大開輿論之門的同時，理論上更有發揮空間、將有更多新興議題的報導文學卻不見更加蓬勃，面對激烈的社會轉型與即將到來的文學商業化，背負過多「社會良知」責任的報導文學在將文學視為消費品的環境難以生存，強烈的批判性與社會性從優點變為缺點，沈重嚴肅的報導文學在銷售量上無法與「輕薄短小」的抒情散文較量，失去出版社以及讀者／消費者的支持，發表的空間不斷縮小，這不僅是《人間》雜誌停刊的主因，亦導致許多業已成名的專業報導文學作家產量日漸下降，暗示報導文學在商業大蠶下的不合時宜，最終報導文學僅能悄悄地隨著 1980 年代的行將結束與《人間》的停刊，一齊走向這股風潮的尾聲。

綜上所述，本章企圖透過在報導文學活躍的 1981 年到 1990 年間，報導文學獎與《人間》雜誌對報導文學發生何種型塑與建構？對於報導文學來說，這種

⁴ 鍾喬便寫到「《人間》在一定的程度上，接續了一度截斷的報導文學命脈。」見鍾喬，《回到人間現場·後記》（台北：時報文化，1990 年），頁 312。

⁵ 1986 年，鄒族少年湯英伸從嘉義師專肄業到台北工作，犯下一家三口的滅門血案，一時震驚社會。官鴻志在《人間》發表〈不孝兒英伸〉深入報導事件始末，引起社會大眾對原住民問題的高度重視，雖最終仍無法挽救湯英伸的死刑判決，然而此事及此文點燃了原住民意識、啟蒙了原住民運動。

變化體現在哪些層面與內涵上？報導文學自上一個十年的文學副刊，轉移陣地到文學獎與專業刊物上，這種活動場域的位移又顯示出何種意義？

第一節 燦然輩出的報導文學獎

相較於 1970 年代中期後方才陸續出現的報導文學獎項，1980 年代隨著報導文學的逐漸成熟，活動的文學場域也隨之不斷擴大，因之在報導文學的獎項上數量大為增加，在這些獎項中最為關鍵者即為在 1978 年便開始徵獎的時報報導文學獎。文學獎的桂冠提昇了報導文學做為新興文類的合理性，吸引更多的創作者投入報導文學的創作，在題材與寫作技巧上均有更多元的嘗試。

此外，已舉辦多年的國軍文藝金像獎持續推動軍中報導文學的成熟，但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原本侷限在軍中題材的國軍文藝金像獎也對外界打開大門，開始嘗試接納其他的寫作題材，加以知識青年的義務兵役行之有年，在原先的軍中作家以外帶來新的創作視野，此二者對於軍中報導文學而言不啻為新的動力。

在上一個十年，官方透過各種文藝獎章的頒發達到收編報導文學抵抗性的目的，透露出官方對報導文學的重視與戒備。邁入解嚴前夕，官方的勢力逐漸從文學中淡出，文學開始具有較為獨立的空間，此時的文藝獎章對報導文學的頒發相比下卻更加頻繁，獲獎者也傾向從知名報導文學獎選出，得獎作品的題材不再要求「政治正確」，更多是環保、傳記類作品，或許顯示著報導文學這段時間在文壇的獨領風騷與不可抵擋，終於匯流成一股鮮明的路線。

一、時報報導文學獎（1978 年～1982 年）

時報文學獎自 1978 年開始徵選報導文學類，時任《人間副刊》主編的高信疆推動獎項的設立功不可沒，高信疆對於時報報導文學獎充滿期待：

時報秉持一貫的「反映並促進社會進步」的宗旨，在「認識自己」、「參與社會」、「反哺大眾」的方針下，特於第一屆的時報文學獎裡，設立「報導文學獎」一項。期使這種直接有力、融貫新聞和史觀、結合事實和思考的新形式，能為正在奔騰激盪

的文學主流注入新的血脈。⁶

可見在時報文學獎在基本的三個文類（小說、新詩、散文）外另外增設此獎，是高信疆本人的促成，亦是高信疆對於《人間副刊》與報導文學精神的再一步延伸、擴展，希望藉此讓文學更深刻的參與到社會大眾之中。獎項既設立，此前又有《人間副刊》的推動與耕耘，首屆時報報導文學獎的徵稿狀況十分踴躍，共計有 180 件報導文學作品投稿，推薦報導文學作品經過審查合格者亦有 44 件，⁷然而原本如此熱烈的時報報導文學獎卻在 1982 年嘎然而止，讓台灣報導文學遭受首次的挫敗。但在這 5 屆的舉辦過程中，已經逐步地建構起台灣報導文學的基本樣貌與要素，5 年的期間透過時報報導文學獎得獎或被推薦的作品累積出一定的數量，藉由評審委員各自對報導文學的表述也因之可以梳理出報導文學的大致輪廓，相對此前報紙副刊中較為短小的篇幅，民間的報導文學有了初步的長篇作品形式，報導文學的文類理論也有了足以討論的素材，因此這五屆的時報報導文學獎在各方面皆具有經典的開創意義，值得深入分析。

表 3-1

1978 年~1982 年 時報報導文學獎 得獎清單	
1978 年 第 1 屆 共 10 篇	首 獎：邱坤良〈西皮福路的故事〉 曾月娥〈阿美族的生活習俗〉
	優 等：王鎮華〈台灣現存的書院建築〉 陳銘礪〈最後一把番刀〉 朱雲漢、丁庭宇〈杜鵑窩下的陰影〉 翁台生〈癲癲病院的世界〉 馬以工〈陽光照耀的地方〉
	佳 作：李利國〈我在淡水河兩岸作歷史的狩獵〉 張曉風〈新燈舊燈—林安泰古厝拆除一日記〉
	推薦獎：古蒙仁〈黑色的部落〉
	評審委員：孟瑤、姚朋（彭歌）、陳奇祿、胡菊人、張系國
1979 年 第 2 屆	首 獎：林元輝〈蘭陽平原上的雙龍演義〉
	優 等：馬以工〈幾番踏出阡陌路〉

⁶ 高上秦主編，《時報報導文學獎》（台北：時報文化，1979 年），頁 1-2。

⁷ 張明珠，《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得獎作品研究（1978~2000）》，頁 89。

共 7 篇	古蒙仁〈失去的水平線〉 楊定燮〈病兒求醫記〉 梁憲初〈春劫〉
	推薦獎：漢聲出版社《國民旅遊特輯》 ⁸
	特別獎：魏京生〈二十世紀的巴斯底獄〉 ⁹
	評審委員：李亦園、殷允芃、黃春明、喬志高、趙滋蕃
1980 年 第 3 屆 共 8 篇	首 獎：心岱〈大地反撲〉
	優 等：林洲民〈望安記事〉 李敬〈回憶北大荒〉 周陽山〈煙山一日談〉
	佳 作：林清玄〈不敢回頭看牽牛〉 林昭〈蘭嶼今昔〉 楊明顯〈無根草〉
	評審委員：朱西甯、沈君山、金耀基、徐佳士、叢甦
1981 年 第 4 屆 共 8 篇	優 等：簡文飛〈捕蟲者〉 心岱〈美麗新世界〉 阮小晨〈花嶼紀實〉 李昂〈別可憐我，請教育我〉
	佳 作：張曉風〈夜診〉 陳玄宗〈信義路五十六巷〉 王義雄〈史懷哲在台灣的一個朋友〉
	推薦獎：尤增輝《鹿港三百年》 ¹⁰
	評審委員：司馬中原、何欣、徐佳士、陳映真、漢寶德
1982 年 第 5 屆 共 3 篇	報導文學獎：安溪（吳英明）〈泰北行記〉 葉菲〈被遺忘的一群〉
	推薦獎：柏楊《金三角·邊區·荒城》
	評審委員：唐文標、林懷民、張系國、黃肇珩、漢寶德

※本表根據張俐璇〈兩大報文學獎〉之「附錄九：時報文學獎歷年簡史」與《〈中國時報〉與《聯合報〉》

⁸ 據張明珠解釋，〈國民旅遊特輯〉為漢聲雜誌社所出版之 250 頁圖文互照的專書，對台灣生態環境演變有較細微的描述，見張明珠，《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得獎作品研究（1978~2000）》，頁 17。

⁹ 據張明珠在《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得獎作品研究（1978~2000）》中指出，〈廿世紀的巴斯底獄〉刊載在 1979 年 3 月 11 日由魏京生所發行的《探索雜誌》第 3 期。

¹⁰ 《鹿港三百年》由戶外生活雜誌社出版，尤增輝撰文、林彰三攝影，共 295 頁，可參見張明珠，《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得獎作品研究（1978~2000）》，頁 19。

合報》報導文學得獎作品研究〉整理。

從得獎名單可知，時報報導文學獎在 5 年的徵獎期間為台灣報導文學塑造出第一代的報導文學作家，這批作家同時立下報導文學寫作的範例與標竿。依楊素芬、吳薇儀的說法，劉還月可以視為台灣報導文學作家的世代分歧點，在劉還月之前的報導文學家，即為在第一屆到第五屆時報報導文學獎獲獎的古蒙仁、邱坤良、李利國、陳銘礪、翁台生、馬以工、心岱、林清玄等人，吳薇儀在其研究中指出，這群報導文學作家「可以視為是台灣報導文學界的前行代。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為人們所熟知的報導文學寫作者，他們的得獎紀錄集中在第一屆至第五屆的時報文學獎，而且再也沒有出現在日後的兩大報文學獎，……。」¹¹由吳薇儀這段論述可以看出這群「前行代」的兩大特色：得獎紀錄僅在前五屆時報報導文學獎、沒有再出現於日後的兩大報報導文學獎。這群第一代的報導文學作家有著相對共同的出身背景，其中大多服務於報社，因之在報紙副刊設立報導文學專欄、大力推介此一新文類的同時，這批作家大多處於報紙第一線而親身接觸，既然已經具備新聞採訪以及報導文學專欄的基本能力，在挑戰較為長篇、足以參賽的報導文學創作上便較能有所基礎。而沒有再出現於日後的兩大報文學獎，筆者以為這是因為下一波的兩大報文學獎設立報導文學項目出現在 1990 年代，與第 5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在時間點上已有將近十年的落差，這段期間這些獲獎的作者或是推出報導文學的集結專書、或是從事相關雜誌的編輯與撰寫，在這段時間累積相當的象徵資本，進而提昇在整個文學場域的所處位置，待得十年後再次興起報導文學獎的熱潮，這批作家已經依靠此段時間累積的聲譽晉升為「評審」階層，而不需要以「參賽者」的姿態為人評價其報導文學的好壞。

首屆時報報導文學獎，2 篇首獎的主題分別是邱坤良以民間戲曲為主題、關於台灣東北西皮派與福路派兩個劇團從分裂到和解的〈西皮福路的故事〉，以及曾月娥以呈現阿美族生活文化與習俗為目標的〈阿美族的生活習俗〉，兩篇首獎的主題各有擅場，大抵皆在關注台灣本土、挖掘較為人所不知的台灣歷史風俗。首屆徵獎的得獎作品也在有意或無意間成為此後作品的「標準」，兩篇首獎作品以及王鎮華的〈台灣現存的書院建築〉各自針對民間劇團、原住民生活與民間建

¹¹ 在吳薇儀的研究中，其中胡台麗、徐仁修 2 位，雖未在第 1~5 屆的時報報導文學獎獲獎，但吳薇儀仍將他們歸為「前行代」。見吳薇儀，《兩岸當代報導文學比較研究（1976-2994）》，頁 80。

築群做過長期的田野調查與觀察，自資料整理為文而旁徵博引，難免帶有學術論文的氣息，卻影響此後的來稿作品亦不乏此書寫模式，意外地萎縮了報導文學可能的發展甚為深遠。文學獎的得獎光環對於有心從事報導文學的創作者而言有著高度吸引力，為求得到評審青睞，新進創作者有意與無意之間朝向前此的得獎作品看齊，反而成為日後創作上的制約，對於這種學術化傾向而產生的流弊，須文蔚曾道：

不少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的「前身」是學術研究，研究者挾著田野調查的豐富資訊，以及鉅細靡遺的文獻調查，以優美的筆調改寫後，參與報導文學獎甄選。這類作品通篇鮮少著墨於人物的刻劃、環境的描寫與氛圍的渲染，卻能擄獲評審青睞，長此以往，後繼者群起仿效之，自然造成一股風潮。……後繼者毫不反省地模仿，只成就了資料堆砌的文本，反而與社會生活漸行漸遠，更與「實在的文學」的理想背道而馳。¹²

具有深厚田野調查基礎的學術性作品，輔佐以文學的筆法潤飾，減少人物與情緒的刻劃、描寫，在報導文學中將「報導」的性質發揮到極致，屬於偏向客觀性的作品。然而同時期得獎的作品中，亦不乏以經營氛圍、訴求感性為長處的作品，如楊定燮〈病兒求醫記〉、李昂〈別可憐我，請教育我〉等，但這類作品在前幾屆徵獎未能取得首獎的成績。綜合觀之，這 5 屆的首獎作品大多在客觀資料上有相當豐富的累積，顯示此時的評審委員對於報導文學的「報導性」仍有一定的要求與重視，偏向以文學見長、情緒飽滿的作品若是未能有龐大的資料背景做為支撐，在評選上便比較無法得到優異的成績。連續 5 年的徵獎，評審委員藉由名次的評定樹立下報導文學的審美標準，導致後繼的報導文學作品積極朝向資料去做努力，但這種盲目的追隨導致作品有形無骨，流弊隨之產生，缺乏思想性而徒具資料，報導文學原本具有的社會參與性逐漸消失，反而與新聞報導越來越近。

正如前所敘述，從評審意見可以看出，¹³當時對報導文學作品的要求基本上是文字優美、結構嚴謹，對於所敘述的事件資料必須剪裁得宜、有憑有據，在議題上偏好能切入當時台灣現況，如農村面對現代化的衝擊、台灣的開發史、消逝

¹² 須文蔚，〈再現台灣田野的共同記憶〉，《報導文學讀本》，頁 35-36。

¹³ 評審意見可見張明珠，《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得獎作品研究（1978~2000）》，附錄五：《中國時報》歷屆報導文學獎評審意見，頁 300-315。

的傳統文化等，以能具有真實感、引人入勝者為優。如陳奇祿在〈杜鵑窩下的陰影〉之評審意見中便表示：「報導文學應該是翔實的把事物的真相描敘出來，使讀者有身歷其境的感覺，而對作者所要報導的主題，能有深切的瞭解。……，但是報導文學則除了必須有事實的可信度以外；還必須有表達的文學技巧，使它更具可讀性，並引起讀者的共鳴。」¹⁴這段敘述基本上概括了前 5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的評審標準。而這些評選條件顯示出，在這個階段的報導文學並沒有作者個人過度強烈的主觀意識滲入，誠然大部分的作者在寫作之時必定有其立場，但在作品中則是「提出問題意識」引發讀者進一步去思索、判斷，可以說這時對報導文學的要求是客觀性要大於主觀性，因此作者在作品中可以表達「看法」卻不能直言其「立場」，情緒的渲染以及悲天憫人的情懷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直言不諱的批判與絕對的立場則是較少的，不避諱作者立場的批判性報導文學寫作要到《人間》雜誌之後逐漸成為主流，進而取代原本偏向客觀報導性的報導文學寫作路線。

然而，從審查意見中對得獎作品的評論觀之，似乎審查委員對這些作品的看法與作者本身的訴求有著解讀上的落差。以 1978 年首屆的時報報導文學獎為例，決審委員彭歌以為〈西皮福路的故事〉顯示出自微小如戲曲也可看出「台灣與大陸本為一體」，而在台灣的大眾面對反共復國的目標更應當「捐小異而求大同」，展現出為國家民族共同未來積極求和的努力——這種延伸解讀顯然有過度詮釋的嫌疑。而該年另一篇首獎之作〈阿美族的生活習俗〉，同樣被決審委員孟瑤視為展現著「漢民族的寬容與博大」、相較於日本人對原住民的殺戮，「漢民族則是具有犧牲自己的化民成俗精神」等，與作品中客觀性的介紹生活民情有所差別，不免讓人感到過度附會。¹⁵這種矛盾可以解讀為 1970 年代末期到 1980 年代中解嚴前後，從文學乃至社會的過渡時期之表現，固然整體社會正從「大中國情結」逐步解套、朝向「台灣本土意識」前進，但這種轉變是緩慢、非一夕之間達成的，亦並非依照時間點的斷代便立刻發生變化，而會在轉型的過程中表現出許多的矛盾、混合、混沌之處。因此，可以理解當這些帶有台灣在地色彩的作品甫從報紙副刊的欄位進入文學獎的比試殿堂，從支持且推廣台灣在地意識的報紙副刊場域進入另一種新的文壇比試場，文學獎的評審依其審美判準構築了另一個文學的強勢話語權，唯有符合者能獲得「認可」，被認為是「優秀作品」。故，這些得獎作品雖在不同程度上被誤讀、附會，但也正是這種雙面的可解讀性使之獲

¹⁴ 同上註，頁 304。

¹⁵ 同上註，頁 300-303。

得評審的青睞，從而在新的文壇場域中獲得表現的機會。

整體而言，時報報導文學獎透露出當時報導文學的主題傾向，這種傾向亦即黃春明所批評的「獵奇」、「境內異國情調」，¹⁶從題材觀之，多數作品所描寫的皆是「台灣境內不為人知的特殊事件、特殊地點、特殊民情」。在原住民運動尚未興起的 1980 年代初期，原住民的生活與處境成爲少見的、稀奇的題材，因此從〈阿美族的生活習俗〉、〈最後一把番刀〉、〈黑色的部落〉到〈蘭嶼今昔〉，原住民可謂是當時一大「熱門」。此外描寫精神病患者的〈杜鵑窩下的陰影〉、癲癲病患的〈癲癲病院的世界〉乃至泰北孤軍的《金三角、邊區、荒城》，雖說在一定意義上積極暴露了這些弱勢族群的困境，但更大的賣點在於挖掘出這些本不爲人所知的存在，引起社會大眾的好奇與驚愕，這類作品陳銘礮當時的名作〈賣血人〉、柏楊的〈穿山甲人〉可謂異曲同工。因此，固然由於文學獎的字數篇幅較副刊專欄爲多，報導文學整體來說在題材內容上確實有所擴大、多元，然而這僅是以全貌而言，若是集中觀察這些報導文學得獎作品，隱約可以發覺每一年的某種「風潮」，報導文學創作者對某些「流行」議題的集體關注。在這種議題的流行追隨之下，可以理解黃春明認爲這些作品「缺乏思想性」，固然這些作品都具有對社會、對歷史的關懷與呼籲，但當這種反省與思考僅僅是表面性的、缺乏個人深度的，甚至有「炒短線」嫌疑，則難怪這類作品最終走向僵化。

二、1980 年代的國軍文藝金像獎

進入 1980 年代的國軍文藝金像獎，在報導文學的徵獎題材上逐漸放寬限制，因之得獎作品在題材上有了些許新嘗試，雖然不免仍以國軍相關題材爲大宗，但考量到上一章所論及的此獎項之封閉性與侷限性，可以理解有心獲獎者會預設評審的立場，以國軍爲主題寫作可獲得更大的得獎機率。整體而言，1980 年代間的得獎作品確實開拓了更多寫作主題與寫作方式，在規模結構與字數上都與前十年略有差異。以下爲此十年間獲獎作品列表：

¹⁶ 陳映真，〈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聯合報》第 37 版，2001 年 1 月 18 日。

表 3-2

1981 年~1990 年 國軍文藝金像獎 得獎清單			
時間/屆數	獎項別	得獎者	得獎作品名稱
1981 年 第 17 屆	未徵選報導文學項目		
1982 年 第 18 屆	金像獎	楊首舉	〈疾風勁草話湘潭〉(約 6 萬字)
	銀像獎	彭明輝	〈鷹的成長〉(約 6 萬字)
	銅像獎	陳性耀	〈固我南疆〉
1983 年~1985 年 第 19~21 屆	未徵選報導文學項目		
1986 年 第 22 屆	銀像獎	王映湘	〈領袖請再召集我們〉(約 2 萬字)
	銅像獎	朱仲賢	〈海上蛟龍〉(約 3 萬字)
	佳作	胡鼎宗	〈駝鈴聲入耳來〉
1987 年 第 23 屆 解嚴	佳作	鄭慶生	〈直到如今更不疑〉
	銀像獎	孫 松	〈我將再起〉(約 1 萬 5 千字)
	銅像獎	梁憲初	〈奔騰的十四項〉(約 1 萬 5 千字)
	佳作	陳兆玠	〈碧海豪情大國風〉(約 2 萬字)
	佳作	龔 燮	〈鹿苑長春〉
	佳作	石世賢	〈揚帆四海遊，千里送溫馨〉
1988 年 第 24 屆	銀像獎	張知行	〈砲聲響起〉
	銅像獎	胡楚卿	〈故園巡禮〉
	佳作	李德政	〈赤禍萬里哀神州〉
	佳作	周培瑛	〈由歷史尋新天地〉
	佳作	盧孝賢	〈漂浮海外的蓬萊仙島〉
1989 年 第 25 屆	銀像獎	王 賢	〈原住民的昨日、今日、明日—失落的弓箭〉(約 3 萬字)
	銅像獎	孫承文	〈帶著友誼遠航去〉(約 1 萬 5 千字)
	佳作	徐世星	〈在驚濤駭浪中建立起來的海上公園〉
	佳作	王雲龍	〈天箭無敵〉
	佳作	羅 紀	〈返鄉探母記〉
	佳作	彭 徐	〈背著榮字的老兵〉
1990 年 第 26 屆	金像獎	曾志強	〈長夜望海〉(約 2 萬字)
	銀像獎	酆台英	〈剝繭的人〉(約 1 萬字)

	銅像獎	孫承文	〈掛上飛鷹〉(約 1 萬 5 千字)
	佳作	王惠民	〈走過歲月、走過旗津—記我家鄉〉
	佳作	鄭坤裕	〈海防尖兵〉
	佳作	邵淑毅	〈北海遊蹤〉

※本表根據蔡豐全，《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得獎作品分析》表四之四「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得獎作品內容簡述」整理。

曾慶華在其碩士論文《國軍新文藝運動之研究》中亦提及：「自第十四屆（1978）起，徵獎之對象擴大至社會，主題之要求亦作了合理的放寬；自第十六屆起，皆以徵選目的代替主題。其基本精神為：只要是反共的、愛國的、團結的作品，均歡迎參加。」¹⁷顯示軍中報導文學不再將主題侷限在「戰鬥文藝」、「反共文學」，1981年頒布的「國軍新文藝運動推行綱要」在措辭上也減少了戰鬥、反共等強烈的字眼，改以溫和的建設社會風氣、美化生命心靈為訴求，顯示逐漸從將文學視為工具轉為視之以心靈的美善創作，這正說明了這種文藝路線的逐漸轉向與箝制的鬆動。¹⁸當1978年鄉土文學論戰初步落幕，而時報文學獎首次設立報導文學獎項，同年第14屆的國軍文藝金像獎徵獎對象亦從現役軍人擴及至軍眷、後備軍人和雇員，¹⁹再加以1981年文藝政策的重新修正，可以說1980年代的軍中報導文學也因社會風氣變遷而走向一個新的時代。

就1980年代的得獎作品分析之，在主題內容上雖然部隊實況描寫以及從軍的回憶仍佔多數，但已經開始有弱勢族群的描寫如〈原住民的昨日、今日、明日—失落的弓箭〉，²⁰並在單一人物描寫的主題上亦有所開創、嘗試，如〈長夜望海〉、〈剝繭的人〉，此一主題上的轉移焦點在1987年解嚴後更加明顯。在字數份量上，此十年間的作品除1982年的〈疾風勁草話湘潭〉因為回憶錄性質故字數達到6萬字以外，²¹大多數作品字數皆約在1萬2千字至3萬之間，整體相較

¹⁷ 曾慶華，《國軍新文藝運動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年，頁101。

¹⁸ 國防部國軍新文藝運動推行綱要第3-5條。三、確認文藝作家的社會責任，建立純樸、清新、雄健、明朗的風格，以闡揚人性的真善美，喚起社會合群互助的德性，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四、確立文藝創作應以服務人生的主旨，以增進國人的生活情趣，激發民族的生命潛力，擴大心靈境界，提昇文藝價值，進而充實人生、美化人生、開創人生。五、秉持三民主義博愛行仁的文化思想，創造純真優美至善的文藝作品，發揮引人入勝的文字力量，達到說服群眾，反映人生，感化群性，啓示生命真諦的目的。

¹⁹ 蔡豐全，《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得獎作品分析》，頁80。

²⁰ 此得獎作品有抄襲〈最後一把番刀〉之疑。

²¹ 據蔡豐全對〈鷹的成長〉作者彭明輝的訪問表示，該篇為約6萬字，然因無法獲得該作品，

1970 年代時動輒 5、6 萬字甚至百萬字的作品結構，在篇幅上已經逐漸縮小，但相對民間報導文學的篇幅，仍是保持著軍中報導文學宏篇巨製的傳統。對於上述現象，蔡豐全解釋道：

隨著國語文的運用在社會日漸普及，國軍文藝金像獎創作者與作品的素質得到提昇，而徵選題材在 1980 年代的鬆綁，也成了作品蓬勃發展的一個最好的發揮空間；另一方面，「預官制度」至此已行之多年，多數高學歷的義務役預官進入軍中，提高了軍人素質，也導引了軍中文藝寫作素材多元的開拓。²²

蔡豐全此說將國軍文藝金像獎轉型的兩大關鍵歸為：國語文教育的逐漸普及、高學歷青年因義務役而進入軍隊。筆者則以為國語文的使用與教育之普及化固然是原因之一，但這是整體社會文學創作風氣提昇的基礎，不能單獨的解釋軍中報導文學的特殊轉型現象。而在「預官制度的行之有年」上，筆者以為過去在軍中專事寫作的軍人固然在學歷上並沒有因義務役而入伍的大專兵優異，但軍中作家中不乏具有相當文學成就且甚至擔任文學獎評審者如尹雪曼、朱西甯、趙滋蕃等，事實上這樣的專業作家反在預官制度成熟後不再出現，因此預官制度究竟是提高了軍人的文藝素質或是反而減低了軍中專職文藝者的出現，尚且難以定論。

不同生活經驗、背景與學歷的知識青年因義務役而入伍，確實在一方面增加了軍中報導文學寫作的多樣性，但這並非單一的因素，這也與社會開放後生活經驗增加、對社會的瞭解與關懷提昇有關，這是社會大眾所共同擁有的一種轉型，因此職業軍人的生活不再只侷限於軍旅生活，寫作的延伸範圍也隨之廣闊。筆者想強調的是，若是將軍中報導文學寫作的轉型單純視為教育程度的影響，是否低估早期軍中寫作報導文學者的寫作能力？實際上像 1970 年代那樣宏篇巨製的架構與報導才是更難駕馭的。但總之，國軍文藝金像獎在經過多年的選拔後，此前的題材範圍不免有枯竭的可能，此時隨著大專兵的入伍，加以整體政治環境的鬆動，在在帶給軍中新的社會視野與對社會其他議題的關注，此時修正文藝政策、擴大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的選材範圍，亦是時勢所趨。

此外，國軍文藝金像獎在 1981 年、1983 年到 1985 年並未徵選報導文學項目，在時間點上正與 1983 年開始停止徵選的時報報導文學獎相合，關於國軍文

故在此暫時不列入討論。

²² 蔡豐全，《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作品分析》，頁 58。

藝金像獎在這些時間點上停辦的原因，或有參與者指出這是因為國軍文藝獎預算有所縮減，在有限的金額內必須在某些項目進行刪減，²³但何以在這幾年間刪減的是報導文學的徵獎，筆者以為這仍有值得推敲之處。筆者認為，或許對於推動報導文學較早的《中國時報》與軍方文藝單位而言，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推動，一來隨著民間報導文學創作風氣日興、持續以獎項鼓勵創作顯得必要性不足，二來對於報導文學發展的困境也較早的出現思考與反應。以軍方而言，原本以激勵士氣民心、宣揚國軍精神為主的報導文學，面臨社會與文學在解嚴前的本土傾向可能出現路線上的混淆與不定，或許因此停辦報導文學徵獎以免爭議。

綜上所述，軍中的報導文學由觀察國軍文藝金像獎可知，已經逐漸打開過去的封閉性，朝向與社會接軌，這也是時代與軍隊本身的轉型所不得不然，知識青年與社會上蓬勃的議題討論，對軍中報導文學產生推力，原先自成一格的軍中報導文學逐漸與民間匯流，在這個民間報導文學活躍發展的關鍵十年，軍中報導文學雖然在體制結構上仍處於過渡階段，但在創作者的議題傾向與寫作模式上，已然露出與民間文壇靠攏的意圖。蔡豐全的研究指出，國軍文藝金像獎自 1990 年的第 26 屆之後，便將報導文學類的字數要求降低至 5 千字左右，²⁴從字數的修正進一步證明軍中報導文學朝向與民間報導文學一致的方向前進。

三、官方報導文學文藝獎的民間化

許多在 1970 年代便業已設立的文藝獎章，自 1980 年代起紛紛增設報導文學類，或是設立時雖本就有報導文學項目，卻並未有如 1980 年代如此密集的頒發，如在前章已經論及的中山文藝創作獎、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皆是在這十年間方才開始對報導文學類進行頒獎。報導文學獎章的大量頒發，顯示報導文學在這此十年間的快速成長與輝煌受到文壇的肯定，從 1970 年代較為稚嫩的階段走向被普遍承認且具有文壇地位的新文類。有關各文藝獎在 1980 年代間的頒獎名單整理如下：²⁵

²³ 可參考蔡豐全對姜穆與呂玉亭的訪談（《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作品分析》，頁 174、頁 177），二人均有指出國軍文藝金像獎的獎金受到每年預算編列、國防預算等的影響，因此每個獎項每年的獎金皆會略有不同，舉辦項目也時有更易。

²⁴ 蔡豐全：「本研究發現，自第 26 屆文藝金像獎起，對報導文學字數的要求縮小，由原先的數萬字，減少為 5000 字左右的範圍，……。」《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作品分析》，頁 68。

²⁵ 得獎名單依照行政院文建會《解嚴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整理。

表 3-3

1980 年代 中山文藝創作獎報導文學類 得獎清單		
時間／屆數	得獎者	得獎作品名稱
1985 年 第 20 屆	葉輝明	《荖濃溪畔》
	周培瑛	《走在鄉間路》
	林少雯	《綠滿人間》
1980 年代 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報導文學類 得獎清單		
1984 年第 25 屆	周培瑛	頒發對象為作家，故無得獎篇章
1990 年第 31 屆	心 岱	頒發對象為作家，故無得獎篇章
1980 年代 中興文藝獎章報導文學類 得獎清單		
1983 年第 6 屆	韓 韓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1984 年第 7 屆	胡有瑞	《現代學人散記》
1986 年第 9 屆	周培瑛	《走在鄉間路》
1987 年第 10 屆	陳玉珠	《藍色小狼》
1988 年第 11 屆	鍾麗慧	《織錦的手》
1989 年第 12 屆	晨 曦	《天籟傳釋者－林昭亮的奮鬥》
1990 年第 13 屆	莊柏和	無得獎篇章

從得獎名單觀察，過去官方色彩濃厚的文藝獎也逐漸與民間靠攏，得獎的報導文學作家大都是從民間報導文學起家，屬於文壇所公認、已有名氣的報導文學傑出作家，如心岱、韓韓，不再如上一個十年在得獎者上與民間有著顯著的落差。顯示這些文藝獎章的官方色彩正在逐漸減低，試圖營造出文藝獎章獨立的價值。此外，得獎者的作品在主題內容上也不若 1970 年代時充滿「政治正確」的色彩，關於政治、國家建設的題材幾乎不再出現，主要偏重環保議題、保育問題，儼然與社會話題靠近許多，從過去受到限制的題材中逐漸邁出步伐。較為特殊的是，在其他報導文學獎項中較為少見的人物描寫，如《現代學人散記》、《天籟傳釋者－林昭亮的奮鬥》，仍出現在中興文藝獎章的得獎之列，似乎在與民間報導文學接軌的同時，文藝獎章仍有部份有異於民間媒體的審美標準與文類判別標準，但在報導文學的合流過程中，文藝獎章針對這類不同性質報導文學作品的頒獎，對於鼓勵報導文學多元發展而言，亦不失為正向的鼓勵。

在上一個十年，官方透過各種文藝獎章的頒發，透露出對報導文學的重視與戒備。此時的文藝獎章對報導文學的頒發相比下卻更加頻繁，照上述文藝獎章的頒發名單看來，幾乎自 1983 年後，每年都有報導文學獎頒出。1983 年恰好是時報報導文學獎停止徵獎的時間點，相對於國軍文藝金像獎之於民間文壇的較少關聯性，這些具有歷史背景支持的文藝獎章在 1983 年後的持續頒獎，確實彌補了時報報導文學獎的空缺，給予報導文學工作者持續創作的動力。如果說在失去時報報導文學獎的加冕後，《人間》適時提供了報導文學新的發表場域，則文藝獎章則是給予報導文學另一頂皇冠，藉由文藝獎章在象徵資本與經濟上的加持，令報導文學得以持續茁壯。

四、文學獎對報導文學的衝擊與建制

在上述所論及的文學獎外，較為重要的報導文學獎尚有吳三連文藝獎報導文學類，在 1980 年代共有 3 次的頒發，分別是 1983 年（第 6 屆）馬以工、1985 年（第 8 屆）楊憲宏、1987 年（第 10 屆）古蒙仁。在時報報導文學獎停辦的 1983 年，馬以工獲得第 6 屆的吳三連文藝獎報導文學類獎項，以自然保育為宗旨的《大自然》雜誌亦在此年創刊，由馬以工擔任總編輯，吳三連文藝獎該年的頒獎不啻給予自然環境議題的報導文學高度的鼓勵。1985 年《人間》創刊，同年的吳三連文藝獎報導文學類得主為楊憲宏，楊憲宏在《人間》雜誌的發行後期擔任該刊物的主編，在以報導文學為標榜的《人間》雜誌做出議題上轉型的嘗試。由上述二例可知吳三連文藝獎的重要性，該獎項的得獎者在報導文學界的不同領域肩負重要的角色，並持續耕耘此文類。然而從時報報導文學獎與文藝獎章之得獎者，和吳三連文藝獎得獎者相互對照，可以發現在得獎名單上的頗多重疊，馬以工、心岱、古蒙仁皆是榜上常客，筆者以為似乎透露出這些報導文學獎的同質性，無論在得獎作品的主題傾向上、或是得獎作家的名單上，都出現隱約的「流行」現象，這不免有錦上添花之嫌。筆者推測，這些以作家為主要頒獎對象的文藝獎章與文藝獎，或許企圖藉由頒發獎項予知名作家以提高其獎項的正當性與公正性，然而對於報導文學而言，將資源與資本過度集中某些作家手中，不免加速推動報導文學後繼者在寫作上的模仿傾向與盲目跟隨的風潮。在這個層面來說，本意應是鼓勵報導文學創作的文藝獎，卻在有意無意之間，先後導致報導文學的窄化與侷限。

此時的報導文學作品曾被黃春明深刻批評，認為多數作品淪為「獵奇」多於「思想」，缺乏批判性，²⁶意指作品內容的新奇和陌生之感，多於深入且同等的理解與研究。誠然作為新興的文類，報導文學在題材的選擇多樣性上有令人驚喜的成果，但從審查委員的心態、評選得獎的理由觀之，或許黃春明的說法與其說是批評作者，不如說是批評掌握文學獎權力的評審委員，畢竟最終是評審的口味決定了作品的風向。與黃春明的批評相同，吳薇儀也認為：

固然藉由作者的努力，讓許多原本處於社會底層，鮮為人知的議題因報導而揭開原本神秘的面紗，試圖喚起人們的注意或重視，但是報導文學理論的斷層以及沒有思想深刻、藝術傑出的典範性報導文學作品做為創作的借鑒，使得這一時期作品嘗試性的意味大於批判性的反思。²⁷

事實上這也是民間報導文學崛起初期不得不遇到的瓶頸，從《人間副刊》較為輕薄的專欄份量之作，轉為單篇、完整的報導文學作品，在議題的導向與文類本身的界定都尚未明朗化的徵獎初期，有心創作者僅能依照已經得獎作品的模式來摸索嘗試的方向，這是其「嘗試性」之所在。因此在眾多文學獎不斷為特定報導文學作家黃袍加身之下，加以一屆屆的參賽作品在得獎風向下持續「傳承」，議題的固定與寫作手法僵化似乎便成為必然的結果，。

關於《中國時報》在連續 5 年的徵獎後，突然停辦報導文學獎的原因，當時的主編金恆煒表示：「報導文學在文類上很難定義，因此有的作品寫得很像學術論文，有的則像報導，而主辦者也很難提出一個可以做為範式的標準，因此才作了停辦的決定。」²⁸但事實上「有的像學術論文，有的則像報導」的情形也可以解釋為台灣報導文學的多樣化與寫作的可能性，正如須文蔚所談及的，受限於首屆報導文學獎得主的作品模式，後繼投稿者自然朝向類似的方向寫作，然而評審此時卻又責怪這類寫作模式過度「學術論文」，反而使後繼者摸不著頭緒。而「報導」形式的報導文學，不能說是偏離報導文學的軌道，畢竟「報導」仍是報導文學當初誕生時的任務之一，以此認為該作品不夠「文學」、不是「報導文學」是否失之嚴苛？筆者認為，從金恆煒此語一出，「報導文學的範式」便開始成為報

²⁶ 陳映真，〈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聯合報》，第 37 版，2001 年 1 月 18 日。

²⁷ 吳薇儀，〈兩岸當代報導文學比較研究（1976-2994）〉，頁 26。

²⁸ 徐淑卿，〈報導文學死了嗎？〉，《中國時報》第 43 版，1995 年 10 月 8 日。

導文學的緊箍咒，論者與創作者紛紛急於為報導文學建立一種「標準範式」、一套「創作理論」，以為報導文學的存在貼上正當性的標籤，這種急切反而在報導文學作品的質與量尚且不足的當時，只落得治絲益棼、各說各話的結果。筆者想反問的是，當小說與散文在各種文藝理論以前，便擁有嘗試任何書寫形式的可能與空間之同時，為何報導文學不能？當《人間》出刊之後，又從原本時報報導文學獎的形式之外，誕生出另一種富有更多主觀情感、更強批判力道的報導文學，以此回頭驗證「報導文學需要範式」之說，豈不顯得矛盾。

第二節 高舉報導文學旗幟的《人間》雜誌

當論及 1980 年代的報導文學，便無法略過《人間》。儘管本論文的重點在於報導文學獎，然而《人間》發行的時間正處於兩大報報導文學獎停辦與開辦間落差的 8 年，因之它不只是報導文學發展歷程中不得不論及的重點，在本論文的論述脈絡中，《人間》做為報導文學獎發展過程中一個關鍵過渡性意義的橋樑，更象徵著此前與此後的報導文學獎發展轉折的重要關鍵，因此在 1980 年代的報導文學獎發展中，筆者仍將《人間》一併納入討論，如此才能看出 1980 年代報導文學的全貌。

陳映真繼承著其原先在《夏潮》的編輯理念，創辦以報導文學為號召的《人間》雜誌²⁹，藉此實現個人的理想與關懷。《人間》的創刊在當時文化界蔚為大事，在發行期間推動著報導文學介入社會運動，實踐了報導文學內在的社會性。然而當《人間》完成了報導文學這項進程，同時也導致報導文學從過去的客觀性轉向重視社會性與主觀性，對於被戴上「社會良知」桂冠的報導文學而言，限制與偏好隨之產生。在 1980 年代末期，當台灣走向大眾消費社會的同時，無法迎合市場消費口味的文化雜誌處境日益艱難，《人間》面對現實環境的考驗轉型以政治議題為主要訴求，卻反與原本的讀者期待越離越遠，報導文學的使命感使得《人間》的憂鬱色彩、曲高和寡更加與消費社會格格不入，曾經帶領報導文學走向巔峰、象徵著台灣人文雜誌精神的《人間》最終在 1989 年黯然熄燈。

1982 年時報報導文學獎停止徵獎，3 年後《人間》雜誌創刊；刊行 4 年、發行了 47 期的《人間》在 1989 年正式停刊，正在聯合報文學獎開始徵選報導

²⁹ 以下皆稱為《人間》。

文學類的 1990 年前 1 年，這種時間點上的補位以及所輻射出來的影響力值得深思。因此在本節筆者意欲聚焦在《人間》4 年間對報導文學造成的多重影響，而這些影響的來源又是從何而生？這種影響對報導文學而言又究竟是利是弊、或是具有雙面的意義？《人間》的結束對報導文學而言又象徵了什麼？

一、《人間》的創刊與緣起

論及《人間》的創刊與緣起勢必要從陳映真個人說起，陳映真的左翼思想在極大程度上是催生出《人間》的關鍵，而在這個脈絡下筆者想自《夏潮》開始追溯《人間》的緣起。在《夏潮》與《人間》的關聯性上，許振福於其碩士論文《人間報導·文學人間：〈人間〉雜誌報導文學研究》中分析到：「檢視雜誌之成員，《人間》創辦人曾擔任過《夏潮》編輯委員、《人間》主編鍾喬也是《夏潮》執行編輯、王墨林也在《夏潮》發表一系列〈中國電影意識發展史〉的作品，《夏潮》與《人間》的從事者相關性不言而喻。」³⁰由此可見《人間》與《夏潮》在人事關係上的密切，陳映真與鍾喬在兩份刊物各自曾擔任的角色更凸顯出兩份刊物在創刊精神與編輯宗旨上的接近。對於《夏潮》與《人間》的關係，陳映真亦曾經直接表示：「國民黨當時是兩手打，一手是打所謂『共產黨份子』，指我們這批《夏潮》的人；另一手就是打台獨。在挨打上，我們跟『黨外』是同一的，可是我又不能站在『黨外』的方針路線上，……這個時候，我就想，不如另開戰場吧，就想到了另辦一本雜誌，就是《人間》。」³¹陳映真在此直言《人間》的誕生實際上是從《夏潮》「另開戰場」而來，因此可以理解為：陳映真原本是強調左派立場的《夏潮》核心編輯委員，然而在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打壓之下，《夏潮》卻被理解為等同共產黨或其他黨外活動的產物，陳映真因此創辦另一較無政治色彩、但維持左翼精神的雜誌——《人間》。

實際上，《夏潮》雖不如《人間》高舉報導文學為雜誌宗旨，但基於「夏潮聯合會」的左翼精神，《夏潮》一直積極提倡報導文學，在第 5 期〈我們的話〉寫到：「報導文學將是本刊今後努力開拓的一個新園地，我們盼望讀者諸君踴躍嘗試勾畫鄉土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將它寄給夏潮，讓我們能從其中更真實深入

³⁰ 許振福，《人間報導·文學人間——〈人間〉雜誌及其影響研究》，頁 63。

³¹ 張文中，〈人間雜誌：臺灣左翼知識份子的追求和理想——陳映真訪談〉，本文網址：<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9013325/>

地瞭解我們土生土長的鄉土社會。」³²《夏潮》的確進而在第 2 卷第 1 期公開徵求以「我一天的工作」為題之報導文學作品，且在第 2 卷第 2 期至第 3 卷第 4 期中陸續刊載來稿，³³顯示《夏潮》支持報導文學的寫作並非空泛之言。因此當我們討論《夏潮》與《人間》的時候，不得不牽涉兩份刊物中關鍵人物陳映真的意識形態傾向，對於陳映真來說，《人間》「這份刊物不僅是我理念、信念的展現，更可說是人格的延伸。」³⁴由上述可知，《人間》做為《夏潮》另闢戰場下的產物，可以說是《夏潮》路線的另一條支流，因此其創刊目的與宗旨在一定程度上也繼承了《夏潮》的左翼精神，但在編輯的方法上採取較溫和的報導文學形式，以低調委婉的方式繼續針砭當時台灣社會的資本主義亂象。

在論及《人間》雜誌創刊的同時，也必須提及 1982 年由中華民國生態保育協會創辦的《大自然》季刊。《大自然》的創刊較《人間》的創刊早三年，然而《大自然》雖未以「報導文學」為號召，但在刊物的主題上卻是報導文學中生態議題的高度開展與專業化，因此可以說比《人間》更早一步的開拓出報導文學的新可能。《大自然》的創刊宗旨為：「為了推廣、普及保育觀念，一方面結合學術界做資源考察、復育繁殖及科學研究等報導；一方面則蒐羅廣大的資料、精美的圖片，配以優雅的版面設計，希望這些科學家終年的心血、攝影家冒生命危險拍攝的珍貴紀錄，可以和讀者共享。」³⁵從上文中以報導文章佐以資料圖片、注重版面設計等發言，便可以看出《大自然》承襲 1970 年代副刊轉型的模式，在自然保育議題成為熱點後嘗試專業化的報導模式，但也因為這種特定主題的目的性，《大自然》顯然比起「報導文學刊物」更多的被認為是「深度報導刊物」。與《人間》相較，《大自然》關心的重心在於保育自然，與《人間》以社會關懷為主有側重點上的差異：例如「離島報導」，《人間》採取的報導角度是離島上的原住民生活哀歌，而《大自然》則是島上的自然生態保育問題。根據許振福的分析，《大自然》與《人間》在文字敘述與篇幅上亦有差異：《大自然》多為短篇，內容上以呼籲大眾保護自然為主；《人間》篇幅較長，以批評、揭露社會現象為主。然而兩本雜誌雖在風格、議題上有所差異，卻是相互合作的關係，同樣的文章有

³² 〈我們的話〉，《夏潮》第 5 期，1976 年 8 月，無頁碼。

³³ 包括謝男〈清道夫的一天〉、劉不揚〈一個苦力的自述〉、李蘭〈一個化妝小姐的自述〉、黃淑鈞〈暑期工讀雜感〉等。

³⁴ 彭海瑩採訪，〈心心念念在「人間」的陳映真〉，收錄於陳映真，《曲扭的鏡子》，台北：雅歌，1987 年，頁 34。

³⁵ 見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網站：www.swan.org.tw/intro.htm，970914

時會在《人間》、《大自然》同時刊載，攝影圖片亦時常互通有無，³⁶這兩份雜誌間的合作關係，似乎也顯示出「深度報導」與「報導文學」之間的曖昧性。

鍾喬曾說道：「《人間》在一定的程度上，接續了一度截斷的報導文學血脈。從少數民族、環保、社會運動的現地報告到社會中默默勤勉工作個人的側寫、紀錄成為「解放」消費化、商品化生活，最有力且直接的一種藝術。」³⁷這段話很精確地指出了《人間》的核心精神與關鍵性。處於時報報導文學獎停辦、副刊對報導文學的厚愛也隨著高信疆離開《人間副刊》陷入青黃不接，在報導文學逐漸缺乏發表場域的 1980 年代中期，《人間》的出現無疑讓報導文學的寫作者又獲得另一片天地，報導文學亦因之有接續的可能。在延續報導文學的生命之外，《人間》的刊物形式與「弱勢代言人」立場同時也推動了報導文學轉向新的寫作風格，從過去副刊中較短小的形式，到文學獎的多樣主題性模式，《人間》則是採取強烈的批判與主觀立場，並在文字之外佐以具有渲染力的攝影作品，圖文配置的模式以及不畏懼客觀報導性的減少，是《人間》對報導文學寫作的開創與重要影響。

二、《人間》的社會運動與報導文學雙重實踐

《人間》的刊行歷時 4 年、共 47 期間，擔任過總編輯者為潘庭松（1-4 期）、高信疆（5-12 期）、陳映真（24-39 期）、楊憲宏（40-47 期），³⁸許振福在其研究中依照「雜誌總編輯」和「議題風格」將《人間》區分為前期（1-23 期）、中期（24-39 期）、後期（40-47 期）；並指出前期偏重弱勢者、被壓迫者的關懷與揭露，中期則以傾向聚焦兩岸間社會與人民的報導、台灣的環境公害為主，後期則是朝向台灣內部政治議題、政治歷史做批判與挖掘。³⁹陳映真選擇以報導文學來

³⁶ 許振福舉例《大自然》總編輯韓韓的〈總要做一點教人瞧得起的事〉一文，除刊載於《大自然》外，於《人間》第 14 期（1986 年 12 月）亦見刊載。圖片部份，馬以工於《大自然》第 21 期發表〈十年了還沒真的懂〉一文，文中圖片乃《人間》所提供，可見《人間》第 21 期，1988 年 10 月。

³⁷ 鍾喬，《回到人間的現場》（台北：時報文化，1990 年），頁 312-313。

³⁸ 許振福指出：「雖然在 13-23 期並無總編輯的名稱，但陳映真在接受訪問時提到『為了使雜誌更開闊，他請一個新的主編，其中一個就是高信疆先生，且不辭勞苦的幫他編了兩年。』因此，13-23 期雖無總編輯的稱謂，但高信疆與陳映真兩人相信是擔任絕大多數總編輯的工作。」見許振福，《人間報導·文學人間——《人間》雜誌及其影響研究》，頁 139。

³⁹ 同上註，頁 150。但筆者想特別強調的是，在上述討論的分期特色中，並不代表該時期的《人間》僅有該時期特色的文章，實際上《人間》在各時期對於社會議題的涉獵還是極為廣泛的，只是在不同的時代、總編輯以及考量之下，部份議題會有集中的傾向，例如後期《人間》雖然強化政治議題，但在生態保育問題上仍有頻繁的發揮，由政治延伸的反公害與污染問題亦

為弱勢者發聲，藉此對抗日漸商業化、物質化的社會；另外為強化文字的力量，遂有結合報導文學與報導攝影做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規劃，藉由《人間》培育台灣的報導文學與報導攝影，透過這兩種藝術形式的社會性達到以左翼立場介入現實的目標。⁴⁰

在《人間》的前期（第 1-23 期），從原住民的處境、弱勢兒童的遭遇到社會邊緣人的議題都有所涉及，「弱勢代言人」無疑是前期《人間》最鮮明的旗幟，確實地實踐著陳映真創刊的期待與信念。⁴¹前期雖歷任三位總編輯，但潘庭松與高信疆先後進入《人間》擔任總編輯並非偶然，而是出於陳映真本身對此二人能力的信賴，藉由總編輯的人選也透露出陳映真對《人間》走向的指引。由於雜誌初期往往對創辦的宗旨較能堅持、把握，因此前期的《人間》在弱勢關懷、在「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⁴²的精神上實踐得格外明確，如迴響極大的〈不孝兒英伸〉⁴³便是前期之作。由此可謂，《人間》的歷史意義乃是陳映真、潘庭松、高信疆三人聯手打造，由三者共同為《人間》在前期確立下風格與定調，其所奠定的「弱勢代言人」形象亦在此後成為《人間》留給大眾的經典。在這段時期的《人間》內容上，相較於《人間副刊》與時報報導文學獎的作品，《人間》在台灣風俗民情中「獵奇」、尋找「異國情調」的程度大為降低，增加更多批判的力道，積極為現實發言，但也顯示「純粹報導」的介紹性、客觀性文章並非《人間》的訴求，藉由「特殊事件」表達「主觀的批判」才是《人間》的目標。影響所及，過去對於客觀性報導尚有一定堅持的報導文學工作者與評論者，逐漸傾向「報導文學必須發揮社會良知」的論點，對時報報導文學獎影響下過度學術化的

時見暴露。固然議題的多寡與不同時期的編輯群、作家群也有關聯性，但整體而言《人間》在刊行的 47 期中所觸及的層面仍是極為多元的。

⁴⁰ 陳映真曾直言：「《人間》，是結合了兩種台灣當時條件已經成熟，可是還沒有發展的文藝形式，一種是報導攝影，又稱紀錄攝影，另一種是報導文學。因為台灣過去的高壓，報導文學很難發展，它有很鮮明的左翼傾向性，干預現實，在台灣很難發展。」張文中，〈人間雜誌：臺灣左翼知識份子的追求和理想——陳映真訪談〉，本文網址：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9013325/>。但筆者想提出一個疑問，在這段敘述之中很曖昧不明的是，「當時條件已經成熟」究竟意指為何？所指的是社會、政治或是文學的「條件」不得而知，在這種模糊的情形下，對於陳映真為何如此執著的選定報導文學與新聞攝影為《人間》兩大主要形式，事實上可能還缺乏完整的釐清。

⁴¹ 許振福分析道：「雜誌 1-23 期潘庭松、高信疆與陳映真先後擔任總編輯為前期，此時期常見以原住民生存、弱勢兒童與社會底層的民眾議題為主，報導的主題以弱勢族群議題佔了多數，因此「弱勢代言人」也似乎成了此時期《人間》最鮮明的標誌。這時期不乏兼具報導與文學的作品，……。」見許振福，〈人間報導·文學人間——《人間》雜誌及其影響研究〉，頁 139。

⁴² 《人間》第 1 期，「創刊的話」標題，1985 年 11 月，無頁碼。

⁴³ 1986 年，原文刊載《人間》第 9 期。

弊病做出一定的修正。另一方面，此時的《人間》藉由對社會事件的報導，多次成功引起社會大眾的集體重視，實現了報導文學對社會運動實踐的可能，使此前不過「紙上談兵」的報導文學達到所有報導文學寫作者的最終理想，報導文學的功能性不再僅是文字上的空談，而被賦予更高的期待，「報導文學＝社會良知」的論點亦因此有了立論的依據。

進入《人間》由陳映真親自擔任總編輯的中期（第 24-39 期），由於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的影響所及，兩岸甫通音訊的衝擊與交集同時產生，台灣內部的社會運動與黨外活動亦日漸活躍，此時的《人間》在議題上也擴大視野，走出台灣、放眼中國，加以陳映真個人鮮明的中國立場與左派意識，因此中國作家、作品的轉載與推介、⁴⁴中國社會與民情實況等皆是《人間》中期的主要趨勢，尤其引人矚目的是陳映真與中國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對談的「人間海峽兩岸對談系列」。⁴⁵可以想見，當陳映真順著解嚴的趨勢將目光轉向對岸，對台灣本土的關注不免相對減少，如前期那般集中報導台灣鮮為人知的黑暗角落與弱勢事件、展現關懷與博愛的作品篇幅降低，此時《人間》中的台灣相關專題則多在報導社會上的工人運動或農民運動，⁴⁶反映出陳映真在左翼社會運動上的積極與關心。另外，中期《人間》延續前期的社會實踐性，但以台灣的報導文學寫中國的議題，就精神層面來說不啻為一種收編。固然陳映真本身中國立場鮮明，並無以台灣涵納中國的意圖，但當時的台灣社會面對神秘的赤色中國，社會大眾在情感上積極塑造著台灣的中國文化正統性，《人間》一系列針對中國的報導，加強了台灣人民對文化中國的認識與認同，無形中促成報導文學內涵議題的擴大。

《人間》第 40 期後改由楊憲宏擔任總編輯，直到第 47 期停刊。在第 41 期以〈解放與尊嚴〉宣告風格的轉型、宣告與《人間》過去「反壓迫勇者」、「弱者代言人」路線訣別，此轉型宣言的措辭極為激烈，帶有更激進的左派色彩，如「戰後新的法西斯幽靈」、「壓迫者」、「要求文化、知性與思維的解放」、「重新建設新歷史時期的台灣、中國及亞洲的新文明」等。⁴⁷從這些情緒極為強烈的宣言可以

⁴⁴ 〈陳映真速寫大陸作家〉（吳祖光——「不適合在黨裡，就出來吧……」、張賢亮——「向生命的夢幻和曖昧開眼」、汪曾祺——「殘菊秋光」、古華——「寫自己認識到的民眾的中國」）載 1987 年 11 月 5 日《人間》第 25 期。

⁴⁵ 陳映真撰文、林瑞含攝影的〈人間海峽兩岸對談系列之二：親愛的劉賓雁同志〉，刊載於 1988 年 9 月 1 日《人間》第 35 期。

⁴⁶ 如〈工人飆上街頭〉（23 期）、〈台灣果農的怒吼〉（28 期）、〈中正機場大罷工〉（34 期）等。

⁴⁷ 《人間》第 40 期，〈解放與尊嚴〉：「《人間》不沉迷在『反壓迫勇者』、『弱者代言人』之類的社會造型中；也不該在不知不覺間與戰後新的法西斯幽靈遍身的壓迫者，形成『壓迫／反壓

發覺《人間》在政治概念上的強化，從原本關懷社會、擁抱弱勢的溫和人文訴求，轉為集中批判國民黨政權、聲援黨外運動的高分貝喊話，⁴⁸不僅對戒嚴時期的台灣歷史、官方觀點進行解構與抨擊，同時對於經濟起飛後的商業社會亂象與人心之貪婪也不乏強力的批判。此時《人間》過多的政治色彩以及黑暗負面的主觀情緒，已然引起讀者兩極化的反應，在讀者投書中反映著部份讀者對《人間》變調的失望與不滿，其中一篇投書便直言感受：「今日台灣碩果僅存的文化雜誌亦以政治為其首要探討，一來是否沾染「泛政治化」之習？二來是否察覺唯政治的革弊才得挽救台灣的頹敗？三來是否圖《人間》雜誌生存的應急之道？」⁴⁹這段話點明許多後期《人間》的盲點，並直指《人間》在財務面臨危機的強弩之末做出的掙扎。然而這時的後期《人間》卻相較中期《人間》的放眼大陸，改將焦點轉回台灣，由於台灣政治批判性的增強，在本土的生態保育與環境公害之關切上亦隨之提昇。⁵⁰但隨著針砭時事的力道加重，編輯者已然從「社會良心」的角度轉為「社會指導者」的立場，暴露過多的主觀性與作者的意識形態，強迫性的給予結論而幾乎不留給讀者思考的空間，不免造成讀者嚴重的負擔感。報導文學的社會實踐性成為一把雙面刃，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在《人間》的前期因高度的社會參與與影響力獲得巨大的掌聲，然而後期卻正是因為同樣原因，過多的社會道德感使《人間》的讀者、報導文學的讀者不堪負荷。

三、《人間》熄燈下的報導文學尾聲

1988年陳映真接受《中國時報》莫昭平訪問後，莫昭平以〈剛剛開店，就

迫』的制約依賴關係。」「更全面的要求文化、知性與思維的解放，更簡單的說，《人間》要解放的是40年來『戒嚴次文化中』一切被謊言和虛構所扭曲和窒息的歷史、知性與文化，以便重新塑造新時期的思維、創造和文化的人格。」1989年2月，無頁碼。

⁴⁸ 如第40期刊登的《黨外執政》系列報導、第43期則是專題批判國民黨推行的國語文運動、第44期則從天安門事件推而論及台灣的黨外運動。

⁴⁹ 呂丘堯，《人間》第41期，1989年5月，頁15。其他如張家棟的投書：「很失望這幾期的《人間》雜誌看不到一些感動的照片和感動的文章，似乎你們的人文精神和信、望、愛的宗旨已經追逐於歷史的舊帳翻尋和政策的批評攻訐。雖然那些是事實，可是坊間太多書講得比你們多，比你們深刻，為什麼不努力把手伸給雛妓、苦力……或者更多大家看見卻未必注意的公害與特權？本來我不想續訂了，但是我仍期盼你們的編輯群在換新人員後，別把信、望、愛也給換了。」《人間》第41期，1989年5月，頁15。

⁵⁰ 在生態保育專題上如〈福摩沙、福謀殺—野生動物專輯〉(44期)、〈海豚不回家〉(45期)、〈水鳥告別大肚溪〉(45期)、〈600萬買斷鳥世界〉(47期)等。在公害污染問題上有〈台電、西屋草菅人命〉(42期)、〈公害「猩紅字」再現？多氯聯苯十年血淚未乾〉(43期)等。

得準備關門？我們養不起文化雜誌嗎？）為題發表專文，文內提及：

《人間》在編輯上與經營上有兩大缺陷。編輯上《人間》傾向以灰暗、悲觀的角度與題材來引起注意，給人悲沉的感受，讀者訂閱了一年就受不了；經營上，《人間》製作成本高，人事支出也大，加上人事欠管理、無紀律，又兼忽略成本及效率觀念，在廣告相當多的情形下，每月仍累積數十萬的虧損。⁵¹

這段文字竟成為對《人間》的預言，《人間》此後僅支撐到 1989 年終於停刊，這種預言性更可能是 1988 年時陳映真便已在訪談中流露《人間》將難以支持的跡象。劉依潔曾指出，《人間》的困難在於，企圖統一雜誌消費市場的品味與編輯們在思想上的主體性，⁵²但現實的市場環境終究無法被編輯理念征服，這種矛盾與困頓很早便浮出檯面。《人間》風光創刊後，從第 4 期開始便不斷呼籲讀者訂閱或是推薦親友，足見經費上的捉襟見肘與維持的艱辛，財務的困難最終導致了《人間》的熄燈。

關於《人間》停刊的原因，莫昭平在其報導中認為，《人間》越來越狹隘的題材，以及陳映真個人意識型態介入或許是《人間》銷路日漸走下坡的主因。劉依潔則以為有內緣及外緣兩方面因素，內緣因素是楊憲宏任總編輯後過度涉入政治、文字亦改為較犀利、煽情，失去原本《人間》人文關懷的特色；外緣因素是 1980 年代大眾消費社會形成，對文學的要求也轉為休閒娛樂，因此嚴肅、認真的人文雜誌更加難以生存。⁵³但筆者以為，上述說法皆是在不同程度上將原因歸咎於陳映真本身或是末代總編輯楊憲宏，惟劉依潔能進一步提出外緣的社會環境之說，較為中允。但筆者以為在《人間》熄燈一事上，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人間》與報導文學實為命運共同體的關聯性，《人間》在編輯風格與消費社會遭受的困境實際上也是報導文學遭受的困境，《人間》的結束也同時宣告著 1980 年代報導文學風光歲月的結束，這當中的共性頗有值得論述之處。

從楊憲宏對《人間》的改版來說，楊憲宏的上任以及稿件基本上還是經過陳映真的審核，從〈解放與尊嚴〉可看出楊憲宏本身有心朝向更激烈的左派議題轉型，亟欲揭穿過去官方所塑造的假歷史，但當中也是受到陳映真的影響與允許，

⁵¹ 莫昭平〈剛剛開店，就得準備關門？〉，《中國時報》第 23 版，1988 年 10 月 17 日。

⁵² 劉依潔，《《人間》雜誌研究》，頁 27。

⁵³ 同上註，頁 95-97。

54因此單純歸咎楊憲宏對《人間》的傳統產生破壞、導致讀者流失則未免失之嚴苛。然而《人間》的停刊同樣不能完全認為是陳映真個人意識形態導致，陳映真的思想傾向與辦刊宗旨並沒有改變，但前期《人間》博得喝采、後期《人間》卻慘淡收尾，其中的差異顯然並不單在始終如一的陳映真身上，筆者以為這是報導文學的社會責任使命不再適切新時代的社會問題，然而後期的《人間》卻在企圖力挽狂瀾的同時對這種社會使命感越陷越深，最終招致停刊。

誠如此前所論述，報導文學在誕生伊始便帶有部份左翼色彩，推動者對報導文學在不同程度上都抱持著針砭社會、關懷弱勢、暴露黑暗的期待，這種期待隨著《人間》帶領報導文學一步步達到介入社會的目的得到了實現。這時的報導文學亦從客觀性更多的偏向主觀性，並背負以更多的社會使命感，在這兩個層面上可以說報導文學從中立而溫和的右派，逐步傾向主張鮮明而積極的左派，這整個過程是與《人間》休戚相關、共同建構的。而回到陳映真創刊《人間》的精神與其個人的意識形態色彩，陳映真的左派立場並未改變，只是透過《人間》帶領報導文學來實踐其思想，同時將報導文學屬於左翼的內涵更加發揚。從這一方面來說，《人間》熄燈的主因似乎也可以說是左翼傾向使然，但後期《人間》的轉型事實上並不是巨大的轉彎，依舊是秉持同樣的精神與立場，從關懷弱小者、為之喉舌的溫和，進一步激烈的抨擊虛偽、針砭社會，前後期在意識形態的左傾上是一致的。但這正是《人間》與陳映真的成功處、也是失敗處，擴大來說，是報導文學的成功處、也是失敗處，由此可論，濃厚的左派色彩與灰色憂鬱的筆調是《人間》、是報導文學成敗之一體兩面。

詹宏志在《天下》雜誌中曾以〈看見是關心的開始—人間雜誌的誕生〉⁵⁵為題對《人間》的命運始末做完整的介紹，在「帶著苦味的真實」一段，詹宏志寫道：

陳映真企圖創辦的雜誌，從市場的觀點來看，是一份高訴求的雜誌。「人間」在試刊樣品所顯示的社會關懷，儘管透過了極為動人的攝影與文字，仍然是帶了苦味的真實。勇於承擔社會

54 陳映真對此曾談到：「楊憲宏這個人比較年輕嘛，他總是要表現，新官上任嘛，我也覺得說好，就讓他表現，這是第一個。第二點，就如你所說，解嚴以後，一大堆那種東西爆發出來，像噴泉一樣的爆發出來，他比較沉不住氣，就要跟，當然，我是允許他這樣做的，我也想看看效果怎麼樣，……。」見劉依潔的陳映真訪問稿，《《人間》雜誌研究》，頁 114。

55 詹宏志，〈看見是關心的開始〉，《天下》雜誌，1985年11月，頁 146-147。

責任的知識份子，可能在閱讀中找到淚水和熱情；其他塵封冷淡的心，則可能覺得雜誌內容不易下嚥。……在這個意義下，「人間」雜誌的出版，倒像是對台灣知識份子的考驗了。

在這段敘述中，筆者注意到「知識份子」一詞的關鍵性，並且強調的是「勇於承擔社會責任的知識份子」，其他則被稱為「塵封冷淡的心」，顯示出無論《人間》內部或是文化／文學界對《人間》的期待與預設，《人間》的讀者群被預設為中產階級的「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是「對社會有責任感」的人，這種不免顯得分化的稱謂是否透露出孤傲寡和的形象、與大眾距離略顯遙遠？《人間》象徵著台灣報導文學界的一個高峰，標誌著報導文學的成熟與風光，但同樣也高度激化出報導文學閱讀群過度小眾的問題，當「大眾」的媒體如《聯合報》、《中國時報》承載著報導文學時，報導文學處在複合性的眾多版面之中，由於所佔份量不多，即使主題內容上憂鬱、寡和亦能被其他版面文章所沖淡，但一旦載體成為純粹的報導文學「刊物」，單憑「報導文學」而企圖成為賣點，這種帶著知識份子曲高和寡性質的小眾文學，不能迎合市場大眾口味的癥結便明顯放大。

《人間》銷售的最高峰之時，也大約不過兩萬，以台灣雜誌的發行人數來說實屬小眾，這也與《人間》對自身讀者定位有關，陳映真曾表示《人間》的採訪對象雖然是較低階層的弱勢族群，但定位上是給知識份子、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閱讀的刊物，陳映真期待透過《人間》能培養出一批「關懷弱勢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期待這群知識份子能夠「覺醒」、「對人民百姓張開眼睛」。⁵⁶陳映真上述訪談的用詞，正如詹宏志文中不斷強調「有良心的知識份子」，對報導文學來說是文學使命感不斷上升，與一般民眾的距離拉大；對《人間》的讀者來說，難以消化的情緒、強迫推銷的結論使人感到負擔，這兩個問題日益嚴重，在文學以「輕薄短小」為賣點的 1980 年代末期更顯突兀。報導文學在《人間》中成為「社會的良知」、成為「知識份子」的專屬，而評論者又不斷強化《人間》雜誌「聖潔的光環」，而使《人間》與所謂「社會大眾」距離越來越遠，結果是報導文學與《人間》如同所有有志難伸、抑鬱寡歡的愁苦中國士人一樣慘淡告終。

⁵⁶ 見劉依潔的陳映真訪問稿，《《人間》雜誌研究》，頁 115。

四、透過《人間》看報導文學的深化與轉型

報導文學自從副刊誕生之始本就帶有一定的左翼傾向，就這點而言，報導文學與陳映真在意識型態上保持著一定的一致性，加以陳映真帶領的《人間》在刊行的 4 年間實現、發揚了報導文學的社會參與性，強化其社會功能與意義，在這段時期將報導文學與《人間》劃上等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說在 1982 年時報報導文學獎停止徵獎之後，1980 年代的報導文學便聚焦到《人間》為主要活動場域，因此透過觀察《人間》便可以觀察到 1980 年代報導文學站在文學頂峰時的特色與核心表現。

總體而言，《人間》一方面強化了報導文學的左翼內涵，以報導文學的筆為武器，積極暴露社會上的黑暗事件與不公義，對上一個時期報導文學缺乏思想性的流弊產生修正的作用，在這個層面上積極的深化了報導文學的文學意義；另一方面，《人間》標榜「具有事實的主觀性」⁵⁷、並不避諱主觀成份的加入，與此前報導文學論者強調一定程度的「客觀性」、與被報導人事物保持一定「距離」的說法產生出入，然而《人間》獲得的迴響也導致作家們逐漸偏好這種透過報導文學表達個人概念、立場的寫作模式，晚期的《人間》在這方面的實踐更為強烈，然而過多的預設立場終究招致部份讀者的反感。在上述二者之外，《人間》對報導文學最為重大的影響，在於實現了報導文學的社會性，完成報導文學介入社會、影響社會的目標精神，須文蔚便曾言及：「報導文學其實在 80 年代才開始真正與社會運動結盟，利用報紙與雜誌繼續實現寫實主義文學的理想，產生豐富的報導成果。」⁵⁸須文蔚進一步認為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的原動力便是這種社會運動的精神內涵，而並非大眾媒體的提倡，⁵⁹這番論述回頭對照《人間》對報導文學的經營，足以為印證。然而這種社會性卻成為報導文學與《人間》共同的雙面刃，沉重的「社會良心」金冠令報導文學與《人間》不堪負荷，憂鬱而灰色的內容讓大眾消費者倍感壓力與負擔，失去市場的支持，《人間》與報導文學終究難以延續。

誠如筆者前述所論，《人間》以藉由「特殊事件」表達「主觀的批判」為刊物目標，固然在修正報導文學「搜奇獵異」的缺失上有所貢獻，但相對的也促使

⁵⁷ 許振福，〈人間報導·文學人間——《人間》雜誌及其影響研究〉，頁 144。

⁵⁸ 須文蔚，〈再現台灣田野的共同記憶〉，《報導文學讀本》，頁 21。

⁵⁹ 同上註，頁 7。

報導文學朝向「社會良心」的自我定位靠攏，這與 1970 年代乃至 1980 年代前期的部份時報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有關鍵性的差異。1970 年代大部分的報導文學作品偏向不具備「針砭時事」的色彩，軍中報導文學受限題材的侷限自然與社會較為遠離，副刊的報導文學專欄亦受限於篇幅以及大眾娛樂性，因此偏向以紀遊、紀事、紀人之文藝報導性作品為主，雖也有些文章涉及社會現象，但終究因副刊的性質而無法擴大內容，無法以新聞報導的方式對社會事件或現象進行更大幅度的深度討論。到 1980 年代，在時報報導文學獎的得獎作品中，例如邱坤良〈西皮福路的故事〉、王鎮華〈台灣現存的書院建築〉、馬以工〈幾番踏出阡陌路〉等，作者的主觀批判成份都是較低的，更多的是客觀性的深度報導介紹，固然在時報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中亦不乏具有高度批判性、社會關懷性的作品如楊定燮〈病兒求醫記〉、李昂〈別可憐我，請教育我〉、葉菲〈被遺忘的一群〉等，然而此兩種類型的報導文學作品交錯得獎，尚未出現偏好上的傾向。但在《人間》之後，「報導文學必須具備對社會的關懷」成爲顯然的要素，隨著報導文學理論的逐漸深化、形成討論熱潮，報導文學忽然必須肩負起「社會良知」、「暴露弱勢的遭遇」的「重責大任」，然而這種嚴肅的定位對報導文學究竟是種具有負擔的束縛或是具有價值的內涵深化，至今或許仍難以定論。

另外，在《人間》發表、做專題採訪報導的寫手中，除了先前已經在時報報導文學獎中嶄露頭角的作家外，還有一大批由《人間》所養成的編輯群，而這些編輯群藉由《人間》的訓練，在此後台灣的報導文學界成爲重要的中堅份子，與得獎作家們經營出 1980 年代報導文學的燦爛與多樣性，在下一個十年則多數成爲專職作家並兼任報導文學獎項的評審。這些由《人間》所培育的報導文學寫手，據許振福的分析包含下列：官鴻志、藍博洲、廖嘉展、鍾喬、楊憲宏、關曉榮、賴春標、潘庭松、李文吉、郭力昕、王墨林、蔡明德、鍾俊陞。此外，不屬於《人間》的編輯群，身爲專業作家、報導文學家但與《人間》有合作關係，曾經爲《人間》撰寫文章者則有：心岱、林清玄、邱坤良、季季、朱天文等。⁶⁰這樣洋洋灑灑的名單，其中半數以上皆爲今日知名的報導文學作家，顯示《人間》的生命力並非在停刊的同時便完全消逝，而是將生命化爲報導文學的種子散佈到台灣文壇之中。就台灣報導文學爲一個整體而言，《人間》的確在兩大報的報導文學獎落差的 8 年間做爲一個過渡的關鍵性橋樑，延續了報導文學的文學活動場域，也讓

⁶⁰ 許振福，《人間報導·文學人間——《人間》雜誌及其影響研究》，頁 135-137。

第一批時報報導文學獎作家在字數有限的徵獎之外有了更廣大的表現舞台，且能夠持續深化自己的寫作議題進而在寫作風格中做新的嘗試或更多的耕耘，《人間》也同時培養出下一批新世代的報導文學寫手，從而讓報導文學在下一個時代的報導文學獎徵獎中出現更多樣的風貌。

第三節 大眾媒體對報導文學的介入與重構

1980 年代突出的社會現象之一，便是大眾媒體的蓬勃發展，連帶文學媒體也急速成長，無論是民間的出版社或是發行的書籍量、新成立的刊物等，與 1970 年代相比都出現急速的成長。文學媒體的興盛更強化了其本身介於作品、作家與讀者之間那道橋樑的關鍵性，文學作品不再被侷限於小範圍的文友、文壇人士之間，轉而被看待為可以被定價、被販賣、可以金錢衡量的「消費產物」，消費傾向使文學與社會大眾／消費者的需求、喜好直接面對面，文學無法繼續過去那樣孤芳自賞的自立於市場之外，被迫更多的與市場妥協。在與消費市場的妥協中，文學陸續失去過去做為單一自足的場域所具有的獨立性，聲稱代表著社會大眾的「媒體」開始積極介入文學生產的過程，對此陳映真便直指：「文化、文學和知識有要求有效的傳播、流傳的內面需要。但是在大眾消費社會時代空前有效的大眾傳播，卻反過來主宰著文化、文學和知識。……用什麼動機和形式去傳播，什麼樣的文化的、知識的和文學的內容，已經遠遠不是作家、學者、藝術家可以自由選擇和規定的。」⁶¹亦即經過大眾媒體的介入，文學、文化和知識都陷入被宰制的局面，本欲藉著大眾傳播之力進行更有活力的散播與傳達，卻反過來被此一工具所控制。因此筆者在本節試圖透過報導文學從副刊到文學獎，乃至專業性刊物的活動場域轉移，從中梳理出媒體從外而對於報導文學內涵的轉化與重構。

一、報導文學在媒體推動下的精英化與專業化傾向

從本章上述所論之報導文學在 1980 年代的轉型，可以看出兩個報導文學發展活動上的趨勢，便是報導文學所活動的媒體朝向精英化、專業化兩個方向前進。報導文學從報紙副刊起家，從小小的專欄逐步經營，在 1980 年代進一步踏

⁶¹ 陳映真，〈大眾消費時代的文學家和文學〉，《中國論壇》雜誌，1984 年 5 月 10 日，頁 23-24。

上文學獎的舞台，此後又成爲專業刊物的號召，整個過程顯示報導文學與媒體間千絲萬縷的關係越來越深，然而精英化的傾向對於報導文學成爲成熟、獨立的文類之訴求，起著何種效用？走向專業化發展的傾向，究竟是與大眾越來越近、抑或越來越遠？報導文學的發表空間究竟是越走越寬廣、抑或越來越狹小？1989年發行47期的《人間》停刊，同年中央日報文學獎在兩大報該年文學獎均未設立報導文學獎的情形下徵選報導文學獎類，劉還月該年以〈平埔何處尋舊社〉獲得第三名。對於這個現象，楊素芬以爲是「顯示報導文學的寫作發表在傳播媒體邊緣徘徊時，副刊的力量再度將它推向文學獎的舞台，在報導文學的火種尚未熄滅之前再度點燃。」⁶²可以說在1980年代，報導文學的主要活動便是以文學獎與《人間》兩個文學場域爲主，報導文學在此十年間的轉型、傾向與深化，也是隨著這兩個活動場域的標準而移動，但這兩個文學場域又各自具有何種特質與傾向，此二者特殊的媒體性質又對報導文學進行了何種重構？

1970年代報導文學自複合性的報紙副刊出發，在整份報紙扣除廣告頁後佔八分之一的副刊中，報導文學擁有的大多僅是方寸之間的專欄，偶有較大篇幅的專題，但從字數到寫作形式、甚至到主題內容，在在受到報紙本身的牽制。在報紙的銷售量競爭中，副刊做爲當時吸引、區別讀者的競爭關鍵，不免承載更多的責任與義務，在這種情形下，報導文學在副刊的發展實際上相當有限，一則在主題內容上不能太過灰暗、艱澀，以免與副刊的調性產生落差；二則在欄位篇幅有限的情形下，沒有太多寫作技巧可以變化，僅能以報導手法的文章爲主。因此當報導文學從副刊出發，逐漸爲社會大眾所認識的同時，報導文學若想繼續茁壯，勢必得走出副刊，尋找足以提供更多空間發揮之處。1978年時報報導文學獎開始徵獎，高信疆的此一決定或許也是看出報導文學在副刊中的龍游淺灘之掙扎，在報導文學於副刊孵育成熟的同時，給予報導文學一個更大的天地，並透過文學獎與文藝獎章的桂冠，報導文學一時與小說、散文、詩這三大文類平起平坐。然而文學獎在文學中製造的典律化與精英崇拜，似乎與報導文學的本質有所衝突，脫離「大眾」的副刊場域，報導文學進入「精英」的文學獎場域，無法脫離社會功能性而存在的報導文學，在訴求純粹文藝美學的文學獎中多少顯得尷尬。

報導文學進入文學獎競爭激烈的場域，其文學性的部份被加倍的放大檢視，過去報導文學的訴求是將客觀的現實以文學的筆調做動人的敘述，達到發揚人道

⁶² 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頁201。

精神與關懷社會的目的，但在文學獎的場域之中，這些非文學性的特質成爲枝微末節，文學獎的評審們更關心的是文類本質的區分問題，因此報導文學中新的審美標準（文類形式與本質）取代了過去的價值標準（社會性、人道精神），在文學獎機制運作的這種代換之中，報導文學原先的特質被消音、被邊緣化，因此才導致上述所論及的，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趨向於學術化、論文化，也正如前言所說，黃春明以爲這時的作品缺乏思想與批判，實際上與文學獎的機制、評審過程的運作有關。因爲報導文學做爲新興而邊緣的文類，貿然的進入文學獎的場域，被迫接受文學獎的遊戲規則，稚嫩且尙未建構出體系的報導文學無法對抗文學獎的遊戲規則，結果反被文學獎重新建構。結果是，報導文學被過多的要求所侷限，既要表現社會關懷，也要保持寫實客觀，作者必須真誠，題材還要有被紀錄的價值，在這整個複雜的規約中，報導文學的發展道路似乎有越走越窄的危機。

此外，在文學獎的運作機制下，唯有通過評審最終認定的作品能獲得「認證」，進而得到爲讀者所閱讀的可能，文學獎的霸權性質使沒有得獎的「遺珠」被排除在所有文類之外，沒有機制可支撐其文類與意義，也沒有讀者可以與之接觸，只有得獎的「精英」才有資格獲得發表的空間、獲得讀者的閱讀，⁶³可見文學獎操作著文學作品的汰選，比起文學守門人的副刊編輯更爲殘酷。因此即使參賽作品爲數不少，但實際上能被定義爲「報導文學」、真正獲得讀者閱讀的作品卻屬於極少數，從報導文學原本的社會性來看，進入文學獎的場域反而大幅降低了報導文學與大眾接觸、與社會接近的特質。失去報紙副刊每天曝光的舞台，報導文學本來期待迎來從次文類、邊緣位置進入中心的可能，這種犧牲似乎成爲報導文學進入純文學殿堂的代價，但結果報導文學卻卡在文學獎的制約之下動彈不得。媒體首先將報導文學塑造爲一種「屬於知識份子」的文學，進而企圖將報導文學提煉爲「純文學」，卻沒有察覺這兩者間存在相悖的訴求，顯示出報導文學依附於媒體下不得不爲之的無奈。

在時報報導文學獎嘎然而止的同時，文藝獎章肩負起鼓勵報導文學創作的任務，然而文藝獎章畢竟缺乏大眾媒體的傳播性，獎章的桂冠無法提供報導文學作家更多發表的場域，一時之間報導文學作家竟有不知何去何從的危機。此時陳映真創辦以報導文學爲宗旨的《人間》，專業化的媒體刊物，比起副刊的有限欄位、文學獎激烈的淘汰與競爭，《人間》儼然提供一個更廣闊且自由的天地給報導文

⁶³ 林民昌，《當代台灣小說文本的知識及其操作》，頁 127。

學作家一展身手。在 1980 年代報導文學位移的過程中，到了如《人間》、《大自然》這種具有明確訴求的專業刊物誕生，報導文學忽然從文學獎的束縛中掙脫，從「純文學」再次回到「報導」的行列，並開始朝向深度報導、議題專業化的方向發展。林民昌對於這種報導文學大幅進軍專業雜誌、導致讀者群發生流動的現象評論道：

各種可以承載更完整之報導文學面目的專門性雜誌，大量吸收掉副刊讀者對刊載於副刊上的報導文學之專注力。對於這種讀者群的流動，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因為雜誌能夠負荷較多的報導攝影，大大地增加了報導文學的本體優勢。換言之，雜誌上的報導文學的文類機制，與副刊上形成的文類機制，由於構成其文類的本質不同，而在機能運作上有所出入，進而導致讀者群的流動，並在最終我們僅記得《人間》雜誌，而幾乎忘了報紙副刊當年曾經扮演的推手的角色。⁶⁴

林民昌這段評論有幾個值得注意之處，首先是專門雜誌對報導文學「承載的完整度」，以及專門雜誌在能夠佐以報導攝影的情形下，增加了「報導文學的優勢」，進而形成一種與副刊中的報導文學「不同的文類機制」。相對於副刊與文學獎，專業雜誌提供的報導文學篇幅更為龐大，加以編輯群有穩定職業供養，能夠長時間在報導對象、事件或地點進行觀察、紀錄，身份上的便利也讓這群新聞或媒體工作者能夠迅速進入現場，對於報導文學的深化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也正因編輯受到媒體本身意識形態的影響，往往也難免導致創作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此，從報導文學內部發展的深化與精緻化而言，專業性刊物的出現顯然提供報導文學絕佳的生長環境，同時透過刊物本身的專業分工，也對報導文學的寫作類型進行了初步的區隔，從而使報導文學在不同的專業議題下得到長期培養的機會。但回到刊物本身的發行情況來看，誠如第二節所論，盛極一時的《人間》在最高峰時期的銷量亦不過一期二萬冊，這些在《人間》之前、之後的刊物實際能達到的最高發行人數應當不會超過這個數字，在發行人數背後的意義是，在專業性刊物上刊登的報導文學已經成為專供特定領域讀者，提供給「少數內行人」閱讀的作品。報導文學在專業刊物的集中、聚攏之傾向，使報導文學與整體社會的距離逐漸拉遠，在專業化與大眾化之間落入難以兩全的困擾，但報導文學在離開「社

⁶⁴ 同上註，頁 85-86。

會良心」這樣的社會大眾功能性之後，又確實在各個專業的議題領域找出新的生機，開展出下一個十年的新風貌。

二、報導文學對媒體的高度依賴性

張堂錡在〈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的困境〉⁶⁵中指出 1990 年代報導文學的幾個癥結點，其中媒體應用性的過度干涉、意識形態的僵化、題材的未能推陳出新、媒體氾濫導致影像取代文字等，可以發現皆在 1980 年代初步露出端倪，而非 1990 年代一夕造成。筆者以為，仔細探究其中的關聯性可以發現，這些癥結在 1980 年代開始逐漸浮出檯面的原因，可說皆與媒體的介入、控制乃至重構報導文學有關。題材的窄化首先導因於報導文學創作者對獎項的追求，一味追隨前輩得獎者的腳步，不斷重複書寫得獎的題材，至《人間》之後又受限於日益嚴重的「弱勢代言人」形象，所謂「弱勢」、所謂「邊緣」的題材被重複回收利用，形成流行的議題被一窩蜂的採訪、書寫，尉天驄對此便曾表示：「報導文學者應該再努力，題材的選擇要寬一點，而且要帶著參與及投入的胸懷來寫，而不是像到蘭嶼觀光一樣，只是一個江湖過客。」⁶⁶過度開發的結果反而消解掉報導文學原先的企圖心與精神，成為寫作上的一種媚俗與盲目。這個過程正是文學媒體對報導文學重構的結果，文學獎對報導文學的文類體制進行規約，使報導文學的創作者被迫朝向學術化、論文化的模式寫作，以獲得在文學獎場域中較高的認同。在《人間》則是進入另一番轉折，由於《人間》本身的性質與意識型態使然，在當中發表的作品也必然與這種意識傾向妥協或合作，由意識型態出發使《人間》在不同時期對特定的議題有所偏好，報導文學也終究只是將類似的題材做出一次又一次的重複發揮。

儘管台灣的有線電視法到 1993 年才通過，但非法的地下第四台已經在 1980 年代的民間社會悄悄蔓延開，另一方面雖然尚未進入電視媒體氾濫成災的局面，卻也面臨著平面媒體的過度擴張，換言之，各種形式的媒體在 1980 年代的台灣開始急速的增加。由於報禁的解除，各大報業集團在原本的報紙快速增張之外，開始出現早報、晚報、娛樂報、工商報等不同訴求的分報，各種綜合性的八卦新

⁶⁵ 張堂錡，〈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的困境〉，《空大學訊》第 242 期，1999 年 11 月。

⁶⁶ 游淑靜，〈不能只是江湖過客——尉天驄談報導文學的再深入〉，收錄於陳銘礪，《現實的探索》，頁 170-173。

聞雜誌也紛紛出籠，⁶⁷平面媒體的快速增加使社會議題加速消耗，報紙雜誌的出刊時間層層疊疊之下，編輯無法花較長的時間經營單一議題，如報導文學這樣需要長時間醞釀、觀察的報導性文章更難以在這種新聞時效過短的環境中生存，在極短的時間內快速製造的結果必然是作品品質的犧牲。而錄影帶與地下電視台的活躍，使具有聲光畫面優勢的影像在吸引力上大幅取代了文字，整體文學圈都開始感受到這股震盪與讀者的流失。報導文學在訴求上與電視媒體有更多的重疊，直接的新聞性畫面比起純粹的文字敘述更能達到情感的撼動，現場直播、深度採訪、系列新聞專題製作等，在講求時效的新聞圈，報導文學更是難以和電視媒體一較長短，難以找到立足之處。講求大眾性、社會性的報導文學長期依賴、依附媒體的結果，形成如蝴蝶效應一般的下場，整個媒體環境的變化都在一定的層面上對報導文學造成影響。

關於報導文學對文學媒體的依賴性，乃至文學媒體對報導文學的介入，可以藉由須文蔚以下一段話做為說明：

編輯人為求在激烈的報業市場上能有競爭力，「文學副刊」已然轉變為大眾文化論壇，受到大眾消費文化的影響，使得「輕、薄、短、小」成為 80 年代副刊論述的主流，報導文學因之退出副刊文學的行列。副刊不再支持報導文學，使得需要媒介經濟奧援的作者無法繼續從事創作工作。民生報副刊〈天地〉的取消，乃至後繼以報導文學為職志的《人間》雜誌停刊，以及時報報導文學獎一度取消，都使得創作誘因中斷。另一方面，編輯人的「計畫編輯」轉向文化批評與專題製作，一旦報導文學不受新生代副刊編輯的青睞，報導文學的空間自然因之萎縮。⁶⁸

由此可知，當文學環境發生改變，當文學媒體不再支持報導文學，報導文學便只有逐漸走向式微，文學媒體對報導文學的介入與建構，實際上也是報導文學得以持續推進的主要動力，當文學媒體不再關注報導文學，當報導文學失去其社會性足以依恃的舞台、失去做為純文學的建構場域，兩方面的落空將導致報導文學的無處可去。而回頭審視 1980 年代報導文學經過文學媒體的建構與再建構，逐步

⁶⁷ 如 1978 年創刊的《時報周刊》、沈野於 1988 年創立的《獨家報導》等。

⁶⁸ 須文蔚，〈報導文學在台灣 1949~1994〉，《新聞學研究》第 51 集，1995 年 7 月，頁 133。

走向專業化的這個過程中，與讀者的距離從文學獎的遙遠，到《人間》的積極入世、介入社會，報導文學強化了社會的參與性，理論上擁抱了更多的人群，但從《人間》的發行人乃至結束觀之，報導文學的讀者卻似乎是越來越小眾。在發表的空間上，報導文學從副刊到文學獎到專業刊物，篇幅與深度是越拉越大，在題材上雖然沒有走出既有的框架，然而在單一的題材上卻能越鑽越深，生態保育的議題發展到《大自然》一類的專業刊物，其深度顯然已經超越過去，所有這些細微的變化皆與媒體相關，媒體與媒體環境無論出於有意主導、無意的影響或是迫使，皆會對報導文學的下一步造成影響，從這種緊密性中深刻的印證著報導文學對大眾媒體的高度依賴。

小結

筆者在本章所要論述的問題是，原先在 1970 年代因政府對媒體的箝制初步鬆動，在社會上各種本土議題興起的同時，報導文學順勢而起；然而到 1980 年代在報禁、黨禁相繼解除，迎來解嚴的同時，理論上應該擁有更多發聲空間的報導文學為什麼卻開始出現盛極而衰的現象？固然在整個 1980 年代，報導文學確實從上一個十年初步進行報導文學創作的局面更加深化，然而從這種眾家爭鳴的熱潮中，隨著《人間》的停刊，報導文學竟然逐漸走向寂靜，關鍵性的因素究竟為何？這種走向式微，關乎著報導文學內緣、外在的哪些層面？1987 年在《文訊》舉辦的「當代文學問題討論會」中，林耀德提出〈台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一文，文中列舉報導文學的「六項普遍缺憾」：過度的適用性、氾濫的抒情性、牢固的意識型態、浮誇的說教心態、因襲的舊觀念、難產的新世代，針對這六點做出十分精準犀利的分析，而此六點亦與筆者在本章所論述的報導文學轉型之處相合，事實上這六點缺憾都是過猶不及的問題，是報導文學特性的一體兩面，此文出現在 1980 年代行將結束的 1987 年有其時間上的意義，其所指也大致是 1980 年代這十年間報導文學經過深化、發展、轉型後出現的流弊，因此筆者在此將以林耀德這六點缺憾做為本章結論的論述脈絡：

一、過度的適用性：1980 年代的報導文學寫手大多於媒體機構中工作，職業身份及穩定的薪資固然是報導文學創作上的優點，然而從缺點上來說則不免受到媒體的制約，在題材取向以及立場上的自由度尤為可議，個人理想性的發揮多少受

到限制，更有論者直言報導文學是「副刊主導的去作者技術」⁶⁹。其次，某些熱門議題的流行，造成報導文學作家們的集體書寫現象，當時事轉移後，這些議題又立刻被拋在腦後，林耀德認為這顯示出報導文學創作者「熱情建立在趨附潮流的應用性上」⁷⁰，因此除了生態保育、原住民問題隨著民間社團的成立依舊受到注目之外，曾經風靡一時的癡瘋病患者、烏腳病污染問題、都被一一遺忘，在這一點上更加突出了報導文學在本質上與新聞報導的接近，以及報導文學受到媒體嚴重影響的事實。

二、氾濫的抒情性：報導文學一方面要求客觀的事實，但同時也要求文學的筆調，然而實際的操作應該如何結合，卻沒有人能提出具體的說法。結果是報導文學創作者往往僅止於對所書寫的事件提出制式的感嘆、省思以增添「文學味」，而這種不免流於表面、失之膚淺的觀察與感想又在反覆書寫中逐漸樣板化。林耀德指出：「不論人事時地物，當報告者經常出現套版式的情緒反應時，氾濫的抒情性便成為作品的致命傷害。」⁷¹顯示報導文學寫作者的情緒、反思與同情都出現落入窠臼的窘境，讀者也不再因此被引起共鳴，而僅感到情緒上的浮誇與表面。這種氾濫的情感也可說和報導文學創作上的瓶頸有關，創作者沒有走出新的寫作模式，這種「事實＋感嘆」的模式與大量出現於 20、30 年代的「革命＋戀愛」小說相同，最終僅能一再複製操作前人的寫作模式。

三、牢固的意識形態：林耀德認為此時的報導文學創作者大多抱持著牢固的意識形態，對於作品欲達成的效果與目標都相當確切，因此在剪裁資料的過程中便不免有所偏頗，而這種寫作成果不過是「經過偽裝的魔術」。⁷²在這點流弊上，須文蔚也曾指出，報導文學的爭議之主因在其「目的性」，而不在客觀性，⁷³意識形態的問題實際上所指向的是報導文學的「目的性」太過明顯。當報導文學的客觀性被不斷強調的同時，目的性的問題也較為輕微，然而當報導文學的客觀性被淡化，隨著《人間》強調介入社會、批判黑暗的報導文學興起，主觀的、情緒的成份被加強，作者個人的所抱持的意識形態也隨之凸顯，這當中可能產生的流弊，從陳映真的左派立場被視為《人間》熄燈的原因可以見得。

69 林民昌，〈當代台灣小說文本的知識及其操作〉，頁 85。

70 林耀德，〈台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文訊》第 29 期，1987 年 4 月，頁 146。

71 同上註。

72 同上註，頁 147。

73 須文蔚，〈報導文學在台灣，1949-1994〉，《文訊》第 29 期，頁 130。

四、浮誇的說教心態：如同筆者在本章所說，報導文學走到《人間》的階段，「社會良心」已經成爲甩之不去的包袱，但事實上，報導文學自高信疆的提倡起，便不斷被塑造爲「針砭社會的利器」，進而會從事報導文學創作的作者群也都具有同樣的傾向。這群有志報導文學寫作的作家，從正面來說，對社會抱持著熱忱與正義感、具有積極淑世的精神；反面來說，有將自身視爲高於「一般社會大眾」的「啓蒙導師」、「訓導長」的傾向。林耀德此流弊在於「要糾正甲、糾正乙、糾正這個社會，這種心態最後只會造成缺乏自省能力的報導文學作家的不斷湧現。」⁷⁴報導文學家們時時以「知識份子」自許、以「知識份子」做爲目標讀者，儼然自覺有一個中產的精英文化圈存在著，隱約存在著「上對下」的心態，報導文學寫作者「喚醒大眾」之企圖與社會大眾提供之「迴響」，二者作爲對照與再詮釋，正隱藏著一種「高」對「低」、「社會良心」對「待啓蒙的百姓」之間的權力支配。

五、因襲的舊觀念：從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報導文學可以觸碰的議題變得更加多元，雖然仍有如上述所言，某些議題集中流行的趨向，但整體來說報導文學所書寫的層面是擴大了。但也因此，林耀德認爲實際的癥結並不在於題材的重複，而是「缺乏專精的能力繼續深入問題的核心，進而在觀念上造成突破。」⁷⁵，這一點也導致前所論及的「氾濫抒情性」。報導文學的作者既然多數身爲編輯，實際上在某些領域的知識並沒有辦法達到高度的專業，例如寫核電廠的污染問題，在不具備更多的化學專業等前提知識之下，確實與很難完成真正深入的報導、很難提出真正有意義的反思、很難指出問題的核心，因此僅能像是「到蘭嶼觀光」、當一個「江湖過客」⁷⁶，並重複著套語般的感嘆。

六、難產的新世代：新世代的無以爲繼，原因可以分爲報導文學自身內部、以及環境外緣兩方面的影響。從內部上來說，報導文學經過 1980 年代的深化，累積一定的作品數量，因此文類形式、文體定位等學術性的建構也陸續出現，然而經過這段時期的討論卻仍是流於各說各話，論者與作者各自表述，沒有建構出可以依賴的體系。雖然有《人間》示範在前，但在《人間》熄燈後相當長的時間內，學界也並沒有與《人間》相關的研究以建立報導文學的文類論述，由此可以看出報導文學內部的尷尬。從外緣環境來說，林耀德以爲從時報報導文學獎取消後，

⁷⁴ 林耀德，〈台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文訊》第 29 期，頁 147。

⁷⁵ 同上註，頁 148。

⁷⁶ 「到蘭嶼觀光」、「江湖過客」此二詞皆出自游淑靜對尉天驄的專訪，見游淑靜，〈不能只是江湖過客——尉天驄談報導文學的再深入〉。

各大媒體對報導文學也漸趨冷淡，在缺乏媒體英雄的光環與獎金的鼓勵之下，報導文學的創作意願也隨之降低。⁷⁷可以說從外緣觀之，更清楚的顯示出報導文學對於媒體的依附性，當報導文學失去媒體的奧援與關愛，也就失去了舞台。

綜合上述六點，林耀德對於報導文學的走向則認為：「專業化的訴求也將使得報告者群自副刊轉往專業性雜誌以及各型小媒體發展，並且加強作品中傳知和報導的功能。」⁷⁸報導文學在離開副刊與文學獎後，確實轉移陣地、改在專業性刊物如《人間》、《大自然》等繼續活躍。從 1970 年代的逐步勃興，到 1980 年代各文學獎、專門雜誌的出現，顯示報導文學已然進入一個新高峰，豐收期正式到來。隨著報導文學的發展進入成熟階段，關於報導文學的理論探討和爭論隨之而來，但在缺乏學院理論介入的狀況下，報導文學經過十年仍只能落入駁雜的、各自表述的結果，最終更加模糊了報導文學的面貌。走到 1980 年代的尾聲，逐漸失去媒體寵愛與文學舞台的報導文學，在內部又陷入難以定位的困境，隨著 1980 年代的行將結束，彷彿也迎來報導文學式微的一陣危機意識。



⁷⁷ 林耀德，〈台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文訊》第 29 期，頁 148。

⁷⁸ 同上註，頁 148-149。

第四章 兩大報報導文學獎下的世代組成與雙重性

(1991年~2000年)¹

《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兩大報，依恃著報業雄厚的資源與媒體的影響力，在文學場域上的話語權爭奪戰從副刊延燒到文學獎，1976年《聯合報》首先設立「聯合報短篇小說獎」，1978年《中國時報》則設立包含小說及報導文學徵獎的「時報文學獎」，隨著兩報徵獎類別的不斷增加，這場文壇的爭霸戰也更趨白熱化。²進入1990年代，兩大報的文學獎已經各自舉辦超過10屆，透過具有份量的評審、高額的獎金，對文壇形成直接且廣泛的影響，業已成名的作家也不乏相繼投身這個競技場，成為台灣文壇作家們爭相奪取的金冠。然而回到文學獎誕生的起點——副刊，隨著報紙的增張，到1996年，兩大報已經高達15大張，副刊的比重下降至60分之1，重要性逐步下降。可以說，由於社會結構轉變，新興媒體崛起，副刊的傳播內容大幅削減，副刊透過文學所建構的文化權力網絡呈現衰退，然而副刊本身介入文學的影響力雖然降低，但由副刊直接指揮、影響的兩大報文學獎仍然繼續在文學網絡中發揮高度的影響力，反成為兩大報文學集團較勁的關鍵場域。

1978年第1屆時報文學獎開辦徵選報導文學獎項，至1982年第5屆結束後停辦；1989年的中央日報文學獎舉辦一次性的報導文學獎徵選；隔年1990年聯合報文學獎加入報導文學徵獎，1991年的時報文學獎亦隨之跟進恢復獎項，兩大報先後重新設立報導文學獎的徵選，一時間報導文學似乎又有再創高峰的可能性，曾經一度停辦的報導文學獎忽然在這十年間得到文壇的青睞，回到文壇鎂光燈的焦點下。1990年代以前，在全國性的重要徵獎上，報導文學項目起落不定，時有持續性的徵稿，偶又有數年的取消，儘管1990年代間有兩大報文學獎持續的徵獎做為聲援，但與之同時也出現一系列〈報導文學死了嗎？〉³、〈有

¹ 本章論述所採取的《聯合報》、《中國時報》兩大報報導文學獎名單，可參見附錄一《1990年代時報報導文學獎得獎列表》、附錄二《1990年代聯合報報導文學獎得獎列表》。

² 以下兩大報的文學獎將皆稱「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不再另加書名號。

³ 徐淑卿，〈報導文學死了嗎？〉，《中國時報》第43版，1998年10月8日。

怪獸！」——看報導文學的式微⁴、「驟然消失的雷聲」⁵等文章，顯示文壇實際上對報導文學存續的高度焦慮。報導文學在文學獎的持續徵獎中乍看彷彿生機勃勃，但論者與前行一代的作家們又不斷指稱報導文學「已然」面臨生死存亡之秋⁶的式微危機，其所焦慮的是過去大眾所熟悉的報導文學寫作模式與議題日趨僵化，在文類自身的發展與作家的世代交替上出現瓶頸，卻又還不見新的寫作模式或是新世代接棒。

然而究竟是何種契機使得報導文學在 1990 年代再次於文學獎中復甦？如果說時報文學獎是因為聯合報文學獎在 1990 年的設立而跟進，那麼又是何種因素使得聯合報文學獎在 1990 年突然有了設立報導文學獎的念頭？時任《聯合副刊》主編的痲弦對於聯合報文學獎增設報導文學項目表示：「報導文學更具現實性、批判性，更能表現社會脈動及時代顏色。」⁶而隨著 1991 年楊澤接掌《人間副刊》，同年便恢復報時報文學獎的報導文學徵選，對此楊澤在該屆的得獎作品集中表示：「報導文學獎的恢復，顯示『人間』對目前複雜多變的現實之體認，及其介入下一波變化的決心。……在此資訊文化眾聲喧嘩的年代，報導文學可以是瞭解各類次文化現象的利器，正宜往更深細周密的路子上去。」⁷透過兩大報副刊主編對於將報導文學加入文學獎的解讀可以得知，報導文學在此時回到文學獎的舞台顯然是基於文學反映社會的要求，顯示台灣在經歷 1980 年代的解嚴與體制衝撞之後，來到 1990 年代全面解禁的後解嚴時代卻更加擾攘，國際情勢以及台灣的經濟、社會面臨急速的變化。與 1980 年代企圖藉由報導文學揭露黑暗、衝擊社會體制不同，1990 年代對報導文學的訴求在於反映並紀錄當時複雜的現實現象與眾多次文化、次議題的興起，報導文學的功能性再次得到適切的發揮空間，在這種時空背景下有了報導文學第二次的起飛。

而當報導文學登上兩大報文學獎，也就等於走向文學獎的權力運作體系中，陷入文學獎不得不然的遊戲規則內。向陽在論及文學獎與文學間關聯時曾說道：「文學獎對文學發展的作用主要是：書寫者文壇身份的取得，文學風潮和書寫典

4 馬以工，〈「有怪獸！」——看報導文學的式微〉，《中國時報》第 37 版，1998 年 12 月 23 日。

5 陳大為記錄，〈驟然消失的雷聲——第 21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類決審會議記錄〉，《中國時報》第 37 版，1998 年 12 月 23 日。

6 楊澤，〈序〉，收錄於楊澤編，《手槍王——第 13 屆、14 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時報文化，1991 年），頁 9。

7 簡敏麗整理，〈理性用事〉，收錄於痲弦編，《小說潮——聯合報第 13 屆小說獎暨附設新詩獎、報導文學獎作品集》（台北：聯經，1992 年），頁 401。

範的權力運作，建構、強化文學班底，形成文學社群倫理機制，……。」⁸由此可知文學獎對文學典範的建構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從作家世代班底的形成，到文類的美學標準建立，乃至當代的文學風潮推動，可以說文學獎的運作全面影響著文學場域內作者、文本、趨勢等多重層面。因此當報導文學進入於兩大報文學獎的比試場，這些得獎作品、評審班底與與之產生的作家世代，必然透過兩大報的媒體影響力，以及具有文壇領袖身份的評審之認同，對台灣報導文學的創作產生極大的建構作用。然而當文學獎透過媒體的影響力與高額獎金，逐漸成為文壇新興起的主導「霸權」，這種中心的建構又是經過哪些權力的運作、對於報導文學在這十年間的發展又發生著何種作用？若將兩大報的報導文學獎分開觀察，又可以挖掘出何種歧異或相同之處？

本章試圖將 1990 年代的台灣報導文學發展聚焦在聯合報報導文學獎與時報報導文學獎，透過對兩大報文學獎在這十年間的徵獎，釐清 1990 年代報導文學的質變、轉型、危機或新生等可能。藉由兩大報文學獎的權力運作，討論在前一個時代對報導文學大聲疾呼、奔相呼籲、反省後，從「寫手」升級為「審查委員」⁹的前代報導文學的寫作者是以何種模式透過文學獎運作著報導文學的發展，又，文學獎對報導文學的典律化產生著什麼樣的制約或移動之可能，文學獎得獎者的世代交替，以及其發表場域的改變、閱讀群的更替、關注議題的轉移等，報導文學在文學獎下得到的是多元發展的可能還是陷入被侷限的困境。

第一節 兩大報報導文學獎中的 1990 年代報導文學

1990 年 3 月台灣爆發野百合學運，台灣民主化的推動成為全民焦點。1991 年終止動員戡亂條款，1992 年國會進行全面改選，同年於新加坡展開辜汪會談，¹⁰政府公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1993 年新黨以第三大黨的姿態成立，1994

⁸ 向陽，〈海上的波浪 小論文學獎與文學發展的關聯〉，《文訊》第 218 期，2003 年 12 月，頁 37。

⁹ 如 1993 年第 16 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決審委員為楊憲宏、劉克襄；1994 年第 16 屆聯合報文學獎報導文學決審委員之一為翁台生；1998 年第 20 屆聯合報文學獎報導文學決審委員之一為古蒙仁。

¹⁰ 1992 年，中國大陸的海協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邀請台灣的海基會（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訪問中國，基過多次磋商與新加坡國務資政李光耀的斡旋，訂於新加坡進行此次民間性、事務性、經濟性與功能性的會談，由海協會董事長汪道涵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進行相關協議。

年台灣首次省長、直轄市長選舉，行政院及總統首次使用「原住民」一詞取代舊稱「山胞」。1995年二二八紀念碑落成、政府首次針對二二八事件公開道歉，同年李登輝總統訪美。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同年台灣海峽飛彈危機。1998年與南非斷交，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2000年第二次民選總統完成政黨輪替，而兩岸小三通即將在下一年來臨。筆者在此列舉出1990年代台灣的社會與政治大事，試圖說明報導文學是在何種社會背景下再次復甦，1990年代的台灣在解嚴之後面臨衝破禁忌之後的眾聲喧嘩，邁入混亂的成長期，在掙脫過去的箝制之後邁向激烈的全面變動，而報導文學正是在這種局勢下再次扮演起紀錄現實與社會良知的雙重角色。

在1990年聯合報文學獎增設報導文學項目後，次年時報文學獎也宣佈「復活」報導文學項目，從1989年《人間》停刊後失去主要舞台的報導文學又成為文壇的焦點，這不是偶然。報導文學在上一個十年漸趨式微，在此時重新站上文學獎舞台顯然是文壇刻意的操作，是文學界面對台灣當時社會的混亂與急速變遷所做出的反應。1990年代的台灣社會全民喧嘩，社會議題不再如1980年代呈現「單點」的發聲，而是進行「線」與「面」的加倍激昂與激進，從主題上來說，社會再次提供報導文學眾多發揮的題材。而從文學界本身的發展觀之，報導文學此時的中興頗有文壇最後奮力一搏的味道，「輕薄短小」的文學風潮雖說逐漸走向尾聲，但迎來的卻是文學觀眾的大量流失。文學界一方面透過文學獎為純文學作品加冕，與排行榜中大眾品味的文學作品做區隔，另一方面卻也憂慮純文學市場的萎縮，在這種尷尬的姿態中將報導文學藉由文學獎再次拉抬出來，或許不無有著想藉由曾風行一時、寫實性較強而文學性較低、與時代議題脈動結合的報導文學，刺探當代社會大眾對文學的興趣與買單意願的企圖。

一、報導文學獎下的報導文學轉向與分流

誠如筆者前言所說，報導文學在此時的「中興」有著文壇內在與社會外緣的雙重因素，回到報導文學本身來探究，報導文學這次的「歸來」又發生著何種「質」的變化？觀察這十年間兩大報報導文學獎的得獎作品，可以發現與1980年代的報導文學出現差異，在此將此十年間的兩大報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整理為本章附錄一、附錄二，藉由歸納分析，為1990年代報導文學在主題內容上的傾向與轉型做出一些說明。

自兩大報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的數據資料觀之，聯合報報導文學獎自 1990 年第 12 屆徵選至 1999 年第 21 屆，共有 30 篇得獎作品，其中中國作家佔 6 篇；時報報導文學獎自 1991 年第 14 屆徵選至 2000 年第 23 屆，共有 18 篇得獎作品，其中中國作家佔 1 篇。在寫作題材上而言，原屬於報導文學領域的常見題材，在這個時期依然不見衰退，生態環境作品在 1990 年代繼續延燒，1980 年代本就屬於熱門的生態環境作品隨著台灣環境意識的提昇，受到的關注度仍有增無減。¹¹而同樣在 1980 年代便受到關注的台灣本土歷史文化的追尋、懷古題材，也不乏後繼者持續創作。¹²延續上一個時代《人間》以挖掘台灣政治歷史真相、關懷弱勢族群為訴求的路線，也有為數不少的作品持續朝向這條道路前進。¹³

此外，除了中國作家在兩大報文學獎的登場，在台灣報導文學創作者的筆下亦開始出現一些以國際性議題為主，或是講述文化衝擊、衝突的作品，如楊樹清〈消失的衛星孩子〉與楊艾俐〈華夏哀歌〉兩篇，顯示著台灣報導文學的格局正在擴大，這兩篇作品其一是探討世紀末台灣小留學生面臨東西文化碰撞與衝擊時的處境，另一則是就華人非法移民的「多佛慘案」事件為主題，而焦桐〈失去地址的人〉的報導對象更是與台灣並無關聯性的非洲薩伊，但為世界矚目的盧安達難民湧入處的薩伊，台灣報導文學作家以此為題材，所代表的意義正如林耀德所說：「代表著台灣作家在視野和人文關懷上已超越了素樸的『本土迷思』，將心靈與智慧朝向世界開放。」¹⁴，此外亦有以澳洲原住民為主題的林福岳〈澹煙小鎮的希望種苗〉，皆足見台灣的報導文學作家們在 1990 年代的解嚴後的時代、國際交流頻繁的時空下，逐漸將觸角從台灣這個立足點延伸觸碰其他的世界。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原住民報導文學的作品，在經歷 1980 年代原住民議題的初步發聲後，1990 年代隨著原住民運動的興起呈現更深入的挖掘。1980 年代的時報報導文學獎中以原住民為主題者有〈阿美族的生活習俗〉、〈最後一把番刀〉

¹¹ 如沈振中〈叉翅、白斑與浪先生——紀基隆的一群老鷹〉(1992 年第 15 屆時報報導文學評審獎)、林雲閣〈八十萬年奇蹟身世換不來一世尊榮——台灣鮭魚族群的命運〉(1995 年第 18 屆時報報導文學首獎)、劉克襄〈凡鳥之歌〉(1994 年第 16 屆聯合報報導文學獎第三名)等。

¹² 如李昂〈鹿窟紀事〉(1991 年第 14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優等)、葉怡君〈風簷之佐〉(2000 年第 23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第二名)、黃文博〈瘟神傳奇〉(1991 年第 13 屆聯合報報導文學獎第二獎)、李靜修〈前山第一城之竹事〉(1994 年第 16 屆聯合報報導文學獎佳作)等。

¹³ 如楊樹清、張煥宇、曾吉賢〈消逝的漁民國特〉(1996 年第 19 屆時報報導文學評審獎)、葉怡君〈風簷之佐〉(2000 年第 23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第二名)、李展平〈尋訪暗角癆病〉(1999 年第 21 屆聯合報報導文學獎第三名)等。

¹⁴ 林耀德，〈觀景窗外的黑色暴力——讀焦桐《在世界的邊緣》〉，《自立早報》，1995 年 6 月 18 日，第 26 版。

與〈黑色的部落〉，皆是以原住民的生活、文化與處境為內容，較表層的感嘆與呼籲，這種在作品中嵌入原住民的辭彙或典故的「逆寫」¹⁵手法，隨著進入 1990 後更為大量的使用、出現，顯得更需要回到原住民自身的語言與文化脈絡中才得以被正確理解與呈現，¹⁶在瓦歷斯·諾幹¹⁷等原住民作家加入報導文學陣營，以及社會上原住民的正名運動後，¹⁸原住民報導文學從楊南郡〈斯卡羅遺事〉到鄧相揚〈霧重雲深——霧社事件後，一個泰雅家庭的故事〉、瓦歷斯·諾幹〈Mihuo——土地紀事〉，顯示原住民報導文學已經從以「原住民」做為一個單一族群的書寫態度，轉變為針對原住民內各族群、不同文化、不同歷史的細部書寫、紀錄，而瓦歷斯·諾幹〈Losin·Wadan——殖民、族群與個人〉一篇更是將原住民報導文學提昇至大河小說般的宏大規模，全文以記實的寫法追溯羅幸·瓦旦的一生，兼採文獻與資料、族人口述，加以作者個人的部份虛構編織，表現出原住民集體的傷痛以及對自決權的追求，「以小觀大」的寫作技巧與層次顯然較之 1980 年代的作品，在價值意義、目標企圖與觀察的視野上都有極大的提昇。然而上述作品全是在時報報導文學獎中獲獎，原住民報導文學作品在聯合報報導文學獎中則沒有如此的突出表現，綜觀 1990 年代聯合報報導文學獎的得獎紀錄，以原住民為主題的有劉還月〈重重後山尋平埔〉、〈尋訪噶瑪蘭〉、〈回不去的山後鳥〉三

¹⁵ 「有不少文學作者會在書寫時，將許多原住民的詞彙以及典故嵌入作品之中，這樣的書寫動作在瓦歷斯·諾幹看來，認為這是一種『逆寫』的行動，意即作者在行文之際加入自身的東西，其實是一種主體宣告的姿態，表面上看來作者可以更精確地表達與描述，能讓讀者更親近書寫者的空間中。但換個角度來看，這樣的書寫方式卻也強迫了讀者必須進入作者的世界，造成讀者閱讀習慣的偏移與分裂。」可參見陳震，《原住民報導文學與原住民運動之聯繫》，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頁 77。

¹⁶ 「但整個作品逆寫的現象，則要到 1985 年之後，才算真正開始有不斷增加的趨勢。例如在 1985 年到 1989 年這五年之間，便有近三成的作者會在作品中嵌入原住民的辭彙及典故，到了 1990 年代之後，更是從不斷成長，而到現今逾六成的豐富情狀。當然，愈來愈多的作品會運用原住民的辭彙或典故，顯示的便是原住民生活處境所遇到的事物，必須回到原住民的語言脈絡中才得以呈現，不再是作者能夠僅以自身文化認知可以完整理解與詮釋的。」參見陳震，《原住民報導文學與原住民運動之聯繫》，頁 78。

¹⁷ 或譯為「瓦歷斯·尤幹」，如時報報導文學獎的作品集中便使用「瓦歷斯·尤幹」，惟近年該作家多使用瓦歷斯·諾幹，故筆者以下皆稱瓦歷斯·諾幹。

¹⁸ 原住民運動開始之時便提出「正名的訴求」，民國 73 年成立的第一個原住民族運動團體即以「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為名展開「原住民正名運動」，包括在集體稱謂上改「山胞」為「原住民」，以及不強制以漢姓為名、恢復傳統姓名。可參見台灣大百科全書，「原住民正名運動」條目：<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1168>。在報導文學上，陳震在〈原住民報導文學與原住民運動之聯繫〉指出：「對於原住民族的稱謂，在 1975 年到 1984 年間，報導文學作者使用『原住民』與『山胞』的稱謂比例各半，但在 1985 年到 1994 年之間，使用『原住民』稱謂的作者比例便不斷地提高，近年來，仍舊使用『山胞』名稱來稱呼原住民的作者則幾乎不再出現。」可參見陳震，《原住民報導文學與原住民運動之聯繫》，頁 76-77。

篇，各在 1990 年、1992 年、1994 年獲獎，但內容上是劉還月投注於平埔族研究的系列作品，可見聯合報報導文學獎在原住民報導文學方面顯得較缺乏開創性，無論在得獎的作家與作品內容上，都不若時報報導文學獎多樣化而豐富。

另一方面，隨著 1980 年代兩岸恢復通訊，1990 年代的兩岸關係大致呈現穩定，兩大報文學獎此時皆主動朝海外華人圈及對岸的中國大陸散發文學獎的宣傳，以吸引更多的參賽者。面對大陸的開放，台灣在政治上的中國正統性受到極大的挑戰，台灣的文壇也面對大陸先鋒小說、傷痕文學等挑戰與衝擊，兩大報選擇主動容納中國作家加入競賽，筆者推測，或許隱含著台灣文學界企圖通過文學獎的標記來收編中國作家之企圖，進而穩固台灣身為「中國文學」的正統性與道統，以彰顯台灣的純正「中華性」。在報導文學上，由於大陸作家創作報告文學的系統十分堅實，持續創作者為數亦多，在進入台灣兩大報文學獎的競爭場後成果頗為豐碩，有異於台灣報導文學的多樣創作手法與新題材，也在在衝擊著台灣過去對報導文學的認知與標準。張俐璇在其碩士論文《兩大報文學獎與台灣文壇生態之形構》中便論道：「在 1990-1996 年這個階段裡，最大的特色在於，大量的中國作家出現，尤其反應在聯合報的報導文學獎中。中國的出現，標著主辦者、評審者對台灣的解釋、對報導文學的看法也在改變與位移。」¹⁹指出在這波中國作家現身台灣報導文學界的潮流及背後的意義，且這種特色在聯合報報導文學獎有著特別顯著的傾向。

聯合報文學獎在 1990 年將推薦獎頒給中國作家吳弘達的〈五八六——中國北方一個勞改隊的墳場〉，1991 年的第三獎由展奮〈瘋狂的海洛英——中國大陸雲南地區吸毒紀實〉獲得，接著在 1992 年將佳作頒給中國的張伯笠〈逃亡鐵幕內〉，1993 年第 15 屆則有覃瑞〈辛亥後裔〉獲佳作、喜樂〈北京不是一天造成的〉獲入選，1996 年馮傑〈兩個人和一座學校〉拿下第三名。由上述可以看出中國作家在聯合報報導文學獎的得獎紀錄上呈現連貫性，從 1990 年設立報導文學獎項以來幾乎年年皆有中國作家上榜，而得獎作品的題材也都是與中國內部的真相與社會情勢有關。但從 1994 年開始，除 1996 年的馮傑之外，中國作家的得獎出現斷層，自 1994 年至 1999 年這 6 屆的報導文學獎再次回到台灣作家的手中，這究竟是評審的影響或是社會風向所致頗值得深究。反觀時報文學獎，雖

¹⁹ 見張俐璇，《兩大報文學獎與台灣文壇生態之形構》，國立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6 年，頁 95。

然時報文學獎亦有針對中國作家進行文學獎的徵稿宣傳，其中也不乏中國作家來稿，但從最終的得獎名單看來，由中國作家獲獎的僅有 1991 年的胡平〈井岡山，沉思的哲人〉，與聯合報報導文學獎有極大對比，一方面顯示著時報報導文學獎的評審在主題上略為偏好台灣本土的素材，另一方面也隱約透露著報社本身立場與評審意識形態操作的可能。

從兩大報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的主題偏好傾向上，不難觀察出兩大報即使同時舉辦報導文學徵獎，但兩大報對作品的要求與品味存在著顯著的差距。整體來說，時報報導文學獎對台灣本土歷史與社會議題的作品有所偏好，聯合報報導文學獎則傾向中國大陸當時現況以及學術性考證作品。就時報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而言，在原住民與生態環境報導文學作品外，李昂〈鹿窟紀事〉、葉怡君〈風簷之佐〉、楊樹清等的〈消失的漁民國特〉、陳姿羽〈唱他的歌，記他的名字〉，以上幾篇從不同角度切入台灣過去隱藏在煙霧中的歷史；另外有凌拂的〈兒童教育與人文思考——荒遠深山教學手記〉與〈那一天我們要去看米羅〉，這兩篇主題皆在討論台灣的教育問題；鄭禮忠〈逐夢的人〉則反映出 1990 年代台灣民眾的困惑與徬徨，這兩類作品都在 1980 年代既有的主題中進行細緻的深化，展現出延伸 1980 年代台灣意識的抬頭與對台灣土地歷史主體性的覺醒，可說是延續 1980 年代時報報導文學獎及《人間》路線所做出的延伸。

而在聯合報報導文學獎上，相對時報報導文學，更多的將關注焦點放在中國議題以及具有世界觀的作品上。焦桐〈失去地址的人〉、林福岳〈澹煙小鎮的希望種苗〉、楊樹清的〈被遺忘的兩岸發聲人〉與〈天堂之路〉皆是以國際性議題與跨國的文化衝擊為主題，凸顯出台灣報導文學家在拓展新寫作素材上的企圖心，以及創作者在世界觀上的擴大。而中國作家得獎頻繁，也將中國內部的報導文學議題與寫作手法帶進台灣，如率先得獎的吳弘達〈五八六——中國北方一個勞改隊的墳場〉以文革中所經歷的勞改對人性的無情戕害為報導，以文革為主題在當時台灣隨著傷痕文學成為中國作家的最大賣點，在 1990 年能首先出線獲獎或許這也是部份因素。其他又如展奮〈瘋狂的海洛英——中國大陸雲南地區吸毒紀實〉、張伯笠〈逃亡鐵幕內〉、覃瑞〈辛亥後裔〉、喜樂〈北京不是一天造成的〉、馮傑〈兩個人和一座學校〉，在題材上從中國雲南地區成為世界毒窟的問題，到六四天安門事件當事者的異國逃亡，擴及城市的歷史與個人的歷史和特殊的事件，中國作家藉由報導文學所展現的題材相當多樣化，可看出中國進入 1990 年

代後由於社會的壓抑所形成的報告文學熱潮。

從兩大報這十年間的審查意見可以發現，評審們不時反映投稿參賽的報導文學在題材上總是落入窠臼，憂慮於主題的枯竭與重複、原創性太少，期待能在下一屆看見新意。然而，在上一個十年，由於時報報導文學獎的徵選僅僅 5 屆，即使題材略有重疊也相較不明顯，且當時適逢報導文學首次躍升文學獎的場域，任何題材都還是「新鮮」的。在集體發聲的 1980 年代，議題百家爭鳴，從自然生態到懷舊人文、黑暗歷史與弱勢族群，從大致的分類上來說已經開發殆盡，1990 年代則是陷入一種「無可不談則談無可談」的窘境。然而若從兩大報文學獎的得獎作品觀察，誠如筆者上述所論，並非單純的不斷重複過去的報導題材，從相同的類別中創作者試圖抽出更細緻的分流來做書寫，面對從國內的解嚴到國際的接軌，題材上也有從台灣而放眼世界的企圖，因此若說 1990 年代僅僅是重複 1980 年代似乎未免失之嚴厲而略有偏頗。筆者以為，這種處於當下的錯誤解讀，一方面是由於評審處於 1990 年代的時空環境，對於這些在 1980 年代擔任創作、評論報導文學工作的兩大報評審而言，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是一個連貫的過程，既是文學環境以及社會時空的當事者，可能較難以察覺長時間的對比與變化；另一方面，或許這些關於「議題」的重複實際上指的仍是「寫作方法」上的重複，由於寫作模式的僵化與固定導致作品呈現出類似的氣息而難以予人新意，關於這部份筆者將在下一小節進行討論。

二、虛構性與真實性的實踐及挑戰

報導文學在台灣的發展從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此時已經過二十餘年，評論者反覆表達與討論的「報導文學是什麼」與「報導文學的重點」也逐漸落入制式的迴圈，不外乎報導文學必須保持客觀性、報導文學應當書寫事實而不可虛構、報導文學理應有著對社會與人類的關懷等，然而整體而言，1990 年代以前對報導文學的探討與界定主要在強調其「報導性」，故將重點放在「事實」、「客觀」等屬於新聞的要求上。進入 1990 年代後，隨著報導文學創作手法上「新聞性要求」的穩固，「文學」的爭議卻開始浮出檯面，當報導文學在過去一成不變的散文形式中不斷重複後，創作者開始試圖走出其他的創作可能、尋求新的創作方向，當報導文學創作試著離開「散文」、或是在「散文」的範圍內創造其他手法，「文學性」上的改變再次衝擊了評論者以及前行一代報導文學作家對報導文

學的認知。

在 1990 年代以前並非沒有關於報導文學的「文學性」之討論，從幾位在 1980 年代擔任過報導文學獎評審的前輩作家學者對報導文學的相關論述中，便已經可以看出報導文學的一些癥結，如何欣在〈報導文學與文學創作〉²⁰中曾對黃年提出的「它（報導文學）容納多種表現方式和文學寫作的技巧」²¹表示：「究竟使用怎樣的表現方法才算是文學的或非文學的，我們未見解釋。」²²並且也對於蔣勳所說的「報導文學需要一種適合於它的語言」²³回應道「適合於報導文學的文學語言必須具備哪些性質？我們也沒有看到解釋。」²⁴事實上何欣這篇文章有相當多的部份引述其友人如痲弦、蔣勳等談論報導文學的概念，隱約透露出何欣本身對報導文學的不熟悉與不確定性，最後對於報導文學的文體定義只能說無法劃下「明確的界說」、「正確的定義」。而何欣的這些反問同時也反映出當時對於報導文學的模糊，這些學者雖然對於美國新新聞、台灣的文學有一定的瞭解，但當這種文類進入台灣的环境，在尚未發展出一個明確的脈絡之下，竟然也無法畫出一個大致的輪廓，最終對報導文學的文學性、文學語言等問題還是不了了之。

1990 年代報導文學於兩大報的再起，使客觀性與主觀性、虛構性與真實性的問題再次回到爭論的核心，但必須區分的是，同樣的概念在過去是以報導文學的「新聞報導」性質為界定的標準，在此時卻是出於報導文學的「文學性」可以到達何種程度、被容許到怎樣的範圍，因此相對更加棘手。對於這種文學性的尷尬與難以拿捏，兩大報的評審在審查意見中也直言不諱，如馬森在第 13 屆聯合報報導文學獎的審查意見中便表示：「我們一直很難為『報導文學』定位，如果偏於報導，我們會說文學性不足；如果文采豐瞻，我們又會說太像小說或散文。今年在決審委員之間便有這一類的討論。」²⁵同屆的評審黃碧端亦表示：「報導文學的第一個考驗，是主題的價值，第二個考驗，是『報導』和『文學』之間分

²⁰ 何欣，〈報導文學與文學創作〉，收錄於陳銘礪編，《現實的探索》，頁 48-67。

²¹ 黃年口述、李凡訪問，〈報導文學的兩個層面〉，《書評書目》第 16 卷第 63 期，1978 年 7 月，頁 14。

²² 何欣，〈報導文學與文學創作〉，《現實的探索》，頁 55。

²³ 同上註。

²⁴ 同上註。

²⁵ 馬森於第 13 屆聯合報報導文學獎，黃文博〈痲神傳奇〉之審查意見。見張明珠，《〈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研究（1978-2000）》，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所碩士論文，2003 年，頁 337。

寸的掌握。」²⁶由此可知當 1990 年代報導文學一回到文學獎的舞台，評審們便首先察覺報導文學在「文學性」上的為難，這種為難顯然是由於投稿作品在文學表現手法上的多樣化，超越過去文學界對報導文學的既定認知，致使評審一時間無所適從、不得不產生爭論。

1992 年張伯笠〈逃亡鐵幕內〉的得獎，首先衝擊著報導文學的認知界線，〈逃亡鐵幕內〉全篇為作者本身從中國黑龍江省逃亡至蘇聯的一段經歷，以第一人稱視角寫成，充滿對話的寫作模式使作品讀來頗像一篇驚險的逃亡小說，對於一向堅持客觀報導的台灣報導文學而言似乎頗有爭議空間。痲弦在審查意見中便特別強調這種以自身經驗為文的報導文學，若不是「真實」的就會完全變為「小說」，但即使痲弦如此強調，該文內容的真實性畢竟是無法被驗證的，無法被驗證的真實性、無法被確認的「私人事實」，與小說的區別顯得如此模糊又曖昧。透過〈逃亡鐵幕內〉的案例，值得深思的是，報導文學對虛構性的「容忍」界線究竟為何？當事件本身為真、人名為假時，還是報導文學嗎？「報導」所要求的真實性底線何在？以下筆者節錄當時三位評審委員對〈逃亡鐵幕內〉的審查意見以做為討論的脈絡：

痲 弦：「逃亡鐵幕內」寫的是個人的事，這一點相當特殊，通常報導文學寫的都是社會公眾事件，也就是通過作者的感情和世界觀，在一定的目標和傾向性下，將客觀事物做一個有機創作。報導文學是含有高度社會性的文學，也是具有強烈社會情感的文學。然而，「逃亡鐵幕內」卻是自身經驗的報導，有點像是第一人稱小說，這一點和一般認定的報導文學有出入。……張伯笠在這篇文章中寫自己的經驗，我們可以把這篇文章列入廣義的報導文學，倘若他是虛構的，就變成小說，而非報導文學，報導文學必須是真人真事，否則就是小說了。²⁷

李瑞騰：在文類的歸屬上，一般都將報導文學納入散文的範疇，算是一種特殊類型。在台灣報導文學興盛的年代裡，它是文學和新聞的結合，後來逐漸由新聞擴大到人文的領域，包含了歷史、地理、現實等各種不同問題的呈現。報導文學到底可不可以像是「逃亡鐵幕內」這種個人經驗式的寫

²⁶ 黃碧端於第 13 屆聯合報報導文學獎，陳金生〈烏腳病流行病學調查參與記〉之審查意見。前揭書，頁 338。

²⁷ 痲弦於第 14 屆聯合報報導文學獎，張伯笠，〈逃亡鐵幕內〉之審查意見。前揭書，頁 342-343。

法，在我看來，是可以的。當我們在寫作報導文學時，就像痲弦先生剛才所講，報導文學是通過個人主觀的情感和認定，去面對客觀事物，再加以有機整合，最後創作為文的文學類型。所以，我認為報導文學可以是經驗式的。換句話說，報導文學裡可包含一種自傳式的報導。²⁸

葉慶炳：大家習慣上的報導文學都是以第三人稱來寫，作者置身事外。如果作者就是當事人，用自傳或回憶的方式來寫，可能會牽涉到諸多感情因素，如此是否能有客觀的立場？事實上，報導文學這個名詞本來就不明確，我們沒有看過報導詩、報導小說或報導戲劇，報導文學只能是報導散文，並沒有可以共同遵守的定義，現在出現了一篇自我報導，自會引起爭議。²⁹

透過上述三位評審對〈逃亡鐵幕內〉的意見表述，可以歸納出對報導文學的幾個側重點與再思考，進而可以窺探 1990 年代的評審世代，面對手法與形式各異的報導文學作品所採取的幾種主要態度。痲弦認為這篇作品確實挑戰了過去報導文學所報導的主題必然是「社會公眾事件」的認知，在主體與手法上雙雙衝擊著報導文學的「客觀性」與「社會性」要求，但他願意以較鬆綁的認定標準，只要這件事情確實是「真實的」，基於真實性的絕對要求，這篇作品可以是「廣義的報導文學」。李瑞騰的看法則更為開放，直接認為報導文學可以是這類個人經驗式的自傳性書寫，個人的經驗透過主觀的感受與客觀事物結合，便是報導文學。葉慶炳的說法則較為保守，他對於過去報導文學的規範亦較為堅持，從意見中可以看出他還是傾向報導文學以散文形式寫作、採用第三人稱視角、且須具有新聞的客觀性，他認為在報導文學的界定尚且不夠明確的情形下，自傳性的報導不免帶有過度的爭議性。

痲弦、李瑞騰與葉慶炳三位評審，對有高度主觀性、個人經驗式與小說味道的〈逃亡鐵幕內〉表現出三種不同的態度，可以說象徵著整個 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獎評審群，在面對同樣遊走於過去報導文學認知界線上的作品所表現的三種代表性態度。或者如痲弦，對過去的規範標準保留一定的彈性空間，然而在新的創作手法與模式尚未經過學界討論與認定的前提下，如能符合一些基本要求，認為可「從寬認定」。而如李瑞騰，則是大開報導文學認定的大門，認為將報導文

²⁸ 李瑞騰於第 14 屆聯合報報導文學獎，張伯笠，〈逃亡鐵幕內〉之審查意見。前揭書，頁 343。

²⁹ 葉慶炳於第 14 屆聯合報報導文學獎，張伯笠，〈逃亡鐵幕內〉之審查意見。前揭書，頁 343。

學與散文捆綁的作法是過去特殊時空使然，因此當以開放的態度面對報導文學的轉型與嘗試，此一說法在今日以後設的眼光來看，可以說提前預告著報導文學鬆綁的契機。又或者如葉慶炳，在新的理論與認知還未能建立的同時，對過去的規範與界定較為堅持，焦慮於這些不同以往的作品還很難說究竟是一種「新的挑戰」還是根本「非我族類」。總之，從一篇得獎作品所延伸出來的爭議可以看出，整個 1990 年代對報導文學的最大癥結便是，主觀性跟客觀性、真實性（散文的）與虛構性（小說的）之間的界線與成份爭議，然而這卻是連掌握報導文學獎決定權的評審們亦莫衷一是的困難問題。

當金恆鏞在 1996 年第 19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的審查意見中表示：「今年進入決選的九篇，許多居然與報導文學根本沾不上邊，有小說與散文體裁、有非報導式的獨白、日記與遊記。」³⁰再次顯示評審對報導文學離開純粹的紀實散文後還能不能是報導文學，抱持著否定的態度。然而胡台麗於 1997 年第 20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的審查意見中卻說到「採用日記體雖不稀奇」³¹，呼應著李瑞騰此前對報導文學形式的鬆綁態度。而金恆鏞在 1999 年第 22 屆的時報報導文學獎中則一改過去的說法，認為即使報導文學的定義尚未凝聚出共識，但這種模糊的地帶似乎也提供更大的可能空間，³²由金恆鏞個人對報導文學認知的「逐步鬆綁」，顯示 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經過作品本身對主觀性、經驗性、部份虛構性等「小說化」的文學性實踐後，終於迎來評論界與文學界對報導文學的新認知與鬆綁。

回顧這一波新興的報導文學在這十年間對過去界線的挑戰，可以發現 1990 年代評審們時時感嘆的「題材落入窠臼」、「意識形態的重複」並不是這時期的報導文學作品所關注的重心，評審們往往只單純就報導文學的題材是否不夠新穎在做討論，但體裁的突破才是當時報導文學創作者更關心的瓶頸。而題材與意識型態的重複，誠如筆者在上一節所談，1990 年代的創作者們事實上在 1980 年代所開展的議題之外進行了更細緻的挖掘，以及對國際視野的擴大，且僅僅以主題認為 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作品不若 1980 年代的作品顯然是不夠公允的。回到

³⁰ 金恆鏞於第 19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林雲閣〈山鬼的震怒〉之審查意見。前揭書，頁 326。

³¹ 胡台麗於第 20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凌拂〈那一天我們要去米羅〉之審查意見。前揭書，頁 329。

³² 金恆鏞於第 22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陳姿羽〈聽他的歌，記他的名字〉之審查意見：「報導文學獎已邁入第二十二屆，但是報導文學的定義或涵蓋範圍尚未獲得文字創造者的共識。這使得這個獎在決審上遭到許多困難，例如評審所應包括的標準以及各標準的比重等都難以明確界定。這是否使得報導文學有某種程度的灰色地帶，因而有較大的空間供作家揮灑？這樣也使得我期待報導文學有更成熟的作品出現。」前揭書，頁 331。

關乎寫作形式的報導「文學」層面來看，隨著更多小說化傾向的作品在 1990 年代陸續得獎、出版，如〈Losin·Wadan——殖民、族群與個人〉、〈五八六——中國北方一個勞改隊的墳場〉、〈兩個人和一座學校〉等，帶有小說化傾向的報導文學作品終究通過了驗證，完成了新世代的報導文學創作者對過去台灣報導文學的挑戰與實踐。

三、主題與形式的雙重鬆綁之可能

從上述可知，虛構性的爭議實際上關係著報導文學是否「只能」用散文寫作，然而當報導文學長期被視為散文中的一支次文類，其發展性就不得不受到侷限。這當中更吊詭的是，早在 1980 年代便有許多論者提出報導文學與美國新新聞的關係，當中不乏以楚門柯波帝（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做為報導文學典範作品的說法，³³但《冷血》屬於根據真人真事寫成的「非虛構小說」（non-fiction novel），在形式上屬於小說，而非台灣報導文學一般慣用的散文形式，當台灣的評論家不斷以《冷血》做為報導文學的示範作品的同時，卻無法清楚的為報導文學的虛構性／小說性做出明確的劃分。從 1980 年代以降各散見或結集的報導文學論述，乃至 1990 年代兩大報的評審意見可以看出，論者與評審對報導文學不能是「小說」的概念非常堅持，對這些評論者而言，報導文學若有「小說」的跡象，就絕對的損害報導文學的真實性，而真實性是報導文學中絕對不可讓步的基礎原則。誠然，真實性確實是「報導」的必備要素，然而過份僵化的堅持卻將台灣報導文學的創作可能性侷限在過去的框架中。

筆者在此借用須文蔚於 2002 年在〈再現台灣田野的共同記憶〉³⁴中提出的「報導文學鬆綁論」，將這個概念的時間點挪回 1990 年代來審視，因為事實上報導文學所以會產生必須「鬆綁」的問題，乃是自 1980 年代報導文學發展進入巔峰為始，至 1990 年代的兩大報報導文學獎結構定型終於形成，從評審的審查意見可以看出，報導文學缺乏文學理論的困境，對於每年的報導文學評審造成長期的流弊，評審們與上一個十年並無二致，對於報導文學的理解以及判準極度依

³³ 如彭家發在〈細說新新聞與報導文學〉中提及，《冷血》（*In Cold Blood*）做為一本「非虛構小說」樹立了新新聞的規範，而美國傳媒中這股新新聞的浪潮波及台灣、香港，在台灣又結合鄉土文學論戰下的文壇風氣，形成台灣國內新的報導寫作路向，亦即報導文學。可參見彭家發，〈細說新新聞與報導文學〉，《新聞鏡週刊》第 263 期，1993 年 11 月，頁 32。

³⁴ 須文蔚，〈再現台灣田野的共同記憶〉，《報導文學讀本》，頁 6-52。

賴個人主觀的見解，因此在面對報導文學的評審時，在「寫實性」的掌握上容易流於表面的堅持，意即評審對於報導文學在「寫實」與「文學」之間的拿捏沒有辦法成功的釐清一套標準，結果造成報導文學被「寫實」所綁架，而相對壓縮到文學性的表現空間。對於報導文學卡在寫實與文學之間的難處，須文蔚的「鬆綁論」中論道：

報導文學應當不像純淨新聞寫作具有一定的形式，如果有必要，「新聞寫作」的常見框框還是可以打破的。當然事實就是事實，事實不是小說。但在手法上，把事實穿插連貫起來，展開情節，應為可行的敘事手法。為了讓讀者瞭解，縱令使用對話或一問一答方式，使文章帶上一點小說形態，本質上還是報導文學。換言之，非虛構式文學寫作方式，是報導文學的重要特質。³⁵

由須文蔚這番發言，再回頭審視 1990 年代兩大報的得獎作品，可以看出實際上已經有更多作品朝向這種「非虛構」的寫法在進行，也從過去台灣報導文學單純的散文寫作手法中在嘗試可能的新方向。從 1977 年柏楊《異域》³⁶的出版，到 1991 年藍博洲《幌馬車之歌》³⁷的問世，台灣報導文學的創作中不斷有作品在挑戰報導文學「虛構性」的極限，然而這兩本在台灣報導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作品，至今仍因虛構性的問題而處於報導文學的曖昧地帶，未能獲得完全的認可，但深究這當中的因素，究竟是這些作品本身「不是報導文學」、抑或是學界無法肯定「什麼是報導文學」？

筆者在此以同樣在 1990 年代出版的《幌馬車之歌》做為論述的借鏡，王文仁在針對《幌馬車之歌》的研究中指出，《幌馬車之歌》一方面運用了口述歷史的模式，但又省去了「問題」的列出使訪談的「對談」性質消失，並且使用小說技巧的調度、剪裁增加了作品的可讀性與流暢，使得作品呈現出小說的味道。然而考察藍博洲本身的創作意圖，強調是以歷史重建的目標進行真人真事的紀實寫

³⁵ 須文蔚，〈報導文學在台灣 1949-1994〉，《新聞學研究》第 51 集，頁 126。

³⁶ 《異域》原以「血戰異域十一年」為名於 1961 年連載於《自立晚報》，作者署名「鄧克保」，然實際上是由柏楊根據泰北孤軍的資料，拼湊、改寫、連綴而成。其後由平原出版社出版，更名「異域」（1961 年），仍以鄧克保為作者名，於台灣熱賣一時，流傳及銷售甚廣號稱超過百萬冊，1977 年由星光出版社再版，後另有躍昇文化公司版本。

³⁷ 〈幌馬車之歌〉最早是在 1988 年於《人間》第 35、36 期刊載，時報出版社於 1991 年出版為《幌馬車之歌》一書，於 2004 年又出版《幌馬車之歌》增訂版。

作，顯然在最初的創作概念上仍然是以報導文學出發的，即使《幌馬車之歌》符合一篇小說的特色，但它仍然可以是報導文學。³⁸因此，當觸及報導文學的虛構性爭議，應該更細緻的區分虛構性之中的「推論」與「想像」，報導文學所謂的「文學性」必須是表現在紀實前提下的「推論」，否則容易淪為單純的資料堆砌與枯燥的事實資料，然而這種「合於事實發展」的「推論」與「沒有事實根據」的「想像」應當被當成兩種不同的「虛構手法」看待，而報導文學卻應當是可以容許前者的存在而無害於真實性的。回到 1990 年代兩大報的得獎作品，可以發覺當中不少這類衝撞、挑戰評審對報導文學「虛構性」認知的作品，然而當作品已經誕生，評論者卻還糾結在「虛構性」的死結中無法走出，竟似乎讓人感到 1990 年代的台灣報導文學在創作上似乎是走在理論的前頭。隨著報導文學理論討論的熱潮過去，1990 年代的台灣學界對報導文學卻已然呈現低調的冷感，然而報導文學的創作仍隨著兩大報的文學獎而默默地持續耕耘、嘗試，寂靜的、消逝的似乎反是來不及跟上這波台灣報導文學的學術理論。

綜觀整個 1990 年代兩大報的報導文學得獎作品，可以發現在主題上並不如其多數論者、評審認為的落入窠臼、了無新意，在既有的議題上呈現細緻的分流與轉型，在新開拓的華人世界與對岸的中國議題上也都有所開發，可說在報導文學的題材上隨著社會上邁入後解嚴時代，並非僅是重複前人的題材，而能與新的時代、新的社會互動。因此，不斷重複的其實是報導文學的寫作模式，儘管新一代的創作者在形式上也嘗試突破上一個十年的老路，另一方面中國作家的加入戰局更加速衝撞台灣本就不穩固的報導文學「傳統」，然而最終沒有能夠同報導文學的題材那般形成一個「鬆綁」的氣勢，徒有「鬆綁」的可能事實卻沒有相稱的「鬆綁」風氣。筆者以為此現象一則關係到文學在 1990 年代的全面降溫，報導文學的創作者數量也隨之下降，因此儘管創作者中不乏有心挑戰報導文學寫作模式、試圖創造新的書寫形式者，也在整體社會與媒體對文學、對報導文學的冷感，以及有志者的人數以及影響力不足以形成風氣與勢力的情形下繼續沉潛。其二，在文學界內部則或許與報導文學獎的評審有關，當這些評審是學院體制內的學者，或是前一個世代的報導文學創作者，兩者對報導文學的認知所形成的差距，以及對過去報導文學觀念的過份堅持，透過評審意見一再的重複建構，進而推展到整個報導文學創作圈，顯然未能對報導文學的新風氣與寫作技巧的新嘗試產生鼓

³⁸ 王文仁，〈從〈幌馬車之歌〉看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創作——兼論台灣報導文學的幾個文類問題〉，《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 3 期，2005 年 6 月，頁 163-182。

勵，可見報導文學獎的評審結構對報導文學在 1990 年代的走向與困境有著關鍵的作用，因此筆者在下一節意欲透過對兩大報報導文學獎評審的組成進行分析。

第二節 報導文學獎的評審班底與作家世代

如前兩章所述，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的文學界亦有不少的報導文學獎，然而在 1990 年代《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大報的報導文學獎以前，這些此前的報導文學獎並未形成一個明顯的評審班底與作家世代。這是由於過去的文學獎缺乏強力媒體的奧援與曝光率，對社會大眾的影響力以及文學界典範的形成較低，然而當兩大報的市場爭奪戰從副刊延燒至文學獎，當文學獎開始承載為文學界挑選典範作品的責任，當文學獎成為文壇新進紛紛爭搶的榮譽桂冠，當文學獎藉著文壇權威的名聲成為絕對的權威象徵，這些前提之下，文學獎對班底與世代的聚集作用才開始發酵。評審透過副刊主編的人脈形成一批隱約固定的班底，而這批隱約固定的評審班底透過運作相近的審美意識篩選，得出一批與之近似的、重複的得獎者，近似的得獎者則藉由文學獎的光環與認同，反覆累積出該時代被認為是典範性的作品，這一連串的運作形成了一個時代的文學風尚。

在本節中，筆者觀察 1990 年代兩大報的報導文學獎評審名單，並與 1980 年代時報報導文學獎的評審名單做對照，試圖從兩個世代評審的對照與比較、分析中得出，報導文學獎評審的世代交替如何影響著報導文學新一代作家班底的誕生。誠如此前所論述，評審的審美價值與得獎判準，也將會建構著報導文學的寫作趨向，透過觀察評審委員的名單組成，以及評審班底近似的概念分析，可以理解文學獎的權力網路、風格與意識型態，進而為 1990 年代由文學獎所型塑的報導文學風貌找出運作的脈絡。

一、文學獎權力規則下的報導文學

兩大報的副刊爭霸延燒到文學獎場域，然而文學獎又是如何運作對文學的影響力？向陽對於文學獎之於文學的作用力歸納為：「書寫者文壇身份的取得，文學風潮和書寫典範的權力運作，建構、強化文學班底，形成文學社群倫理機制」

39可以說文學獎對文學界的影響表現在文學社會學的意義上，文學獎評審透過權力的運作建構文學典範，再經由典範給予新進作家以「身份」，這群被賦予身份的作家與運作權力的評審成為兩個班底社群，「文學社群鞏固某種意識型態、社群典範和文學班底及其倫理的工具，它的權力運作自然關係到文學社群或班底的鞏固或重整。」⁴⁰這整個運作過程甚至可將文學獎視為一種「權力遊戲」，焦桐對於兩大報文學獎的權力本質便曾經直言不諱的說道：

台灣這些文學獎的存在，尤其是影響力最廣泛深遠兩大報文學獎，具現為一種權力位階的生產，評審被世俗化為德高望重者，參賽者被世俗化為有待提攜的後進，只有獲獎者才能靠那聲譽升位階，甚至轉而擔任評審，獲獎者的名聲不是孤立的榮譽或金錢利益，它通過媒體的權力操作，取得某一種合法性的位階。這種尊卑關係在每一次的文學獎活動中重複生產出來。⁴¹

由上述焦桐的分析可以看出評審／參賽者之間的現實關係與權力結構，而獲獎者所得到的不僅是金錢，是文壇中的象徵資本，這種象徵資本的累積與隨後帶來的利益才是每個參賽者所競逐的。

過去以「文學守門人」姿態站在文壇金字塔端的副刊主編，隨著報紙增張、副刊影響力的式微，轉而另闢戰場、創辦文學獎。文學獎的評審圈實際上也是副刊主編人脈與文學品味的綜合結果，藉由「客觀的評審制度」此一光環，副刊主編將評審提昇至絕對的文學精英地位，將過去主編在文壇所擁有的話語權以及權力讓渡給文學獎的評審們。關於文學獎的運作中最容易被忽視的一點便是作者的隱藏，作者的匿名、隱藏與評審所擁有的絕對權力有極大的關聯性，在文學獎的評審過程中，不僅僅只是讀者的缺席、讓位，作者的匿名雖以「公正的評審」為理由，但實際上卻是更加神聖化評審執行權力的過程，評審做為唯一公開、露面的存在，與讀者、作者皆拉開距離，以公正無私的面具執行著文學獎封閉體制中的權力，做出不可質疑的判斷，林民昌便指稱這種運作是：「副刊透過強大傳播力支持下的『文學獎』機制，重新在報紙的總讀者中，收括了一群『意念讀者』，

39 向陽，〈海上的波浪 小論文學獎與文學發展的關聯〉，《文訊》第 218 期，頁 37。

40 同上註。

41 焦桐，〈文學獎〉，收錄於焦桐，《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1977~世紀末）》，台北：時報，1998 年，頁 241。

說服這群讀者們相信，『文學獎所選出的作品是比較優秀的』。⁴²在文學獎的過程中，評審透過報紙此一大眾傳媒的影響力，從而成為「所有讀者」的代表，再藉由副刊主編讓渡的「守門人」身份，為評審的文學品味做了毋庸置疑的保證，從而使這群評審們可以決定這些無名作者所寫出的無名作品中，哪些「值得」被觀看，被判定資格不符的作品則被代表著「全體讀者」及「文壇品味」雙重身份的文學獎評審否定其作品的「身份」，由此可知文學獎透過副刊、透過報紙對大眾所傳達的影響力是如何建構、如何操作。

向陽對於文學獎對文學典範的運作說到：「……文學獎也進一步有意或無意地產生建構或再現（representation）文學典範的權力施為，這是關涉文化霸權（hegemony）的爭奪。」⁴³由此可知，文學獎的運作不僅僅牽涉獎項花落誰家，而是經由獎項的象徵意義，達到爭奪文化詮釋的話語權。從評審的層面觀之，評審由多人組成，每個評審的文學品味及審美標準、作品意見必然有所分歧，評審會議實際上也是權力的場域，評審們在會議中爭奪發言權、彼此交相說服，評審的組成來自各個文學集團，各有其自身的知識體系與品味，意即評審的組成是各式文化資本的匯聚。文學獎上的決審會議有如各種「力的較量」場所，最終名次的出爐往往更多是堅持與妥協的相對結果。而從參賽者的角度而言，得獎者的作品排擠了未得獎者的位置，結果得獎者的作品有意無意之間影響著此後參賽者的寫作策略，這種影響可以被理解為權力的行使，而評審與得獎者之間的關係正是透過權力的給予而完成緊密的聯繫。

因此，文學獎之於評審，除了提供一個權力運作的機制使這些評審得以建構一套文學典範外，評審亦藉著文學獎給予的中心位置反覆彰顯自身在文壇權力結構中的核心位置，「授予者的身份」與「可授予的權力來源」同時鞏固著評審階層在文壇的精英性。⁴⁴評審在整個文學獎機制中扮演著絕對的文本詮釋者，然而一篇得獎作品從三位甚至更多的評審、不同的審美品味、文學眼光中脫穎而出，卻是一個妥協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而獲獎的作品時常並非各個評審心目中最優秀的作品，向陽直言：「能從不同的評審各自的網罟中通過者，不必然是最好的，卻必然是多數評審可以接受的。」⁴⁵最終能獲得大獎者往往不是最具有創新性、

⁴² 林民昌，《當代台灣小說文本的知識及其操作》，頁 90。

⁴³ 向陽，〈海上的波浪 小論文學獎與文學發展的關聯〉，《文訊》第 218 期，頁 38。

⁴⁴ 同上註，頁 39。

⁴⁵ 同上註，頁 40。

挑戰性的作品，相對地更可能是保守的、安全的作品，必須能夠得多數評審的認同，然而不需要是最受特定評審、特定眼光青睞的作品，在這種「得獎策略」之下，創作者需要考量的因素便顯得更加複雜，時代的寫作風向、寫作的策略等成爲作品以外更關鍵的「得獎條件」。

對報導文學而言，文學獎運作的痕跡、評審班底的影響力更加顯明，這是由於報導文學經過二十餘年的發展，儘管偶有賣座或引人大眾注意的作品，但整體而言仍然缺乏具有代表性意義、足以成爲典範的作品。這一方面是學術界對報導文學的論述傳統建立不及所導致，學術理論的缺乏導致無法標誌出代表性作品，而缺乏典範則又加倍導致報導文學的言人人殊、各自表述。表現在文學獎上，評審們主觀的自由心證與審美的偏好，更大程度地決定了報導文學獎項獎落誰家，呈現評審主導的絕對性，劉郁青在〈新聞？文學？濫情？——從〈華夏哀歌〉事件談報導文學的問題〉中便犀利的直指報導文學的評審問題：「報導文學的典範無法確立，首先在文學獎中引起的爭議是評審的口味差異甚大引發評選是否公正的問題，每個評審對『報導』和『文學』的比重和評選標準都十分分歧，所以在評審的決選會議中通常必須事先表述各自的標準，……。」⁴⁶其所導致的是，儘管文學獎已經舉辦多次，仍然無法歸結出一套公認的標準或是一篇典範性的作品，加以各年、各報評審的差異性，每年文學獎所評出的得獎作品缺乏一致性，年年各異的文學獎得獎作品造成報導文學混亂、難以一致的風格，更使得後繼的投稿者以及評審更加迷惘，文學獎塑造「典範」的意義在報導文學中顯得難以伸展。

另一方面，報導文學獎的評審名單相對其他文類有更加集中、易於重複的傾向，主要是從 1980 年代的知名報導文學家中挑選適宜人選擔任，偶爾搭配一位學院中的研究者或散文家、小說家。而由於報導文學創作圈的相對狹小，出任文學獎評審者重複機率頗高，造成報導文學類的評審在權力的行使以及文學品味的影響力上更加擴大，是一種少數的行內人之間的指導關係。評審們在 1980 年代的創作經驗也很大幅度的對他們觀看 1990 年代的作品產生先入爲主的作用，這群評審出於過去的經驗所建構的報導文學標準與 1990 年的作品間產生微妙的較勁關係，結果是評審不斷表示新時期的報導文學作品不如上一個十年、沒有進

⁴⁶ 劉郁青，〈新聞？文學？濫情？——從〈華夏哀歌〉事件談報導文學的問題〉，《傳學門電子報第 25 期》，2000 年 12 月 19 日，本文網址：<http://twmedia.org/scstw/?p=134>

步。而非「行內人」的學者或小說家、散文家等則更多的專注報導文學的文類定義問題，對於非報導文學創作起家的這些人而言，報導文學的難以定義使他們的評審更加困難，然而過份拘泥於文類、形式的文學性意義界定，似乎又顯得忽略了報導文學的批判與關懷本質。總之，當評審秉持文化資本，掌握知識權力去分類界定如何書寫的時，似乎使得文學獎成為操作文學知識權力的場域。

二、兩大報的評審班底與組成

楊素芬在論及報導文學獎時說道：

……不乏出現作品在聯合報報導文學獎甄選失利，而在時報報導文學獎拿下大獎的，也有從時報報導文學獎淘汰後跳槽到聯合報報導文學獎，這些現象可以從每一屆的決賽紀錄窺出端倪。甚至有同一題目的同篇作品，在前屆落選，卻在後屆扳回翻身，這種文學獎特有的奇特現象只能視作報導文學發展現象裡的一環，否則就失之偏頗了。⁴⁷

但筆者以為，這並非是報導文學獎「特有的奇特現象」，而可以放在文學獎這個獨特的權力運作場域中做出分析。同樣的作品在不同屆的文學獎、甚至不同報的文學獎有不同的結果，並非文學獎「本身」的變因過多，最主要的「變因」就是評審。文學獎的評審基於自身的美學標準，透過文學獎所賦予的絕對權力，對參賽作品做出不可動搖的結果判斷，這種由評審個人出發乃至獎項結果的過程中，一步步的擴大了評審個人的影響力及品味，反映在得獎結果上便呈現出難以解釋的差異，因為這些差異極可能不過是單一評審的品味差異，可見評審在文學獎的運作中之關鍵性。

據向陽的分析，在文學獎中擔任評審者可以大致分為四類：文壇大老、已受肯定的青壯代作家、文學社群的領袖及論述健將、從事文學研究的學院學者，⁴⁸以此觀看 1990 年代兩大報報導文學獎的評審名單，大抵若是，而從這四種分類，又可以觀察出兩大報的評審班底差異，從而為兩大報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的主題差異找出解釋的可能面相。由筆者在前述對文學獎的權力運作分析可知，文學獎

⁴⁷ 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頁 207。

⁴⁸ 向陽，〈海上的波浪 小論文學獎與文學發展的關聯〉，《文訊》第 218 期，頁 39。

對文壇風尚、作家世代形成的影響力，以及文學獎如何型塑個別文類的典範，其中的關鍵便在於透過評審所建立的美學品味，而評審的世代差異與班底差異皆能造成文學獎的各種可能變化。為了能夠清晰呈現出在報導文學獎中的評審世代交替現象，以下筆者將 1978 年到 1982 年間共 5 屆的時報報導文學獎評審列表如下：

表 4-1

1978 年~1982 年 時報報導文學獎 評審委員名單		
1978 年	第 1 屆	孟瑤、彭歌、胡菊人、張系國、陳奇祿
1979 年	第 2 屆	李亦園、殷允芃、黃春明、喬志高、趙滋蕃
1980 年	第 3 屆	朱西甯、沈君山、金耀基、徐佳士、叢甦
1981 年	第 4 屆	司馬中原、何欣、徐佳士、陳映真、漢寶德
1982 年	第 5 屆	唐文標、林懷民、張系國、黃肇珩、漢寶德
張系國、徐佳士、漢寶德各 2 次，其餘 1 次。		

將這份 1978 年到 1982 年的時報報導文學獎評審名單，對比陳銘礪於 1980 年所編選出版的《現實的探索》，書中所蒐羅篇章的作者不少與這份評審名單相合，如：何欣〈報導文學與文學創作〉、張系國〈歷史、現實及文學〉與〈落實的社會面〉、彭歌〈必須深入人性〉、陳奇祿〈報導文學的真象〉，另外亦收有李亦園〈千古傳承話絕藝——邱坤良的「民間戲曲散記」〉、唐文標〈我來，我見，我——古蒙仁的「黑色的部落」〉、胡菊人〈我看台灣的「新生代」——陳銘礪的「賣血人」〉。從對報導文學的總論與文體特色，乃至作品的討論，乍看之下所論及的範圍極廣，但大體上仍不免流於個人經驗式的論述與理解，也不乏文學獎審查意見的直接轉載或擴寫，《現實的探索》做為 1980 年代以前報導文學討論篇章的總集合，曾擔任時報報導文學評審的作家與學者便共計有 7 人出現在書中，一方面提昇這些評審擔任報導文學項目審查的正當性，另一方面也顯示報導文學在 1980 年代初期仍缺乏專業研究的窘境。

觀察時報報導文學獎從 1978 年到 1982 年這 5 屆的評審名單，可以察覺在這份評審名單中較缺乏報導文學的專業性，在這些評審中從事報導文學寫作的工作者為數偏少，在 5 屆共 22 位的評審中，僅有在 1981 年擔任過一次評審的陳

映真以報導文學工作者的身份知名。但必須指出的是，此時距離陳映真在 1985 年創辦《人間》雜誌也仍有一段時間上的落差，可以說陳映真在此時被邀請擔任報導文學獎的評審，並非出於陳映真對報導文學的專業，更多考量的是其文壇知名作家的身份。以審查次數來看，擔任過 2 次評審者有張系國、徐佳士、漢寶德共 3 人，其中僅徐佳士具備傳播學者身份，與報導文學較有相關性，另外兩人中的張系國以小說聞名、漢寶德身為建築學者以建築相關散文著稱，與報導文學的關聯性並不大，這顯示即使是擔任過 2 次評審的評審委員，也並不全然具備報導文學的專業性。再者，擔任過 1 次報導文學評審者共 19 人，這種「一次性」的評審在總共 5 屆的報導文學獎評審中佔多數，與 1990 年後兩大報的決審委員名單對比，唯一重疊者為林懷民，其餘評審委員在進入 1990 年代後皆不再參與報導文學的評審工作，這種顯見的斷層似乎也再次凸顯出這五屆的徵選中評審委員對於報導文學專業性的缺乏，在 1990 年代已有一批專業的報導文學作家世代後，便輕易的被取代。

從時報報導文學獎初期 5 屆徵選的名單中，可以看出報導文學在 1980 年代甫出現在文學獎中的尷尬。報導文學進入文學獎的徵選，顯然是高信疆的有意為之，與其說是徵選「優秀」的作品，更多的是希望藉由文學獎提昇報導文學寫作的風氣，但既然在專門的報導文學作品仍沒有足夠累積的情形下，報導文學的專業工作者也尚未形成一股勢力，在這種情形下要聘請在報導文學類的評審其實相當困難，因此從其他文類的知名作家中尋找適合人選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種評審的結構是否也因此導致上一個十年報導文學偏向「論文化」、「學術化」的主因，則相當值得思考。

當進入 1990 年代後，兩大報的報導文學獎評審班底又出現何種變化？筆者以下將兩大報的評審名單分開列出做討論，藉此說明兩大報的評審班底有何種結構上的差異，進而造成得獎作品的差異。

表 4-2

1991 年~2000 年 時報報導文學獎 評審委員名單		
1991 年	第 13 屆	柏楊、南方朔、高信疆、董橋、蔡源煌
1992 年	第 14 屆	姚一葦、林懷民、舒國治、遼耀東
1993 年	第 15 屆	柏楊、楊憲宏、劉克襄
1994 年	第 16 屆	平路、馬以工、金恆鏞

1995 年	第 17 屆	亮軒、劉大任、張大春
1996 年	第 18 屆	馬以工、金恆鑣、南方朔
1997 年	第 19 屆	金恆鑣、古蒙仁、胡台麗
1998 年	第 20 屆	馬以工、張大春、舒國治
1999 年	第 21 屆	金恆鑣、胡台麗、南方朔
2000 年	第 22 屆	馬以工、東年、郭力昕
<p>4 次：馬以工、金恆鑣</p> <p>3 次：南方朔</p> <p>2 次：柏楊、張大春、舒國治、胡台麗</p> <p>1 次：高信疆、董橋、蔡源煌、姚一葦、林懷民、遼耀東、楊憲宏、劉克襄、平路、亮軒、劉大任、古蒙仁、東年、郭力昕，共 14 人</p>		

表 4-3

1990 年～1999 年 聯合報報導文學獎 評審委員名單		
1990 年	第 12 屆	林文月、高信疆、張錯
1991 年	第 13 屆	馬森、簡嬪、黃碧端
1992 年	第 14 屆	痲弦、李瑞騰、葉慶炳
1993 年	第 15 屆	林文月、張作錦、李利國
1994 年	第 16 屆	王力行、翁台生、李瑞騰、南方朔
1995 年	第 17 屆	黃碧端、曾永義、柯慶明
1996 年	第 18 屆	李瑞騰、黃年、胡台麗
1997 年	第 19 屆	林明德、王浩威、邱坤良、黃碧端、蔡詩萍
1998 年	第 20 屆	黃啓方、古蒙仁、龔鵬程
1999 年	第 21 屆	林瑞明、李敏勇、焦桐、林明德
<p>3 次：黃碧端（學者）、李瑞騰（學者）</p> <p>2 次：林文月（學者）、林明德</p> <p>1 次：高信疆、張錯、馬森（學者）、簡嬪、痲弦、葉慶炳、張作錦、李利國、王力行、翁台生、南方朔、曾永義、柯慶明（學者）、黃年、胡台麗、王浩威、邱坤良、蔡詩萍、黃啓方、古蒙仁、龔鵬程、林瑞明、李敏勇、焦桐，共 24 人</p>		

首先自評審的人數上而言，相較於 1991 年後再度復興的報導文學獎，在

1978 年到 1982 年間的評審人數較多，在 1982 年以前由 5 人組成的評審委員，在 1991 年後每屆改為決審評審 3 人，同樣的人數編制也發生在聯合報報導文學獎。筆者以為這或許也透露出在 1990 年代以前，由於報導文學仍屬於較新興的文類，以報導文學寫作而知名的專業作者也相對稀少，不得不以其他專家學者做為選擇，因此必須參酌較多評審的意見。二來在 1990 年後，兩大報的文學獎流程較創辦初期複雜，已經有明確的初審、複審、決審三階段，由於在審查的三個階段皆會消耗掉部份評審人選，加以重重篩選後能進入決審的稿件為數不多，因此到決審階段僅有 3 人擔任評審。此外，1990 年代兩大報文學獎的徵選項目較 1980 年代為多，如聯合報文學獎原本僅徵選小說類，但隨著文學獎的擴編而增加了新詩、散文、報導文學等，在獎項名目增加的情形下，評審名單必然有所分散、專精。

在 1991 年到 2000 年共 10 屆的時報報導文學獎中，評審委員名單出現了有異於 1980 年代評審群結構的另一種傾向。觀察名單人選可以發現，相較於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在評審名單上較常出現重複，擔任過 4 次評審的有馬以工、金恆鏞共 2 人；擔任過 3 次評審者有南方朔 1 人；擔任過 2 次評審者則有柏楊、張大春、舒國治、胡台麗共 4 人，顯然在評審的名單上明顯出現集中的傾向。就評審的背景觀之，大多數評審都是具有報導文學寫作經驗的知名作家，在報導文學的專業性上比起 1982 年以前出現明顯的提昇，此外搭配的一些文學評論家，大多也都是針對報導文學有過研究、探討之人。但值得指出的是，自第 18 屆開始，在評審委員上出現較明顯的密集重複，馬以工與金恆鏞在 1996 年至 2001 年之間各有 3 次擔任決審委員，這種評審在短時間內的「重複再利用」，對於獎項本身而言似乎更容易陷入得獎作品風格類型的一致化，加以評審對同類型作品的審美疲乏，時報報導文學獎在第 21 屆的全數從缺或許與此不無相關。

整體而言，時報文學獎評審的組成以作家為主。這種作家為評審主力的結構反映在時報報導文學獎的評審標準上，有幾個比較突出的特色，從審查意見中可以看出，這批評審更關心的是報導文學如何突破過去的窠臼與模糊性，因此不斷在意見中反覆論及報導文學的僵化跟困境，對於報導文學之後的發展充滿悲觀與危機意識，但也正因為評審多為上一個十年成名的報導文學作家，對於 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作品時時有「今不如昔」的結論，似乎無法客觀的看待 1990 年代報導文學的特色與新的開創。在題材上，由於這批作家過去的主題與台灣的密切

結合，因此可能出現較為認同台灣本土議題的作品之傾向，。

聯合報文學獎在評審委員的名單上，重疊次數較少，擔任過 3 次的評審有黃碧端、李瑞騰 2 人，擔任過 2 次的也僅有林文月、林明德 2 人，顯示聯合報文學獎評審的集中性相對較低，客觀性較高。而從評審的背景觀察，聯合報文學獎的評審比較偏向學院中的文學理論家，作家比例不若時報文學獎為高。且由於評審的重複性低，擔任過評審者也相較時報報導文學獎為多，以人選上而言較為多元，然而仔細觀察這些評審名單，發現其中以報導文學知名者並不多，且幾位知名報導文學家也僅擔任過 1 次評審，評審名單中除了學院中的權威學者外，為作家身份者則多為以散文知名者。這種以散文家代替報導文學作家的評審現象，對報導文學獎的評審專業度而言不免打折，但也因此，聯合報的名單中並沒有出現明顯的名單重複時期，不若時報報導文學獎集中於幾位報導文學家擔任評審的現象。

整體觀之，聯合報報導文學獎的評審中由於學者較多、作家較少，在對作品的偏好傾向上，偏向更有國際觀、學術感的作品，對於台灣本土性議題較無偏好，因此中國作家在聯合報的多次獲獎，在報社本身的立場之外，也與評審的組成不無相關。而從文類形式來看，評審的看法也較為鬆綁，筆者以為或許正因報導文學家在聯合報報導文學獎評審中的比例較低，對於過去所熟悉的報導文學形式較不堅持，學院出身的學者基於對文藝美學的要求，無論各種文學技藝、寫作形式的嘗試都能包容，小說性、自傳性、學術論文性等報導文學作品因此皆能榜上有名。

若再進一步比較兩大報在這十年間的評審名單，交互參照之下，在兩大報文學獎皆擔任過報導文學類評審者有：高信疆、南方朔、胡台麗、古蒙仁共 4 人，筆者將各評審於兩大報各自擔任評審的時間表列如下：

表 4-4

1990 年代 時報文學獎與聯合報文學獎 報導文學類評審重疊清單							
高信疆		南方朔		胡台麗		古蒙仁	
中時	聯合	中時	聯合	中時	聯合	中時	聯合
1991	1990	1991	1994	1997	1996	1997	1998
		1996		1999			

		1999					
--	--	------	--	--	--	--	--

從上述對兩大報報導文學獎的評審分析可以看出，除了 4 位評審之外，兩大報在報導文學項目上的評審幾乎沒有重疊。而這 4 位的重疊中，高信疆以個人對報導文學的貢獻在兩大報再度對報導文學設獎的第 1 年便先後擔任評審；南方朔主要在時報文學獎擔任評審，唯有 1 次在聯合報文學獎評審；胡台麗也 2 度在時報文學獎擔任評審，聯合報文學獎僅有 1 次；古蒙仁也是連續兩年先後各在兩大報文學獎擔任 1 次評審。從這種現象中可以看出，即使在重疊的評審委員上，兩大報也並沒有顯示出比較頻繁的接觸，僅僅重複 1 次，顯示兩大報對於報導文學得獎作品的要求必然也由於評審委員的差異性，呈現不同的取向，這種兩方在評審上的低重疊性，一方面顯示出兩大報各自擁有的「班底」不同，二來也依稀呈現出兩大報對報導文學要求的差異性，可見 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處在兩大報的夾縫中，在灰色的尷尬地帶中求取創作上的新可能與新發展。

三、文學獎中形成的班底與世代雙面向

在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對文學社會學的論述中，「世代」的概念意指接受共同的訊息、累積共同的歷史經驗，在共同的社會背景下擁有屬於他們獨特的寫作技藝，在創作上引領時代風潮；「班底」的概念意指垂直時間的歷程中，分享相同文學意見與立場、排斥外來不同意見的文學集團。筆者在從文學獎來討論報導文學時，挪用「世代」與「班底」兩個名詞做為切入點，試圖對報導文學獎機制中的「評審」與「作者」延伸出兩種不同的討論面相，但並非取用埃斯卡皮概念中的詞意指涉，而主要藉由「班底」（Team）來指稱一群處於相對固定的組織中之成員，以「世代」（generation）來指稱 1990 年代這一批有別於 1980 年代與 2000 年代的群體。因此，筆者在此對「世代」一詞的使用是從歷時性的角度出發，以此區隔 1990 年代的評審與作家有別於上下十年的特性，做出時間脈絡上的劃分；而「班底」一詞的使用則是基於共時性的角度，以此指出 1990 年代的兩大報報導文學獎中，無論評審或得獎者都有顯著的人選集中傾向，透過集中性的突出以及人選的重複，隱約成為固定的一個集團。

承上而論，以「評審班底」與「作家世代」來做論述，是著眼於兩大報文學

獎在評審名單上的特定傾向，誠如筆者在第二節所討論，兩大報由於副刊主編的文壇人脈、文學品味以及報紙本身的立場等諸多因素，在文學獎的評審人選上出現明顯的差異性，形成該報特有的「評審班底」，從而型塑出該報文學獎獨特的、隱約成型的審美標準。然而必須注意的是，筆者以「班底」指稱這種評審聚集與重複的現象，並不意味著這些評審的個體之間有著絕對相同的文學觀與文學品味，但在整個文學圈而言，這群「評審班底」擁有「相對」較為接近的人際往來圈，因此兩大報的評審名單可以看出一定的排他性與差異性。而對比 1980 年代經由雜誌報紙等媒體的傳播而成名的報導文學作家們，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創作者更多的依賴兩大報文學獎達到曝光以及成名的效果，加以在作品內容以及形式上的創新與不同，與上一個十年的作家產生世代間的落差，因此筆者以「作家世代」來指稱 1990 年代作家有別於 1980 年代作家的現象，透過兩大報文學獎的反覆得獎進而成名的報導文學作家們，形成著一個「文學獎世代」。

而若以「評審世代」與「作家班底」論，報導文學在 1980 年代的評審群與 1990 年代的評審群出現明顯的結構差異，這種組成的差異形成兩個十年報導文學型塑的不同，尤其 1990 年代的評審中不乏 1980 年代知名的報導文學作家、評論家，在相同的時空歷史背景下、在相對人數較少的報導文學圈從事創作，且大多在報章雜誌等平面媒體工作，確實形成一個明顯的「世代共性」。在作家班底上，由於報導文學創作圈的相對狹小以及 1990 年代兩大報文學獎的關鍵性，「得獎班底」進而也是整個報導文學創作圈的「作家班底」，1990 年代的兩大報報導文學獎由 1980 年代的作家群出任評審，審美品味藉由文學獎的機制得以過濾這個本就為數不甚多的創作圈，最後汰選出的得獎者必然與這批評審有一定的品味契合度，這種現象在創作人數較少的報導文學圈顯得更加明顯，最終篩選出來的得獎者卻也如同評審的組成一般有著較高的重複性。

綜上所述，1990 年代特有的重複而隱隱形成的評審世代／評審班底，透過他們的權力運作也形成一批相對更為鮮明的作家班底，由於報導文學的寫作圈相較新詩、散文、小說三大文類的寫作圈狹小許多，從每年參加兩大報報導文學項目的稿件數量便可得到印證，⁴⁹因此在這些為數不甚多的創作者中，透過同一批評審的篩選，最終能得獎的就不免也是同一批老面孔，這種現象在 1980 年代尚

⁴⁹ 兩大報的報導文學徵選來稿數量大約皆在 60~40 篇左右，與三大文類來稿數量動輒數百件、甚至近千件的數量落差極大，可參閱張俐璇在其碩士論文《兩大報文學獎與台灣文壇生態之形構》中所做的數量統計。

未如此鮮明，由於 1980 年代僅有時報文學獎徵選報導文學且僅持續 5 屆，但在 1990 年代由於兩大報皆有報導文學徵選、且徵選延續十年，這種「班底」、「世代」的現象也就格外清晰，這些得獎兩次（含）以上的常客有瓦歷斯·諾幹、林雲閣、凌拂、楊樹清、劉還月、劉克襄、張典婉、李曉菁，其中楊樹清更是橫跨兩大報並共有 4 次得獎紀錄，筆者將得獎者清單表列如下：

表 4-5

1991 年~2000 年 兩大報報導文學獎 得獎者清單			
獎別	得獎者	獲獎次數	獲獎年份/屆數
時報報導文學獎	瓦歷斯·諾幹	2 次	1993 年（第 16 屆）、1994 年（第 17 屆）
	林雲閣	2 次	1995 年（第 18 屆）、1996 年（第 19 屆）
	凌拂	2 次	1995 年（第 18 屆）、1997 年（第 20 屆）
	楊樹清	1 次	1996 年（第 19 屆）與張煥宇、曾吉賢共同獲獎，因楊樹清在聯合報報導文學獎有多次獲獎紀錄，故在此特意單獨列出。
	獲獎 1 次：胡平、李昂、楊南郡、鄭禮忠、張煥宇、曾吉賢、王誠之、陳姿羽、楊艾俐、葉怡君，不含楊樹清、共 10 人		
聯合報報導文學獎	劉還月	3 次	1990 年（第 12 屆）、1992 年（第 14 屆） 1994 年（第 16 屆）
	劉克襄	2 次	1994 年（第 16 屆）、1995 年（第 17 屆）
	張典婉	2 次	1995 年（第 17 屆）、1996 年（第 18 屆）
	楊樹清	2 次	1997 年（第 19 屆）、1998 年（第 20 屆）
	李曉菁	2 次	1998 年（第 20 屆）、1999 年（第 21 屆）
	獲獎 1 次：吳弘達、展奮、張伯笠、黃文博、陳金生、顧肇森、周愚、覃瑞、王雲龍、喜樂、李靜修、王蜀桂、馮傑、丁曙、林福岳、包念澄、李展平，共 17 人		

在這些得獎次數在 1 次以上的常勝軍中，不少人有專攻的寫作議題，如林雲閣的〈八十萬年奇蹟身世換不來一世尊榮——台灣鮭魚族群的命運〉、〈誰傷了撒

拉茅的心？〉分別得到時報報導文學獎與聯合報報導文學獎，但在題材內容上都是以台灣鮭魚為報導觀察對象；又如劉還月的〈重重後山尋平埔〉、〈尋訪噶瑪蘭〉、〈回不去的山後鳥〉連續獲得兩大報報導文學獎，但在題材上皆是以平埔族的歷史追尋為報導對象；⁵⁰凌拂的〈兒童教育與人文思考——荒遠深山教學手記〉、〈那一天我們要去米羅〉也是皆以親身的教育經驗做為寫作主題。這一方面由於報導文學要求作者對於寫作主題要有較高度的掌握與較長的觀察時間，加以受限於報導文學的徵獎字數限制使得作者有時不得不將材料分為兩篇，且報導文學對專業度的要求也使得作者不一定能時時轉移報導對象，隨著評審、作家雙重班底的形成導致某些議題的常見，這似乎也是解答 1990 年代「題材枯竭」的一個可能性。

總結上述所論，筆者在這一節中嘗試從文學獎的權力運作過程、報導文學獎中評審與作家各自的「世代」、「班底」雙重面相，試圖釐清 1990 年代報導文學在兩大報文學獎下更多的意義與真相，在單純的評審名單、得獎名單之外透露著報導文學在此十年間何種幽微的發展脈絡與權力糾葛。1990 年代的評審與創作者，各自與此前的上一代形成不同的特色、標準與發展，而二者亦在 1990 年代同時間的平面上各自象徵著 1980 年代報導文學與 1990 年代新時期報導文學，藉由文學獎的機制上演著微妙的拉鋸頡抗，隨著兩大報的報導文學獎行將落幕，報導文學似乎也完成一次鮮明的世代交替。

第三節 報導文學的式微危機／轉型契機

當 1990 年聯合報文學獎設立報導文學獎項，而 1991 年時報文學獎的隨之跟進，一時間報導文學彷彿迎來一個新的轉機，在《人間》停刊之後苦無發表空間的報導文學再次獲得文學獎的青睞，在 1990 年代甫開始的當時似乎有了再創 1980 年代風光的可能性。然而隨著 1998 年第 21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的全數開缺，報導文學卻又像是走到了最大的危機關卡，一系列〈報導文學死了嗎？〉、〈「有怪獸！」——看報導文學的式微〉、「驟然消失的雷聲」等標題驚人的文章紛紛出現，報導文學竟似走到生命的尾聲。然而這種隱約有著矛盾性的現象是在什麼背景下產生，報導文學一方面受到兩大報媒體的青睞、與三大文類一齊站上文學獎

⁵⁰ 在兩大報文學獎外，劉還月在中央日報報導文學獎的得獎作品〈平埔族何處尋舊社〉，也是其平埔族研究的系列作品之一。

的競技場，理論上透過這番加持應該能有所推廣與成長，但另一方面為何評審卻又不斷在評審意見中透露出對報導文學存續的焦慮、對新生代作家與作品的不甚滿意，乃至決定全數從缺？究竟透過兩大報在這十年刻意的扶植與養育，報導文學在 1990 年代是走到轉機還是危機？是式微還是沉潛，又或是轉型、再生？這種矛盾的現象以及文學獎和評審之間的兩極反應，又透露著對報導文學何種的觀察、期待或焦慮？筆者在本章企圖透過歸納、分析兩大報報導文學獎的決審評審意見，為 1990 年代這十年間報導文學的整體走向做出一個可能的總結：是式微的危機還是轉型的契機？

一、報導文學的困境與式微

經過 1990 年到 1999 年的聯合報報導文學獎與時報報導文學獎，從表面上看來報導文學似乎一時間又回到文學的中央舞台，迎來二度的風潮。但首先是 1998 年第 21 屆的時報報導文學獎開出全數從缺的結果，引起文壇一片嘩然，事實上早在第 15 屆聯合報報導文學獎時，李利國便曾提議該年報導文學獎項全數從缺：「他認為此次晉入決選的幾篇作品並不能反映『報導文學』這個寫作類型的本質，也沒有一篇可以當作範本。因此，他主張一律不給獎，以對報導文學這個獎項發生刺激作用。」⁵¹可見在 2000 年第 22 屆聯合報文學獎宣佈停止徵選報導文學之前，報導文學在徵獎的十年間不時出現質疑的聲浪，在這十年間報導文學從復活再次走向衰敗，當中所透漏的困境與式微的真相為何，令人疑惑。筆者以下節錄在此十年間兩大報報導文學獎的決審相關意見如下，透過評審對報導文學的憂慮，探究報導文學式微的癥結或爭議何在：

劉大任：做為報導文學的作者，提供「真知識」才是本位，「社會抗議」與「政治主張」固有一時譁眾取寵之效，卻往往削弱而非增強說服力，這個陷阱，尤其在當前的台灣，不可不慎！⁵²

古蒙仁：台灣近幾年的報導文學作品，一直陷在題材的因襲和衰竭的困境之中，

⁵¹ 楊錦郁紀錄，〈給現實社會下猛藥——報導文學獎決審會議記錄〉，收錄於痲弦編，《小說潮——聯合報第 15 屆小說獎暨附設報導文學獎、新詩獎作品集》，台北：聯經，1993 年，頁 444-445。

⁵² 劉大任於第 18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林雲閣〈八十萬年奇蹟身世換不來一世尊榮〉之審查意見。張明珠，《〈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研究（1978~2000）》，頁 324。

無法展現開闊的視野和格局，因此整體的水準也難以提昇。……。⁵³

馬以工：不僅是時報的報導文學獎從缺，另一些報導文學獎，亦幾乎是從缺的情況下勉強頒發。由作品的品質來看，有些水準甚而低於時報的落選作品，由作者來看，參與的幾乎是相同的。……而今天並不是因為評審的挑剔，而是報導文學似乎是式微了。⁵⁴

南方朔：如同小說的寫作必須講究題材的創新，報導文學則應注重關懷面相的拓展。蓋只有如此，始能免於讓報導文學在定型化之後，無法與時俱進。近年來，台灣的報導文學已有固定為幾種類型的疲態，原創的騷動性漸漸失去，如何更貼切現實的去開展新的關懷範圍，創造新的問題意識，顯然日益迫切。⁵⁵

在上述審查意見之外，焦桐在擔任第 22 屆聯合報報導文學獎評審時也曾表示，決審的作品也大都「缺乏文采」，同屆的評審李敏勇也表示同意，認為這些作品「沒有比較感動人的文學風格」。⁵⁶綜合上述審查委員的意見，可以歸納出幾個報導文學的危機重點，首先最重要且最常被提及的便是題材的衰竭跟重複，第二是報導文學承載過多的社會功能性、作者的意識形態痕跡明顯而有炒作嫌疑，第三是缺乏深刻感人的文字能力、淪於表面的報導介紹，最後便是創作圈的狹窄、參賽者與得獎者沒有新面孔。

古蒙仁與南方朔等評審反覆表示報導文學在題材與內容上的重複，舒國治在 1998 年的審查意見中亦直言批評報導文學的「動不動便是空泛弱勢、關心智障、勘查災區，以及一知半解的假考古」⁵⁷，認為報導文學創作者顯然對於生活周遭的興趣太低，導致選材重複。評審紛紛表示報導文學長此以往難以開展出更大的格局，憂慮報導文學在主題上的缺乏新意將導致報導文學難以繼續延續生命力與創造力。但誠如筆者在本章第一、二節所論，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

⁵³ 古蒙仁於第 20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王誠之〈迷濛的松雀鷹之眼〉之審查意見。前揭書，頁 327。

⁵⁴ 馬以工於〈「有怪獸！」——看報導文學式微〉，《中國時報》第 37 版，1998 年 12 月 23 日。

⁵⁵ 南方朔於第 22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楊樹清〈消失的衛星孩子〉之審查意見。張明珠，《〈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研究（1978-2000）》，頁 332。

⁵⁶ 焦桐、李敏勇於第 21 屆聯合報報導文學獎，李展平〈尋訪暗角癆病〉之審查意見。前揭書，頁 359。

⁵⁷ 舒國治，第 21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審查意見〈作者要帶我們去哪裡〉，《中國時報》第 37 版，1998 年 12 月 23 日。

在主題內容上實際上做出很多細節的開發與精緻化的深入，面對國際議題也能有所表現，對於題材老調重彈的擔憂，更多的是報導文學在寫作手法上的僵化與固定所導致，一貫的寫作模式使評審較難發現表層下企圖展現的新意。然而以文學獎的得獎作品觀之，最終能獲獎者大多也都是在題材上能有新意或延伸的作品，若再加以考量決審之外眾多未能通過初審的作品，報導文學的題材是否真如評審以為的缺乏原創性、新的關懷，顯然未能完全定論。反面而言，筆者並非主張 1990 年代的作品充滿創新，但從題材上來說，此時期的作品絕對不若評審意見所反映的那般普遍因襲、老套，誠然有所新意跟深入的報導文學作品在 1990 年代並不一定是多數，然而僅以此斷定 1990 年代報導文學已然陷入僵局或是失去活力未免過於武斷。另外也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發表這些審查意見的評審皆是決審委員，未能通過初審的「遺珠」並不在這批評審的討論之列，這些被抹去存在的報導文學作品呈現的又是何種面目，決審委員無法得知，因此決審作品的陳陳相因也極可能是初審委員篩選後的結果。

在社會功能性與意識形態的問題上，正與上一個十年以報導文學為號召的《人間》形成一種對應，這是報導文學從 1980 年代對社會運動的實踐開始造成的流弊，在前人榜樣如《人間》的影響下，新一代的報導文學創作者難免將對政治與社會的參與，視為報導文學的必要性質，藉由與現實的呼應達成報導文學的社會關懷意義。然而正如《人間》晚期這類型風格的爭議性，這種作法過多的將報導文學視為工具，沾染過多作者本身的意識形態色彩，而僅僅將報導文學做為表現自身立場與意識形態的媒介，已然讓評審感到不耐，1998 年的時報報導文學獎在馬以工、舒國治、張大春三位決審評審的決議下全數從缺，當時決審委員之一的張大春對此結果說明道：

遺憾的是，在一個幾乎人人自覺「作品是可以某種意識型態抗爭之中的深度工具」的文化氛圍中，報導文學再度披掛起那個人道關懷的金鐘罩，重拾其對古蹟、窮鄉、弱勢、災變、被遺忘的風土、被蹂躪的環境、被壓抑的族群……的反覆搜尋。……除卻「政治正確性」綱領之外，別無關懷、除卻「本土化民粹熱情之外、別無人道的文學縮減。⁵⁸

⁵⁸ 張大春，第 21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審查意見〈尋找發現的刻度——對報導文學獎從缺的說明〉，《中國時報》第 37 版，1998 年 12 月 23 日。

張大春的發言再一次表示對於報導文學披掛「人性關懷」與「政治性訴求」外衣的反對與厭倦，對於報導文學朝向「概念先行」的質變危機提出警訊。因此在 1990 年代對報導文學的客觀性訴求又再次提昇，評審們不斷反覆重申，立場的預設並非帶來更高的文學理想性，反而容易陷入濫情與武斷、片面的危險，評審們所要求的是讓報導文學回歸純粹的文學，試著將報導文學所肩負的「社會良知」招牌拿下，藉此換取報導文學在純文學空間更多的生機。

與張大春一同在 1998 年做出全數從缺決議的馬以工，在評審意見中悲觀的認為報導文學確實已經走向式微，隨著時代的邁進，報導文學的功能已經被更具聲光效果的電視媒體所取代，加以網路跟漫畫等的流行興起，報導文學缺乏存在的空間，也難以產生如 1980 年代那樣盛極一時的作家世代。⁵⁹須文蔚寫於 1994 年的〈報導文學在台灣 1949-1994〉處在這個十年的中央，此文的出現暗示著報導文學令人憂心忡忡，文中列舉出報導文學在目的性上的爭議以及方法論的欠缺，並以四點原因歸結報導文學式微的因素：一、文學理論的變遷，後現代主義美學的出現與現代主義、寫實主義同時形成對立。二、媒體環境變遷，經濟奧援不再。三、創作艱辛、後繼乏人，報導文學的創作需要長時間的田野調查與訪談的累積，對於 1980 年代後追求輕薄短小的文學市場而言，花費的力氣顯然不符合「成本」。四、理論論述不足，學院中對於報導文學的研究以及課程設置依然為數極少，形成報導文學處於新聞學、文學之間的模糊地帶，反成棄嬰。須文蔚的結論與馬以工的看法頗多呼應之處，行至 1998 年這個十年的尾聲，報導文學在論者與作者的眼中，竟然都已是危機四伏的緊要關頭。

二、報導文學的轉型與重生

在 1998 年時報報導文學獎的全數從缺中，該屆的評審馬以工認為 1990 年代報導文學作品不如 1980 年代報導文學作家的作品，提出今不如昔的感嘆。此時重新審視 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作品，儘管由於發表空間的銳減，在數量上以及品質上的總體而言或許不如 1980 年代，然而就主題的再挖掘與新開拓，以及報導文學寫作技巧、手法的新挑戰上，1990 年代的台灣報導文學其實正經歷著自覺的轉型。筆者以下摘錄兩大報報導文學獎部份審查意見，以為 1990 年代的

⁵⁹ 馬以工，〈「有怪獸！」——看報導文學式微〉，《中國時報》第 37 版，1998 年 12 月 23 日。

報導文學並非「驟然消逝的雷聲」做出闡釋：

翁台生：台灣報導文學從早期的本土關懷，發展到現在國際視野的開拓，**不只是活絡題材，也是人道關懷的提昇**，「失去地址的人」也可以是本地報導文學的延伸，說得上是**台灣報導文學的另一種起步**。⁶⁰

南方朔：自從 1970 年代西方的報導文學被引入之後，由於台灣獨特的歷史情境，原本以社會問題意識做為主軸的報導文學，遂被轉化為以鄉土和生態環境為主要的方向，它成了人們滿足鄉土情懷的中介，也是重建認同的情感橋樑。⁶¹

金恆鑣：報導文學獎已邁入第二十二屆，但是報導文學的定義或涵蓋範圍尚未獲得文字創造者的共識。這使得這個獎在決審上遭到許多困難，例如評審所應包括的標準以及各標準的比重等都難以明確界定。這是否使得報導文學有某種程度的灰色地帶，因而有較大的空間供作家揮灑？這樣也使得我期待報導文學有更成熟的作品出現。⁶²

從上述三位評審的審查意見中，可以看出對 1990 年代報導文學的另一種分析，亦即 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有著不同於 1980 年代的新可能，也誠如筆者在前幾節所分析，一來在主題上有所開發及深入，二來在寫作形式上能做出新的嘗試，隨著 1990 年代評審在心態上的逐漸鬆綁，面對新時期的報導文學有著新的觀看角度，解開對過去報導文學形式及議題、社會關懷、人性價值等的束縛，評審們也逐漸發現 1990 年代報導文學所展現的新價值與轉型的樣貌。

在題材上，古蒙仁曾於第 20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的審查意見中表示，他進行審查的著重點在於「題材的創新與突破」以及「挑戰性與困難度」，期待能「發掘主流社會議題的作品」，⁶³儘管古蒙仁也同時表達對於報導文學題材枯竭與重複的憂心，但在這些標準之下仍然有符合標準的作品脫穎而出，顯示即使屬於少

⁶⁰ 翁台生於第 16 屆聯合報報導文學獎，焦桐〈失去地址的人〉之審查意見。張明珠，《〈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研究（1978-2000）》，頁 346。

⁶¹ 南方朔於第 16 屆聯合報報導文學獎，李靜修〈前山第一城之竹事〉之審查意見。前揭書，頁 347。

⁶² 金恆鑣於第 22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陳姿羽〈聽他的歌，記他的名字〉之審查意見。前揭書，頁 331。

⁶³ 古蒙仁於第 20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王誠之〈迷濛的松雀鷹之眼〉之審查意見。前揭書，頁 327。

數，但參賽作品中已有在題材上創新、符合主流社會議題，且具有一定的挑戰性之作品。翁台生的意見也呼應著這種報導文學潛在的成長，已然觀察到報導文學題材上朝向國際社會延伸，是報導文學新的起點。將上述所引翁台生與南方朔的審查意見，與上一小節的審查意見相對比，會發現在兩大報這十年間的審查意見中存在著許多難以釐清的疑點，以題材而言，當部份評審對重複而了無新意的題材反覆警告的同時，另外一批的評審卻對於參賽作品從台灣出發、建立土地認同進而擴展到國際視野的發展趨勢感到欣慰，從意見的落差中似乎可以窺探出報導文學並不如想像中的困窘死寂，同樣有部份評審看出報導文學在新時代的深化與轉型。

在承載過多社會功能性與意識型態的問題上，從源頭來看，在上一章筆者已經論述 1980 年代的報導文學在《人間》的影響下對社會運動的實踐，整個 1980 年代的報導文學可以說是建立在對弱勢族群、社會黑暗面、為人所不知的現實等的同情與暴露之上，可以說在報導文學進入 1990 年代以前，已然是肩負社會良知、作者個人立場與意識的功能性文學。而文學做為一種連續性的產物，並非在邁入新的十年便自動產生與上一代截然不同的特色，而是連貫性的接續此前的風貌，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若說在功能性與意識形態上太過刻意而明顯，事實上也是自上一個十年的報導文學發展承續而來。然而 1980 年代的報導文學不需要經過兩大報文學獎評審的檢驗，所產生的流弊與問題不會輕易浮出檯面，等到進入兩大報文學獎的試煉場，在相對看重純文學美學技藝的評審眼中，報導文學在功能性上的拿捏尺度方才成為爭議的問題，而在那些前行代的作家評審下，也正藉機表達對報導文學發展趨勢的不滿。

回到 1990 年代兩大報報導文學獎，令人為難的是，評審大多仍強調、堅持報導文學對社會的關懷與現實意義，馬以工對於報導文學的內涵曾表示「除了主題要清晰，還要有信念，更重要的是跟時代緊密相連，值得我們花時間去讀。」⁶⁴在這種要求下，另一方面又強調報導文學應該拋棄過多的社會包袱、過多的作者個人意識形態與立場，「必要」與「不要」之間相當難以拿捏。可以說在 1990 年代以前，報導文學的興盛正是由於其社會實踐性與功能性，在進入 1990 年代後，型塑報導文學的多方面力量都發生著轉變，一方面「文學獎」對文學的純粹

⁶⁴ 陳大為紀錄整理，〈驟然消逝的雷聲——第 21 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類決賽會議記錄〉，《中國時報》第 37 版，1998 年 12 月 23 日。

美學要求較高，報導文學本身的實用性成爲需要被排除的特點；另一方面報導文學的「社會實踐性」已經發生內涵上的質變，從過去對整體社會的道德呼籲轉變爲個人看法的表演舞台，社會良知與個人意見之間的尺度言人人殊；此外，也可以說報導文學在社會實踐上的階段任務已經完成，隨著各種媒體管道的發達以及社會的全面解禁，報導文學的功能性已經不再被需要。總之隨著時空環境的轉變，加以報導文學自身在發展過程中的轉型，從極度的社會功能性轉而思考這種社會功能性的訴求對於做爲「文學」的報導文學可能帶來的流弊，在逐步的轉型與再型塑之過程中，文學界對報導文學的期待似乎更多的朝向「文學」靠攏，這種傾向可以被理解爲一種對報導文學鬆綁的呼喚。

第 15 屆聯合報報導文學獎時，李利國便曾提議全數從缺：「他認爲此次晉入決選的幾篇作品並不能反映『報導文學』這個寫作類型的本質，也沒有一篇可以當作範本。因此，他主張一律不給獎，以對報導文學這個獎項發生刺激作用。」⁶⁵終於在第 21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實現」全數從缺的結果。然而全數從缺對於「刺激報導文學」發展是否真能有正面效果，不禁令人打了問號，而究竟報導文學「寫作類型的本質」爲何，李利國亦沒有提出確切的解釋。從對報導文學的理論結構而言，不過是 1980 年代時評審們各說各話的再一次展現，顯然在經過 20 餘年的發展後，報導文學界的學者、評審、前輩作家，在個人的意見與看法外也未能有新的建樹，僅能消極的藉由「全數從缺」來指責報導文學的後起之秀不如以往，然而卻連「不如以往」的實際因素也難以提出。因此，誠如上所引金恆鑣的意見所言，從另一個角度解讀這種缺乏理論建構的現象，也許能得出新的結果，既然未能建構台灣報導文學理論已經成爲事實，或許台灣報導文學的成長正可以在未固定的模糊地帶化危機爲轉機，從而在自由度較大的空間嘗試多樣的寫作風格，從而持續累積作品產量，持續豐厚理論誕生的基礎。而從 1990 年代以降的報導文學發展觀之，報導文學確實在缺乏學院理論支援、過去的發表環境亦一一消失的情形下，另闢蹊徑，開出不同於前輩的燦爛花朵。

三、轉型與式微：互生的雙重性

每一個得獎作品的存在都是一種對未得獎作品的排除，這種存在使其他「遺

⁶⁵ 楊錦郁紀錄，〈給現實社會下猛藥——報導文學獎決審會議記錄〉，《小說潮——聯合報第 15 屆小說獎暨附設報導文學獎、新詩獎作品集》，頁 444-445。

珠」失去了意義，因此筆者想要反問的是，在評審不斷聲稱這些作品具有瑕疵的同時，卻又不斷地選舉出這些作品，在這種反覆的操作之中，實際上是鞏固了這類作品的「存在」。筆者上述對兩大報報導文學獎審查意見的整理，正是想證明這種逆向的吊詭，這種吊詭也反映在報導文學「重生」與「危機」的雙面性上。在這節中，筆者透過兩大報的審查意見與 1990 年代的一些報導文學評論文章，所試圖要建立的論點在於，站在 2011 年的時間點重新還原報導文學走到 2000 年的樣貌，報導文學其實並不是「驟然消失的雷聲」或是「死了」，事實上這種消亡或是說式微同時象徵著報導文學的轉機，危機感的激化肇因於報導文學的樣貌開始發生變化、創作出現瓶頸，然而卻並非朝向死胡同發展。

在楊素芬對 1990 年代台灣報導文學的觀察中，她指出這個階段的報導文學幾個明顯轉向，首先以人文、自然為主的地域性報導文學作品增加，此外富有高度專業知識性的深度報導成為趨勢，隨著解嚴後眾多資料的出現，以重新探討台灣歷史為主題的作品也成為具有寫作潛力的領域，而隨著台灣的國際化，走出台灣本土而報導其他地域的人事物也成為新的發展。⁶⁶對於兩大報評審不斷指出的題材枯竭問題，楊素芬則表示：

面對其他已經開發的題材寫作，不應視為陳舊的題材，舊題可以新作，因為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報導者對議題的詮釋都不盡相同，……，由此可見題材無新舊之分，開發新方向的寫作題材固然重要，但是不應將舊題材的重新書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媚俗，這樣對報導者是不盡然公平的。⁶⁷

楊素芬的論述顯然也認為 1990 年代評審所謂的「題材重複」、「意識形態媚俗」是較為苛刻的說法，在這個十年間即使是在同樣的大範圍之下，新一代的創作者卻已經有著新的詮釋角度與細緻的分流，熱門議題的重複書寫不見得是出於媚俗的心理，而是有新的問題意識與訴求。因此若以 1990 年代論者及兩大報評審的說法來斷定這十年間報導文學的發展停滯不前，或是發展不如上一個十年，都是有失公允的結論，在拉開時空距離的 2000 年之後，應當還原 1990 年代報導文學隱藏在當時論述之下的實際面貌。

馬以工在獎項全數從缺的第 21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發表許多感嘆，認為在媒

⁶⁶ 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頁 223。

⁶⁷ 同上註，頁 224。

體環境大幅轉變的當代台灣，報導文學畢竟是不再輝煌，走向尾聲。楊素芬對此提出兩個時代的文學獎徵獎在字數上的要求不同，「字數上表面的差距足以深刻影響報導者的採訪與寫作」⁶⁸，當報導文學獎的上限字數從 1980 年代的 2、3 萬字下修到 1990 年代的 8 千字，從負面的影響上來說，篇幅的限制必然影響創作者的寫作深度與廣度，然而字數的大幅縮減同時也迫使新一代的報導文學創作者朝向新的寫作模式去嘗試，字數的減少必然牽動整體創作的架構，新一代的創作者因此必須改變前輩作家的寫作模式，在較小的篇幅中創造新意，從積極的層面來說，帶動了 1990 年代報導文學的多元發展，走出過去停留在學術性散文與報導性散文的體制。而馬以工身為前行一代的報導文學作家，同時身為 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獎熱門評審，這番懷舊的今昔感嘆背後，不免讓人感到父執輩對於即將被取代的焦慮與下意識的不以為然，這種焦慮也正足以印證 1990 年代報導文學走在 1980 年代報導文學不同的道路上。

從日記體、非虛構小說等體裁的多方嘗試，可以看出台灣報導文學界新一代的創作者其實有心走出前人的窠臼，然而這些嘗試或許初期不免流於稚嫩，二來也受限於評審對於報導文學一些基本要求的堅持，例如散文式、客觀性、真實性，誠然這些原則確實是評審報導文學時的主要綱領，然而論者與評審似乎也沒有對報導文學進行更深入的探討與理解，以提供彈性的發揮空間。當報導文學被置入文學獎的場域，便產生一個有別於其他文類特殊的現象，文學獎的本質之一是透過權力的運作建構典範性的作品，然而當評審面對 1990 年代的作品卻以 1980 年代報導文學的標準審視，在忽視時空的不同以及字數的縮減等因素之下，評審群只感到這批作品的「非典範性」，不足以成為範本，結果是在每年的審查意見反覆表示今不如昔、走不出過去窠臼，在這些感嘆與批判之外大多也沒有提出更具體的訴求。兩大報經過對報導文學十年的徵選，在 1990 年的尾聲陸續停止此項目的徵獎，也許是承認建立「報導文學範本」的失敗，從部份評審的意見也可以看出，已經意識到以過去的眼光審查新一代報導文學作品將難以達到鼓勵發展的目的，應該透過新的視野、新的標準對報導文學鬆綁，應該以更寬廣的可能性重新定義「報導文學」。

2002 年的「兩岸報導（告）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中，回首 1990 年代的台灣報導文學，吳正堂認為報導文學的式微起因於兩大報文學獎取消報導文

⁶⁸ 同上註，頁 207。

學類，加以新興媒體如網路等的興起，讀者風氣轉向輕薄短小的消遣性作品，報導文學創作者又不免受限於過去的經驗，難以創造出新的發展，以上幾點因素不失為整個 1990 年代報導文學發展式微說的總結。⁶⁹然而對於吳正堂此說，李瑞騰則指出在 1999 年的九二一大地震後，與地震相關的徵文使報導文學再次掀起熱潮，在兩大報副刊版面以及文學獎之外，報導文學也已經過渡到綜合性的刊物與其他媒體，各地方文史工作室中亦有不少人默默經營著報導文學的寫作。⁷⁰此研討會舉辦在 1990 年代甫結束的 2002 年，所論的內容可以視為 1990 年代報導文學發展的綜合論述，從吳正堂與李瑞騰相左的意見之中，可以看出 1990 年代兩大報評審以及論者對報導文學的兩種看法，是式微、是驟然消失的雷聲，還是報導文學的中興、轉型與再深入的契機？顯然從 1990 年代一直到 2002 年都還有著不同的答案。

透過上述論述，筆者以為可以將沒落的危機與重生的希望視為一種雙重性，是一體兩面的不同解讀。如同前述所言，觀察兩大報報導文學獎評審的意見，可以發現在不同評審之間往往形成許多意見的落差與斷裂，在這種彼此矛盾的「指示」下，有志報導文學創作的新一代作家可以是無所適從，但也可以看做是創作指導的罅隙，提供給創作者們灰色而寬廣的可能空間。從題材的層面上來說，可以認為是炒冷飯的重複老套，但也同樣可以觀察出其中細緻的深化與差異；從社會功能性而言，可以認為是個人意識形態的超載與媚俗，但也可以視為社會實踐的階段性任務即將完成，報導文學終將離開「報導」往「文學」深耕；從發表的空間而言，固然兩大報奧援不再、網路與電子媒體興起也壓縮了純文學的空間，但亦使報導文學朝向長時間的地域性深度報導以及專業知識性刊物發展。基於這種雙重性，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發展，筆者以為並不如過去論者以為的悲觀，固然學界對報導文學漸趨冷淡，報導文學的創作圈與發表空間也不若 1980 年代的輝煌，然而在表層的危機之下，隱藏著一股旺盛的生命力。

小結

1990 年代這十年有兩件大事全面衝擊著文學，或者說報導文學的生存空

⁶⁹ 萬麗慧，〈書寫事實·閱讀真實——2002 年兩岸報導（告）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側記〉，《文訊》第 207 期，2003 年 1 月，頁 52。

⁷⁰ 同上註。

間。首先是 1990 年台灣學術網路 (Taiwan Academic Network) 成立，標誌著台灣第一個網際網路的出現，進而到 1992 年台灣學術網路的全面建制完成，接通國際網路正式啓用，自此宣告台灣社會網路時代的來臨。其次是 1993 年有線電視法三讀通過，從此台灣電視媒體進入瘋狂增台的時代，新聞頻道大增、政論節目紛紛出籠。筆者特意標舉出這兩個時間點以說明 1990 年代的媒體環境，在 1980 年代這個「集體發聲的時代」⁷¹之後，邁入 1990 年代報導文學所以在此時重燃生機，似乎與時代的紛亂與激情有關，然而它的再次衰微更可以歸因於網路以及第四台的興起，新興媒體衝擊了文學的生存空間，而報導文學是文學的一個縮影。

進入 1990 年代後，純文學的存續一直是個令所有作家焦慮的問題，1980 年代所流行的「輕薄短小」文學固然使文壇憂慮大眾的文學品味，然而在這十年間出版社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就文學的出版與銷售而言還在成長階段、一片看好。在出版熱烈的情形下，1990 年代文學界面臨的問題已經轉向另一個更嚴重的層次：純文學還有人看嗎？在這個巨大的疑問下，曾經引領社會讀者品味的文學獎也日漸顯得尷尬，焦桐便指出：「90 年代文學獎之受矚目與讀者參與的程度已遠不如 70 年代，讀者和作者都逐漸流失」，⁷²所謂「全面的參賽熱降溫」，焦桐以為原因是在文學獎權力網路的萎縮，以及電視傳媒的氾濫讓作家已經不必要僅僅依賴文學獎獲得權力位階。但無論媒體如何興盛，仍然沒有改變的是，一個新進作家想累積文壇聲譽，文學獎的「履歷鍍金」仍然有其必要性。可說以整體而言，1990 年代起的文學界確實正在萎縮中，但若單以文學內部的場域觀之，文學獎的地位仍然無可動搖。然而，終究以外部整個台灣社會而言，純文學的缺乏市場益發明顯，大眾的市場口味與文學圈內的審美標準之落差極大，報導文學雖然在美學上不若小說、現代詩等令讀者難以進入，但由於報導文學所背負的「社會良心」，讀者對報導文學也難免益加不耐。加以媒體網路與有線電視台的崛起，報導文學的功能被取代，這兩種新興媒體在報導文學所處理的議題上更即時、更深入、更廣泛的傳播，在這些層面上節節敗退的報導文學，似乎也只能處於文壇的保護傘下繼續孤芳自賞。

《聯合報》於 2000 年第 21 屆的聯合報文學獎停止報導文學的徵選，《中國

⁷¹ 筆者在此借用楊澤所編的《八〇 一個集體發聲的時代》之書名，為 1980 年代下一註腳。

⁷² 焦桐，〈文學獎〉，《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1977~世紀末）》，頁 258-259。

時報》也在次年的第 23 屆時報文學獎宣佈停止報導文學的徵選，兩大報相繼在 1990 年代行將結束的當時為報導文學劃下休止符，從時間點的意義來說不無階段性任務完成的意味。楊素芬在《台灣報導文學概論》中論及台灣報導文學獎現象時說道：「單就文學來探究報導文學式微與否的問題顯得草率，雖然文學獎或多或少具有指標性意義，但是文學獎的甄選過程充滿不安定的變因，並無法涵蓋整個報導文學的發展現象。」⁷³誠然，單以兩大報報導文學獎其實難以詮盡台灣報導文學在 1990 年代的整體現象，在報導文學的發表空間大幅減少的 1990 年代，尚有報導文學專業刊物如《新故鄉》⁷⁴、《山海文化》⁷⁵在發行中，也仍然有如焦桐《在世界的邊緣》、楊蔚齡《邊陲燈火》等報導文學作品的結集出版，兩大報的報導文學獎其實僅僅是 1990 年代報導文學發展的其中一個面相。然而筆者在這一章所以聚焦於兩大報的報導文學獎，主要著眼於文學獎在這十年間對台灣整個文壇的象徵性與關鍵性，因此若要為 1990 年代的台灣報導文學發展找出一條可把握的脈絡，還是必須回到兩大報文學獎。透過對兩大報文學獎的觀察，筆者試圖分析文學獎中「不安定的變因」，從波浪中尋找推動、形構文學這片海的線索，⁷⁶為報導文學獎現象做出另一種解讀與分析。在文學獎的場域中，透過評審與參賽者之間的互動，可以為當時的報導文學劃出有規則可尋的輪廓，且透過兩大報在社會以及文壇的影響力，追蹤報導文學在整個文學場中的位置以及作品、評審在這場域中的意義。而當 1990 年代即將結束的同時，兩大報也完成對報導文學的復興運動，透過兩大報的報導文學獎自起而落，以及過程中的爭議、從缺等，乃至評審與作家的班底形成與世代論替，可以見微知著的依樣畫出 1990 年代的台灣報導文學大致起伏。

總結本章，筆者仍要強調，此時期的報導文學具有特殊的「雙重性」，並非如當時論者與作者以為的悲觀、行將沒落，式微與轉型的一線之隔僅僅在於詮釋角度的不同，報導文學在離開媒體的版面後不得不積極走進社會、融入民間，求

⁷³ 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頁 207。

⁷⁴ 1999 年 3 月，廖嘉展在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的支持下創辦《新故鄉》雜誌，由廖嘉展擔任社長暨總編輯，期待將社會運動的議題與理念，透過社區總體意識與民眾產生更深的連結。

⁷⁵ 1993 年由孫大川召集創辦「山海文化雜誌社」，並編輯《山海文化》雙月刊，同年 11 月出版創刊號，是台灣第一份以原住民為主體的雜誌，迄今出版 26 期。

⁷⁶ 筆者在此借用向陽在論述文學獎與文學間的比喻：「我們經由文學獎看到作家的起落、班底的盛衰、意識形態的強弱、權力的大小，看到文學風潮／風向如何在文化霸權的爭奪過程中彰顯出來。在文學發展的過程中，文學獎是波是浪，卻不是海的本身。」向陽，〈海上的波浪 小論文學獎與文學發展的關聯〉，《文訊》218 期，頁 40。

取另一種生存模式，這也是報導文學誕生伊始所追求的目標。若是報導文學始終停留在媒體的保護傘之下，難免永遠停留在雛鳥階段，兩大報報導文學獎的十年扶植，在 20 世紀即將結束之時選擇將報導文學推出保護的羽翼之外，亦是報導文學堅強茁壯、發展為獨立文類的契機。

因此，媒體上曝光率的降低不代表報導文學本身的活動力在減少，綜觀整體 1990 年代報導文學的成就，無論在新的國際性主題的嘗試、過去舊有議題的重新深入與再挖掘，生態與環保的主題也一反過去 1980 年代大聲疾呼的手段，改以較冷靜、長時間的觀察做深度的採訪與紀錄，即使當代難以察覺，但在拉開距離的此時再重新審視這兩個十年的作品，可以看出 1990 年代報導文學作品的特色與轉型。而在寫作形式上，隨著中國作家的加入帶來了過去台灣少見的書寫模式，傳記、日記、第一人稱小說、非虛構寫作等，在報導文學的創作手法上相較上一個十年單純的新聞採訪與散文形式，顯然開出眾多不同的可能性與新方向。從學術理論上來說，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研究與討論相對寂靜，在 1980 年代的熱烈後，留給 1990 年代的僅僅是反省與更多的疑問，而報導文學理論的建構在缺乏學院介入的情形下，也僅能交付在文學獎評審的手中。評審們卻由於出身作家或是非報導文學專業的緣故，即使經歷多次的報導文學決審會議，也僅能一再的質疑、不斷的困惑，卻沒有實質的理論建設，停留在「什麼不是報導文學」，而難以進展至「什麼是報導文學」。

在理論之外的世界，台灣報導文學界依舊勤懇的拓展著書寫的可能性，從主題到寫作手法的多元、人文關懷從台灣而國際的擴展，作品與作家皆確實逐步的朝向報導文學鬆綁的方向邁進，式微的是發表空間與報導文學理論，然而擺脫侷限、親自鬆綁、轉折與重生的是台灣報導文學本身，這是 1990 年代台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特色。它是緩慢流動中的涓涓活水，不是將斷源的枯竭河流。

第五章 新世紀報導文學的議題化與地方化（2001 年～2010 年）

進入 21 世紀，報導文學的活動空間有日漸萎縮的趨勢，在報紙副刊的縮編下，報導文學在報紙已經幾乎沒有存活的版面；在專書上，從《文訊》雜誌近十年的「新書快訊」中，在「報導文學」項目下的專書日漸稀少；而從近十年的《中華民國文學年鑑》也可以看出，報導文學從過去在分類中獨立為一項，逐漸慢慢消失在分項之中，似乎報導文學已從文壇的舞台中謝幕下台，呈現過時的色彩。然而與這種沈寂的現象相對的是，2000 年以來的報導文學獎數量相當多，達到台灣報導文學發展歷程中的最高峰，無論全國性或地方性的文學獎在近 10 餘年皆陸續或偶有徵選報導文學獎，成為報導文學活動的主要場域。

新世紀以來，全國性的文學獎在報導文學徵選上出現「單一議題性」的集中，如舉辦多年的國軍文藝金像獎便將報導文學項目改為「軍聞報導」，又如以「原住民」為徵稿議題的原住民報導文學獎，以及人權、生態等各種公共議題都誕生了各自的報導文學獎，顯示過去報導文學內的各項議題都在報導文學獎中獲得較高的獨立性與關注。而台灣各縣市獨立舉辦的文學獎也陸續出現報導文學獎，如屏東大武山文學獎、苗栗夢花文學獎、彰化縣市的磺溪文學獎等，此外甚至劃分出更小的集中範圍如「三重城市之窗文學獎」在 2005 年、2006 年徵選報導文學，「中和庄文學獎」亦在 2010 年首次徵選報導文學，顯示報導文學在朝向單一議題聚焦之外，同時亦有另一條支流朝向更具有在地性與本土性的地方書寫前進，這類的報導文學徵獎皆會強調須以地方文化觀察、生活印象、景觀踏查或鄉鎮書寫為內容，但這樣的傾向卻隱約有淪為為地方特定產業宣傳工具的可能危機。¹

筆者收集自 2001 年至 2010 年的報導文學相關獎項紀錄，透過分析獎項的屬性、分佈、得獎者、得獎作品、評審委員等多重方向，來釐清地方文學獎中的報導文學與此前之報導文學所呈現的異同、轉化或延伸，以這些多重的脈絡交織

¹ 可參見張耀仁，〈新世紀以來報導文學在台灣的論述分析——以地方文學獎得獎作品為例（2000-2009）〉。

出報導文學在新世紀的面貌。為求達到此觀察的連貫性，筆者將報導文學獎在 21 世紀的脈絡向前延伸至 1998 年前後，此時間點正是各地方文學獎紛紛設立、議題性的報導文學獎陸續出現的關鍵，因此若要將近十年的報導文學發展脈絡做出清楚的連貫，必須回到 1990 年代的部份現象做討論，故儘管本章所要探討的是 2001 年以降的報導文學現象，但在處理的資料上將跨越此十年的幅度。

本章將集中在報導文學邁入 21 世紀後的「議題集中化」與「在地書寫化」的兩種轉型線索，此外藉由與基層民間合作最為緊密的社區大學做為另一個報導文學在地化的切入點，報導文學藉由社區大學的鄉鎮文史書寫課程、地方性文學集會²等，形成一種不同於文學獎的民間力量，此觀點將能補充說明在地方性與全國性的文學獎之外，報導文學與民間的關係為何，深化的程度為何、所謂的地方性為何等問題。進而討論具有單一議題訴求性的報導文學獎、社區大學、地方文學獎項三者所顯現出的「新世紀報導文學」，在內涵與訴求上有何種轉變與特殊性？而這雙重的轉型傾向對報導文學而言，是活化、抑或僵化？進一步探討對報導文學內涵與意義上的影響，以及與過去 30 年的報導文學歷程在脈絡上的連結關係，以期為 21 世紀的報導文學找出文學與社會之間的新定位。

另外必須在此說明，筆者在本章所蒐集、整理的資料，在搜索網路資源外，³配合 1996 年至 2009 年的《台灣文學年鑑》⁴，以及歷年各縣市文學獎、全國性文學獎的得獎作品集整理而成。可惜並非所有文學獎的得獎作品集皆會列出該年的評審人選，在時有時無的狀況下，筆者以最大限度將彙整之資料做出本章的分析整理，資料上未臻完善之處，仍待前輩與後進指正、補遺。

第一節 21 世紀以來的報導文學獎

2000 年代的報導文學在社會知名度及文壇矚目度上似乎陷入空前的新低，研究者大多採取「回顧」的態度看待報導文學，彷彿報導文學已然是上一個世代

² 如 2008 年的樂生文學週末第二季便以報導文學為主題，與樂生療養院的社會運動訴求結合。

³ 在網站資源部份，筆者除用各文學獎名以 Google 搜尋引擎做地毯性搜索，加以行政院文建會網站 (www.cca.gov.tw/)、各縣市政府文學獎相關網站外，其餘主要參考網站為：文學創作者 (<http://www.yon.com.tw/>)、全球華人文學獎 (http://ocl.shu.edu.tw/ocl_award/html/explor.php)、喜菡文學網論壇 (www.pon99.net)。

⁴ 由於筆者撰寫論文之時，2010 年的《台灣文學年鑑》尚未出版，無法補全 2010 年的各文學獎資料，實屬遺憾。

的文學產物，但吊詭的是，事實上 2000 年代的報導文學獎數量卻是整個台灣報導文學發展過程中的最高峰，自 1990 年代末期至 2000 年代，全國性與地方性的報導文學獎大大小小超過 10 餘個，如果說報導文學是「消逝的」，又如何為這種報導文學獎的繁花盛開做出解釋？全國性報導文學獎與地方性報導文學獎又有著何種差異與特色？顯示著 2000 年代報導文學何種現實／現時的趨勢與意義？

一、兩條線索：全國性報導文學獎與地方性報導文學獎⁵

(一) 全國性報導文學獎

在筆者所收集的報導文學獎近 15 年的設立情形資料中，全國性文學獎中若是設立報導文學類，大多為具有「特定議題」的徵獎，少數例外者如耕莘文學獎在 2005 年、2006 年徵選報導文學類，以及台灣文學獎在 1998 年、2001 年、2003 年以隔兩年徵選一次的方式徵選報導文學類，⁶然而這類全國性且沒有議題限制的文學獎在近十年中屬於相對的少數，並且大多在徵選兩、三屆後便不再延續，似乎在缺乏特定議題的狀態下，報導文學的徵稿反而顯得困難。在全國性的文學獎中，常態設立報導文學類，或是專門以報導文學為徵選對象者，大多為具有特定目標議題的文學獎，如原住民的「原住民文學獎」⁷、婦女的「婦女人權報導獎」⁸、身心障礙者的「文蒼獎」⁹，以及最為大宗的生態保育者如「永續台

⁵ 筆者透過網路檢索以及翻閱 1996 年～2009 年的《台灣文學年鑑》、近 10 年的《文訊》雜誌，整理出自 1998 年～2011 年間有徵選報導文學的全國性文學獎與地方性文學獎，做為本章的論述依據，可參閱本論文「附錄三：1998 年～2011 年 全國性報導文學獎得獎列表」、「附錄四：1997 年～2011 年 地方性報導文學獎設立暨得獎列表」。

⁶ 在此 3 年的徵選後，2004 年至 2009 年皆未曾再有報導文學類的徵選，2010 年的台灣文學獎增加「原住民漢語報導文學金典獎」一項，由李信·書達（李秀蘭）的〈親親小奇萊〉獲獎。然而既為針對「原住民」的報導文學徵獎，顯然與此前的徵獎不同。

⁷ 原住民的相關文學獎主要由山海文化雜誌社主辦，曾與中華汽車原住民文教基金會、《人間副刊》、《聯合報副刊》等合辦。1995 年「第 1 屆山海文學獎」（山海文化雜誌社主辦）、2000 年「第 1 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山海文化雜誌社、中華汽車原住民文教基金會、《中國時報》共同主辦）皆未徵選報導文學，2001 年的「第 2 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山海文化雜誌社、中華汽車原住民文教基金會、《中國時報》共同主辦）始徵選報導文學類，2002 年的「原住民報導文學獎」（山海文化雜誌社、《聯合報》共同主辦）則是僅徵選報導文學，此後 2003 年改徵選短篇小說、2004 年改徵選散文，經過 2 年的停辦，於 2007 恢復徵選短篇小說與散文。2010 年起，原住民文學獎改為「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且由行政院原民會主辦、山海文化雜誌社承辦，且固定徵選報導文學類。

⁸ 婦女人權報導獎在 1998 年首次徵選，由台灣人權促進會、新女性聯合會、台北蓬萊扶輪社共

灣報導獎」¹⁰、「生態文學暨報導獎」¹¹、「鄭福田生態文學獎」¹²等。此外如「全國巡迴文藝營創作獎」在 1998 年~2000 年間也設立有報導文學組，1998 年由觀光局策劃、中國婦女寫作協會主辦的「觀光文學獎」¹³中亦徵選報導文學。由上述可知，從 1998 年以降的台灣各報導文學獎已經從過去全面性的綜合評比，轉向單一議題聚焦的模式，無論是原住民、女性人權、生態環保或身心弱勢族群，事實上都是從過去的報導文學中獨立分支成一類，表現出更細緻經營且更能突出議題的策略。

在兩大報文學獎方面，聯合報文學獎自 2000 年起停辦報導文學的徵選，與之相對，時報文學獎在 2001 年停辦報導文學獎後，於 2002 年改以「鄉鎮書寫」重新「還魂」報導文學，由於在 2005 年與 2008 年時報文學獎徵選「報導文學」時，「鄉鎮書寫」在該年便沒有徵獎，加以「鄉鎮書寫」的徵選說明寫到：「舉凡發生於台澎金馬各地鄉鎮相關的自然風土、人文歷史，以散文體例書寫完成之作品」，¹⁴可見「鄉鎮書寫」在實際意義上是「縮小版」的「報導文學」，用以取代

同合辦，宗旨為「為紀念 1998 年為世界人權宣言五十週年，本社特別提供獎金，鼓勵媒體從業人員及社會人士報導有關台灣婦女人權事況，以促進台灣婦人權益水準，特設置本獎。」，其徵選對象為「以每年發表或出版之有關台灣婦女人權事況報導中，傑出或優異者」，所徵選的報導為「廣義的報導文學（包括深度新聞報導）」，以在台灣發表的 1 萬字以內作品為原則。相關介紹可參考網址：<http://www.tahr.org.tw/index.php/article/1998/06/16/44/>，或文訊雜誌社編，《1998 台灣文學年鑑》（台北：行政院文建會，1999 年），頁 428。

⁹ 文薈獎全名為「文薈獎—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獎」，自 1998 年開始徵選，自首屆徵選至 2001 年第 4 屆徵選皆徵選報導文學類，但在 2005 年開始便停止徵選報導文學。相關介紹可參考文訊雜誌社編，《1998 台灣文學年鑑》，頁 427。

¹⁰ 永續台灣報導獎，由生態保育聯盟、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中華民國企業家永續發展協會、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共同主辦，1998 年為第一屆徵獎，徵獎項目分為文字報導獎、影片報導獎、攝影報導獎等多項，其中文字報導獎以於國內登記立案之報章、雜誌發表之作品為評選對象。相關介紹可參考網址：<http://twstudy.sinica.edu.tw/~ngo/topic/prize2/about.htm>，或《1998 台灣文學年鑑》，頁 429。

¹¹ 生態文學暨報導獎，由中華民國新聞權益基金會、自然生態教育基金會共同主辦，1998 年第一屆徵獎。相關介紹可參考文訊雜誌社編，《1998 台灣文學年鑑》，頁 429。

¹² 鄭福田生態文學獎，由財團法人鄭福田文教基金會主辦，徵選台語詩（含客家詩）及散文（含報導文學），徵選主題為「對台灣自然生態的觀察、抒發人文關懷之自然書寫」，自 2009 年開始徵獎，至 2011 年為第三屆。相關介紹可參考「財團法人鄭福田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福田樹木保育基金會」網址：<http://www.futien.org.tw/main1/index.php>。但由於該獎項在徵文類別上仍以散文為主，而非以報導文學為徵獎項目，因此在本章後續論述及資料處理中，將不列入此獎。

¹³ 觀光文學獎由交通部觀光局策劃、中國婦女寫作協會主辦，徵選文章為「以旁觀者的角度，書寫與台北國際燈會相關之各種報導，或報導和元宵節有關之事件，字數以 3000 字為限」，相關資料可參考文訊雜誌社編，《1998 台灣文學年鑑》，頁 430。

¹⁴ 參見第 30 屆時報文學獎徵獎簡章。

篇幅宏大、撰寫不易的報導文學。從時報文學獎對報導文學的定位轉移來看，自報導文學到鄉鎮書寫又回到報導文學，書寫主題從廣而窄而又廣，顯示出主辦單位在報導文學項目徵選與否的兩難，既想維持時報文學獎在報導文學上的光榮傳統，但又迫於現實（報導文學類的來稿數量明顯較少等）不得不做出些微的讓步與修正，首先在停辦報導文學後連續三年改徵選題材較為平易近人、字數門檻較低的鄉鎮書寫，¹⁵這個舉措多少有「測試市場反應」的味道，而儘管之後的 2005 年恢復報導文學徵選，在書寫的規模上卻也不再回到過去的篇幅，整體的發展趨勢逐漸朝向更加「散文化」的路線，而非「深入報導」。

綜觀近 15 年全國性報導文學獎設立的時間點，可以觀察出某些趨勢。首先是 1998 年的特殊意義。在 1998 年時聯合報文學獎與時報文學獎的報導文學獎仍持續進行中，但與此同時的是：第一屆婦女人權報導獎、第一屆永續台灣報導獎、第一屆生態文學暨報導獎、文薈獎、全國巡迴文藝營創作獎與台灣文學獎亦皆在該年首次徵選報導文學類，在 1998 年一年之間便有數種報導文學相關獎項同時徵選，顯示出這是一個報導文學從全面性題材逐漸往單一議題分流的過渡時期，當此時儘管有兩大報文學獎與台灣文學獎等對題材不加限制的報導文學獎，但出現更多的是生態、弱勢族群等不同個別議題的報導文學獎。這些原本在報導文學的領域中不分彼此的議題在此時獨立為個別獎項並不是偶然，回到當時台灣社會的歷史情境來看，1990 年代的末期，於 1980 年代蓬勃激昂的各種社會運動已經逐漸冷靜，各種亟待解決的議題得到了高度的突出與關注，但經過社運風潮後，台灣社會的公民意識抬頭，對於政府與社會成員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如何維護個人自身利益、保障生存的環境空間等，都有了較為具體的看法與注重，為求持續這些議題的社會關注，有心的機關團體紛紛設立相關的報導文學獎項，回頭審視，可以發現社會運動的核心議題幾乎都是報導文學曾經書寫過的重要議題。

綜上所述，1998 年報導文學獎所以發生這種「全面性議題獎項」與「個別性議題獎項」重疊而成的全面興起，一方面是報導文學在長期以來對突出社會問題、挖掘弱勢族群的「功能」與「作用」得到肯定，另一方面是與社會運動休戚

¹⁵ 時報文學獎在 2000 年徵選報導文學獎時，字數限制為「5000~10000 字」，而 2002 年開始徵選鄉鎮書寫時，字數便縮減為「3000 字以內」，即使在 2005 年恢復報導文學徵選，此時字數業已下修為「3000~8000 字」，至 2008 年最後一次徵選報導文學時，字數已經等同鄉鎮書寫項目，改為「3000 字以內」。

相關、共同成長的報導文學透過社運的拓荒，在社會上收穫了一個發展的沃土。換言之，在全國性報導文學獎中的這個現象，是報導文學從 1980 年代以來致力於挖掘社會黑暗的「傳統」之成果，繼承前行代報導文學作家們對社會的責任感，從綜合而多樣的報導森林之中，各自長出拔然卓立的枝幹。

（二）地方性報導文學獎

自 1990 年代開始，台灣各級縣市陸續開辦文學獎，至 2010 年為止，共計有 24 個縣市地方文學獎，亦即在進入 21 世紀後，全台灣各縣市皆有在地的文學獎徵選。經過 2011 年的縣市升級與合併後，台中市「大墩文學獎」與台中縣「中縣文學獎」合併為「台中文學獎」；台南市「府城文學獎」與台南縣「南瀛文學獎」合併為「台南文學獎」；高雄市「打狗文學獎」與高雄縣「鳳邑文學獎」合併為「打狗鳳邑文學獎」，在這三個縣市合併的文學獎中，「台中文學獎」與「台南文學獎」皆在 2011 年的首次徵選中加入了「報導文學」項目。透過地方文學獎對報導文學持續的挹注、耕耘，似乎可以看出報導文學在凝聚地方意識上的重要性。

台中市「大墩文學獎」自開辦以來有過 4 次報導文學徵選，台中縣「中縣文學獎」自開辦以來也有過 6 次的報導文學徵選，因此合併為「台中文學獎」後持續對報導文學進行徵選並不意外。然而台南市「府城文學獎」與台南縣「南瀛文學獎」，自開辦以來皆未曾對報導文學進行徵選，合併後的「台南文學獎」卻也設立了報導文學項目，屬於較為意外的現象。對此筆者以為，縣市合併升級後的地方文學獎，在擴大的同時也注意到報導文學在強化地方認同與文史脈絡上的意義，三個合併後的文學獎中唯一未設立報導文學的「打狗鳳邑文學獎」，似乎傾向藉由對台語文學的徵選來型塑另一種意識上的認同，與台中、台南的情形有所不同。

其餘地方文學獎中，常設有報導文學項目者，有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屏東縣「大武山文學獎」，彰化縣「磺溪文學獎」，另外亦有部份地方文學獎則是偶有幾屆設立報導文學獎，如新竹市「竹塹文學獎」、南投「玉山文學獎」、馬祖「馬祖文學獎」。另外也有部份地方文學獎雖無「報導文學」項目的徵選，但在文類徵選說明上頗有與報導文學性質重疊之處，如金門的「浯島文學獎」在散文類徵

選中規定內容須與金門有關、以金門旅遊印象及「鄉鎮書寫」為主，澎湖的「菊島文學獎」在散文類徵選中註明「亦可寫作報導文學」，又如 2011 年的「馬祖文學獎」徵選「故事書寫」一類，以上徵選從廣義的範圍來看，皆可視為是報導文學徵選的轉型。此外，亦有更小範圍的地方文學獎，如新北市三重區的「三重城市之窗文學獎」、新北市板橋區的「枋橋文學獎」、新北市中和區的「中和庄文學獎」，其中「三重城市之窗文學獎」在 2005 年（第 2 屆）、2006 年（第 3 屆）皆曾經徵選過報導文學，而「中和庄文學獎」也在 2010 年於成人組中徵選報導文學、青少年及兒童組徵選踏查文學，可見報導文學在凝聚地方共識上已經滲透入更小範圍的區域。

在時間的觀察上，大多數各縣市地方文學獎的創立集中在 1998 年、1999 年這兩年間，¹⁶誠如前述在論及全國性文學獎時提出 1998 年為關鍵的年度，在地方性文學獎上也出現意外的相合，且在上述中所論及的常態徵選報導文學類的地方文學獎，除台中大墩文學獎外，其餘皆是在這 2 年間設立、並且自第 1 屆起便常態徵選報導文學類。地方文學獎的成立，顯示各縣市的在地意識覺醒，各級縣市開始關注自身縣市的歷史、文化與文學，而不再依循中央政府提供的大歷史與大論述，台灣本土意識的抬頭帶動了社會大眾對所生活之土地重新認識的迫切性，加以 1990 年代末的報導文學正處於全國性文學獎的熱潮中，地方文學獎與之產生共伴效應，選擇報導文學做為挖掘地方風土人文、深化地方歸屬感的工具成為可以理解的結果。

從地方性報導文學獎的設立企圖與功能意義中，隱約可以找出報導文學的另一條脈絡，如果說全國性報導文學繼承著 1980 年代社會運動對公眾議題的關注、對弱勢團體的聲援，同樣可以在 1980 年代找到屬於地方性報導文學獎的另一條源頭。筆者在第三章論述 1978 年～1982 年的時報報導文學獎時提到，當時不少得獎作品主題在於關注台灣本土、尋找為人所不知的台灣歷史風俗，或是書寫今昔對比、沒落的古蹟與文化等，如邱坤良〈西皮福路的故事〉、李利國〈我在淡水河兩岸作歷史的狩獵〉、林元輝〈蘭陽平原上的雙龍演義〉等，事實上這類作品都具有強烈的地方性色彩，可以視為地方報導文學獎的前身，而這類作品或者帶有學術論文色彩、或者具有抒情懷古成份、或者抒發個人的感嘆，在 2000

¹⁶ 1998 年創立者如台北文學獎、夢花文學獎、桃城文學獎、鳳邑文學獎，1999 年創立者如磺溪文學獎、南投文學獎（玉山文學獎）、大武山文學獎、花蓮文學獎、菊島文學獎。

年代的地方報導文學獎中皆可以找到近似的作品。儘管今日的作品或許在操作上不如 1980 年代的前輩作家，但在創作的意圖上卻是一脈相承。

二、報導文學獎中的三大現象

(一) 字數篇幅空間增大

各報導文學獎的字數限制存在著極大差異，過去的報導文學獎從國軍文藝金像獎到兩大報文學獎，在字數的規定上大部分獎項皆有沿襲的規範，然而在進入 2000 年後，報導文學獎的字數卻有著從 5000 字左右到 20000 字的差異，以下筆者就各報導文學獎最近一次徵獎的字數規定做為分析資料：

表 5-1

全國性文學獎 字數限制¹⁷

2000【時報文學獎 報導文學】	5000~10000 字以內。
2005【時報文學獎 報導文學】	3000~8000 字以內。
2007【時報文學獎 鄉鎮書寫】	3000 字以內。
2008【時報文學獎 報導文學】	3000 字以內。
2001【文薈獎 報導文學】	5000 字以上。
2001【第二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 報導文學】	3000~12000 字，圖片 3~5 張。
2002【原住民報導文學獎】	8000~12000 字，圖片 5 張以上。
2010【第一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 報導文學】	8000~12000 字。
2011【第二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 報導文學】	8000~12000 字

地方性文學獎 字數限制¹⁸

2011【大武山文學獎】	以 12000 字為原則。
2011【台南文學獎】	5000 字~15000 字。

¹⁷ 在全國性文學獎的字數規定上，由於全國性文學獎龐雜，部份獎項由於中間偶有停止徵選報導文學獎的情形，若是獎項規定字數有所變動（如時報文學獎）便予以分列，若是持續徵選且字數規定並無更動者，擇以最近一次徵選的簡章規定為準。

¹⁸ 在地方性文學獎的字數規定上，筆者統一以 2011 年的徵選簡章規定為準，其中玉山文學獎由於 2011 年並無徵選報導文學類，故以 2010 年資料為準；台中大墩文學獎、中縣文學獎因在 2011 年已合併為台中文學獎，故以 2010 年資料為準。

2011【夢花文學獎】	5000字~20000字以內為宜。
2011【磺溪文學獎】	8000字~20000字之間。
2010【中縣文學獎】	6000字~15000字。
2010【大墩文學獎】	15000字以內。
2010【玉山文學獎】	5000字~15000字為原則。
2011【台南文學獎】	5000字~15000字為原則。
2011【台中文學獎】	20000字以上，附相關圖／照片尤佳。

從上表的資料可知，報導文學獎在字數的規範上相當寬鬆，從5千字乃至2萬字的範圍極大，似乎主辦單位有心鼓勵參賽者經營較大規模的作品，但又不得不放低字數下限以使更多參賽者有意願寫作。以字數下限來看，除原住民報導文學獎自8千字起跳外，其餘報導文學獎多在3千字、5千字之譜，這樣的字數與一般文學獎對散文類的字數要求不相上下。然而在字數上限方面，除時報文學獎本身隨著「報導文學」與「鄉鎮書寫」的徵稿項目更易而調整字數外，其餘報導文學獎的字數上限自1萬2千字、1萬5千字乃至2萬字皆有，對比1990年代兩大報報導文學獎的字數上限8千字，2000年代的報導文學獎在字數上限增加許多篇幅，整體而言字數的彈性空間相當大，可以容納散文體裁的作品篇幅，但也足夠經營一篇深度報導式的作品。

大抵而言，全國性報導文學獎在時報文學獎以外，不乏徵選對象為已發表的報導作品之獎項，如永續台灣報導獎、婦女人權報導獎等皆是以該年度已出版、發表之報導為評選對象，因此在字數篇幅上往往規模較大或沒有絕對限制，即便如原住民報導文學獎或台灣文學獎有著字數規範，通常也屬於足以完成深度報導篇幅的字數限制，字數下限的門檻較高。而地方性報導文學獎，由於以培育地方藝文風氣為主要訴求，加以為爭取更多的來稿，字數的彈性範圍從5千到2萬，顯然足以包容散文、深度報導、甚至小說等體裁，呈現出較為多元而自由的書寫模式。

（二）強調功能性的主題

在參賽資格方面，全國性報導文學獎由於有明確的議題傾向，除少數如原住

民相關獎項對參賽者身份有所限制外，¹⁹其餘獎項僅要求來稿作品符合題旨，對參賽者身份未多加限制。然而在地方性文學獎上，由於有培育地方文學創作者的宗旨為前提，因此在參賽者的身份上，往往會限制為該縣市居民，或曾在該縣市就業求學；或在不限身份下，改為限制作品內容需與該縣市歷史人文、風土民情相關，反映該縣市在地特色，其中報導文學類由於來稿數量較少，為求增加來稿量，在參賽限制上大多採取後者，亦即限制作品主題而不限制參賽者身份，如屏東大武山文學獎、台南文學獎、苗栗夢花文學獎、台中大墩文學獎、台中縣文學獎等皆為如此。²⁰

從各縣市文學獎的參賽限制說明中可以看出，各縣市文學獎儘管放寬了對參賽者的身份限制，但在參賽主題上仍然堅持地方性的主題，造成得獎作品在內容上不免高度集中在該縣市知名的古蹟、景點上。尤其協辦單位更顯著的影響著該年的參賽作品，如 2009 年的大武山文學獎由於慈鳳宮的承辦，在辦理宗旨上增加「為提昇屏東阿猴媽祖聲望，型塑阿猴媽祖清新形象，發揚文化創新，激發青年文藝創作潛力，使地方文化茁壯發展。」，在報導文學類的說明中更直接要求「其中報導文學作品主題須以聖母（媽祖）、聖帝或民俗藝陣擇一撰述」，²¹故該年 6 篇報導文學得獎作品中有 4 篇直接與慈鳳宮相關、其餘 2 篇亦是與民間信仰文化相關的八家將主題。就此觀點來看，地方文學獎固然藉由報導文學挖掘出不少地方上尚未被開發的議題、聚集民眾對地方的信心與認同感，但對於報導文學本身來說，似乎是更加的被功能化，而喪失更多可能性，也致使報導文學的視野被縮小。地方性文學獎帶來的弊病，同時也與報導文學的民間化息息相關，與地方文史工作室呈現相輔相成的成長。而與此相對的，則是針對特定議題的全國性報導文學獎，如原住民文學獎、生態環境報導獎、婦女人權獎，可以說 1970 年代風格的報導文學，在新世紀改以議題化的方式脫胎換骨，改成重點式的經營。然而在這個層面來說，報導文學的重點仍然被放在「喚起大眾關注」、「凝聚

¹⁹ 原住民族獎項大多限制參賽者具有原住民族身份，或父母雙方其中一人為原住民族身份。

²⁰ 如 2011 年大武山文學獎：「凡本國國民均可參加。外縣市籍民眾，作品需反映出屏東縣人文、風土民情者。本縣縣民或曾服務本縣及就讀本縣學生作品題材不限。」、2011 年台南文學獎：「報導文學類包括傳記文學，不管是人物側寫或社會事件，只要和台南市相關的都可以參賽。」、2011 年夢花文學獎：「設籍本縣人士或在本縣居住、就學及就業者，作品主題不限。如作品內容是書寫苗栗縣人文風土民情地景者，不限資格。」、2010 年玉山文學獎：「作品內容須以描述南投縣風土民情為題材，倘未符合，不得參選。」

²¹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強調，今年大武山文學獎往年不同者，為提昇屏東阿猴媽祖聲望，型塑阿猴媽祖清新形象，其中報導文學作品主題須以聖母（媽祖）、聖帝或民俗藝陣擇一撰述。」見〈各地藝文採風〉，《文訊》第 283 期，2009 年 5 月，頁 143。

社會意識」的「功能性」上。

(三) 得獎者的高重複率²²

李崇建在〈地方文學獎要走到哪裡去？〉中針對地方文學獎的得獎者論到：

眾多地方文學獎，無論是限定本縣人士投稿，或是設定某種主題，以地方風情為主，常可見得獎者重複在各縣市文學獎榜單出現，因而所謂的「獎棍」、「獎金獵人」也隨著地方文學獎的興盛而出現，這是眾人質疑地方文學獎價值的原因之一。²³

誠如李崇建所言，部份地方文學獎對於參賽者的身份會有所限制，必須是設籍或曾經在該縣市就讀、工作者，藉由這種限制提高在地居民的參與度，甚至是提高在地藝文人士的獲獎率，以免「獎落外人田」。在報導文學的徵獎上，由於來稿本身數量較少，加以報導文學本身在功能上的特殊性，具有為當地宣傳、廣告的作用，或是強化地方歸屬感與文化信心的意義，因此在報導文學項目通常傾向「屬地主義」，從限制作者身份改為限制書寫主題，然而從得獎名單卻可以看出，相較於全國性的文學獎，這種「屬地主義」式的限制卻創造出更多的重複得獎者。

觀察這些反覆多次得獎的報導文學寫作者，其中不乏是在同一地方文學獎中多次獲獎達到 3 次以上者，這些得獎者中甚至有跨縣市參加文學獎而獲獎多次者。在這批得獎常勝軍中，胡遠智以 19 次的得獎紀錄遙遙領先於其他得獎者，其次是獲獎 7 次的許勝雄、獲獎 6 次的張欣芸與白棟樑、以及獲獎 5 次的鄧榮坤、王派仁和余益興。以胡遠智為例，其得獎紀錄橫跨新竹竹塹文學獎、新竹吳濁流文學獎、苗栗夢花文學獎、屏東大武山文學獎、南投玉山文學獎、台北三重城市之窗文學獎、台北中和庄文學獎等，幾乎是有徵選報導文學類的地方文學獎中皆曾獲獎，甚至包含 1 次全國性的耕莘文學獎。筆者以為這種報導文學得獎者高度重複獲獎的現象，或許與地緣因素不無相關，在長年設立報導文學獎的地方文學獎中，新竹、苗栗、彰化、台中四個縣市彼此相連，僅有屏東大武山與以上縣市較遠，在縣市相連的情形下，書寫者在交通上要採訪、踏查，或在文化上要

²² 可參見本論文「附錄五：1997 年～2011 年報導文學獎獲獎者得獎紀錄列表」。

²³ 李崇建，〈地方文學獎要走到哪裡去？〉，收錄於《百日不斷電－別為文學抓狂》（台北：聯合文學，2005 年），頁 102。

有所瞭解也相對容易，以此觀之，由於中部縣市大多常態設立報導文學獎，因此中部創作者在報導文學獎中出線的次數較高。屏東大武山文學獎在地理位置上雖然較遠，然而做為少數設立有報導文學獎項的地方文學獎，加以對參賽者身份上並無特殊限制，同樣吸引這四個縣市的報導文學寫手持續參賽。

在全國性報導文學獎方面，由於主題區分明確，而具有單一領域專長者較少跨足到其他領域，因此在得獎者的重複狀況上乍看之下不若地方性報導文學獎明顯，然而若將各單一議題獎項略做區分，則會發覺同樣發生著得獎者反覆得獎的現象。如在原住民報導文學獎中，從 2001 年至 2011 年間總共 4 屆的名單中，便可以看到高進發、趙啓明、石進益 3 人皆曾經獲獎 2 次，以短短 4 屆來說這等重複率已經相當高，以原住民報導文學獎此現象而言，在議題限定之外，同時也受到參賽者身份（具有原住民身份或父母其一為原住民身份）的限制，因此造成結果相對激化。但在原住民報導文學外，譬如生態類報導文學、人權關懷類報導文學等相關獎項，由於得獎者乃是從全國性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自然是長期在專業領域耕耘的報導者，如林雲閣獲得 1998 年生態文學暨報導獎、胡台麗獲得 1998 年永續台灣報導獎。此外，若將全國性報導文學獎的得獎者與地方性報導文學獎獲獎者名單做交叉比對，可以發現不少重疊，如白棟樑、李曉菁、趙啓明、屠佳等，顯然這種得獎者的高重複率並不僅限於全國性或地方性報導文學獎，而是整體報導文學圈的共同現象。

綜上所言，可以看出 2000 年代透過得獎者的高重複率建構出一個相對明確的「報導文學圈」，從地方性獲獎進而在全國性拿下獎項者不在少數，藉由反覆獲得報導文學獎的肯定，成為一個穩固的創作圈。儘管由於 2000 年代的文學獎由於未獲傳媒的奧援，儘管 2000 年代的文學獎實際作用備受質疑，種種文學環境的變化導致這批得獎者的知名度或文壇聲譽不若前輩作家，但透過全國性與地方性總數不少的報導文學獎反覆肯定，終究形成一批相對固定的新世紀報導文學寫作班底。

三、報導文學獎的侷限性

在上一小節，筆者論述到各報導文學獎的獲獎者重複率極高的現象，進而形成 2000 年代的報導文學創作圈班底，但在如此眾多的報導文學獎中，伴隨著高

重疊率的獲獎者／創作者，與經過限制的書寫主題（單一議題或某縣市限定），可以想像對報導文學的創作造成相當的侷限性與固定性，這是否致使報導文學的主題被侷限在部份縣市、而難有更宏觀的主題？1990年代的報導文學曾經藉由報導文學獎的鼓勵一度涉及國際性議題，2000年代的發展卻與之背道而馳，似乎將台灣的報導文學格局越做越小。這種現象是否也反映著近10年來台灣的整體氣氛，相較於國際性議題，更多的將焦點放在「本土」。台灣朝向內部的本土意識抬頭，地方文學獎的陸續誕生與此不無相關，隨之而來的似乎是報導文學關注議題的對內化與縮小化，這是否帶來報導文學新的困境？

近年許多論者對於地方文學獎、乃至地方性報導文學獎皆不乏批評的聲浪，首先是「題材的重複」。由於地方文學獎在培育地方文學風氣之餘，也期待凝聚地方共識，導致在徵獎主題上一般皆限制與該縣市風土人情相關，即便在沒有限制的極少數情形下，評審也相當傾向圈選出與該縣市相關的作品，以求「符合該縣市文學獎的宗旨」。然而一個縣市的歷史人文、地理風情經過長年的反覆挖掘難免陷入枯竭，創作者只好不斷重炒冷飯，同樣的古蹟、同樣的古廟、同樣的沒落傳統、同樣的歷史事件一再「還魂」，形成主題上的倦怠感。第二個問題是「創作者書寫模式的重複」，張耀仁便直陳這批反覆獲獎者的寫作模式完全千篇一律，皆是「側重史料切入，佐以耆老的說法，最終提出今非昔比之嘆」²⁴，由於報導文學創作圈的小眾，對這些得獎常勝軍而言，相同的寫作技巧顯然已經足以不斷囊括獎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創作者缺乏追求寫作變化的企圖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多次得獎的報導文學創作者幾乎都並非職業作家，即便不乏文史科系的學生、地方文史工作者，但相比專職作家只能說是文學界的「票友」，在創作僅僅做為興趣而非「志業」或「職業」的情形下，對創作技巧的變化自然更不抱持精益求精的野心。而這種「主題」與「創作模式」的雙重重複，事實上是透過創作者的運作形成明顯聯結的，張耀仁對此歸納觀察指出：「這一主題與論述重複的情況，尤其常見於重複獲獎者的作品（許勝雄專寫新住民個案訪談、林松範專寫小徑古道的報導、胡遠智的報導主題幾乎皆以傳統工藝或產業、人物報導為訪談主題）。」²⁵得獎者的多次得獎，來自於套數相同的創作技巧，在獲得得獎鼓勵的情形下，得獎者似乎「沒有必要」也「難以意識到」需要改變創作的

²⁴ 張耀仁，〈新世紀以來報導文學在台灣的論述分析——以地方文學獎得獎作品為例（2000-2009）〉，頁2。

²⁵ 同上註，頁22。

主題或書寫的模式，形成互為因果的現象。

由於題材受限需與指定縣市相關、創作者寫作模式雷同，進而導致第三個問題——「缺乏具有實際意義的問題意識與社會參與」。張耀仁對此直言道：

部份獲獎者一再重複，主題集中於產業報導，過度依賴一受訪者的說明，使得報導主題的延展性有限，無法見微知著，形同套式的感嘆與撰文筆法，孤立了報導主題，除了使閱聽眾獲知某一行業的來龍去脈外，對於社會問題的挖掘與解決，並無任何助益。……獲獎作品在囿於地方文學獎限制需與地方風土民情相關的前提下，報導主題猶如一座座孤島：不具公共政策的批判力，也無從聯結該主題以外更碩重、更有力的社會反思。

26

創作者與地方性報導文學獎的主題限制組成一個相對閉鎖的創作環境，在這個圈子中，創作者持續交出同樣模式、類似主題的作品，地方性報導文學獎再給予肯定，形成相互鼓勵的封閉循環，創作者也因受到支持肯定而缺乏向外尋找新題材的野心。可以說報導文學原本龐大的社會題材資源，由於地方報導文學獎的「割據」而分裂成一塊塊，造成創作者「見樹不見林」的盲點，難以探觸報導議題的全貌。在特定縣市的主題中泥足深陷，對整體社會的關注相對缺乏，無法在感嘆與懷舊之餘提出更多的深思與實質意義，成為 2000 年代報導文學最大的問題。

對於上述種種流弊，筆者以為，即使在地方報導文學獎中出現種種僵化的危機，但當論及 2000 年代的報導文學發展時，不能不將全國性報導文學獎一併納入論述，誠如筆者在本節前所論述，全國性報導文學獎與地方性報導文學獎代表著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的兩條線索，儘管地方性報導文學獎在獎額數量上遠較全國性報導文學獎為多，但仍不能忽略全國性報導文學獎所代表的脈絡。若將地方性報導文學獎理解為「地方風土與文化傳統類」報導文學的繼承，並將全國性報導文學理解為「社會運動與公眾議題類」報導文學的賡續，便可以看出 21 世紀台灣報導文學的整體發展走向「議題分工」的路線。在全國性報導文學獎中展現出的便是與社會具有實際聯繫的報導文學，訴求為「大議題」、「大社會」、「大論述」；而在地方報導文學獎中展現的是「小題材」、「小地方」、「小歷史」，兩者並不存

²⁶ 同上註，頁 25。

在優劣或必然的差異性，若是一味訴求報導文學必須背負「社會責任」、具有「社會意識」，似乎又將報導文學退回到《人間》雜誌式的道德束縛，而非鬆綁。

另一方面，筆者前述論到這批報導文學創作者多數並非職業作家，而經營社會議題一類龐大論述的報導文學需要長時間的關注、耕耘，2000年代的報導文學創作者多數並非記者、編輯、作家的情形下，長期的駐點觀察或大量的採訪幾乎不可能實現，在缺乏足夠的資料下要進行社會議題性的報導文學創作十分困難，甚至容易落入個人主觀陳述或片面表達意識形態立場的危險，對於具有其他職業身份的創作者而言，從生活週遭、熟悉的縣市風土做為經營報導文學的起點，是較為謹慎且可靠的做法。再者，即便如此，在地方性報導文學獎中仍有以小觀大、具有社會意義的作品，如2003年苗栗夢花文學獎中范瑞霞的〈夕陽可能無限好？—從泰安獨居老人居家照護談起〉、2003年屏東大武山文學獎則有楊麗容與蘇慧玲的〈被社會遺忘的母親——外籍媽媽〉、2008年新竹吳濁流文學獎也有屠佳的〈師科巷〉等，以上皆是地方報導文學獎的獲獎作品，然而探討的主題範圍相當廣泛，獨居老人、外籍母親乃至轟動一時的社會案件相關人，顯然地方性報導文學獎在限定的主題之外，仍然提供許多報導文學發揮的空間，仍有報導文學創作者從小範圍出發進一步試圖碰觸更多元的社會議題，延伸地方議題的觸角，透過這些地方性報導文學獎項的持續堅持，報導文學確實逐漸從枝葉之中結出一些不同的果實。

第二節 新世紀報導文學獎背後的運作與型塑

進入21世紀後，由於報導文學在媒體上的發表空間縮小，各式各樣的報導文學獎成為有志於報導文學的寫作者最主要的活動場域，然而文學獎背後的評審組成與文學獎運作又是如何型塑、推動著新世紀報導文學的樣貌？由於報導文學獎的來稿數量不如小說、散文、新詩等項目踴躍，在評審的組成上，除全國性報導文學獎外，地方性報導文學獎多省略初審的步驟，直接交由決審評審審查，加以報導文學圈成員的小眾，擔任評審者大多反覆擔任多次各大報導文學獎評審，由此可以想像在報導文學獎的背後，評審個人對得獎結果的影響甚大，因此這幾位少數評審個人的偏好、對報導文學的要求等，對得獎作品與得獎者形成極大的作用力。

然而評審與得獎者／參賽者之間在文學獎中的權力運作關係，筆者已經在第四章進行論述，因此在本節中，筆者將以 2000 年代的報導文學獎評審，與第四章中 1990 年代的評審分析結果進行比較，進一步探討在兩個 10 年中，除了評審本身組成的世代差異外，透過文學獎作用的評審與得獎者／參賽者間糾葛的權力關係又發生著何種轉變？

一、評審組成的世代交替與其意義²⁷

在 2000 年代報導文學獎的評審方面，常見的評審人選中不乏知名報導文學作家如劉克襄、藍博洲、廖嘉展、陳憲仁等，上述幾位幾乎都擔任過 5 次以上的評審，筆者試圖盡可能整理 2000 年代前後 10 餘年間的報導文學獎評審資料，然而由於不少報導文學獎缺乏歷史連貫性的公開審查會議紀錄，甚至在得獎作品結集中亦沒有註明該年度的評審委員，因此造成筆者在上表的資料處理上出現不少闕漏，但筆者以為即便透過現有的有限資料彙整，仍可以大致看出一些 2000 年代報導文學評審組成的傾向與現象。彙整評審名單及評審次數表列如下：

表 5-2

1997 年～2011 年 全國性與地方性報導文學獎 評審委員清單		
總評審 次數	評審人	評審獎項細目
15 次	劉克襄	台中中縣文學獎（3 次）、台中大墩文學獎（4 次）、彰化磺溪文學獎（5 次）、南投玉山文學獎（2 次）、文建會台灣文學獎（1 次）
11 次	何來美	苗栗夢花文學獎（11 次）
9 次	向 陽	台中中縣文學獎（3 次）、屏東大武山文學獎（1 次）、彰化磺溪文學獎（3 次）、耕莘文學獎（2 次）
	張致遠	苗栗夢花文學獎（9 次）
8 次	康 原	台中大墩文學獎（1 次）、彰化磺溪文學獎（5 次）
7 次	藍博洲	苗栗夢花文學獎（4 次）、台中中縣文學獎（1 次）、新竹吳濁流文學獎（1 次）
	黃秋雲	苗栗夢花文學獎（7 次）

²⁷ 關於本節所整理分析的各獎項評審資料，可參閱「附錄六：1997 年～2011 年報導文學獎評審列表」。

6 次	廖嘉展	台中中縣文學獎（4 次）、台中大墩文學獎（2 次）
	彭金龍	苗栗夢花文學獎（6 次）
5 次	陳憲仁	台中中縣文學獎（4 次）、
	魏貽君	台中中縣文學獎（2 次）、彰化磺溪文學獎（2 次）
4 次	張典婉	苗栗夢花文學獎（4 次）
3 次 共 6 人	孫大川	時報文學獎（1 次）、原住民文學獎（2 次）
	須文蔚	新竹吳濁流文學獎（1 次）、耕莘文學獎（2 次）
	浦忠成	文建會台灣文學獎（1 次）、
	古蒙仁	彰化磺溪文學獎（1 次）、新竹吳濁流文學獎（1 次）、文建會台灣文學獎（1 次）
	陳運棟	苗栗夢花文學獎（3 次）
	陳彥斌	台中中縣文學獎（3 次）
2 次 共 11 人	陳 列	台中中縣文學獎（2 次）、
	焦 桐	台中大墩文學獎（1 次）、耕莘文學獎（1 次）
	王家祥	台中大墩文學獎（1 次）、文建會台灣文學獎（1 次）
	阮桃園	台中大墩文學獎（2 次）
	潘國正	新竹竹塹文學獎（1 次）、新竹吳濁流文學獎（1 次）
	陳銘礪	台中大墩文學獎（1 次）、新竹吳濁流文學獎（1 次）
	路寒袖	文建會台灣文學獎（1 次）
	李文吉	原住民文學獎（2 次）
	利格拉樂·阿烏	原住民文學獎（2 次）
	鄭至慧	時報文學獎（2 次）
	廖玉蕙	時報文學獎（2 次）
1 次	王幼華、鍾喬、丘秀芷、陳明台、楊翠、吳明益、龔顯宗、李若鶯、蘇珊玉、曾貴海、傅怡禎、桂文亞、陳篤弘、林雙不、楊樹清、范文芳、黃卓權、張德南、彭瑞金、王麗華、林瑞明、鍾鐵民、羅任玲、陳浩、楊渡、舒國治、楊照、林德俊、林煥彰、陳祖彥、應平書、阿盛、羅位育、董恕明、謝世忠、高德義、陳義芝、陳敬介、巴代、啓明·拉瓦、夏曼·藍波安	

其中劉克襄為評審範圍最廣泛者，在 4 個地方性報導文學獎上多次擔任評審，並也曾出任全國性報導文學獎的評審；向陽、藍博洲、廖嘉展、陳憲仁亦俱是橫跨多個地方性文學獎常態擔任評審者。另外，有部份評審集中在某一文學獎多次擔任評審，如常態舉辦報導文學徵獎的苗栗夢花文學獎在歷年的評審組成

上，何來美、張致遠、彭金龍、黃秋雲以上 4 位便各自擔任至少 6 次以上的評審。這種現象一方面顯示地方性報導文學獎基於其地方性色彩，在評審的任用上往往有沿用的傾向。然而這類地方性藝文人士評審，一般而言也僅停留在同樣的文學獎中擔任評審，極少出現在跨區域、縣市的其他文學獎評審名單中，也幾乎不會擔任全國性報導文學獎的評審。然而，這種評審的組成傾向，讓人不免憂心地方報導文學獎在經年由同樣的評審篩選作品之下，是否容易陷入標準單一、缺乏多元乃至僵化的可能性。對此，張耀仁在分析地方報導文學獎時便指出：「同一批評審幾乎年復一年擔任同一類組的審閱工作，難免在競逐獎金的心態下，衍生出參賽者『對著評審胃口開菜單』，……。」²⁸這也再次凸顯出報導文學做為文學界中較為小眾的次文類，所衍生出的種種困境。由於報導文學一路以來的參與者不如新詩、散文、小說眾多，經過 40 餘年的發展，聲望、知名度與作品足以擔任評審者實際上也相當有限，相比於其他文類還可從學院中挖掘適合的評審人才，由於報導文學至今未能在學院中體制化，因此能聘請的學者也極為有限，報導文學的評審經年累月的由同一批人擔任，實有著不得不的為難。大體而言，可以看出地方性報導文學獎在評審組成上，大多以常態性的地方藝文人士加上 1 至 2 位以報導文學寫作或評論知名的作家、學者，試圖兼顧地方性及文類的專業度，然而這種評審組合方式由於地方藝文評審的人選往往因襲不改，有造成得獎作品內容僵化的疑慮。全國性報導文學獎在評審結構上則和地方性報導文學獎略有不同，可以看出學院型評審參與的必要性，如向陽、須文蔚、林瑞明皆是以學者身份擔任報導文學評審。

有趣的是，若將 2000 年代各大報導文學獎的評審名單，與上一章筆者所整理的兩大報報導文學獎評審名單做對照，²⁹可以發現其中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在 1990 年代時常擔任兩大報報導文學獎評審者如馬以工、金恆鏞、南方朔、柏楊、張大春、舒國治、胡台麗、黃碧端、李瑞騰、林文月、林明德，³⁰在 2000 年代卻幾乎不再擔任報導文學獎的評審，僅有少數者如舒國治、古蒙仁等少數人是從 1990 年代擔任評審至 2000 年代，然而對照此 10 年間眾多的報導文學獎，顯然這批 1990 年代的評審群已經逐漸讓出報導文學評審的位置。在 2000 年代擔任

²⁸ 張耀仁，〈新世紀以來報導文學在台灣的論述分析——以地方文學獎得獎作品為例（2000-2009）〉，頁 18。

²⁹ 可參見本論文第四章，頁 105。

³⁰ 筆者在此列出者為第四章兩大報評審委員名單中，曾擔任 2 次（含以上）者。

評審者如劉克襄、楊樹清、張典婉，大多是在 1990 年代被上一批評審所「拔擢」出來的「得獎者」，從得獎者而成爲評審，明顯出現報導文學獎在評審組成上的世代交替。且相比 1990 年代兩大報報導文學獎的評審組成，2000 年代的評審組成中，報導文學作家所佔比例極高，在 1990 年代時擔任報導文學類評審者不乏學院中的權威學者、傳播類學者或是散文家等，但 2000 年代的評審則幾乎由出身 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家們包辦，做爲學者身份而較常擔任評審者如向陽、須文蔚、阮桃園、孫大川者出任評審的次數雖然不少，但在整體評審的組成來說仍屬於少數。

2000 年代的評審由作家爲主體，學者或其他文類作家比例降低的現象，一方面證實報導文學在 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間，仍缺乏更多的專業學者投身研究領域，另一方面卻也顯示成長、知名於 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作家們已經成爲一個儘管小眾但堅實且獲得文壇認同的群體，足以從「得獎者」轉爲擔任「評審」的工作。相較於 1990 年代的評審們時常討論的「什麼是報導文學」、「這樣寫是不是報導文學」等定義問題，以及對報導文學可能後繼無人的憂心與疾呼，2000 年代的評審顯然已經接受報導文學輝煌不再、屬於小眾文學圈的現實環境，儘管對於報導文學獎的來稿作品質量仍不免有些微詞或批評，但對於文學獎能持續徵選報導文學、對於能有一批持續來稿的創作者、對於能偶見一些驚喜的成功之作，這群評審似乎都抱持著較樂觀而開闊的期待，1990 年代世紀末那些「驟然消逝的雷聲」、「報導文學死了嗎」與全數開缺的警示，已經不再出現在審查意見中，報導文學的發展前景隨著這群當初彷彿不被看好的 1990 年代得獎者成爲 2000 年代的評審群，走向一個較爲輕鬆的發展空間。

但這並不代表 2000 年代的評審不再持續探討 1990 年代評審群所留下的討論議題，在 2000 年代的審查意見中，仍可以看到評審們大致區分爲兩類立場，一類是對報導文學的體例、定義有所堅持；另一類是對報導文學的各種創作模式採取從寬以待、樂見其成，但這並不代表某一位評審絕對屬於某一類，在實際的情形上，個別評審往往基於個人的創作歷程、學術思考等因素，對報導文學堅持的要素不盡相同，或者堅持寫實性、或者堅持社會意義、或者堅持散文體裁，形成複雜的各自表述。例如在第 9 屆台中中縣文學獎的報導文學評審會議上，對〈小鰲〉的討論中，劉克襄質疑「對話的方式非常像小說情節。既然是報導文學的寫作，是否需要那麼多詳細的對白？還有利用大量對白來鋪陳報導文學，會讓人質

疑整篇文章報導的真實性。」³¹ 但向陽則提出「台灣的報導文學比較少以對白鋪陳。在美國的有些報導文學的寫法則是強調對白、場景和細節，甚至包括動作和表情的描繪，其實這也牽涉到報導文學的定義問題。」³² 然而最終向陽並不推薦這篇，原因是「整篇文章的敘述方式比較像散文，而不是報導文學。」³³ 兩位評審的對話過程便表現出報導文學評審們各自考量「什麼可以是報導文學」的複雜性，在這個層面上，2000年代的評審並沒有脫出上一個10年評審們的模式，儘管擁有更多的創作經驗，卻帶來評審過程中更容易搖擺、疑慮的諸多考量。

二、評審與得獎者、得獎結果間的聯結關係

誠如筆者在上一小節討論兩大報報導文學獎的評審組成之分析，報導文學圈的相對狹小，致使出任報導文學評審者的重複機率相當高，而在報導文學評審重複率高的狀況下，再加以考量本章第一節所論及的報導文學獲獎者也發生著高度重複的現象，兩者之間便出現可疑的關聯性。首先需要考量的是報導文學獎本身的稀少性，縱使筆者多次論及2000年代是報導文學獎設立數量的最高峰，但相比新詩、散文、小說三大文類的徵稿，報導文學仍是相當罕有，結果是報導文學創作者往往寫就一篇作品便「重複使用」，一篇尚未得獎而輾轉流浪於各報導文學獎的作品，遇上經常擔任報導文學獎評審者，由於報導文學獎的來稿通常不甚多，因此相當容易被「認出」，結果同一篇作品儘管在頭一、兩次無法獲得青睞，在經過多次的評比與汰選後稍事修正再繼續轉投其他獎項，只要肯等待機會，就有一定機率在他次獎項中獲選，操作著獲獎的高機率。

會產生上述現象，和參賽者的身份有一定關聯性。如筆者在第一節所論，2000年代從事報導文學創作的寫手們，和1980年代及1990年代的前輩們最大的差異便在於個人背景，相較於過去報導文學作家大多從事編輯、記者等媒體相關工作，近10年的報導文學作家則多是地方文史工作者，或是自發性對報導文學有興趣的業餘寫作者。地方文史工作者一方面與地方報導文學獎結合，持續挖掘地方本土的古蹟、建構地方史、甚至是村史，兩者在性質上的相輔相成促使這

³¹ 陳葦慈紀錄、整理，〈總體觀感與評審標準·報導文學類評審會議記錄〉，收錄於陳嘉瑞編，《早：第9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7年），頁296。

³² 同上註。

³³ 同上註。

類型的作家對於跨區域或全國性的議題缺乏興趣，而是針對「點」做更深的挖掘。業餘寫作者又可約略分為兩類型，其一是持續寫作報導文學者，另一類是偶發性的報導文學寫作者。前者雖然並非地方文史工作者，然而藉由個人的積極與堅持而能持續在各地方文學獎投稿、露臉。後者則大多是出於某一契機，可能是到某處觀光旅遊，或是某次機會聽聞特殊事蹟，出於偶然性的因素而嘗試寫作報導文學，這類創作者在地方報導文學獎中一般僅在得獎 1 次後便不再出現，這種整體現象就如李崇建所說：

台灣就這麼小，從事文學創作者也寡，寫作者此處落籍，彼處居住，他鄉工作，自然各處皆可插上一腳，各地投稿，遍地開花；又或者書寫風土人情，對這些善於文章或者杜撰的作者而言，更非難事，因此地方文學獎特色便少，得獎文章看來看去，缺乏新意。³⁴

在這段敘述中指出 2000 年代這批地方性報導文學獎得獎者／參賽者的兩大特色：素人化與普遍化。「素人化」³⁵指的是持續創作報導文學而多次獲獎者的業餘、非專業身份；「普遍化」指的是任何社會大眾皆可能成為一次性的報導文學創作者，這兩類現象構築成 2000 年代的報導文學獎得獎群體——時常獲獎者並非專業或全職的報導文學創作者，偶一獲獎者也往往不過是社會中普通的某一公民——從這個現象上可以說，1980 年代或 1990 年代那種全力關注特定議題、專一創作報導文學的時代的確已經結束，新世紀的創作者大多對報導文學不抱持太強烈的使命感或企圖心，即便有如胡遠智一類持續不懈創作報導文學者，仍與 1990 年代的創作者在寫作意圖與期待上有極大的落差。

1990 年代的創作者對於報導文學又是抱持著何種寫作意圖與理解，這個問題可以從這群創作者在 2000 年代的評審意見中看出端倪。

劉克襄：報導文學是否可以有不一樣的詮釋方式或新觀點的加入都是令人比較期待的。在地的環境問題已被討論了一、二十年，類似的題目再加上相同的處理方式會讓人有種老調重彈的感覺，期待未來報導文學的書寫有

³⁴ 李崇建，〈地方文學獎要走到哪裡去？〉，《百日不斷電—別為文學抓狂》，頁 102-103。

³⁵ 「素人」原是日文「しろと」，用以指在某些事物上沒什麼經驗、或非專業、專門的人、外行人、業餘愛好者。

更新穎的題材和更多不同的思維方式。³⁶

向陽：這次我自己的評審重點及原則有三：1、最起碼符合「報導」，也就是要有「人」，不能只是資料、文獻的堆砌，要去採訪，因為採訪與報導是有密切關聯的。2、文字不可使用太過修飾的語言。既為報導體，就要假設有一大眾讀者的存在，必須使用流暢通順、易於瞭解的文字表現；如果太文學性、散文的修飾表現，可能會影響報導的本質。3、在報導的過程中，要能掌握到報導對象的精髓、特質、特性，並讓閱讀者有所收穫。³⁷

藍博洲：報導文學這個新興的文類，一般來說具有報導性、文學性和批判性。現場的、準確的報導性是它成立的前提，也是它不同於虛構小說的基本性格；生動的、感人的文學性是它的必備精神，也是它不同於一般新聞報導的特質；所以它基本上是文學，不只是新聞。它雖然允許政論式的批評，但只要報導性和文學性能夠達到有機的、辯證的統一，它自有不說自明的批判性。³⁸……當然，報導文學也允許用小說的技巧去表現細節，可前提還得是真人真事。³⁹

透過上述劉克襄、向陽、藍博洲三位評審的意見，可以看出幾個 2000 年代評審的重點：「現場採訪」（真實性及田野調查的付出）、「結構」（文獻資料的消化、編排與敘述方式）、「題材」（是否有新的議題？舊的議題是否有寫出特色？）、「文體」（是不是報導文學？還是散文或是旅遊文學、心得？），尤其是「現場採訪」以及「結構」成為評審們最為注重且最期待參賽者改進的重點，「文體」和「題材」成為相對較不要求的評比要素。這是由於報導文學的文體爭論隨著 1990 年代的結束而逐漸被學界輕輕放下，評審們也逐漸朝向接納「鬆綁論」、接納不同體裁的報導文學寫作模式。在題材方面，由於地方文學獎的要求，評審們也瞭解並無法做出過多的要求，只好部份的與老調重調的題材妥協，然而這並非表示沒有特殊的題材出現，但相較於上一個十年的「國際性議題」，這個十年的報導文

³⁶ 陳葦慈紀錄、整理，〈總體觀感與評審標準·報導文學類評審會議記錄〉，收錄於陳嘉瑞編，《早：第 9 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頁 295。

³⁷ 林毓均紀錄、整理，〈總體觀感與評審標準·報導文學類評審會議記錄〉，《第 10 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8 年），頁 337。

³⁸ 〈報導文學類評語〉，《2008 年新竹縣市吳濁流文藝獎》，頁 218。

³⁹ 同上註，頁 221。

學更致力於挖掘「本土」的素材、聚焦到更小的角落，惟近年地方性報導文學獎中的題材也日益多樣化，筆者以為或許這和各地方文學獎逐漸放寬書寫內容及參賽者資格有關，儘管具有在地色彩的報導作品似乎容易討好，但成熟的資料結構能力、新穎的題材意識成為評審們更注重的特質。

另外必須一提的是，報導文學的「文學性」逐漸成為評審們相對願意寬鬆對待的一環，這是由於參賽作品數量稀少，加以評審們對報導文學如上述所說的「體例」、「現場採訪」有著絕對的要求，在作品呈現出實際採訪調查的真實性，以及結構和內容上的明確無誤，在文學性上即使較弱，即便文筆稍嫌生硬、不夠流暢，卻還是有較大的機會成為得獎作品。這種現象隱隱流露出報導文學在新世紀的另一個危機，儘管願意從事田野調查的人還未完全消失，但具備一定文字能力足以處理素材的人卻在逐漸減少，這與前述筆者所論之報導文學創作群的「素人化」、「普遍化」有著一定的關聯性。

最後必須指出，在 2000 年代地方性報導文學獎中存在著一個必須注意的運作弊病。例如藍博洲在幾次擔任苗栗夢花文學獎報導文學類評審時，其評審意見大多相當嚴厲，直指部份參賽作品「根本不是報導文學」，然而這類直言作品不當以釐清、提高報導文學質量的評審卻並非多數，如同筆者在上一小節所指出，地方性報導文學獎時常以地方藝文人士為常規評審班底，這類評審容易出於獎勵風氣的目的而偏向不夠明確的意見，但對於報導文學在地方報導文學獎的發展來說，卻並非是個樂觀的趨勢，反而使人擔憂對報導文學認識不清的參賽作品是否隨之不減反增，甚而得獎。例如藍博洲在擔任第 6 屆苗栗夢花文學獎報導文學類決賽評審時，優等作品〈禁忌的背後〉被認為「沒有特別的、深刻的報告（一般的書坊間很多）」，佳作的〈勝興螢河傳說〉、〈楓雪情〉更被直接批評「不是『報導文學』，只是普通的『遊記』」。⁴⁰相較其他評審對來稿多以文筆的流暢度、內容的可讀性為評估重點，⁴¹藍博洲的審查意見對於釐清報導文學的寫作有較大的意義。導致的結果是，地方性報導文學獎基於鼓勵地方文學風氣的訴求而盡量不產生「從缺」，從而即使參賽作品未能達到評審對品質的要求，也仍然必須從意

⁴⁰ 周錦宏編，《苗栗縣第 6 屆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苗栗：苗栗縣文化中心，2003 年），頁 540-541。

⁴¹ 可參閱其他評審的審查意見，見《苗栗縣第 6 屆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黃秋雲審查意見，頁 533-534、彭金龍審查意見，頁 535-536、張致遠審查意見，頁 537-539、何來美審查意見，頁 542-543。

見中妥協出幾篇「得獎作品」，使許多並非「報導文學」的作品得到報導文學獎，形成地方報導文學獎的部份瑕疵。

三、報導文學獎的昨日、今日、明日

筆者在前述已經指出 2000 年代的評審群實際上是由 1990 年代的「得獎者」所組成，這時必須回到這群評審還是「得獎者／參賽者」時，被 1990 年代的評審所批評的創作癥結點來討論其在 2000 年代的評審概念。在第四章的第三節，筆者論述到 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評審在審查意見中不時透露對於當時報導文學參賽作品「動不動便是空泛弱勢、關心智障、勘查災區，以及一知半解的假考古」⁴²感到不耐，張大春在審查意見直言當時的報導文學被創作者們視為「意識形態抗爭之中的深度工具」⁴³，1990 年代的評審們不斷反對報導文學作者過度表現自身立場與意識形態，儘管仍堅持報導文學必須保有對社會的關懷與現實意義，但同時強調應當讓報導文學回歸純粹的文學。有趣的是，當這批於 1990 年代被批評過度涉入社會、暴露過多個人的創作者升格成為 2000 年代的評審時，這種肩負社會使命感的作品反而稀有了起來，在缺乏發表空間的情形下，創作者擠向地方性報導文學獎的大門，出於討好或是容易經營等等因素，具有社會問題意識、具有社會參與性的作品卻難以一見，跨過新世紀而發生在報導文學中的變化，不得不使這群 1990 年代的創作者／2000 年代的作家感到昨日不再的惆悵，對此劉克襄便在報導文學獎的決審會議上呼籲道：「現在報導工作者和 80 年代的差異，在於人的實踐——人不只是一個觀察者，還是一個參與者。跟社區要有互動，對話要更深入。」⁴⁴今昔對比之下，上一個 10 年對社會的澎湃激情已如昨日夕陽般難以再現。

回到 21 世紀報導文學的今日，前所多次論及的地方性報導文學獎致使題材侷限的現象，在全國性報導文學獎中並非沒有著類似的問題，誠如第一節所言，由於全國性報導文學獎一般是針對特定議題而徵獎，但在有明確徵文目的的「文

⁴² 舒國治，第 21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審查意見〈作者要帶我們去哪裡〉，《中國時報》第 37 版，1998 年 12 月 23 日。

⁴³ 張大春，第 21 屆時報報導文學獎審查意見〈尋找發現的刻度——對報導文學獎從缺的說明〉，《中國時報》第 37 版，1998 年 12 月 23 日。

⁴⁴ 郭玉敏，〈報導文學類評審會議紀錄：用生命實踐一種新的可能〉，載於路寒袖主編，《神蹟：第 4 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 年），頁 330。

薈獎」(身心障礙者文藝獎)、「原住民報導文學獎」之外，甚至「台灣文學獎」的報導文學類歷年得獎作品中，原住民報導文學作品亦是年年榜上有名，從評審的審查紀錄中也可以得知從徵選伊始，原住民題材的作品便已然佔據大量，似乎不由得讓人感到報導文學獎脫離不了「政治正確」的傾向。離開激情的 1990 年代，報導文學做為「社會良知」、「弱勢支持者」的標籤似乎依舊穩固，透過全國性報導文學獎的議題性徵選，得到進一步的突出。這種現象與上段所說的「缺乏社會實踐」成為奇異的對照，在這些具有特定議題導向的全國性報導文學獎中得獎的作品／創作者，依然不一定具備上一個世代對社會的實踐與參與感，創作報導文學的目的不是「改造社會」、「喚起良知」，更多是出於「小我」的立場，從自身經驗出發進行私人的書寫，如獲得 2010 年台灣文學獎「原住民漢語報導文學金典獎」的〈親親小奇萊〉乃是作者書寫自己公公李來旺和姑姑撒昀為撒奇萊雅族正名運動的經過，充滿感性的筆調且使用不連貫的章節安排，顯然與過去認知中的「報導文學」作品差異甚大，具有更多作者個人的色彩。

另一方面，筆者於上一章討論 1990 年代的兩大報報導文學獎時，曾論述在整個文學獎機制中，評審與得獎者之間的權力運作關係，得獎者汲汲營營於「文學獎」乃是為了晉身文壇獲得更多鍍金的象徵資本以及評審的品味認同，然而這套在 1990 年代做為文學獎潛規則的運作模式，在進入 2000 年代卻不再呈現相同的模式，這種差異性在於文學獎與傳媒間的橋樑發生斷裂。在 1990 年代，兩大報文學獎藉本身的發行量為其奧援，為得獎作品提供一定的能見度，在每年徵獎結束後彙編的「得獎作品集」之外，兩大報的副刊必定分出一定版面輪番刊載得獎作品、審查會議或審查意見，因此得獎者獲得的不僅是文壇的資歷，更獲得知名度，作品的傳閱度亦隨之提高。在這個意義上，1990 年代做為兩大報文學獎徵獎項目的報導文學，其文類本身與作家、作品也得以維持曝光率，此時回頭審視 1998 年第 21 屆時報文學獎的報導文學全數開缺事件，其所造成的轟動與討論也是依賴著報紙與副刊本身的閱讀量才得以形成話題。

然而，2000 年代的報紙發行量受到業已成熟的網路媒體劇烈衝擊，報紙本身的傳播力量已經大不如上一個 10 年，報導文學在兩大報文學獎中逐漸退出舞台，自聯合報文學獎停止徵選後，時報文學獎也在徵選與否間搖擺不定。誠如筆者在第一節所論述，在此 10 年間，報導文學的主要活動場域已經轉移到其他全國性文學獎與地方性的縣市文學獎，但此二類文學獎間所共有的問題便是：缺乏

傳媒管道。由於此二類文學獎大多由官方資助，少數由民間主辦的獎項往往也難以持續徵獎，然而這些文學獎缺乏更多的平面媒體管道，導致得獎作品的唯一刊登之處便是徵獎後的「得獎作品集」，而這些作品集實際上的銷售與閱讀、傳播狀況卻是高度封閉，做為資料留存的意義甚至大過閱讀的層面，對此 21 世紀的文學獎現象，林佩蓉在《2006 台灣文學年鑑》中便指出：「文學獎在頒獎典禮之後，得獎作品如何行銷於社會大眾，進而被閱讀、評論以產生文學媒體的效應，似乎未曾被在意，……。」⁴⁵ 文學與傳媒間橋樑的斷裂，使文學獎在 2000 年代不再能為得獎者帶來如此多的文壇象徵資本與知名度、曝光率，得獎者能獲得的往往只是獎項本身提供的獎金，在文學獎遍地皆是的情況下，得獎者時常被譏諷為「獎金獵人」，然而誠如筆者上述所言，實際上是這些文學獎不再能為得獎者提供獎金以外的資本，才致使這種結果。在這種封閉的文學獎環境做為前提下，評審與得獎者之間的關係轉而成為相對獨立且較為疏離的狀態，在 2000 年代的報導文學獎中，由於載體已經不以報紙為主要舞台，因此在前章所論述的——由副刊主編讓渡給評審的絕對權力、評審透過傳媒力量而成為所有讀者的代表——這種情形已經逐漸消退，評審回到單純的「個體」，其所代表的審查意見也往往僅被看作其個人的單一意見，失去對得獎者行使絕對指導的作用，甚至時時被未獲獎者挑戰其做為評審的權威性。

21 世紀的文學獎如繁花盛開，但吊詭的是，眾多的文學獎並沒有帶來新一波的文學熱潮，反而更突出著文學的弱勢，文學被迫藉由文學獎來引起關注，甚至更多的是，藉由獎金來引起關注，然而失去傳媒的奧援，文學獎也不過是文學圈內人間封閉的選秀活動，在文壇整體的衰退之中，似乎反而窺見報導文學在文壇屹立不搖的一面。然而，下一個 10 年的報導文學在報導文學獎之外，還有什麼可能性？在全國性報導文學獎與地方性報導文學獎所代表的兩條分流路線之後，報導文學可以被期待走向何處？

第三節 新世紀報導文學的新風貌

綜合上述對報導文學的論述可知，2000 年代的報導文學並不如學界以為的沈寂，而是在特定的文學圈中展現活躍的生命力，本節將首先透過報導文學獎中

⁴⁵ 林佩蓉，〈台灣文學獎的回顧與展望〉，收錄於林瑞明編，《2006 台灣文學年鑑》（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 年），頁 30。

評審的意見及得獎作品提出新世紀以來，報導文學在文體、體裁、內容上，關於報導文學內部的發展趨勢，再進一步提出 21 世紀的台灣報導文學透過報導文學獎的分工，在外部的發展上朝向「單一議題化」與「在地書寫化」兩種轉型線索前進。

一、透過報導文學獎所呈現的發展趨勢

如前所論，2000 年代評審們在審查報導文學時的重點在於「現場採訪」（真實性及實地田野調查）、「結構」（文獻資料的消化、編排與敘述方式）、「題材」（主題新穎度）、「文體形式」（是不是報導文學），透過以上四個面向的討論，可以看出新世紀報導文學在內部的發展趨勢，與 1990 年代時有何種差異。

成功的報導文學作品應當具有消化實地採訪與文獻資料兩者的成熟技巧，並且進行具有可讀性的書寫與鋪排，因此現場採訪的真實性與結構上對文獻資料的使用屬於同樣層次的問題，必須一併討論。評審們在評審意見中對這類問題所提出的兩大意見是，僅僅採用容易蒐集的書面或網路資料而缺乏實地採訪，例如向陽與魏貽君在第 6 屆磺溪文學獎的審查意見表示：「惜乎在作品書寫的比重分配上，太過偏重於對文獻資料的回顧、學術論文的引述，資料的堆積程度多過於寫實的文學情境」、「即使是得獎的三篇作品，其實也有個人抒懷高於現場踏查、文獻引述多於實地訪談的瑕疵」⁴⁶；另一類意見則是指出，儘管作者進行了實地踏查或採訪，但不夠確實、全面，甚至淪為資料的驗證與堆砌，如劉克襄在第 5 屆磺溪文學獎的審查意見中便說道：「儘管作者們都很認真在做田野調查和蒐集資料，但很可惜，都未將採訪的史料消化得很成功，明顯看出文史資料堆砌的痕跡。」⁴⁷報導文學獎的評審們指出，部份參賽作品文獻資料運用過度冗長，造成閱讀上的負擔，在結構上無法順利消化文獻資料；另一部份的問題則是使用的資料過度淺薄，僅僅使用隨處可見的基礎資料而無法結合內容，例如陳彥斌在第 8 屆中縣文學獎的審查意見中便說道：「有一些文章結構較不紮實，但寫手很認真想要寫好，因為限於對報導文學寫作方式的不熟悉和缺少經驗，所以寫作較粗

⁴⁶ 魏貽君，〈報導文學類評審報告〉，收錄於陳慶芳編，《第 6 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4 年），頁 236-237。

⁴⁷ 劉克襄，〈報導文學類評審報告〉，收錄於陳慶芳編，《第 5 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5 年），頁 240。

糙，但代表性和題材方面皆有所擴大。」⁴⁸似乎在報導文學獎中這類的作品瑕疵仍不免反覆出現，顯示出參賽者大多對於掌握報導資料仍然生澀。但這種「操作」層面的問題卻相當難以解決，由於報導文學在近 10 年缺乏發表的媒體管道，加以前述所論，多數報導文學創作者亦非編輯、記者或作家身份，儘管其中不乏地方文史工作者，然而要能達到熟練的鋪排資料與訪查、創作出成熟的報導文學作品之程度，實在缺乏學習的管道，僅能一再從報導文學獎的得獎作品中進行模仿、揣摩，然而得獎作品有時也並非足以成為學習對象的模範之作。

再者是文體形式的問題。「報導文學應該是什麼」、「怎樣才是報導文學」的爭議從 1980 年代一路爭論，至 1990 年代達到最高峰，隨著 1990 年代兩大報導文學獎的設立，創作者不斷試圖挑戰新的手法，而評審在受到衝擊之後的爭論往往不過是各抒己見，最終仍然難以達成共識。隨著學界對報導文學相關討論的降溫，報導文學的文體問題更成為遙遙無期的待解難題。走到 2000 年代，儘管報導文學的文體、文類定義依舊未有定論，但在實際的創作上，無論評審或創作者皆逐漸朝向真正的報導文學鬆綁，肯定報導文學可以是散文、亦可以是小說等多元的可能。但多元的文體創作嘗試並不表示可以混淆報導文學的文類本質，評審們時常指出許多創作者對報導文學的認識論不清，例如魏貽君在第 6 屆彰化磺溪文學獎的報導文學評審報告中便指出：

報導文學亦非個人回憶錄、起居注的私體文學，這是創作報導文學的基本認知；本屆的參賽作品，不乏有把報導文學寫成傳記文學之例，……且在書寫的結構設計中，摻雜了過多無關主題的分歧情節，遂使報導文學有成地方文史導覽手冊、旅遊文學之嫌；評審委員建議，報導文學的書寫創作，應該盡量避免使用第一人稱「我」的敘述用詞，以免報導文學向心得報告傾斜。⁴⁹

「遊記式的心得」、「旅遊文學」、「傳記文學」、「論文報告」以上四者是評審們認為最常與報導文學混淆的文類，如同楊樹清在 2010 年第 12 屆彰化磺溪文學獎報導文學類的審查意見中所指出：「很多寫手投入報導文學書寫或競賽，又不想

⁴⁸ 張葦菱紀錄、整理，〈報導文學類評審會議記錄·總體觀感與評審標準〉（評審委員：陳彥斌、廖嘉展、陳憲仁），收錄於路寒袖編，《五欲供——第 8 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6 年），頁 286。

⁴⁹ 魏貽君，〈報導文學類評審報告〉，《第 6 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頁 237。

被當作報導文學對待，成了一般性的散文、傳記文學、旅行文學，差別就在於有文學性而無事件性，有報導性而無問題意識。」⁵⁰由這段意見可知，許多創作者即便投稿報導文學項目，但實際上對報導文學並沒有足夠的認識，甚至並不自覺所創作的是報導文學，在這種情形下，所呈現的作品自然距離真正意義上的報導文學越來越遠，造成許多並非報導文學的作品「越位」到報導文學類來競爭，反而使得評審們相當為難，結果報導文學獎的設立卻似乎使得報導文學的文類定義更加模糊，顯示出在缺乏典範性作品、欠缺學術上的定義、亦欠缺文學媒體的引介及曝光等多重困境的影響下，報導文學的概念對於文學創作者日益模糊，儘管積極面來說這種模糊地帶有創造出具有衝擊性的新穎作品之可能，但更多的是負面的，致使報導文學的邊線模糊在其他眾多文類的交界之中。

如果說 1990 年代兩大報報導文學獎帶出的爭議是報導文學是否有「散文」以外的可能、虛構性與真實性之間的界線可以到哪裡，那麼 2000 年代的報導文學卻更加著重在「怎麼寫」、「寫什麼」的創作本體問題上，在寫作體裁的爭議上。2000 年代的評審們抱持著更寬闊的包容性，在第 3 屆中縣文學獎的報導文學類評審意見中，擔任該次評審的陳憲仁、廖嘉展、劉克襄表示：

此次參選的二十一篇報導文學作品給予評審最大的觀感是，超越了報導的既有形式，或者以散文形式，或者以日記形式、小說形式進入題材，挑戰著評審對報導文學的觀點。但從創作者的角度來看，則是其自主地選擇認為最佳的形式說話。放在地方性的文學獎上，評審放棄其他文學獎的標準，而以更大的包容性鼓勵報導紀錄。而入選作品的多元性，也是三位評審的重要考量。⁵¹

三位評審俱是在報導文學寫作圈享有高度聲譽的作家，並且擔任多次評審工作，從上述評審意見可以看出 2000 年代的這群「指導者」對報導文學保持著相當開闊的期待，癥結點已經不在於「報導文學是什麼」，而是「報導文學可以怎麼樣」。以張伯笠〈逃亡鐵幕內〉為例，此篇作品獲得 1992 年聯合報報導文學獎佳作，

⁵⁰ 楊樹清，〈報導文學類評審報告〉，收錄於蕭青杉編，《第 12 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2010 年），頁 233。

⁵¹ 郭玉敏紀錄、整理，〈報導文學類評審會議記錄：總體觀感與評審標準〉（評審委員：陳憲仁、廖嘉展、劉克襄），收錄於路寒袖編，《暮色中的那抹殘紅：第 3 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1 年），頁 455。

該篇屬於個人傳記的、帶有小說色彩的書寫模式在當年的評審之中引起極大的討論，主要的爭論重點在於報導文學的「社會性」、「真實性」、「客觀性」界線問題，這些討論最終的核心問題依舊是「報導文學是什麼」。然而到 2000 年代，以 2008 年的新竹吳濁流文學獎報導文學類為例，其中〈黑暗部落 Smangus〉一篇已經近似小說，且真實性難以驗證，但最終仍得到評審的支持。又如 2009 年南投玉山文學獎報導文學類中，〈流水。武界。石〉一篇也是採取類似小說的筆法，文中不乏虛實難斷的對話情節，但評審委員之一的康原認為在不妨害整體事件真實性的情形下，適度的虛構筆法是可以接受的，另一位評審劉克襄對此則表示：「對於報導文學的形式，如果評審委員認為這種舊的形式再次復甦出來挑戰現有的形式對報導文學有價值，而有意給他分數的話，我是不會反對。」⁵²儘管劉克襄對該篇作品本身並不特別支持，但必須注意到的是，在書寫的文體上劉克襄並沒有反對意見，甚至認為這已經是「舊的形式」。整體而言，21 世紀以來的評審們對於眾多挑戰既有的報導文學書寫模式的作品大多樂見其成，討論已不再聚焦在「這種技巧不可行」、「是不是報導文學」，而是「這樣寫到底有沒有意義」以及「處理得好不好」，顯示出報導文學已然脫離 1990 年代的「完全真實」與「散文」迷思，能夠以一種回頭的態度面對不同文類體例的報導文學創作形式，對於未來報導文學文類定義的學術討論累積可供討論的能量。

從上述可知，在主題上與其說評審們重視題材的新穎度，不如說是注重「問題意識」以及「社會結合度」。如第 5 屆台中中縣文學獎報導文學類的評審們便直陳：

此次參選的十篇報導文學作品，和前幾年參選作品或其他報導文學獎的參選作品相較，處理的題材幾乎重複不變。相同的題材當然可以不斷被報導，但顯然這些題材一再重複的作品，大多堆砌太多文史資料，而缺乏深入的研究，難以看出作品的報導性，更別說具備文學性的報導作品了。所以此次，評審相當重視參選作品是否具有報導的問題意識。⁵³

從這段意見可以看出，評審們對於報導文學挖掘新的報導題材已經由於地方性報

⁵² 劉克襄，《2009 年南投玉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頁 410。

⁵³ 陳思嫻紀錄、整理，〈報導文學類評審會議記錄·總體觀感與評審標準〉（評審委員：邱秀芷、廖嘉展、藍博洲），收錄於路寒袖編，《根：第 5 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3 年），頁 264。

導文學獎的限制而趨於放寬標準，但對於報導文學應當具備與現實社會結合的「報導性」、「問題意識」仍相當堅持。又如廖嘉展在第 8 屆中縣文學獎審查意見中指出：「有不少參賽作品仍停留在史料爬梳，而且佔了相當比例；史料和現實要談論的議題間的問題聯結，仍需要再加強。」⁵⁴然而這種對報導文學「問題意識」的要求，事實上是 1980 年代的一種普遍概念，如同筆者在前幾章所論述，這實際上可以說是報導文學在該特定的時間點所承載的特殊使命，因此筆者試圖回到 1970 年代，在台灣報導文學所謂「風起雲湧」的時代以前，軍中的報導文學實際上便不具備有這種「問題意識」，假設我們同意這些都是台灣報導文學的一支，或許今日便不需要如此要求新世紀的報導文學必須走向「社會使命」的道路。歸根究底，由於成長、知名於 1980 年代的報導文學作家們如楊樹清、藍博洲、劉克襄，始終繼承著報導文學在社會使命、道德良心、喚醒大眾的這一脈訴求，進入新世紀後，這批作家儼然成為報導文學的「指導」，不免對報導文學抱持同樣的期待，但這種「規約」是否又使得報導文學的創作路線越縮越窄？或許值得另一種反面思考。

二、新世紀報導文學的「單一議題化」與「在地書寫化」

在本章的第一節，筆者已經論述全國性報導文學獎與地方性報導文學獎代表著台灣報導文學發展至 21 世紀的兩種路線，而這兩種路線在整個報導文學的歷史中各自有著時間性的連貫意義，以全國性報導文學獎為表現的發展趨勢為「單一議題化」；以地方性報導文學獎為表現的發展趨勢為「在地書寫化」，報導文學在新世紀進行了明確的分流，透過報導文學獎的細緻分工，全國的與地方的，主導著兩條不同的報導文學書寫模式。而這兩條路線又是從何種歷史發展脈絡中演進、轉型而來？對於新世紀的報導文學而言，型塑出何種明日的新面貌？

（一）單一議題化

台灣報導文學發展過程中，以單一議題為報導文學獎徵選對象的情形，早在 1970 年代便已經開始，在第二章中筆者論述到國軍文藝金像獎中報導文學類的

⁵⁴ 張葦菱紀錄、整理，〈報導文學類評審會議記錄·總體觀感與評審標準〉（評審委員：陳彥斌、廖嘉展、陳憲仁），收錄於路寒袖編，《五欲供——第 8 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頁 286。

設立，以及軍中報導文學特有的封閉性，從國軍文藝金像獎所發展起來的軍中報導文學實際上便是一種單一議題的報導文學，儘管徵獎公告上並沒有對主題進行明確限制，然而所書寫的主題基本不離軍旅生活、前線風光、愛國事蹟等，是由於創作者身份的限制導致內容具有明確的單一議題導向，此獎項開創出一種以報導文學體例專門書寫特定題材的模式。1980年代《人間》雜誌成立，透過《人間》雜誌編輯群的長期耕耘，在幾年之間挖掘出台灣社會種種未被人所注意的公共議題與社會現象，幾乎開創出往後30年台灣報導文學所能探觸之主題的所有面相。與之同時的是時報文學獎設立報導文學類，彼此呼應之下，一時間報導文學名家輩出，成長於此時者如古蒙仁、李利國、馬以工等，無一不是在日後備受推崇的報導文學作家，在層出不窮的社會挖掘中開出報導文學的全盛時代。

1990年代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呈現出社會運動的激情年代，在1980年被挖掘出的各種議題都得到大聲疾呼的機會，台灣社會進入面對解嚴之後衝破禁忌、眾聲喧嘩的狂歡與徬徨，邁入混亂的成長期。報導文學趕上時代的腳步，成為這個時代最佳的紀錄，這時期的報導文學更朝向激烈的意識形態表現，個人主張的訴求，與社會運動結合進而實現報導文學本身的社會實踐性。然而隨著1990年代尾聲，社會運動的激昂也告一段落的同時，報導文學亦隨著兩大報報導文學獎的停止徵選而忽然失聲。但2000年代的來臨卻開出另一番的局面，繼承著上述的發展脈絡，從1980年代以來持續引起社會關注的重點議題，諸如婦女人權保障、原住民族問題、環境生態保育等，經過1980年代的挖掘、1990年代的社會宣傳，到2000年代結出獨立而成熟的果實，隨著各種官方與民間的相關組織成立，這些議題得到各自發展的完整空間，進而全國性的報導文學獎項大多與這些議題或組織相關，透過報導文學的功能性對這些議題保持關注、持續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代的報導文學相關研究論著，也大多朝向單一議題的方式進行研究。碩士論文的成果上，在報導文學作家專論以外，關於原住民報導文學者從2000年以降有林秀梅《台灣原住民報導文學作品研究》、陳翠屏《原住民報導文學中的主體建構》⁵⁵、陳震《原住民報導文學與原住民運動之聯繫——從公眾行動的角度探討報導文學的社會功能》，在女性議題方面則有陳柳妃《台灣女性議題報導文學：以文學傳播理論為核心的初探》，甚至出現以921大地震

⁵⁵ 陳翠屏，《原住民報導文學中的主體建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相關報導文學為研究主題者如林雅雯《九二一大地震報導文學研究》⁵⁶，顯示這種朝向單一議題集中的趨勢不僅僅發生在報導文學的創作或獎項上，同時發生在學術界中。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這種報導文學朝向單一議題化的趨勢，從 1970 年代開始隱約成形，經過 1980 年代的議題開發、1990 年代與社運的結合，在 2000 年代透過全國性報導文學獎而固定為報導文學發展的其中一條脈絡。在優點上，報導文學的社會實踐性得到穩固的發展，透過反覆參與社會議題的徵獎，報導文學的社會參與已然得到深化，確立了報導文學在這些議題上的重要作用。但從缺點上來看，其一是沒有設立單獨報導文學獎的議題更加得不到創作者的關注，由於獎項的主題限制，致使更多缺乏關注的議題即便為創作者所注意、書寫，也得不到發表的空間，使得已經弱勢的社群更加弱勢。即便是獨立設立報導文學獎的大型社團或議題，仍不免使人疑慮的是，在缺乏文學媒體支援作品曝光率的情形下，除了得獎者名單與作品名稱外，這些報導文學作品在今日還能吸引多少人閱讀、甚至知悉，都還頗有斟酌的空間，似乎結果不免陷入一種「圈內人」、「精英式」的封閉性競賽結果。

（二）在地書寫化

1970 年代的報導文學在國軍文藝金像獎之外，《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在各自副刊進行的改革也相當程度的推動了民間報導文學的發展，透過企劃編輯、重視文化感的改革，這類新型副刊呈現積極介入現實、關懷本土的企圖，並試圖建立屬於台灣的文化形象，在這種風氣之下，副刊透過報導文學成功的引起社會大眾對台灣本土藝術家如洪通、朱銘的注意，一時間引起極大迴響，成為報導文學書寫台灣在地文化的先聲。進而在 1980 年代的時報報導文學獎中，出現許多具有強烈在地色彩的作品，諸如邱坤良〈西皮福路的故事〉、林元輝〈蘭陽平原上的雙龍演義〉、林昭〈蘭嶼今昔〉等，皆是針對特定文化環境下的人文風土進行描寫，無論採取學術性或是抒情式的筆法，在 1980 年代的得獎作品中已經可以發覺這些挖掘台灣本土的人文歷史之作品，即使這類作品受到黃春明等批評為「獵奇」、「境內異國情調」，⁵⁷但仍不能抹煞其在台灣文學界乃至台灣社會建構

⁵⁶ 林雅雯，《九二一大地震報導文學研究》，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⁵⁷ 陳映真，〈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聯合報》第 37 版，2001 年 1 月 18 日。

台灣本土認同、主體意識覺醒的過程中所達成的貢獻。

在 1990 年代的發展中，兩大報報導文學獎的作品中，儘管不如 1980 年代充滿明顯的地方色彩，但在寫作技巧上隨著中國作家的加入帶來了傳記、日記、第一人稱小說、非虛構寫作等新的報導文學寫作模式，在之後的地方性報導文學獎中得到進一步的學習與發揮。在題材上，1990 年代的作品由於不如 1980 年代大多刊登在報紙、雜誌等刊物上，新聞色彩相對較淡、而有更多的文學性在其中，因此大多抒情性、主觀性及個人感嘆較強，如楊樹清、張煥宇、曾吉賢〈消逝的漁民國特〉、陳姿羽〈唱他的歌，記他的名字〉，這類偏向今昔文化對比、沒落傳統或產業、消逝的歷史與人物等，在地方性報導文學獎中都得到了繼承。1998 年台灣凍省（廢省、精省、省虛級化），自此台灣省議會不再具有地方自治決策及監督的權力，各級縣市政府依照地方制度法得到較大的地方自治權，在第一節論及地方性報導文學獎時，筆者曾指出 1998 年前後地方文學獎紛紛設立的時間點意義，經由政治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因此在進入 1990 年代後，台灣各縣市積極塑造自身的凝聚力與群眾認同，從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與挖掘開始，至此趨向由大而小、聚焦到生活周遭更細微的當地人文采風，配合各縣市文學獎的成立，獎勵地方文學風氣之餘也同時在重新建構各地方的歷史。

進入 2000 年代的報導文學，由於傳播媒體提供的奧援大幅減少，過去傳統紙本的傳媒版面已經不再為報導文學所開啓，但報導文學隨著地方性文學獎的成熟，儼然成為各縣市「本土化」訴求的依靠與工具，這股報導文學與本土化之間的關係，成為值得留意的新趨勢，並進而延伸出「作家素人化」、「題材地方化」的現象。綜合上述，報導文學經過台灣主體意識、本土認同的長期建構後，逐漸將眼光向內，發展為著眼台灣內部的在地書寫模式，但必須注意的是，報導文學的在地書寫化另一面相是，宣傳作用大於文學意義的問題，筆者在上述論及地方性報導文學獎的主題限制時已經談到，多數地方性報導文學獎都對書寫題材有所限制，結果是創作者受制於規定，不得不交出一些討好當地的作品，淪為為某縣市文化做文化宣傳。但在地方性報導文學獎對主題限制的爭議中，如同國際化與本土化的爭論，地方報導文學獎本身基於地方文學獎的在地色彩，在這個大命題下做出存續地方文化的耕耘亦不失努力，反面的說，當這些作品被置於「台灣報導文學」這個大框架下則顯得不求進步，因此是「台灣」這個大命題與「地方」這個小命題之間著眼的差異性使然。客觀觀察新世紀以來的台灣文學環境，提供

給報導文學的文學獎、版面皆已經大不如前，有志寫作報導文學者不得不朝向地方文學獎角逐有限的名額，因此這種出於地方性而導致的千篇一律與重複書寫，也必須從作者們「可能的非自願」去理解，而地方性報導文學獎持續地供給報導文學創作者穩定的競技場與發表機會，在存續報導文學、建立新世代的報導文學寫作班底等方面，俱值得高度的肯定。

（三）社區大學中的報導文學⁵⁸

在上述兩條脈絡以外，筆者在此想提出社區大學中的報導文學相關課程，做為「在地書寫化」的補充。社區大學深入台灣縣市各地，與民間的關係相當密切，以此觀測報導文學的「在地化」情形，應為一個可行的切入口。在社區大學的資料部份，筆者以「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網站⁵⁹為主要資料來源，對其中登錄的共 85 所全國各級縣市社區大學做 2001 年至 2010 年的課程調查，然而各社區大學的網站資料詳簡不一，其中不少社區僅列出近 2、3 年的開設課程，筆者僅能就各網站中所能提供之最大限度的課程資訊做出整理歸納，以此做為蠡測報導文學與民間結合度的一種可能窗口。由於社區大學的課程名稱較為多元，其中難有「報導文學」如此確切的課程名稱，在課程的認定上，筆者以文化踏查、田野調查以及「是否有寫作成品」為認定準則，課程名稱或綱要中有踏查及寫作者，則視為報導文學的相關課程。另外在社區大學的開課方式上，每年基本分為春季班與秋季班，多數社區大學另外在暑假期間開設暑期班。

透過對資料的觀察，可以將社區大學中的報導文學相關課程分為兩種類型。其一是最為常見的有關原住民文化的課程，在行動上以部落實地踏查、訪問部落耆老為主，進而瞭解原住民文化、建構部落史並傳承、保存部落文化。以台東而言，由於有眾多原住民文化、部落，因此這類型的課程相當常見，整體而言這類以原住民為訴求對象的報導文學課程在所有相關課程中佔相當比例。其二是在都會區的社區大學開設報導文學相關課程，則大多與「地方文史色彩」、「師資」二者有相當關聯。以前者而言，如淡水、彰化為台灣傳統歷史豐厚之處，致使這幾個地方在這類踏查、寫作的課程上較常出現，一方面出於文史工作室的合作與推

⁵⁸ 關於全國各社區大學報導文學相關課程的開設情形，可參閱「附錄七：社區大學報導文學相關課程開設情形列表」。

⁵⁹ 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http://www.napcu.org.tw>

動，二方面也基於文化保存的需求，「村史建構」、「社區史編輯」課程皆屬於此類。在師資上，由於社區大學的開課教師相對固定，若某位教師的課程受到學生歡迎，往往很容易長年開設，因此從筆者整理的「社區大學報導文學相關課程內容簡介列表」⁶⁰中，可以看出幾位常見的師資如廖守義、吳智慶、陳板、顏錫沂等，在其帶領下，該地區的社區大學也較容易經常性的出現這類踏查文史寫作課程。而在台北市的社區大學中，這類地方文史踏查的課程相當多，雖然大多沒有實際的寫作課程，但配合各社區大學的社區報編輯、文史報編輯課程頻繁開設，顯示著地方文史工作已然縮小到更小的地區範圍。筆者以為，這類地方文史踏查類的課程，可以視為報導文學下的一股分支，儘管不一定有報導文學寫作的要求，但對於講求田野調查、實地採訪的報導文學而言，這類課程可說是民間一股積極的潛力，同時呼應著報導文學在地書寫化的趨勢。

小結

總結本章，筆者試圖透過全國性報導文學獎與地方性報導文學獎各方面的資料分析，勾勒 2000 年代以來的報導文學在內部轉型和外部趨勢上的一些輪廓，提出「議題單一化」和「在地書寫化」兩條自 1970 年代以來的發展線索，在 21 世紀呈現何種的分工與匯流，並藉由社區大學中報導文學相關課程的開設，做為報導文學在地化、民間化的切入點，顯示報導文學藉由社區大學的鄉鎮文史書寫課程、地方性文學集會⁶¹等，形成一股不同於文學獎的民間力量，並進地推動著報導文學向前邁進。因此，台灣的報導文學一方面走向全國性的、單一議題性的、精英性的發展路線，另一方面也同時朝向地方性的、在地書寫性的、民間性的方向前進，兩條線索支撐出 21 世紀台灣報導文學的豐富面貌，既是分工的支流，也是匯聚的大川。

但對於 21 世紀的報導文學，仍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在社會運動逐漸走到尾聲的今日，報導文學還有多少「為弱勢」發聲的機會？正如筆者在前所論述，特定議題的設立報導文學獎，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自己的中心地位，但同時也排擠了邊緣的族群，當過去的弱勢成為新的中心，報導文學還能如何關注這

⁶⁰ 筆者整理社區大學中報導文學相關課程的內容簡介，可參閱「附錄八：社區大學報導文學相關課程內容簡介列表」。

⁶¹ 如 2008 年的樂生文學週末第二季便以報導文學為主題，與樂生療養院的社會運動訴求結合。

些新興的「黑暗角落」成爲很大的疑問。在傳播的問題上，也成爲報導文學一個難以迴避的困境，張耀仁在論及 21 世紀的報導文學傳播效力時，很清楚地指出問題所在：

而更根本也最吊詭的問題，在於地方文學獎得獎作品總會匯編成得獎專輯，但這類專輯的傳播效力為何？是否更容易被閱聽眾取得？其中的傳播管道與效果使人憂懷，畢竟這類專輯通常流通於得獎者間，閱聽眾被架空了，連帶報導文學的議題無人關心，也少有人獲知，在這一傳播流通上，新世紀報導文學的傳播效力，顯然遠不如七〇乃至九〇年代的前行代報導文學。

62

這段話點出了新世紀報導文學最大的危機。當進入 21 世紀的報導文學完全依附在各類文學獎的身上時，這些與報紙不再息息相關的各種文學獎顯然缺乏傳播的管道，獲獎者所能透過獎項而得到的「知名度」大幅下降，這在許多討論新世紀文學獎的困境的篇章中已經有所論及。然而當這種情況發生在更高度要求傳播性的報導文學身上時，矛盾性便顯得更加激化。當報導文學失去傳播的舞台，其本質是否就已經、或是必須發生轉化？新聞媒體的激增、紀錄片的興起等，報導文學過去的獨特生存空間不復存在，文學終究難以在即時性上超越影音媒體，報導文學改爲朝向「非即時性」的地方文史寫作、「非急迫性」的社會議題報導也就顯得不得不然，由此觀點來看，似乎在報導文學的發展趨勢上有了一個新的詮釋。

綜上所述，台灣的報導文學在進入 21 世紀之後產生民間化、在地化與功能化的傾向，甚至可以以「本土化」來做更大範圍的涵括。台灣的報導文學隨著台灣整體環境對本土的關懷與挖掘，逐漸走向更精緻而小範圍的發展，且隨著這股浪潮紮根於各社區、縣市、村落，即便在突出單一特定議題的獎項中，實際上也是關注在台灣內部的社會議題上，當中失落的是從台灣走向世界的宏觀視野，取而代之更多的是向台灣內部的關注。過去 1990 年代兩大報文學獎中有中國作家出入其中、題材跨足國際的情形在今日台灣報導文學中畢竟是漸漸消失了，這點不能不說是台灣報導文學的一塊重大闕漏，這個意外的偏差與遺漏似乎是與台灣整體社會的趨勢相合，成爲不得不然的遺憾。

⁶² 張耀仁，〈新世紀以來報導文學在台灣的論述分析——以地方文學獎得獎作品爲例（2000-2009）〉，頁 25。

2000 年代的報導文學從「議題性」、「在地性」兩條路線的細緻化分流上得以產生一些新的突破，藉由近 10 年間全國性與地方性報導文學獎的雙方支援，報導文學在創作上的「鬆綁時代」確實已經來臨，報導文學亦得到比較明確的定位與持續發展的契機。報導文學與社會運動結合的時代似乎隨著台灣社會的環境改變而告終結，報導文學所內含的「文以載道」期待也隨著文學界生態的改變而被迫放下「良心大業」，回歸更單純的報導面、文學面，而不再背負著任何「喚醒」的責任，這種改變對於報導文學來說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鬆綁」。或許可以期待 21 世紀的報導文學，在離開激情喧嘩的社會前線後，從舒展的姿態中迎來美學上成就的新可能。



第六章 結論

過去的報導文學研究傾向將「台灣報導文學」視為一個完整而一致的文類來進行歷史源流上的討論。但筆者在此想建構的是「台灣報導文學」實際內容上的多樣異質性，這並不僅僅是從時間斷代的切割上做出區分，而是自時間點的差異，實際上台灣報導文學的文類內涵也不停在發生著變動，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直至今日我們仍無法對「什麼是報導文學」做出一個公認而肯定、確切的答案，筆者提出的理由便是：台灣報導文學在不同時期、不同勢力的介入之下，從繼承中國報告文學傳統的宏篇巨製、主題明確的軍中報導文學，進展到副刊推動時期較為輕薄短小的議題設定模式，再到兩大報文學獎時期以結構完整的散文形式書寫台灣風土歷史與民情，乃至傳媒發達後由專門性雜誌如《人間》充滿圖文搭配的專題模式，最終進展到地方性、社區性的各地文學獎與在地書寫——台灣報導文學的內涵意義隨著四十年的時間遷移以及文學場域內部的權力轉移也時時刻刻在發生著質變，因之我們無法為之輕易的下一定義。換言之，報導文學亦並非如上一個世紀末所說的「消逝」或「死亡」，而是不斷在文學的場域中變換其位置，以另一個模式持續在發聲。

在第二章中，筆者論述軍方、官方、民間多重的文學勢力在報導文學中角力的現象，各種文學社群的介入使報導文學自 1970 年代起變呈現出複雜的多樣性，而不能僅以高信疆帶領下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做為 1970 年代報導文學的全貌，亦不能將 1975 年「現實的邊緣」專欄視為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的起點，此一事件固然有其關鍵意義，但仍必須將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類、嘉新新聞獎以及各大文藝獎章的對報導文學的型塑力量加以考量，方能看出整個時代中報導文學呈現何種複雜而多重的現象。因此，1970 年代的報導文學乃是同時為軍方、官方、民間三者所交互影響，儘管於軍方報導文學起步較早，但由於在傳播上的侷限，文學界的話語權終究落在民間媒體手上，而正此時的文化界正過渡著官方意識形態的緩慢淡出，但官方勢力對文學、乃至報導文學的影響力仍不能輕忽。官方的黨政勢力，軍方的內部操作皆與民間媒體機構同時並存，這是談論

1970 年代報導文學時不能忽視的一點，三者勢力彼此各有一批不同的文學生產者、不同的評鑑組織，各自擁有控制下的文學獎，最終具有差異性的文學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正顯示著報導文學發展中不同文化勢力的排斥與融合。

在第三章中，筆者企圖透過時報報導文學獎與《人間》雜誌，分析 1980 年代的報導文學呈現與上一個時代的報導文學在內涵及表現上的差異性，報導文學從文學副刊轉戰文學獎舞台與專業刊物，活動場域的兩重位移加強了報導文學的文學性以及社會實踐性，相較於 1970 年代則是在探討議題上有極大幅度的拓展。1980 年代報禁、黨禁相繼解除，迎來解嚴的同時並與社會運動相結合，挖掘出台灣社會更多新的報導議題，《人間》雜誌在這些目標上為報導文學完成了實踐，並形成報導文學在此時期專業化與精英化的傾向。1980 年代的報導文學呈現一股熱潮，但隨著《人間》的停刊，報導文學出現沒落的危機，過度的適用性、氾濫的抒情性、牢固的意識型態、浮誇的說教心態、因襲的舊觀念、難產的新世代，這六點批評皆是報導文學特性的一體兩面，也是 1980 年代報導文學的流弊。而時報報導文學獎與《人間》雜誌的出現，顯示報導文學的發展已然進入成熟階段，關於報導文學的理論探討和爭論隨之而來，但終究只是駁雜、言人人殊的論述，反而更加模糊了報導文學的面貌。走到 1980 年代的尾聲，逐漸失去媒體寵愛與文學舞台的報導文學，顯示出報導文學對於媒體的高度依賴性，失去傳媒支持的報導文學一時間無以為繼，加以內部亦陷入難以定位的困境，隨著 1980 年代的行將結束，彷彿也迎來報導文學式微的危機意識。

筆者在第四章將 1990 年代的台灣報導文學發展聚焦在聯合報報導文學獎與時報報導文學獎，藉以釐清 1990 年代報導文學的質變、轉型、危機或新生等可能。藉由兩大報文學獎中的評審與參賽者間的權力運作分析，為當時的報導文學劃出有規則可尋的輪廓，且透過兩大報在社會以及文壇的影響力，追蹤報導文學在整個文學場中的位置以及作品、評審在這場域中的意義。兩大報報導文學獎在整個十年間發揮著對報導文學強大的型塑作用，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形成由文學獎而產生的評審班底與作家世代，此外也對報導文學的典律化產生著制約的力量，文學獎得獎者的世代交替，以及其發表場域的改變、閱讀群的更替、關注議題的轉移等，報導文學在文學獎下呈現出兩股相反的發展趨勢，危機與轉機只在一線之隔。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表現出特殊的「雙重性」，並非僅僅如以為的悲觀、行將沒落，式微與轉型的差異僅僅在於詮釋角度的不同，報導文學隨著 1980

年代的結束而逐漸脫離媒體的鎂光燈之下，但也迫使報導文學不得不積極走進社會、融入民間，在議題上更進而立足台灣而放眼國際，中國作家的加入也帶來了更多樣化的主題與書寫模式，在報導文學的創作手法上開出更多不同的可能性與新方向，成為報導文學茁壯、進而鬆綁的契機。

筆者在第五章收集自 1998 年前後至 2011 年的報導文學相關獎項，透過分析獎項的屬性、分佈、得獎者、得獎作品、評審委員等多重方向，來釐清地方文學獎中的報導文學與此前之報導文學所呈現的異同、轉化或延伸，以這些多重的脈絡交織出報導文學在新世紀的「議題集中化」與「在地書寫化」兩條主要線索，以及與過去 30 年的報導文學歷程在脈絡上的連結關係。此外，藉由與基層民間合作最為緊密的社區大學做為另一個報導文學在地化的切入點，顯示這股在地化的趨勢中，有一個不同於文學獎的民間力量正在發酵。然而，當 21 世紀的報導文學完全依附缺乏傳播管道的文學獎上，便出現相較此前更激化的矛盾性，完全沒有傳播性的報導文學還能是「報導」文學嗎？成為新的棘手問題。新聞媒體激增、紀錄片興起、閱讀人口的減少等，在在使得報導文學的生存空間受到壓縮，由於報導文學在即時性上的弱化，這種議題性與地方性的趨勢成為不得不然的發展趨勢。全國性與地方性報導文學獎各自所代表的兩條發展線索，匯流成新世紀報導文學的風貌，報導文學在創作上的「鬆綁時代」確實已經來臨，回歸更單純的報導性、文學性，也使得報導文學得到比較明確的定位與持續發展的新窗口，可以期待未來作品的累積能促使報導文學的學術理論得到體制化的建構。

從報導文學發展的起始，便不斷有建構學術理論的呼聲，然而經歷 40 餘年的發展仍未能達成一個有效的成果，缺乏學院的建制或許是報導文學無法在台灣文壇具有穩固地位的關鍵因素之一。在 1980 年代、報導文學最為風生水起的時期，即便在文化大學的中文系及新聞系曾經設有「報導文學」課程，但不久隨即取消。¹進入 1990 年代，報導文學藉由兩大報文學獎引發最後一波熱潮，然而仍未能引起大專院校對此文類的投入。就其根本，報導文學終究被視為是個「資淺的次文類」，前後 20 年的熱潮時間不夠長，未能被學院認可其「經典地位」，加以在美學程度上不如現代主義作品具有審美的相對高度，報導文學本質上偏重寫實性與本土性、在讀者群上以社會大眾為訴求，在短短二十年間積累的作品亦未

¹ 高信疆，〈試探·問題與可能〉，收錄於文建會，《中華民國 71 年文藝季座談實錄》（1983 年），頁 432-437。

能符合學院對美學、技藝的高度門檻要求。無法進入學院研究的殿堂，也就失去與年輕研究者的連結，未能在文學研究中取得一席之地，再次導致報導文學被歸於「次文類」的位置。這種殊途同歸的尷尬與冷淡，一再地將報導文學打入冷宮，缺乏研究者關注的文類無法成爲氣候，這竟是曾經報導文學不斷循環的宿命。

整體而言，筆者在本論文的論述主要著重在報導文學獎的分析上，從 1970 年代的國軍文藝金像獎、1980 年代的時報報導文學獎、1990 年代兩大報報導文學獎，乃至 2000 年代的全國性及地方性報導文學獎，筆者期待藉由一種歷時性的報導文學獎觀察做爲線索，觀察出報導文學在這 40 餘年的發展中，透過文學獎的獲獎與評審兩個層面展現出何種變形與其意義。透過對報導文學獎長時間的追蹤觀察，筆者在 2000 年代的報導文學獎論述中論及此時期報導文學得獎者的高度重複現象，事實上在 1990 年代兩大報的報導文學獎中，也不乏看見重複得獎的現象，如楊樹清、劉克襄等俱曾獲得 2 次以上的獎項，但由於 1990 年代的報導文學獎尚未如 2000 年代因地方性文學獎而出現眾多的報導文學獎項，因此在個人重複得獎的次數總和上不會像 2000 年代如此驚人，這個情形再次說明了報導文學圈的小眾現象，自 1980 年代以降，報導文學獎中的重複得獎率始終偏高，這個現象並不是偶然，而是報導文學本身創作圈狹小使然，如何擴大報導文學的參與度、進而提昇報導文學創作圈的範圍，成爲報導文學在 21 世紀最大的挑戰。

在本論文的侷限上，由於採取以報導文學獎做爲觀察 40 年來報導文學發展的主要脈絡，不得不疏忽於討論報導文學相關刊物的傳播以及報導文學專書的出版現象，誠爲一大遺憾。在報導文學刊物上，例如 1967 年創刊的《慈濟》月刊，雖不以報導文學爲號召，但作爲發行量一度衝破三十萬、台灣發行量最大的期刊，發刊詞中仍強調所有採訪將以「報導文學形式」爲主。²而作爲報導文學標竿性刊物如《人間》等雜誌雖已停刊多年，但在雜誌媒體百家爭鳴的 1980 年後，也出現更多默默耕耘的刊物，或地方性的或目標性、議題性的以「報導文學」爲標榜持續出刊，其中知名者如《大自然》³、《山海文化》⁴、《新故鄉》⁵雜誌等。

² 《慈濟》月刊發刊詞寫到：「《慈濟》月刊於民國 56 年 7 月創刊，以報導文學形式，記錄當代真實且善美的人物與事蹟；保存發生在此時、此地，足以留傳後代的生命精粹。」

³ 1982 年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成立時創辦此季刊，迄今至 2010 年 5 月共出版 107 期。

⁴ 1993 年由孫大川召集創辦「山海文化雜誌社」，並編輯《山海文化》雙月刊，同年 11 月出版創刊號，是台灣第一份以原住民報導文主體的雜誌，迄今出版 26 期。

⁵ 1999 年，廖嘉展在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的支持下創辦《新故鄉》雜誌，期待將社會運動的

此外尚有許多發刊並不密集、影響力亦有限，但以報導文學為號召的刊物如《九彎十八拐》⁶等，這類小型刊物固然不及過去大型刊物的發刊數量，但在其區域性的讀者群中仍有影響力，這些都值得且必須在未來的報導文學研究中納入討論。

在報導文學的專書出版上，近年尤其有不少優秀的報導文學作品出版並引起廣泛的迴響，當中許多都與受到社會矚目的重大社會議題相關，例如吳音寧的《江湖在哪裡？——台灣農業觀察》⁷便是以白米炸彈客楊儒門事件為主題，側寫戰後以來台灣農業的發展與困境；又如顧玉玲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⁸紀錄在台灣的菲律賓勞工生活，是顧玉玲長期關注勞工和移工生活的近身觀察、參與之作，更近期則有藍博洲的《老紅帽》⁹，身為報導文學知名作家的藍博洲以多年時間採訪 5 位曾經歷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政治犯，透過對其苦難歲月的紀錄，重現白色恐怖時期的真實歷史；又如關曉榮將過去 10 餘年對蘭嶼的觀察紀錄在增修之後重新出版為《蘭嶼報告 1987 ~ 2007》¹⁰。由上述可知，業已成名的報導文學家們許多仍持續關注其專業議題，藍博洲持續對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進行重現與出土、關曉榮對於蘭嶼發展歷史進行長達 10 年以上的追蹤，顧玉玲則是關懷弱勢與人權，在移民勞工議題上累積豐厚的成果，從過去的歷史到今日的移民勞工、外籍配偶、農村現狀等，台灣報導文學在 21 世紀確實呈現出更具有深度的面貌，跳脫「是不是報導文學」的討論後，有心創作且持續耕耘的報導文學作家們反而更自由、寬廣的在不同領域發揮更高的創造力，儘管「報導文學」的名號可能不再響亮，儘管已經不再有創作者自我標榜其創作為「報導文學」，但在實際的意義上，報導文學確實沒有消逝在時代之中，反而是由於對社會的滲透力而呈現難以察覺、不需察覺的新樣貌，或許只在這個現象下，才能說報導文學的「鬆綁」已然完成，定義的崩散並不是報導文學的死亡，更可能是嶄新道路的起點。

議題與理念，透過社區總體意識與民眾產生更深的連結。

⁶ 2005 年由黃春明創辦所創辦的以宜蘭地方意識為主體的雜誌，截至 2007 年 7 月共發行 14 期。

⁷ 吳音寧，《江湖在哪裡？——台灣農業觀察》，台北：印刻，2007 年。

⁸ 顧玉玲，《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台北：印刻，2008 年。

⁹ 藍博洲，《老紅帽》，台北：南方家園，2010 年。

¹⁰ 關曉榮，《蘭嶼報告 1987 ~ 2007》，台北：人間，2007 年。

參考書目

專書：年鑑類

- 李瑞騰主編，《1997台灣文學年鑑》，台北：行政院文建會，1998年。
- 李瑞騰主編，《1998台灣文學年鑑》，台北：行政院文建會，1999年。
- 李瑞騰主編，《1999台灣文學年鑑》，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0年。
- 杜十三主編，《2000台灣文學年鑑》，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2年。
- 彭瑞金主編，《2001台灣文學年鑑》，台北：行政院文建會，2003年。
- 彭瑞金主編，《2002台灣文學年鑑》，台北：行政院文建會，2003年。
- 彭瑞金主編，《2003台灣文學年鑑》，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4年。
- 彭瑞金主編，《2004台灣文學年鑑》，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5年。
- 林瑞明主編，《2005台灣文學年鑑》，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年。
- 林瑞明主編，《2006台灣文學年鑑》，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年。
- 彭瑞金主編，《2007台灣文學年鑑》，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年。
- 彭瑞金主編，《2008台灣文學年鑑》，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9年。
- 李瑞騰主編，《2009台灣文學年鑑》，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0年。
- 行政院新聞局主編，《中華民國83年出版年鑑》，台北：行政院新聞局，1994年。
- 行政院新聞局主編，《中華民國84年出版年鑑》，台北：行政院新聞局，1996年。
- 行政院新聞局主編，《88年出版年鑑》，台北：行政院新聞局，1999年。
- 行政院新聞局主編，《中華民國89年出版年鑑》，台北：行政院新聞局，2000年。
- 行政院新聞局主編，《中華民國91年出版年鑑》，台北：行政院新聞局，2002年。
- 鍾修賢主編，《中華民國92年出版年鑑》，台北：行政院新聞局，2004年。
- 鍾修賢主編，《2004出版年鑑》，台北：行政院新聞局，2004年。
- 陳碧鐘主編，《2005出版年鑑》，台北：行政院新聞局，2005年。
- 行政院新聞局主編，《2006出版年鑑》，台北：行政院新聞局，2006年。
- 行政院新聞局主編，《2007出版年鑑》台北：行政院新聞局，2007年。

行政院新聞局主編，《2008出版年鑑》，台北：行政院新聞局，2008年。

行政院新聞局主編，《中華民國98年出版年鑑》，台北：行政院新聞局，2009年。

中國新聞學會主編，《中華民國新聞年鑑（80年版）》，台北：中國新聞學會，1991年。

中國新聞學會主編，《中華民國新聞年鑑（85年版）》，台北：中國新聞學會，1996年。

廖雲章主編，《中華民國新聞年鑑 1997-2006》，台北：中國新聞學會，2007年。

中華民國90年出版年鑑編輯委員會主編，《中華民國90年出版年鑑》，台北：行政院新聞局，2001年。

中華民國雜誌編輯委員會主編，《中華民國雜誌年鑑（1950-1998）》，台北：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1998年。

文訊雜誌社主編，《2007 台灣作家作品目錄》，台南：台灣文學館，2008年。

柏楊主編，《中華民國文學年鑑1980》，台北：時報文化，1982年。

文訊雜誌社主編，《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增訂本），台北：行政院文建會，1995年。

專書：得獎作品集類

季季主編，《時報文學獎史料索引》，台北：時報文化，1990年。

高上秦主編，《時報文學獎》，台北：時報文化，1984年。

高上秦主編，《時報報導文學獎》，台北：時報文化，1979年。

高上秦主編，《第2屆時報文學獎》，台北：時報文化，1982年。

陳怡真主編，《將軍碑——第9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時報文化，1986年。

陳怡真主編，《昆蟲記事——第10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

季季主編，《美麗——第11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時報文化，1988年。

季季主編，《語錄狂——第12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時報文化，1989年。

楊澤主編，《手槍王——第13、14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時報文化，1991年。

楊澤主編，《異鄉人——第15屆時報文學獎作品集》，台北：時報文化，1992年。

楊澤主編，《耶穌喜愛的小孩——第16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時報文化，1993年。

楊澤主編，《送行——第17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時報文化，1994年。

楊澤主編，《魚骸——第18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時報文化，1995年。

- 痲弦主編，《小說潮－聯合報第 12 屆小說獎暨附設報導文學獎作品集》，痲弦主編，台北：聯經，1992 年。
- 痲弦主編，《小說潮－聯合報第 13 屆小說獎暨附設報導文學獎》，台北：聯經，1992 年。
- 痲弦主編，《小說潮－聯合報第 14 屆小說獎暨附設報導文學獎、新詩獎作品集》，台北：聯經，1992 年。
- 痲弦主編，《小說潮－聯合報第 15 屆小說獎暨附設報導文學獎、新詩獎作品集》，台北：聯經，1993 年。
- 痲弦主編，《飛翔之光－聯合報文學獎 1994 卷》，台北：聯經，1994 年。
- 痲弦主編，《美麗新世界－聯合報文學獎 1996 卷》，台北：聯經，1996 年。
- 痲弦主編，《我寫故我在－聯合報文學獎 1995 卷》，台北：聯經，1995 年。
- 陳義芝主編，《向時間下戰帖－聯合報文學獎 1997 卷》，台北：聯經，1998 年。
- 陳義芝主編，《華年放異采－聯合報文學獎 1998 卷》，台北：聯經，1998 年。
- 陳義芝主編，《新的寫作時代－聯合報文學獎 1999 卷》，台北：聯經，1999 年。
- 陳義芝主編，《再現文學垂天大翼－聯合報文學獎 2000 卷》，台北：聯經，2000 年。
- 苗栗縣政府主編，《苗栗縣第 2 屆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苗栗：苗栗縣政府，1999 年。
- 苗栗縣政府主編，《苗栗縣第 3 屆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苗栗：苗栗縣政府，2000 年。
- 周錦宏主編，《苗栗縣第 5 屆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苗栗：苗栗縣文化中心，2002 年。
- 周錦宏主編，《苗栗縣第 6 屆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苗栗：苗栗縣文化中心，2003 年。
- 周錦宏主編，《苗栗縣第 7 屆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4 年。
- 彭基山主編，《苗栗縣第 8 屆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5 年。
- 彭基山主編，《苗栗縣第 9 屆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6 年。
- 林振豐主編，《苗栗縣第 10 屆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苗栗：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2007 年。
- 林振豐主編，《苗栗縣第 11 屆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苗栗：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

觀光局，2008年。

劉政鴻主編，《苗栗縣第12屆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苗栗：苗栗縣政府，2009年。

劉政鴻主編，《苗栗縣第13屆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苗栗：苗栗縣政府，2010年。

劉政鴻主編，《苗栗縣第14屆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苗栗：苗栗縣政府，2011年。

黃連池、廖憶鳳主編，《第2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0年。

彰化縣文化局主編，《第3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1年。

彰化縣文化局主編，《第4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2年。

陳慶芳主編，《第5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3年。

陳慶芳主編，《第6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4年。

陳慶芳主編，《第7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5年。

林田富主編，《第8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6年。

林田富主編，《第9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7年。

林田富主編，《第10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8年。

林田富主編，《第11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9年。

蕭青杉主編，《第12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10年。

台中縣政府主編，《探照生命裂縫的光群：第1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縣政府，2000年。

路寒袖編，《暮色中的那抹殘紅：第3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1年。

路寒袖主編，《神蹟：第4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年。

路寒袖主編，《根：第5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3年。

路寒袖主編，《李普陣亡了：第6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4年。

路寒袖主編，《種子：第7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5年。

路寒袖主編，《五欲供：第8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6年。

年。

陳嘉瑞主編，《早：第9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7

年。

陳瓊芬主編，《一個墜落的女體：第12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10年。

新竹縣文化局主編，《2006年新竹縣吳濁流文藝獎得獎作品集》，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6年。

新竹縣文化局主編，《2008年新竹縣吳濁流文藝獎得獎作品集》，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8年。

新竹市政府文化局主編，《1997竹塹文學獎得獎專輯》，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年。

新竹市政府文化局主編，《2000竹塹文學獎得獎專輯》，新竹：新竹市政府，2000年。

新竹市政府文化局主編，《1999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新竹：新竹市政府，1999年。

黃國榮主編，《台中市第11屆大墩文學獎作品集》，台中：台中市文化局，2008年。

石芬靜等編，《台中市第6屆大墩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市文化局，2003年。

黃國榮主編，《台中市第8屆大墩文學獎作品集》，台中：台中市文化局，2005年。

石芬靜等編，《台中市第7屆大墩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市文化局，2004年。

黃國榮主編，《台中市第9屆大墩文學獎作品集》，台中：台中市文化局，2006年。

黃國榮主編，《台中市第10屆大墩文學獎作品集》，台中：台中市文化局，2007年。

台中市文化局主編，《台中市第12屆大墩文學獎作品集》，台中：台中市文化局，2009年。

台中市文化局主編，《台中市第3、4屆大墩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中：台中市文化局，2000年。

劉貴珍主編，《第12屆南投縣玉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南投：南投縣文化局，2010年。

陳振盛主編，《第11屆南投縣玉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南投：南投縣文化局，2009年。

屏東縣政府主編，《第4屆大武山文學獎》，屏東：屏東縣政府，2002年。

屏東縣文化局主編，《第6屆大武山文學獎》，屏東：屏東縣政府，2004年。

屏東縣文化局主編，《第1屆大武山文學獎》，屏東：屏東縣政府，1999年。

屏東縣文化局主編，《第9屆大武山文學獎》，屏東：屏東縣政府，2009年。

其他專書

- Anthony Elliott 著、李延輝等譯，《當代社會理論大師》，台北：韋伯，2008年。
- Dominic Strinati 著、張茵蕙等譯，《通俗文化理論》，台北：韋伯，2005年。
- Em Griffin 著、陳柏安等譯，《傳播理論》，台北：五南，2006年。
- Escarpit 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台北：遠流，1990年。
- M. L. DeFleur & Ball-Rokeach 著、杜力平譯，《大眾傳播學理論》，台北：五南圖書，1991年。
- Nick Stevenson 著、趙偉姣等譯，《媒介、文化與社會理論》，台北：韋伯，2009年。
- Philip Smith 著、林宗德譯，《文化理論面貌導讀》，台北：韋伯，2007年。
- Werner J. Severin & James W. Tankard, Jr. 著、羅世宏譯，《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台北：五南，2007年。
- 丁曉原，《二十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安徽：安徽大學，1999年。
-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文學與傳播的關係》，台北：學生書局，1995年，
- 中國時報五十年報史編輯委員會，《中國時報五十年》，台北：中國時報，2000年。
- 尹雪曼，《中國文國文藝史》，台北：正中書局，1975年。
- 巴托莫爾著、廖仁義譯，《法蘭克福學派》，台北：桂冠，1991年。
- 文訊雜誌社主編，《台灣文學出版：五十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三）》，台北：文建會，1997年。
- 王天濱，《台灣報業史》，台北：亞太圖書，2003年。
- 向陽，《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2001年。
- 向陽、須文蔚主編，《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年。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編，《中華民國71年文藝季—文藝座談實錄》，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3年。
- 西爾伯曼著、魏育青、徐汎譯，《文學社會學引論》，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年。
- 何金蘭，《文學社會學》，台北：桂冠圖書，1989年。
-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所主辦，《2002年兩岸報導（告）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所，2002年。
- 李金銓，《大眾傳播理論》，台北：三民書局，2001年。
- 李茂政，《人類傳播行為大系通論》，台北：美國教育，1991年。
- 李瑞騰，《台灣文學風貌》，台北：三民書局，1991年。

阮桃園，《報導文學的核心價值—析論《人間》雜誌》，台北：里仁，2011年。

周綱鳴，《怎樣寫報告文學》，香港：朝陽出版社，1982年。

孟 樊，《台灣出版文化讀本》，台北：唐山，2002年。

東海大學中文系主編，《苦悶與蛻變：60、70年代台灣文學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津，2007年。

東華大學中文系編，《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台北：紅葉文化，2004年。

林民昌，《當代台灣小說文本的知識及其操作》，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3年。

林芳玫，《解讀瓊瑤的愛情王國》，台北：商務印書館，2006年。

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允晨文化，1996年。

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1996年。

林耀德、孟樊編，《世紀末偏航—八〇年代台灣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0年。

邱天助，《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1998年。

邵玉銘，《中華民國出版事業概況》，台北：大地，1989年。

金恆煒主編，《一週大事—第8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時報文化，1985年。

約翰·B·湯普森著、高鈺譯，《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江蘇：譯林出版社，2005年。

倪炎元，《再現的政治：台灣報紙對「他者」建構的論述分析》，台北：韋伯文化，2003年。

翁秀琪，《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三民書局，1993年。

馬丁·傑著、胡湘譯，《阿多諾》，台北：桂冠，1992年。

馬庫塞著、劉繼譯，《單向度的人》，台北：桂冠，1989年。

高信疆主編，《現實的邊緣》，台北：時報文化，1975年。

高宣揚，《布爾迪厄》，台北：生智，2002年。

高宣揚，《哈伯瑪斯論》，台北：遠流，1992年。

國家圖書館編，《海峽兩岸報導文學專題選刊》，台北：國家圖書館，2002年

尉天驄，《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流，1978年。

張荳雲主編《文化產業：文化生產的結構分析》，台北：遠流，2000年。

張誦聖，《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聯合文學，2001年。

張錦華，《傳播批判理論》，台北：黎明文化，1994年。

習賢德，《《聯合報》企業文化的形成與傳承 1963-2005》，台北：秀威，2006年。

陳世敏，《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台北：三民書局，1990年。

陳國祥、祝萍著，《台灣報業演進40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年。

- 陳銘磻，《現實的探索》，台北：東大，1980年。
- 陳銘磻編，《台灣報導文學十家》，台北：業強，2000年。
- 彭家發，《新聞文學點、線、面》，台北：業強，1988年。
-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前衛，1997年。
- 焦 桐，《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1977～世紀末）》，台北：時報文化，1999年。
- 須文蔚，《台灣文學傳播論》，台北：二魚文化，2009年。
- 黃瑞祺，《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巨流，1990年。
- 楊 照，《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台北：聯合文學，1995年。
- 楊 照，《夢與灰燼—戰後文學史論二集》，台北：聯合文學，1998年。
- 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台北：稻田出版社，2001年。
- 楊澤主編，《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文化，1994年。
- 楊澤主編，《七〇年代懺情錄》，台北：時報文化，1994年。
- 痲弦、陳義芝主編，《世界中文報副刊學綜論》，台北：聯經，1997年。
- 詹宏志，《飛揚的一代》，台北：九歌，1982年。
- 蔡源煌，《當代文化理論與實踐》，台北：雅典，1992年。
- 鄭明嫻，《現代散文構成論》，台北：大安，2000年。
-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1992年。
- 鄭明嫻，《當代文學氣象》，台北：光復出版社，1988年。
- 鄭明嫻，《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4年。
- 鄭明嫻、林耀德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文學現象卷》，台北：正中書局，1993年。
- 聯合報副刊編輯，《台灣新文學發展重大事件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年。
- 鍾 喬，《回到人間現場》，台北：時報文化，1990年。
- 龔鵬程，《台灣文學在台灣》，台北：駱駝出版社，1997年。

碩博士論文

- 江詩菁，《宰制與反抗：兩大報系與黨外雜誌之文化爭奪 1975~1989》，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 何恭佑，《《人間》雜誌本土議題中的影像與書寫》，國立中山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9年。

年。

吳佩娟，《台灣的文學編輯與作者之互動關係研究》，南華大學出版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吳薇儀，《兩岸當代報導文學比較研究（1976-200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4年。

吳麗娟，《台灣文人出版社的經營模式》，南華大學出版所碩士論文，2003年。

巫維珍，《台灣書評發展史：1972-2000》，國立政治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2002年。

林秀梅，《台灣原住民報導文學作品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林淇瀟，《文學傳播與社會變遷之關聯性研究——以七〇年代台灣報紙副刊的媒介運作為例》，文化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1993年。

林雅雯，《九二一大地震報導文學研究》，佛光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年。

胡文嘉，《《綜合月刊》報導文學作品之敘事分析》，國立東華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6年。

張卉君，《寫在邊緣：台灣女性報導文學中的性別政治》，國立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8年。

張明珠，《《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研究（1978-2000）》，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張俐璇，《兩大報文學獎與台灣文壇生態之形構》，國立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6年。

莊麗莉，《文學出版事業產銷結構變遷之研究——文學商品化現象觀察》，國立政治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1995年。

許振福，《人間報導·文學人間——《人間》雜誌及其影響研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郭曉萍，《陳銘礪報導文學作品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陳震，《原住民報導文學與原住民運動之聯繫——從公眾行動的角度探討報導文學的社會功能》，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陳柳妃，《台灣女性議題報導文學：以文學傳播理論為核心的初探》，國立東華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年。

陳翠屏，《原住民報導文學中的主體建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曾慶華，《國軍新文藝運動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年。

楊美紅，《台灣大眾媒體文學書評之研究——文學社會學的詮釋觀點》，國立政治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2002年。

劉依潔，《《人間》雜誌研究》，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9年。

蔡豐全，《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分析》，政治作戰學校新聞所碩士論文，2002年。

賴永忠，《台灣地區雜誌發展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1993年。

薛麗珠，《古蒙仁的報導文學作品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謝明芳，《當代台灣報導文學的興起與發展》，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2年。

專書論文

李崇建，〈地方文學獎要走到哪裡去？〉，《百日不斷電——別為文學抓狂》，台北：聯合文學，2005年。

林耀德，〈台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七十六年文學批評選》，台北：光復書局，1988年。

高信疆，〈永恆與博大——報導文學的歷史線索〉，《現實的探索》，台北：東大圖書。

彭海瑩，〈心心念念在「人間」的陳映真〉，《曲扭的鏡子》，台北：雅歌，1987年。

楊 達，〈何謂報告文學〉，《楊達全集·詩文卷》(上)，台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年，頁 503-504。

楊 達，〈報導文學問答〉，《楊達全集·詩文卷》(上)，台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年，頁 522-528。

蔡源煌，〈報導文學與新新聞〉，《當代文化理論與實踐》，台北：雅典出版社，民國 85年 9月，頁 63-74。

鄭明嫻，〈新新聞與現代散文的交軌〉，《現代文學現象論》，台北：大安，1992年，頁 135-156。

鄭明嫻，〈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光復書局，1994年，頁 13-68。

學報論文（含會議論文）

- 王文仁，〈從〈幌馬車之歌〉看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創作——兼論台灣報導文學的幾個文類問題〉，《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3期，2005年，頁163-182。
- 向陽，〈文學·社會與意識型態——以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中的副刊媒介運作為例〉，《第二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師大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97年。
- 向陽，〈台灣報導文學的虛構敘事規約〉，國立中興大學主辦，第二屆敘事學國際研討會。
- 余昭玟，〈《史記》與當前的報導文學〉，《雲漢月刊》第7期，2000年，頁255-269。
- 胡文嘉，〈台灣報導文學批評史初探〉，《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5期，2007年6月。
- 張璦，〈台灣當代報導文學的背景與價值〉，《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12期，2000年，頁31-34、頁48。
- 張堂錡，〈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的困境〉，《空大學訊》第242期，1999年11月。
- 張堂錡，〈潛流下的伏動——大陸九〇年代報告文學寫作趨向的考察〉，《中國現代文學季刊》創刊號，2004年3月。
- 張堂錡，〈體系化的探索、建構與可能——台灣報導文學理論研究綜述〉，《政大中文學報》第5期，2006年6月，頁167-195。
- 張耀仁，〈再思考「報導文學在台灣1949-1994」〉，中華傳播學會年會暨研討會會議論文，2001年。
- 張耀仁，〈新世紀以來報導文學在台灣論述分析——以地方文學獎得獎作品為例（2000-2009）〉，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主辦，第四屆文學傳播與接受研討會。
- 陳光憲，〈二十世紀報導文學的回顧〉，《應用語文學報》第1期，1999年，頁143-164。
- 陳光憲，〈史記寫作藝術與現代報導文學〉，《應用語文學報》第2期，2000年，頁137-162。
- 陳光憲，〈論報導文學的時代性〉，《語言文學之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2000年。
- 陳光憲，〈論報導文學的樣式〉，《市立師院語文學刊》第4期，2000年6月，頁75-105。
- 陳飛龍，〈論報導文學——兼談司馬遷的史記〉，《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40期，1979年12月。
- 須文蔚，〈台灣文學傳播研究之方法論析論〉，《淡江中文學報》第14期，2006年，頁253-274。

須文蔚，〈從社會運動中長成與飛馳的台灣報導文學〉，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院主辦，兩岸報導（告）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2001年6月15日。

期刊論文

- 丁曉原，〈台灣報導文學理論批評的型態與策略〉，《文藝評論》，2001年1月，頁59-68。
- 尹雪曼，〈從新聞學觀點看報導文學〉，《文學思潮》第3期，1979年，頁81-83。
- 尹雪曼，〈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中華文藝復興月刊》，1989年4月，頁46-54。
- 尹雪曼，〈報導文學寫作講話〉，《中華文藝》第25卷第5期，1983年，頁20-24。
- 向明，〈文學價值取決於文學本身——有感台灣氾濫的文學獎〉，《文訊》第168期，1999年10月，頁54-55。
- 向陽，〈海上的波浪——小論文學獎與文學發展的關聯〉，《文訊》第218期，2003年12月，頁37-40。
- 向陽，〈海上的波浪——小論文學獎與文學發展的關聯〉，《文訊》第218期，2003年12月。
- 何聖芬記錄，〈現階段報紙副刊的檢討與展望——北部地區副刊編輯人座談會〉，《文訊》第21期，1985年12月，頁119。
- 吳正堂，〈尋找失去的熱情——關於台灣「報導文學」精選書目〉，《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47期，2002年11月。
- 李瑞騰，〈從愛出發——近十年來台灣的報導文學〉，《文藝復興》第158期，1984年12月，頁50-58。
- 林民，〈文學傳播的更年期，讓權力遊戲頻冒汗——回應五八一期「百萬文學獎背後的權力遊戲」〉，《新新聞》第583期，1998年5月，頁88-89。
- 林淇漾，〈淺談當代台灣文學傳播問題〉，《傳播研究簡訊》第4期，1995年，頁14-16。
- 林淇漾，〈戰後台灣文學傳播困境出論：一個「文化研究」向度的觀察〉，《新聞學研究》第51期，1995年7月，頁143-172。
- 林進坤紀錄，〈報導文學的昨日、今日、明日〉，《書評書目》第63期，1987年7月，頁6-13。
- 林耀德，〈台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文訊》第29期，1987年4月，頁153-163。
- 林耀德，〈聯副四十年〉，《聯合文學》第83期，1991年，頁10-19。
- 邱佩文，〈有關「人物報導」的書目提要〉，《文訊》第95期，1993年9月。
- 金恆煒，〈台灣媒體的結構性分析：以《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為例〉，《當代》第228

- 期，2006年8月。
- 亮軒，〈我們不同——看台灣出版業面臨的困境〉，《書評書目》第80期，1979年12月。
- 思兼，〈報導文學與第三類接觸——接觸報導高信彊／兼談文藝性的副刊傳統〉，《書評書目》第66期，1978年10月。
- 施祖琪、臧國仁〈再論風格與新聞風格——以《綜合月刊》為例〉，《新聞學研究》第77期，2003年10月，頁143-185。
- 秦賢次，〈中國報紙副刊的起源與發展〉，《文訊》第21期，1985年12月，頁42-57。
- 莊宜文，〈從文獎會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訊》第143期，1997年9月。
- 許尤美，〈伊甸奏起的輓歌——從《人間》的報導文學看台灣生態環境〉，《水筆仔》第3期，頁22-44。
- 陳光憲，〈第一本本土報導文學研究專著——讀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文訊》第194期，2001年12月，頁22-23。
- 陳映真，〈大眾消費時代的文學家和文學〉，《中國論壇》雜誌，1984年5月10日，頁23-24。
- 陳銘礚，〈四十年文藝的出版史略(上)〉，《文訊》第32期，1987年，頁259-268。
- 陳銘礚，〈四十年文藝的出版史略(下)〉，《文訊》第33期，1987年，頁243-250。
- 彭家發，〈細說新新聞與報導文學〉，《新聞鏡週刊》第263期，1993年11月，頁30-33。
- 焦桐，〈帶著懷舊的心情邁向未來——九月份十六家報紙副刊調查報告〉，《文訊》第21期，1985年12月。
- 須文蔚，〈報導文學在台灣1949-1994〉，《新聞學研究》第51期，1995年7月，頁121-142。
- 須文蔚，〈鬆綁論下的台灣報導文學讀本〉，《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47期，2003年11月，頁3-5。
- 馮景青記錄，〈當代文學問題討論會〉，《文訊》第29期，1987年4月。
- 黃年口述，李凡整理，〈報導文學的兩個層面〉，《書評書目》第63期，1978年7月，頁15-18。
- 楊素芬，〈報告 V.S 文學；台灣 V.S 大陸——「兩岸報導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側記〉，《文訊》第190期，2001年8月，頁89-90。
- 萬麗慧，〈書寫事實·閱讀真實——2002年兩岸報導(告)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側記〉，《文訊》第207期，2003年1月，頁52-55。
- 詩影，〈「史記」是報導文學初論〉，《文藝月刊》第170期，1983年8月。

- 詹宏志，〈「看見」是關心的開始：「人間」雜誌的誕生〉，《天下雜誌》第54期，1985年11月，頁146-147。
- 鄭貞銘，〈副刊編輯的素養〉，《文訊》第21期，1985年12月，頁65-71。
- 盧桂珍，〈眾聲喧譁中對台灣報導文學的幾點省思——兼評《台灣報導文學概論》〉，《書目季刊》第36卷第2期，2002年9月，頁131-139。
- 賴光臨，〈報紙副刊將更見重要〉，《文訊》第82期，1992年8月，頁11-12。
- 隱地，〈出版事業在台灣〉，《書評書目》第99期，1981年8月。
- 鐘麗慧，〈近三十年報導文學選輯提要(上)〉，《文訊》第22期，1986年2月，頁344-354。
- 鐘麗慧，〈近三十年報導文學選輯提要(下)〉，《文訊》第23期，1986年3月，頁356-365。
- 龔鵬程，〈台灣區域文學史的寫作與傳統〉，《文訊》第174期，2000年4月。

報紙文章

- 李利國，〈期待報導文學再出發〉，《聯合報》第37版，1993年10月16-17日。
- 柏楊，〈將更奮不顧身——報導文推薦獎得獎感言〉，《中國時報》第8版，1982年10月5日。
- 徐淑卿，〈報導文學死了嗎？〉，《中國時報》第43版，1998年10月8日。
- 馬以工，〈「有怪獸！」——看報導文學的式微〉，《中國時報》第37版，1998年12月23日。
- 張作錦，〈報導和文學的矛盾與統一〉，《聯合報》第37版，1993年10月。
- 陳大為記錄，〈驟然消失的雷聲——第21屆時報報導文學獎類決審會議記錄〉，《中國時報》第37版，1998年12月23日。
- 陳銘礪，〈1981年我國的報導文學〉，《商工日報》第11版，1983年8月19日。
- 陳銘礪，〈1982年我國的報導文學〉，《商工日報》第9版，1983年8月22日。
- 陳慧華記錄，〈報導文學往何處去〉，《台灣新聞報》第12版，1980年11月20-21日。
- 須文蔚，〈台灣文學史上最早的報導文學作品〉，《中央日報》第17版，2003年11月13日。
- 趙衛民記錄，〈為報導文學披沙揀金——記聯合報第12屆小說獎附設報導文學獎決審會議〉，《聯合報》第25版，1992年1月13日。
- 劉婉俐記錄，〈對周遭世界真實世界殷切的探望——第20屆時報報導文學獎類決審會議記錄〉，《中國時報》第27版，1997年11月24-29日。

鍾錦隆，〈報導文學是文學嗎？〉，《聯合報》第37版，1998年12月20日。

李 赫，〈談「現實的探索」〉，《中央日報》第10版，1980年11月12日。

胡台麗，〈紀錄片可以報導文學結合〉，《民生報》第3版，1985年11月30日。

莫昭平〈剛剛開店，就得準備關門？〉，《中國時報》第23版，1988年10月17日。

蔡珠兒、朱恩伶、張娟芬採訪，〈人間燈火未熄〉，《中國時報》第31版，1993年5月14日。

林耀德，〈觀景窗外的黑色暴力——讀焦桐《在世界的邊緣》〉，《自立早報》第26版，1995年6月18日。

舒國治，〈作者要帶我們去哪裡〉，《中國時報》第37版，1998年12月23日。

張大春，〈尋找發現的刻度——對報導文學獎從缺的說明〉，《中國時報》第37版，1998年12月23日。

伊里紀錄、整理，〈報導文學首獎暫予擱置——本刊對「華夏哀歌」爭議的討論〉，《中國時報》，2000年12月5日，第37版。

陳映真，〈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聯合報》第37版，2001年1月18-20日。

須文蔚，〈台灣的報導文學並未消失〉，《聯合報》，2001年6月14日。

須文蔚，〈台灣報導文學誕生的歷史線索〉，《中央日報》第17版，2003年10月30日。

須文蔚，〈一流小說筆法下的報導文學：讀馬奎斯《智利秘密行動有感》有感〉，《中央日報》第17版，2004年2月5日。

王之樵記錄，〈感性也要兼具知性——第十九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類評審會議記錄〉，《中國時報》第19版，1996年10月12-14日。

網路資源

許育嘉，〈重新建立文化戰線的歷史武器——論台灣報導文學〉，網址：

<http://www.xiachao.org.tw>。

台灣大百科全書：<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index>

張文中，〈人間雜誌：臺灣左翼知識份子的追求和理想——陳映真訪談〉網址：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9013325/>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網站：www.swan.org.tw/intro.htm，970914

劉郁青，〈新聞？文學？濫情？——從〈華夏哀歌〉事件談報導文學的問題〉網址：

<http://twmedia.org/scstw/?p=134>

行政院文建會網址：www.cca.gov.tw/

文學創作者網址：<http://www.yon.com.tw/>

全球華人文學獎網址：http://ocl.shu.edu.tw/ocl_award/html/explor.php

喜菡文學網論壇：www.pon99.net

婦女人權報導獎網址：<http://www.tahr.org.tw/index.php/article/1998/06/16/44/>

永續台灣報導獎網址：<http://twstudy.sinica.edu.tw/~ngo/topic/prize2/about.htm>

財團法人鄭福田文教基金會網址：<http://www.futien.org.tw/main1/index.php>

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網址：<http://www.napcu.org.tw>

政府出版資訊網網址：<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index.jspx>



附錄一：1990 年代時報報導文學獎得獎列表¹

年份／屆數 ／來稿件數	獎項別	得獎者	得獎作品
1991 年 第 14 屆 來稿 47 篇	首 獎	胡 平 ▲中國作家	〈井岡山，沉思的哲人〉
	優 等	李 昂	〈鹿窟紀事〉
評審委員：柏楊、南方朔、高信疆、董橋、蔡源煌			
1992 年 第 15 屆 來稿 35 篇	首 獎	楊南郡	〈斯卡羅遺事〉
	評審獎	沈振中	〈叉翅、白斑與浪先生——紀基隆的一群老鷹〉
評審委員：姚一葦、林懷民、舒國治、遼耀東			
1993 年 第 16 屆 來稿 39 篇	首 獎	鄧相揚	〈霧重雲深——霧社事件後，一個泰雅家庭的故事〉
	評審獎	瓦歷斯·諾幹	〈Mihuo——土地紀事〉
評審委員：柏楊、楊憲宏、劉克襄			
1994 年 第 17 屆 來稿 58 篇	首 獎	瓦歷斯·諾幹	〈Losin·Wadan——殖民、族群與個人〉
	評審獎	鄭禮忠	〈逐夢的人〉
評審委員：平路、馬以工、金恆鑣			
1995 年 第 18 屆 來稿 45 篇	首 獎	林雲閣	〈八十萬年奇蹟身世換不來一世尊榮——台灣鮭魚族群的命運〉
	評審獎	凌 拂	〈兒童教育與人文思考——荒遠深山教學手記〉
評審委員：亮軒、劉大任、張大春			
1996 年 第 19 屆 來稿 43 篇	首 獎	林雲閣	〈山鬼的震怒〉
	評審獎	楊樹清 張煥宇 曾吉賢	〈消逝的漁民國特〉
評審委員：馬以工、金恆鑣、南方朔			
1997 年 第 20 屆	首 獎	王誠之	〈迷濛的松雀鷹之眼〉
	評審獎	凌 拂	〈那一天我們要去看看米羅〉

¹ 本表據張俐璇《兩大報文學獎分析》，附錄九：時報文學獎歷年簡史，頁 179-199，以及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頁 208，整理而成。

來稿 22 篇	評審委員：金恆鑣、古蒙仁、胡台麗		
1998 年	本屆報導文學獎全數從缺		
第 21 屆	評審委員：馬以工、張大春、舒國治		
1999 年 第 22 屆	首 獎	陳姿羽	〈唱他的歌，記他的名字〉
	評審獎	楊樹清	〈消失的衛星孩子〉
	評審委員：金恆鑣、胡台麗、南方朔		
2000 年 第 23 屆	首 獎	楊艾俐	〈華夏哀歌〉 ²
	評審獎	葉怡君	〈風簷之佐〉
	評審委員：馬以工、東年、郭力昕		



² 被網路媒體指為是翻譯作品、資料寫作，「引用若干資料未註明來源」、「有引用或轉述含混現象，以至於產生一些疑點」，最後楊艾俐發表放棄得獎宣言。可見伊里紀錄、整理，〈報導文學首獎暫予擱置——本刊對「華夏哀歌」爭議的討論〉，《中國時報》，2000年12月5日，第37版。

附錄二：1990 年代聯合報報導文學獎得獎列表¹

年份／屆數 ／來稿件數	獎項別	得獎者	得獎作品
1990 年 第 12 屆 來稿 98 篇	第一名	劉還月	〈重重後山尋平埔〉
	推薦獎	吳弘達 ▲中國作家	〈五八六——中國北方一個勞改隊的墳場〉
	評審委員：林文月、高信疆、張錯		
1991 年 第 13 屆 來稿 41 篇	第一獎	從 缺	
	第二獎	黃文博	〈瘟神傳奇〉
	第三獎	展 奮	〈瘋狂的海洛英——中國大陸雲南地區吸毒紀實〉
	佳 作	陳金生	〈烏腳病流行病學調查參與記〉
評審委員：馬森、簡嬪、黃碧端			
1992 年 第 14 屆 來稿 32 篇	第一名	從 缺	
	第二名	顧肇森	〈槍爲他說了一切〉
	佳 作	劉還月	〈尋訪噶瑪蘭〉
		張伯笠 ▲中國作家	〈逃亡鐵幕內〉
評審委員：痲弦、李瑞騰、葉慶炳			
1993 年 第 15 屆 來稿 24 篇	佳 作	周 愚	〈歸來的軍刀〉
		覃 瑞 ▲中國作家	〈辛亥後裔〉
	入 選	王雲龍	〈一場遊戲一場夢——一位戒毒者的故事〉
		喜 樂 ▲中國作家	〈北京不是一天造成的〉
評審委員：林文月、張作錦、李利國			
1994 年 第 16 屆 來稿 65 篇	第一名	焦 桐	〈失去地址的人〉
	第二名	劉還月	〈回不去的山後鳥〉
	第三名	劉克襄	〈凡鳥之歌〉

¹ 本表據張俐璇《兩大報文學獎分析》，附錄十：聯合報文學獎歷年簡史，頁 200-220，以及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頁 208，整理而成。

	佳 作	李靜修	〈前山第一城之竹事〉
	評審委員：王力行、翁台生、李瑞騰、南方朔		
1995 年 第 17 屆 來稿 27 篇	第一名	王蜀桂	〈台灣南島語系的最後知音——外籍神父〉
	第二名	張典婉	〈一些大陳人的故事〉
	第三名	劉克襄	〈荒狗〉
	評審委員：黃碧端、曾永義、柯慶明		
1996 年 第 18 屆 來稿 34 篇	第一名	從 缺	
	第二名	林雲閣	〈誰傷了撒拉茅的心？〉
	第三名	馮 傑 ▲中國作家	〈兩個人和一座學校〉
	佳 作	張典婉	〈討海查某人——紀錄台灣一群女漁夫的故事〉
	評審委員：李瑞騰、黃年、胡台麗		
1997 年 第 19 屆 來稿 44 篇	第一名	楊樹清	〈被遺忘的兩岸發聲人〉
	第二名	丁 曙	〈你為誰討回公道〉
	第三名	林福岳	〈澹煙小鎮的希望種苗〉
	評審委員：林明德、王浩威、邱坤良、黃碧端、蔡詩萍		
1998 年 第 20 屆 來稿 35 篇	第一名	楊樹清	〈天堂之路〉
	第二名	包念澄	〈神秘夜客〉
	第三名	李曉菁	〈蒸氣火車 CK101 復活〉
	評審委員：黃啓方、古蒙仁、龔鵬程		
1999 年 第 21 屆 來稿 41 篇	第一名	從 缺	
	第二名	李曉菁	〈隱形浩劫〉
	第三名	李展平	〈尋訪暗角癆病〉
	評審委員：林瑞明、李敏勇、焦桐、林明德		
2000 年 第 22 屆	本屆停止徵選報導文學		

附錄三：1998年～2011年 全國性報導文學獎得獎列表

時報文學獎			
2001年 第24屆	停辦報導文學類徵選		
2002年 第25屆 鄉鎮書寫		陳健瑜	〈大茅埔的新娘〉
		卓玫君	〈獻給諸神的詠嘆調〉
		白棟樑	〈石蚵的故鄉〉
		許正平	〈超時空小鎮漫遊〉
		瓦歷斯·諾幹	〈走過裂島的痕跡〉
2003年 第26屆 鄉鎮書寫		賴舒亞	〈挖記憶的礦〉
		劉如玲	〈我那凌亂的三重記憶〉
		吳心宇	〈我的康樂街〉
		楊美紅	〈風雨之後、島國以西〉
		林媽肴	〈穿越鐵蒺藜與軌條〉
2004年 第27屆 鄉鎮書寫		賴鈺婷	〈來去蚵鄉〉
		王怡文	〈鄉〉
		王美玉	〈台灣情〉
		王美慧	〈她，住在風鄉沙城的麥寮〉
		李崇建	〈漂流巴士〉
2005年 第28屆 報導文學	首獎	顧玉玲	〈逃〉
	評審獎	郭碧容	〈長路〉
		屠佳 林德龍	〈車城歌聲〉
2006年 第29屆 鄉鎮書寫	首獎	黃信恩	〈空白海岸〉
	評審獎	陳榮昌	〈癡瘋島〉
2007年 第30屆	首獎	從缺	
	評審獎	石芳瑜	〈重回社子島〉

鄉鎮書寫		顏嘉琪	〈酸菜故鄉〉
2008 年 第 31 屆 報導文學	首 獎	陳俊志	〈人間·失格－高樹少年之死〉
	評審獎	徐麗雯	〈米殤〉
		屠 佳	〈河邊遺夢〉

第 2 屆婦女人權報導獎

2003 年		梁玉芳	〈記得月亮活下來－性侵害婦女關懷系列〉
--------	--	-----	---------------------

第 24 屆耕莘文學獎 光榮任務報導類

2001 年	首 獎	從 缺	
	優 等	邱淑絹	〈花蓮北埔社區的環保娘子軍〉
		李委煌	〈巫喜教，讓醫療器材的良能循環再生〉
		劉雅嫻	〈用音樂演奏生命〉
	佳 作	黃秀花	〈從植物人邊緣走過〉
		陳柏州	〈大地上的小小螢火蟲－大里市環保志工〉
		黃世暉 (黃山高)	〈女媧補天－旗山智障教養院〉
		蔡美馨	〈迴－側記台灣過動家族的身世延展〉

「台灣之顏」耕莘 40 週年文學獎 報導文學類

2005 年	億光特別獎	從 缺	
	佳 作	潘文鶯	〈驛園新風情－竹田車站尋幽與再造〉
		洪慶宗	〈淺臥於彰南平原的巨龍，田中五分車站文化風采再現〉
		胡遠智	〈歷史建築的再生利用－從國民戲院蛻變為新竹市影像博物館〉

第 27 屆耕莘文學獎 報導文學類

2006 年	優 等	楊雅琪	〈九陽正經，上站下站〉
	佳 作	陳姿瑾	〈住在森林裡的文字獵人〉

永續台灣報導獎

主辦：生態保育聯盟、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中華民國企業家永續發展協會、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

1998 年 第 1 屆	文字報導獎	陳慈美	〈生態時代新人生觀－環保媽媽的生態反省〉
		廖東坤	〈櫻花鉤吻鮭馬蘇的旅程〉
		龔卓君	〈關懷台灣海洋環境系列報導〉
	影片報導獎	胡台麗	〈穿過婆家村〉
		曾文珍 許明淳	〈水－地沉下去了〉
		陳榮顯	〈水璫之歌－守望東台灣〉
驚蟄獎	范欽慧	〈自然筆記〉	
1999 年 第 2 屆	文字報導獎	李永適	〈搶救台灣珊瑚礁特別報導〉
		陳淑華	〈南台灣護水故事系列〉
		尤子彥	
		廖雲章	〈搶救棲蘭山檜木林系列報導〉
		張 正	

生態文學暨報導獎

主辦：中華民國新聞權益基金會、自然生態教育基金會

1998 年 第 1 屆	首 獎	浦忠成	
	二 獎	蔡灼明	
	三 獎	馬筱鳳	
		林良哲	
1999 年 第 2 屆	首 獎	林良哲	〈家鄉保衛戰－阿聰和他的東門里〉
	二 獎	朱惠菁	〈當阿美族遇上小蝦虎－從補蝦虎魚文化到生態保育〉
	三 獎	李曉菁	〈秘密草園－西北台灣的水生植物天地〉

		蕭錦綿	〈樹在，人常在〉
		白棟樑	〈大肚山的菅蓼花〉

台灣文學獎 報導文學類

主辦：行政院文建會

※ 2002 年~2009 年均未徵選報導文學類

1998 年 第 1 屆	首 獎	施錫政	〈「變臉」－彰濱的悲情記事〉
	評審獎	余昭玟	〈「尹盎斯要結婚」－阿美族婚禮今昔〉
		李展平	〈台灣「蘭巴雷」－倒在血泊的謝緯醫師〉
	優 選	白恣票	〈悲喜五汊港〉
		林少雯	〈又見梅花舞春風〉
		林秀蘭	〈輪椅上的豪情〉
佳 作	王正善等二十八名		
2001 年 第 3 屆	首 獎	陳偉勳	〈我們就是春天〉
	評審獎	謝國鐘	〈記憶與夢想的尋求〉
		蔣耀賢	〈傀儡－戲－人生〉
	優 選	葉怡君	〈長路使徒〉
		江冠明	〈動盪時代的歌聲〉
		蘇意茹	〈凝視新生島嶼的古老眼睛－重返台灣寫生逍遙遊〉
	佳 作	沈文台	〈孤燈照滄海－台灣燈塔看守人的極地歲月〉
		白李秋蜜	〈被上帝遺忘的地方〉
		黃丹力	〈台灣之足〉
		許銘洲	〈部落容顏的總滄桑——一場太魯閣反水泥的終局〉
		潘美緣	〈螢火蟲之愛－罕見疾病兒童的生命寫真〉
	王碧雲	〈失狩的獵人〉	
2003 年 第 5 屆 收件 42 篇 決審 12 篇	第一名	趙啓明	〈白毛人的前世今生〉
	第二名	屠 佳	〈牯嶺街記事〉
		林德龍	
	第三名	莊華堂	〈回來打馬赫〉
佳 作	張娟芬	〈秋霜烈日〉	

		黃世民	〈最後的第一杯小米酒〉
2010年 收件 6 篇 決審 5 篇	原住民漢 語報導文 學金典獎	李信·書達 (李秀蘭)	〈親親小奇萊〉

第 2 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

主辦：中華汽車原住民文教基金會、山海文化雜誌社、中國時報

2001年	第一名	高進發 (泰雅族)	〈赤足走過三十三年的遷徙風采〉
	第二名	周明傑 (排灣族)	〈比悠瑪－網上展風采〉
	第三名	鄭信得 (鄒族)	〈塔山下永遠的部落〉
	佳 作	趙啓明 (泰雅族)	缺
		陳逸君 (布農族)	缺
		浦忠勇 (鄒族)	缺

原住民報導文學獎

主辦：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文化發展會(山海文化雜誌社)、聯合報

2002年 收件 15 件	第一名	林二郎 (巴代) (卑南族)	〈山地眷村〉
	第二名	趙啓明 (啓明·拉瓦) (泰雅族)	〈說故事的人〉
	第三名	高進發 (馬薩吉駱)	〈八年部落戰爭〉

		(泰雅族)	
第 1 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			
主辦：行政院原民會 承辦：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會（山海文化雜誌社）			
2010 年	第一名	從 缺	
	第二名	從 缺	
	第三名	曾玉菁 (巴甘·谷基路) (太魯閣族)	〈銅門災變二十年，有誰記得它??〉
	佳 作	邱聖德 (Anu) (布農族)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紅葉少棒隊的故事〉
		陳敏芳 (Tanivu Akuyayana) (鄒族)	〈我是誰〉
		蔡光輝 (Sibu Udung) (太魯閣族)	〈箭海無涯〉
石進益 (法倚·ispalakan) (布農族)		〈神的僕人——搭利馬牧師〉	
第 2 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			
主辦：行政院原民會 承辦：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會（山海文化雜誌社）			
2011 年	第一名	從 缺	
	第二名	陳美娟 (卑南族)	〈在東海岸遇見阿美族本位教育〉
	第三名	余桂榕 (adus palalavi) (布農族)	〈移動中的部落廚房： 原鄉都會布農族勞工的網絡地圖〉
	第三名	石進益	〈蛻變的獵人—阿浪〉

		(法倚·ispalakan) (布農族)	
佳 作		翁亞暄 (ljavaus·pakaleva) (排灣族)	〈kusinipuaiai a sasenayan 我在那裡唱〉
		曾有欽 (渥巴拉特·布基嶺 昂) (排灣族)	〈聽見陽光灑下的聲音—laucu 的期待與失落〉

全國巡迴文藝營創作獎 報導文學組

1998 年	楊 琳	〈萬「粽」一心〉
	林若璇	〈反敗為勝〉
	林玲如	〈搶救統一超商的海鷗部隊〉
	陳志成	〈癌弦退休，義務文學傳道人永不退休〉
	陳辭修	〈威而剛帶來的醫藥社會文化〉
1999 年	童惠翎	〈消失的鹽分地帶〉
2000 年	陳偉勳	〈暗夜爐香〉
	王碧雲	〈天之棄兒何去何從〉
	葉孟峰	〈流年：不居的流光，翻轉的年代〉

文薈獎—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獎

1998 年 第 1 屆	第一名	張榮明	〈現實的震撼〉
	第二名	蔡淑如	〈背著胡琴闖天涯〉
	第三名	李曉菁	〈長腳〉
	佳 作	眭澔平	〈啄木鳥人的春天〉
		蔡惠萍	〈玫瑰園的故事〉
		唐珮玲	〈完整的缺口〉
		趙彩秀	〈星星的孩子〉
		潘秀琴	〈我的失語症朋友〉

1999年 第2屆	第一名	曾千惠	〈Call-in 人生〉
	第二名	陳 依	〈張格翔和這一班〉
	第三名	曉 鯨 ¹	〈變臉〉
	佳 作	林奇立	〈用愛織情〉
		丘榮襄	〈大自然的守護天使〉
		黃顯庭	〈九五病房〉
陳瑞婷		〈走出寂靜〉	
	李煥聰	〈明眼人〉	
2000年 第3屆	第一名	陳克華	〈焚燒的瞳〉
	第二名	高翊峰	〈安全島上的香花－台汽北站的欠手伯〉
	第三名	王碧雲	〈月光山下的折翼天使〉
	佳 作	李金峰	〈用心看世界的人〉
		謝鴻文	〈秋天的風景〉
		陳柏州	〈盜娃娃的天空〉
2001年 第4屆	第一名	宋玉冰	〈青山依舊在〉
	第二名	黃玉幸	〈校長走了〉
	第三名	紀佩君	〈音喚靈窗〉
	佳 作	曾玉雯	〈快樂阿！它不是遙遠的吧！〉
		高翊峰	〈門前請勿停車－忠孝東路三段的無名氏〉
		宋月女	〈過動兒－小米

¹ 應為筆名，由於查無本名故僅以筆名列出。

附錄四：1997 年～2011 年 地方性報導文學獎設立暨得獎列表

台灣各縣市報導文學獎設立簡況				
○：經常性有報導文學徵選 △：偶有／曾有報導文學徵選 X：未曾有報導文學徵選				
縣 市	文學獎名稱	創立年度	標號	備註
基隆市	海洋文學獎	2003 年	X	
台北市	台北文學獎	1998 年	X	僅有文學年金項目獎助報導文學作品
新北市	新北市文學獎	2005 年	△	2007 年曾徵選報導文學 2011 年縣市升級後由「北縣文學獎」改為「新北市文學獎」
桃園縣	文藝創作獎	1996 年	X	
新竹市	竹塹文學獎	1997 年	△	1997 年、1998 年、1999 年、2000 年曾徵選報導文學
新竹縣	吳濁流文學獎	2001 年	△	2006 年、2008 年曾徵選報導文學
苗栗縣	夢花文學獎	1998 年	○	歷屆皆徵選報導文學
彰化縣	磺溪文學獎	1999 年	○	歷屆皆徵選報導文學
台中市	大墩文學獎	1997 年	○	2005 年～2010 年共 6 屆連續徵選報導文學
台中縣	中縣文學獎	1999 年	○	歷屆皆徵選報導文學
台中市	台中文學獎	2011 年	△	2011 年台中縣市合併後改為「台中文學獎」，並徵選報導文學
南投縣	玉山文學獎	1999 年	△	原為「南投縣文學獎」，後改為「玉山文學獎」，2009 年、2010 年徵選報導文學
雲林縣	雲林文化藝術獎	2002 年	△	2004 年、2006 年、2008 年曾徵選報導文學
嘉義市	桃城文學獎	1998 年	X	1999 年第 2 屆後停辦至今
台南市	府城文學獎	1995 年	X	
台南縣	南瀛文學獎	1993 年	X	
台南市	台南文學獎	2011 年	△	2011 年台南縣市合併後改為「台南文學獎」，並徵選報導文學

高雄市	打狗文學獎	2003 年	X	
高雄縣	鳳邑文學獎	1998 年	X	
高雄市	打狗鳳邑文學獎	2011 年	X	2011 年縣市合併後改稱「打狗鳳邑文學獎」
屏東縣	大武山文學獎	1999 年	○	歷屆皆徵選報導文學
台東縣	後山文學獎	2001 年	X	2005 年第 3 屆後停辦至今
花蓮縣	花蓮文學獎	1999 年	X	
宜蘭縣	蘭陽文學獎	2004 年	X	
連江縣	馬祖文學獎	2009 年	△	2010 年曾徵選報導文學
金門縣	浯島文學獎	2004 年	X	
澎湖縣	菊島文學獎	1999 年	X	

※ 以下列表中部份得獎者姓名疑似筆名，由於查無本名故僅能以筆名列出。

新北 台北縣文學獎			
2007 年 第 3 屆	首 獎	從 缺	
	優 選	胡遠智	〈鼓動奇蹟的響仁和〉
	佳 作	楊乃甄	〈通往坪林的路〉
		吳品慧	〈話我故鄉 金礦山城〉

新北 三重「城市之窗」文學獎			
2005 年 第二屆	入 選	胡遠智	〈林阿三與華洲皮影戲團〉
2006 年 第三屆	入 選	胡遠智	〈大墨飄香有體唯心〉

新北 中和庄文學獎				
2010 年	踏查文學類		陳柏旭	〈中和的守護神_烘爐地土地公廟〉
	兒童組	第一名	自強國小 陳建明老師	

共收 5 件 決審 4 件	第二名	從 缺	
	第三名	從 缺	
佳作	高瑞菱 秀朗國小 江志偉老師	〈請到我的家鄉來〉	
	杜 昀 竹林小學 江怡璇老師	〈中、永和大蒐秘〉	
踏查文學類 青少年組	第一名	高 薈 南山高中 駱毓貞老師	〈四號記憶 公園印象〉
共收 12 件 決審 7 件	第二名	陳逸慈 南山高中 駱毓貞老師	〈中和廟〉
	第三名	黃偉傑 南山高中 駱毓貞老師	〈鼎立在中和人心目中—烘爐地〉
	佳 作	王雅慧 南山高中 林慧菁老師	〈中和圓通寺〉
報導文學類 成人組	第一名	從 缺	
	第二名	胡遠智	〈日本刀的修理職人—訪謝錦鐘老師傅〉
	第三名	從 缺	
	佳作	陳佐臺	〈名牌包醫生〉
李美琴		〈雙和人精神依戀之鄉： 一幅美麗的父慈子孝圖〉	
共收 10 件 決審 6 件			

新竹 吳濁流文學獎

2006 年	首 獎	鄭立明	〈斷層線上的蘋果在跳舞〉
	貳 獎	胡湘慧	〈泥土，愛與生命之源〉
2008 年	首 獎	從 缺	

	貳獎	屠佳	〈師科巷〉
	參獎	胡遠智	〈新舅仔〉

新竹 竹塹文學獎

1997年 第1屆	正獎	從缺	
	貳獎	從缺	
	佳作	胡遠智	〈新竹香粉〉
周增祥		〈台灣肥料公司新竹廠之擴建及經過及貢獻〉	
1998年 第2屆	首獎	從缺	
	貳獎	顏芳姿	
	佳作	彭淵燦	
1999年 第3屆	首獎	從缺	
	貳獎	從缺	
	佳作	葉煥順	〈新竹來的大木匠師父〉
		李曉喬	〈弄獅〉
2000年 第4屆	首獎	從缺	
	佳作	郭福麟	〈女兒的家—闢出一片「原住民」的天地〉
		黃百忠	〈細說補鼎談「鼓釘」〉
		范富玲	〈火車穿行阿里山〉
		彭淵燦	〈坑子口靶場〉

苗栗 夢花文學獎

1998年 第1屆	首屆查無得獎名單資訊		
1999年 第2屆	首獎	從缺	
	優等	從缺	
	佳作	鄭瑞圖	〈追憶苑裡先賢王清淵與愛竹山莊〉
2000年 第3屆	首獎	陳美月	〈西非鎖記〉
	優等	范瑞霞	〈是誰在吹西索米〉
		徐清明	〈好鳥枝頭亦朋友〉
		謝子烈	〈山水之旅〉

2001年 第4屆	首獎	劉嘉琪	〈再見香格里拉〉
	優等	陳美月	〈吉屋出售〉
	佳作	劉書瑀	〈月台的記憶與味道—論福隆便當〉
鄭伯利		〈台灣人之驕傲—阿通伯〉	
2002年 第5屆	首獎	李崇建	〈開放的教育 開闊的文學— 全人教育實驗學校中文教育掃描〉
	優等	劉嘉琪	〈尋覓心中的日月—探訪傳說中的香格里拉〉
	佳作	范瑞霞	〈戀戀溫泉：泰安行〉
2003年 第6屆	優等	張榮峰	〈霧鄉小城彫刻刀—話三義木雕春秋〉
		劉嘉琪	〈禁忌的背後〉
	佳作	李曉菁	〈勝興螢河傳說〉
		范瑞霞	〈夕陽可能無限好？—從泰安獨居老人居家照護談起〉
	胡春蓮	〈楓雪情〉	
2004年 第7屆	優等	劉嘉琪	〈傳承客家獅〉
	佳作	鄧榮坤	〈山南山北走一回〉
		黃正幸	〈我的鄰居「阿文伯」〉
2005年 第8屆	優等	何文麗	〈凱歌高聲唱〉
	佳作	劉鎮東	〈古墓傳奇〉
		胡春蓮	〈大山無言 荒野有情〉
		胡遠智	〈蟄伏在苗栗竹南的休眠火龍—從竹南蛇窯的蛻變談起〉
2006年 第9屆	首獎	從缺	
	優等	許勝雄	〈咀嚼流動的古道記憶〉
		湛敏佐	〈與快樂相約 與詩仙相遇—詹冰專訪〉
佳作	胡遠智	〈從「台灣的蛇窯」調查研究談「蛇窯」商標的爭議〉	
2007年 第10屆	首獎	從缺	
	優等	許勝雄	〈咀嚼流動的史蹟記憶〉
		阿幸	〈「在家自學」與「苗栗自學家庭二、三事」〉
	佳作	胡遠智	〈金色中港—金銀紙的故鄉〉
侯剛本		〈發現福爾摩莎的西乃山—苗栗 禱告山的印象之旅〉	
2008年 第11屆	首獎	胡遠智	〈百年老店風華〉
	優等	廖紫蘋	〈颶風少年〉
		許勝雄	〈游離尋岸—新住民女性之夢〉

	佳 作	楊小璇	〈客家之美〉
2009 年 第 12 屆	首 獎	從 缺	
	優 等	張慧嬌	〈讀書，讀人，讀生命—記杜子讀書會〉
		梁純綉	〈醬缸人生展風華〉
	佳 作	胡遠智	〈百年鐵店薪火傳〉
		張世俊	〈油人生涯的回憶〉
		鄧榮坤	〈稻草復活了〉
2010 年 第 13 屆	首 獎	從 缺	
	優 選	張欣芸	〈尤瑪·達陸的織夢人生〉
		陳美月	〈阿弟的正顎手術〉
	佳 作	王碧雲	〈紫金城的故事〉
		胡遠智	〈山中傳奇〉
		梁純綉	〈遺失的幸福滋味〉
劉勝鈺		〈古往今來三通嶺—「挑炭古道」再興，「社造」不死〉	
2011 年 第 14 屆	首 獎	從 缺	
	優 選	胡遠智	〈民俗藝人張益銘的金銀紙世界〉
		黃姮榕	〈用詩捕捉春光乍現的美好〉
	佳 作	劉勝鈺	〈加里山交響曲〉
		梁純綉	〈山城史懷哲〉
		江寶琴	〈跨過女權的鴻溝—兩位客家婦女的故事〉

彰化 磺溪文學獎

※2002 年—2010 年期間不分名次

1999 年 第 1 屆	第一名	陳文玲	〈鹿港少年黑龜〉
	第二名	吳添地	〈鷹嘍大地〉
	第三名	陳正平	〈中部書院巡禮〉
	佳 作	王怡仁	〈滄海桑田望鹿港〉
		李曉菁	〈尋找說尹娘的鹿港人〉
2000 年 第 2 屆	第一名	從 缺	
	第二名	陳利成	〈漂浮的土地〉
	第三名	李曉菁	〈元極舞三十日新誌〉
	佳 作	王志忠	〈找尋彰濱區開發故事〉

2001年 第3屆	第一名	從 缺	
	第二名	白棟樑	〈二〇〇一・番仔挖港〉
	第三名	莊芳華	〈我家門前有小河—目睹一個河岸社區的發展〉
	佳 作	黃明峰	〈玩偶—一生情〉
黃婉婷		〈飄散的種子〉	
2002年 第4屆		余益興	〈竹管厝的流金歲月——以永靖鄉竹子村為例〉
		陳利成	〈被囚禁的家廟〉
		鄒天佑	〈願化春泥更護花—齊心打造一座「國家花卉園區」〉
2003年 第5屆		張軒哲	〈刀痕裡隱然若現的新契機—鹿港錦森興魯班公宴〉
		陳利成	〈柳河的生與死〉
		蘇意茹	〈浮世清胴—李克全和他的藝術時代〉
2004年 第6屆		余益興	〈風華歲月—記永靖鄉果菜市場的變遷〉
		邱美都	〈忠實歲月舞春風〉
		謝瑞隆	〈「東螺溪」采風行〉
2005年 第7屆		邱美都	〈戀戀百齡翁—員林鐵枝仔路〉
		洪慶宗	〈牽牛趕集去，記北斗牛墟陳年往事〉
		鄒天佑	〈鑄田又逢春〉
2006年 第8屆		余益興	〈重返九號仔移民村〉
		洪慶宗	〈見證百年糖業風華——糖鐵田林線踏查〉
		張碧霞	〈興賢書院異彩〉
2007年 第9屆		陳可欣	〈雞運〉
		鄒天佑	〈又見青蚵嫂〉
		趙啓明	〈最大的是愛〉
2008年 第10屆		許勝雄	〈毒鴨蛋事件〉
		陳志成	〈吳晟的負荷〉
		鄧榮坤	〈南路鷹飛過八卦山〉
2009年 第11屆		吳昆宗	〈尋找八卦山的美麗精靈〉
		李坤隆	〈福安村的彼齣布袋戲〉
		陳昭如	〈落幕的事件，未落幕的故事〉
2010年 第12屆		張欣芸	〈相思寮的眼淚〉
		王派仁	〈打開芬園庄役場廳舍大門〉
		邱美都	〈搶救〉

2011年 第13屆	首獎	王派仁	〈滿坑楓紅已遠去，盼見白雪覆山頭〉
	優選	張欣芸	〈西城舊夢高賓閣〉
		林娟娟	〈西海岸王功產業三部曲－花生·蘆筍·蚵〉
		吳昆宗	〈寒風中微弱的歌聲－只要我長大〉

台中 大墩文學獎

2005年 第8屆	第一名	蘇士博	〈打鐵向晚天－流金歲月的打鐵仔店〉
	第二名	許細妹	〈水碓何去何從〉
	第三名	彭士芬	〈不愁無處度今宵－向深夜工作者致意〉
	佳 作	林良哲	〈隱藏在石碑林中的一段歷史〉
林佳慧		〈綠川記憶體－觀照綠川生態與人文〉	
2006年 第9屆	第一名	黃豐隆	〈碉堡挽歌－ 一件經濟開發與文化資產保存的記錄與省思〉
	第二名	賴彩美	〈松竹里古早叫做一三份埔〉
	第三名	黃慶聲	〈萬和宮老二媽回西屯省親的文化故事〉
2007年 第10屆	第一名	余益興	〈再見旱溪米粉寮〉
	第二名	黃豐隆	〈戲說字姓－南屯字姓戲百年風華〉
	第三名	許細妹	〈在都市插枝求活的「原」鄉人〉
	佳 作	張明德	〈我的第二故鄉－南台中〉
2008年 第11屆	第一名	吳哲良	〈無尾巷：一個時空錯置的潛據聚落〉
	第二名	張欣芸	〈點燃十方之愛〉
	第三名	蔡易廷	〈荒村〉
2009年 第12屆	第一名	王派仁	〈在紅磚拱廊下尋找宮原武雄〉
	第二名	許細妹	〈大瓦厝－值得關懷疼惜的文化資產〉
	第三名	宋柔曄	〈追憶如風往事－日治時期書法家吳福枝〉
2010年 第13屆	第一名	鐘麗琴	〈小戲仔，大舞台－記新興國小歌仔戲社〉
	第二名	黃豐隆	〈想念那一段蔗糖歲月〉
	第三名	江慶洲	〈輕輕我的妳 要漂去哪裡〉

台中 中縣文學獎

※歷屆皆不分名次

1999 年 第 1 屆	白棟樑	〈山頂的海口人〉
	王派仁	〈發現泰安車站〉
2000 年 第 2 屆	黃秋玉	〈九二一記事〉
	袁 叟	〈寵寵的半生日記〉
	夏 羽	〈走過大里溪〉
	童燕瑩	〈編織泰雅〉
	白李秋蜜	〈悲歡白冷圳〉
2001 年 第 3 屆	黃婉婷	〈月姬梨的故事——一場起於震災的農村產業實驗〉
	邱景墩	〈捕手〉
	白李秋蜜	〈亨德教授與他的紀念公園〉
	白棟樑	〈阿罩霧圳春秋〉
	吳子鈺	〈一畝淨土，還諸天地——一段小瓢蟲農場的有機種植歷程〉
2002 年 第 4 屆	李杰穎	〈浩劫遺忘與重生——兩次大地震中的石岡〉
	林松範	〈遊園驚夢〉
	白元勛	〈運河傳奇〉
2003 年 第 5 屆	黃綉玲	〈巧手師傅——賴昆旺〉
	張彩玥	〈創造無聲的天空——台中縣聽障生活無障礙發展協會〉
2004 年 第 6 屆	廖武鈴	〈愛松談松——台灣五葉松風情報導〉
	馬占魁	〈百年老店糕餅飄·兩代店主妙手奇才〉
	張明德	〈被時代淘汰的行業〉
2005 年 第 7 屆	楊士範	〈芳苑人在沙鹿的移民之歌〉(取消得獎) ²
	張明德	〈后里鄉與月眉糖廠滄桑史〉
	王立任	〈回填 17 年前的記憶——記「梧棲蓮塘蔡 18 年普」情事〉
2006 年 第 8 屆	白棟樑	〈砲台上的葡萄架〉
	瓦歷斯·諾幹	〈都是水溝惹的禍〉
	林惠敏	〈不再紡麻——獨留布袋史話在隆豐社區流傳〉

² 該篇被檢舉與《彰化文獻》第 6 期(2005 年 3 月)中的〈彰化芳苑人在沙鹿成衣業的奮鬥故事〉雷同性過高，經主辦單位查證後屬實，取消其得獎資格，詳細經過可見《隄子：第 7 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頁 276-277。

2007年 第9屆	鄧榮坤	〈在大肚溪逗留〉
	鄭澤文	〈穿越定泊—大提琴音樂家張正傑的溯源之旅〉
	張軒哲	〈溫馨送餐情—記寫老五老基金會中縣山城志工〉
2008年 第10屆	許勝雄	〈外籍配偶寶島夢〉
	翁麗修	〈織情綿綿〉
	王乙徹	〈烏金·群像—梧棲漁港烏魚產業觀查〉
2009年 第11屆	陳昭如	〈被遺忘的 1979……與毒共存的惠明人〉
	林松範	〈大肚山上的「車米崙」〉
	張英珉	〈阿公的抽屜〉
2010年 第12屆	王派仁	〈夏羽 烏日故事館—三民街走一回〉
	余益興	〈懷舊與再生—三叉買菸場的前世今生〉
	張欣芸	〈重回綠色烏托邦-霧峰光復新村〉

台中 台中文學獎

2011年	第一名	從 缺	
	第二名	林良哲	〈誰在綠川河畔唱歌—台中市南區民生路二十六巷拆遷紀實〉
	第三名	習賢德	〈懷生俱樂部〉
	佳 作	鄧志忠	〈相信有一天，火車—尋找月眉糖廠鐵道〉
		黃豐隆	〈溝背 1895—記一段被淡忘的台中抗日戰役〉

南投 玉山文學獎

2009年 第11屆	第一名	胡遠智	〈廣興紙寮，紙愛台灣〉
	第二名	陳彥臻	〈守住山城 根留家園〉
	第三名	許勝雄	〈尋岸另一半〉
	佳 作	石進益	〈尋找原鄉的家族〉
		蔡慶彰	〈濁水。武界。石〉
新人獎	從 缺		
2010年 第12屆	第一名	胡遠智	〈愛、互助與重生·紙教堂〉
	第二名	張欣芸	〈明日之城的明日〉

收件 5 篇	第三名	從 缺	
	佳 作	從 缺	
	新人獎	沈夙崢	〈彷彿聽見清兵的嘆息聲〉

雲林 文化藝術獎

2004 年	文學類 報導文學	沈文台	
2006 年	優 等	張清海	〈台西的前世今生〉
		黃文榮	〈戀戀糖鄉－虎尾的歷史與人文〉
	佳 作	蔡俊寬	〈狗爺公的香火袋〉
		賴宥任	〈走出震殤〉
2008 年	首 獎	周佳靜	〈讓夢想乘風翱翔的林內紫斑蝶〉
	第二名	黃文榮	〈探訪第一街－虎尾中山路的故事〉
	第三名	張清海	〈雲林糖事〉
	佳 作	沈文台	〈失足 50 年－雲嘉南沿海地區的「烏腳病」歲月〉
2011 年	首 獎	從 缺	
	第二名	黃文榮	
	第三名	郭喜斌	

台南 台南文學獎

2011 年 收件 22 篇	首 獎	王眾平	〈東門城與倫敦的交界處〉
	優 等	林娟娟	〈鯨魚爆炸了〉
	佳 作	張溪南	〈小學校大老師－新魯冰花吳鴻滄〉
		費啓宇	〈拼湊故事人－誤闖文化叢林小白兔康文榮〉
		薛穎珊	〈無米樂幸福農村〉

屏東 大武山文學獎

1999 年 第 1 屆	第一名	潘明富	〈屏東之光〉
	第二名	江大昭	〈驚奇之旅－畫發現就來義的排灣神話遺跡〉
	第三名	林世治	〈戶外博物館尋根〉

	佳 作	黃基博	〈一所詩意盎然的小學〉
		黎華亮	〈六歲進士邱國楨發掘記〉
		涂信忠	〈心靈加油站〉
2000 年 第 2 屆	第一名	江大昭	〈尋根探源話保力〉
	第二名	陳進成	〈東港的神將陣頭〉
	第三名	黃柏達	〈與茶有約〉
	佳 作	林世治	〈排灣族傳統婚禮〉
		蔡媸(女速)	〈追夢—小市民的心聲〉
2001 年 第 3 屆	第一名	黃世民	〈霧台魯凱藝術史話〉
	第二名	黃明峰	〈家鄉劇團與布袋戲〉
	第三名	潘謙銘	〈仙蛋傳奇〉
	佳 作	陳玉賢	〈美哉屏東〉
		吳玉賢	〈不打烊的愛〉
		蔡媸(女速)	〈地利人傑—高樹鄉〉
2002 年 第 4 屆	第一名	楊士範	〈大武流浪到台北〉
			未能找到其他得獎作品名單
2003 年 第 5 屆	第一名	從 缺	
	第二名	楊麗容 蘇慧玲	〈被社會遺忘的母親——外籍媽媽〉
	第三名	陳利成	〈阿朗壹古道〉
2004 年 第 6 屆	第一名	周明傑	〈一甲子的邀約—日本文獻當中僅存排灣族歌者的追蹤報導〉
	第二名	陳志豪	〈平原之末、半島之始〉
	第三名	簡志龍	〈新園新惠宮人文與建築的考察〉
	佳 作	林榮淑	〈校園變色龍〉
		張榮峰	〈水火的祈禱—東隆宮建醮溯源〉
		黃世暉	〈六堆風雲〉
2005 年 第 7 屆	第一名	林 鈴	〈自歷史的實處走來〉
	第二名	江 海	〈愛與和平的世紀大和解—側寫牡丹事件的百年心聲〉
	第三名	鍾秀鳳	〈聽說有「三間廟」：關於屏東縣鄭成功廟的一、二〉
	佳 作	許勝雄	〈戀戀東港情〉

		賀樹棻	〈千頃蓮霧萬串紅〉
		鄧榮坤	〈藤球與歡呼齊飛－屏東排灣族「五年祭」巡禮〉
2007年 第8屆	第一名	翁麗修	〈紅色的幸福〉
	第二名	胡遠智	〈不向老天認輸的獨臂漁夫〉
	第三名	黃慶祥	〈做戲看戲〉
	佳 作	石進益	〈揭開水門村的神秘面紗〉
		黃贊蒼	〈橫臥在新園地上的軌跡〉
鍾仁忠		〈大武山下的田園哲人陳冠學〉	
2009年 第9屆	第一名	陳鴻逸	〈文化累積的故事－尋慈鳳宮的百年風華〉
	第二名	李鳳美	〈八家將的生存狀態〉
	第三名	胡遠智	〈側寫屏東慈鳳宮〉
	佳 作	王繼平	〈從海上到路地的全能守護者——我看媽祖信仰在屏東〉
		徐正雄	〈夜訪慈鳳宮〉
郭文珠		〈天靈靈地靈靈－「探討八家將」〉	
2011年 第10屆	第一名	從 缺	
	第二名	胡遠智	〈恆春搶搶滾－2011 恆春古城豎孤棚競賽紀實〉
	第三名	陳彥廷	〈離鄉，向海〉
	佳 作	陳鴻逸	〈佳冬慈恩寺－記八八水災〉
		黃世民	〈叛裙水蓮花〉
		鄧志忠	〈隘寮溪河床的前世與今生－尋找一條載滿野心與血淚的死亡鐵路〉

連江 馬祖文學獎

2010年	優 選	從 缺	
	佳 作	陳宜嬪	〈北竿坂里「十三暝」鬧元宵〉
		陳寶明	〈母親的河〉

附錄五：1997 年～2011 年報導文學獎獲獎者得獎紀錄列表

※本列表僅列出獲獎總次數在 2 次以上之獲獎者。

※本列表中獲獎者簡介乃根據各文學獎得獎作品集之作者介紹，或其出版著作之作者介紹摘錄，部份得獎者未能收集相關簡介，僅能暫以留白。

獲獎人	總次數	得獎紀錄	備註	簡介
胡遠智	19 次	1997 新竹竹塹佳作	新竹竹塹 1 次	1973 年出生，台北人。中央光電所碩士畢，業餘報導文學工作者，現居住於竹北市。
		2008 新竹吳濁流參獎	新竹吳濁流 1 次	
		2005 苗栗夢花佳作	苗栗夢花 7 次	
		2006 苗栗夢花佳作	屏東大武山 3 次	
		2007 苗栗夢花佳作	南投玉山 2 次	
		2008 苗栗夢花首獎	新北三重 2 次	
		2009 苗栗夢花佳作	新北中和庄 1 次	
		2010 苗栗夢花佳作	新北北縣 1 次	
		2011 苗栗夢花優選	耕莘文學獎 1 次	
		2007 屏東大武山第二名		
		2009 屏東大武山第三名		
		2011 屏東大武山第二名		
		2009 南投玉山第一名		
		2010 南投玉山第一名		
		2010 新北中和庄第二名		
		2007 新北北縣優選		
		2005 新北三重入選		
		2006 新北三重入選		
		2005 耕莘文學獎佳作		
許勝雄	7 次	2006 苗栗夢花優等	苗栗夢花 3 次	1971 年生，台北縣人，中正大學政治學碩士畢。
		2007 苗栗夢花優等	屏東大武山 1 次	
		2008 苗栗夢花優等	彰化磺溪 1 次	
		2005 屏東大武山佳作	台中中縣 1 次	

		2008 彰化磺溪	南投玉山 1 次	
		2008 台中中縣		
		2009 南投玉山第三名		
張欣芸	6 次	2008 台中大墩第二名	苗栗夢花 1 次	1978 年生於南投縣中興新村，畢業於臺中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現定居台中。
		2010 苗栗夢花優選	屏東大武山 1 次	
		2010 台中中縣	彰化磺溪 1 次	
		2010 彰化磺溪	台中中縣 1 次	
		2011 彰化磺溪優選	南投玉山 1 次	
		2010 南投玉山第二名		
白棟樑	6 次	1999 台中中縣	台中中縣 3 次	1948 年生，台中人。現為望山文化工作室負責人，烏榕頭文化協會理事長。
		2001 台中中縣	彰化磺溪 1 次	
		2006 台中中縣	生態報導 1 次	
		2001 彰化磺溪第二名	鄉鎮書寫 1 次	
		1999 生態文學暨報導獎 三獎		
		2002 時報鄉鎮書寫		
鄧榮坤	5 次	2004 苗栗夢花佳作	苗栗夢花 2 次	1958 年生，桃園縣人，曾任記者、教師、出版社總編輯等，現任職於沈筠文史工作室。
		2009 苗栗夢花佳作	屏東大武山 1 次	
		2005 屏東大武山佳作	台中中縣 1 次	
		2007 台中中縣	彰化磺溪 1 次	
		2008 彰化磺溪		
王派仁	5 次	1999 台中中縣	彰化磺溪 2 次	1965 年生，台中人。台灣師範大學社教所畢。現任職於台中東園國小。
		2010 台中中縣	台中中縣 2 次	
		2009 台中大墩第一名	台中大墩 1 次	
		2010 彰化磺溪		
		2011 彰化磺溪首獎		
余益興	5 次	2002 彰化磺溪	彰化磺溪 3 次	台中師院國民教育所碩士，現任國小教師、太平烏榕頭文化協會秘書長、歷史人文解說員。
		2004 彰化磺溪	台中中縣 1 次	
		2006 彰化磺溪	台中大墩 1 次	
		2010 台中中縣		
		2007 台中大墩第一名		
劉嘉琪	4 次	2001 苗栗夢花首獎	苗栗夢花 4 次	1970 年生，苗栗客家人，現定

		2002 苗栗夢花優等		居苗栗。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畢業，現任教於苗栗明德國小。
		2003 苗栗夢花優等		
		2004 苗栗夢花優等		
李曉菁	6 次	1999 彰化磺溪佳作	彰化磺溪 2 次	台北人，淡江大學英文所博士，任職於田野影像出版社。
		2000 彰化磺溪第三名	苗栗夢花 1 次	
		2003 苗栗夢花佳作	文薈獎 1 次	
		1998 文薈獎第三名	生態報導 1 次	
		1999 生態報導暨報導獎 三獎	聯合報 2 次	
		1998 聯合報第三名		
		1999 聯合報第二名		
陳利成	4 次	2000 彰化磺溪第二名	彰化磺溪 3 次	筆名陳胤，彰化人。淡江大學中文系畢，現任彰化埔心國中教師。
		2002 彰化磺溪	屏東大武山 1 次	
		2003 彰化磺溪		
		2003 屏東大武山		
趙啓明	4 次	2007 彰化磺溪	彰化磺溪 1 次	筆名啓明·拉瓦，台中人。東海大學社會系畢，現任職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類學組。
		2001 原住民報導文學獎 佳作	原住民報導 2 次 台灣文學獎 1 次	
		2002 原住民報導文學獎 第二名		
		2003 台灣文學獎第一名		
屠 佳	4 次	2008 新竹吳濁流貳獎	新竹吳濁流 1 次	浙江慈谿人，上海電影專科學校動畫系畢業。
		2003 台灣文學獎第二名	台灣文學獎 1 次	
		2005 時報鄉鎮書寫	鄉鎮書寫 2 次	
		2008 時報鄉鎮書寫		
黃豐隆	4 次	2006 台中大墩第一名	台中大墩 3 次	1958 年生，曾任台中市犁頭店鄉土文化學會理事長，現為聯合大學資工系教授，並從事文史編輯工作。
		2007 台中大墩第二名	台中台中 1 次	
		2010 台中大墩第二名		
		2011 台中台中佳作		
林良哲	4 次	2005 台中大墩佳作	台中大墩 1 次	1968 年生，台中人。政大法律系畢，現為自由時報駐台中市記者。
		2011 台中台中第二名	台中台中 1 次	
		1998 生態文學暨報導獎	生態報導 2 次	

		三獎		
		1999 生態文學暨報導獎		
		首獎		
梁純綉	3 次	2009 苗栗夢花優等	苗栗夢花 3 次	
		2010 苗栗夢花佳作		
		2011 苗栗夢花佳作		
陳美月	3 次	2000 苗栗夢花首獎	苗栗夢花 3 次	
		2001 苗栗夢花優等		
		2010 苗栗夢花優選		
范瑞霞	3 次	2000 苗栗夢花優等	苗栗夢花 3 次	筆名洛杜意，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旅居美國後專事寫作，返台後現居苗栗市。
		2002 苗栗夢花佳作		
		2003 苗栗夢花佳作		
江大昭	3 次	1999 屏東大武山第二名	屏東大武山 3 次	政戰學校新聞系畢業。現為「江海文史傳播工作室」負責人，屏東縣大武山文學會理事長。
		2000 屏東大武山第一名		
		2005 屏東大武山第二名		
鄒天佑	3 次	2002 彰化磺溪	彰化磺溪 3 次	1957 年生，省立花蓮高商畢，現為中華放射腫瘤學會秘書，兼任醫學會雜誌助理編輯。
		2005 彰化磺溪		
		2007 彰化磺溪		
邱美都	3 次	2004 彰化磺溪	彰化磺溪 3 次	彰化人，彰化師範大學輔導所畢，現任彰化千高台文化協會理事、員林鄉親報編採與專欄寫作。
		2005 彰化磺溪		
		2010 彰化磺溪		
洪慶宗	3 次	2005 彰化磺溪	彰化磺溪 2 次	新竹人，現為東螺文化聯合工作室召集人、東螺媽文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
		2006 彰化磺溪	耕莘文學獎 1 次	
		2005 耕莘報導文學佳作		
白李秋蜜	3 次	2000 台中中縣	台中中縣 2 次	1953 年生，嘉義人。虎尾女中畢，現為望山文化工作室研究助理。
		2001 台中中縣	台灣文學獎 1 次	
		2001 台灣文學獎佳作		
張明德	3 次	2004 台中中縣	台中中縣 2 次	1926 年生，台中人。曾任國小教師、台北市松年福社會「玉蘭莊」總幹事。
		2005 台中中縣	台中大墩 1 次	
		2007 台中大墩佳作		
許細妹	3 次	2005 台中大墩第二名	台中大墩 3 次	1949 年生，新竹人。現任台中

		2007 台中大墩第三名		犁頭店鄉土文化學會常務理事、台中市文昌公廟導覽志工。
		2009 台中大墩第二名		
沈文台	3 次	2004 雲林文化藝術獎 2008 雲林文化藝術獎佳作 2001 台灣文學獎佳作	雲林文化 2 次 台灣文學獎 1 次	1949 年生，雲林人。從事新聞傳播工作二十餘年。
石進益	3 次	2007 屏東大武山佳作 2009 南投玉山佳作 2010 原住民文學獎佳作	屏東大武山 1 次 南投玉山 1 次 原住民文學 1 次	1954 年生，花蓮布農族人。現任屏東隘寮國小校長。
黃文榮	3 次	2006 雲林文化藝術獎優等 2008 雲林文化藝術獎 第二名 2011 雲林文化藝術獎 第二名	雲林文化 3 次	雲林人，中正大學歷所博士生，現為彰化二林高中教師。
瓦歷斯·諾幹	2 次	2006 台中中縣 2002 時報鄉鎮書寫	台中中縣 1 次 鄉鎮書寫 1 次	1961 年生，漢名吳俊傑，泰雅族人。台中師專畢，曾主持刊物《獵人文化》。
林松範	2 次	2002 台中中縣 2009 台中中縣	台中中縣 2 次	1942 年生，台中人。逢甲大學畢，現任社區大學講師。
彭淵燦	2 次	1998 新竹竹塹佳作 2000 新竹竹塹佳作	新竹竹塹 2 次	現任聯合報記者。
張清海	2 次	2006 雲林文化藝術獎優等 2008 雲林文化藝術獎 第三名	雲林文化 2 次	1936 年生，雲林人。1955 年起定居雲林東勢。
黃世暉	2 次	2004 屏東大武山佳作 2003 耕莘文學獎佳作	屏東大武山 1 次 耕莘文學獎 1 次	筆名黃山高，現為台灣日報記者、旗美文史工作室負責人。
陳柏州	2 次	2003 耕莘文學獎佳作 2003 文薈獎佳作	耕莘文學獎 1 次 文薈獎 1 次	宜蘭人，政大新聞所畢，現為慈濟文化志業中心擔任《慈濟》月刊、《慈濟道侶》文字記者。
高翊峰	2 次	2000 文薈獎第二名 2001 文薈獎佳作	文薈獎 2 次	1973 年生，苗栗人，文化大學法律系畢業，現職為 FHM 時尚雜誌資深編輯。

馬薩吉駱	2 次	2001 原住民報導文學獎 第一名	原住民報導 2 次	漢名高進發，泰雅族人。
		2002 原住民報導文學獎 第三名		
張榮峰	2 次	2003 苗栗夢花優等	苗栗夢花 1 次	1973 年生，桃園人，現為高中教師。
		2005 屏東大武山佳作	屏東大武山 1 次	
劉勝鈺	2 次	2010 苗栗夢花佳作	苗栗夢花 2 次	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理事，現於苗栗國中任教。
		2011 苗栗夢花佳作		
李崇建	2 次	2002 苗栗夢花首獎	苗栗夢花 1 次	東海大學中文系畢，現為全人中學教師。
		2004 時報鄉鎮書寫	鄉鎮書寫 1 次	
胡春蓮	2 次	2003 苗栗夢花佳作	苗栗夢花 2 次	現任職於苗栗縣政府。
		2005 苗栗夢花佳作		
林世治	2 次	1999 屏東大武山第三名	屏東大武山 2 次	1961 年生，台東排灣族人，現為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管理局文化服務員。
		2000 屏東大武山佳作		
蔡 媛 (女 速)	2 次	2000 屏東大武山佳作	屏東大武山 2 次	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現任教於高樹國中。
		2001 屏東大武山佳作		
周明傑	2 次	2004 屏東大武山第一名	屏東大武山 1 次	1967 年生，屏東排灣族人。國立臺北師範學院音樂系畢業，現任教於屏東潮東國小。
		2001 原住民文學獎 第一名	原住民報導 1 次	
翁麗修	2 次	2007 屏東大武山第一名	屏東大武山 1 次	
		2008 台中中縣	台中中縣 1 次	
黃明峰	2 次	2001 彰化磺溪佳作	彰化磺溪 1 次	1975 年生，屏東人。逢甲大學中文所畢，致力於布袋戲研究。
		2001 屏東大武山第二名	屏東大武山 1 次	
黃婉婷	2 次	2001 彰化磺溪佳作	彰化磺溪 1 次	1973 年生，台中人。高師大特教系畢，現任彰化啟智學校教師，社區網站「石岡鄉民俱樂部」站長。
		2001 台中中縣	台中中縣 1 次	
張軒哲	2 次	2003 彰化磺溪	彰化磺溪 1 次	1976 年生，苗栗人。雲林科大文化資產所畢，現為自由時報記者。
		2007 台中中縣	台中中縣 1 次	

蘇意茹	2 次	2003 彰化磺溪	彰化磺溪 1 次	彰化人，台大藝術史研究所畢。曾任多家媒體編輯，現專事寫作。
		2001 台灣文學獎優選	台灣文學獎 1 次	
吳昆宗	2 次	2009 彰化磺溪	彰化磺溪 2 次	彰化人，世新大學畢，曾任報社記者，限為彰化縣美食編輯小組員。
		2011 彰化磺溪優選		
陳昭如	2 次	2009 彰化磺溪	彰化磺溪 1 次	台大人類學系畢，任職媒體多年，現為自由撰稿人。
		2009 台中中縣	台中中縣 1 次	
陳鴻逸	2 次	2009 屏東大武山第一名	屏東大武山 2 次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現為彰師大國文系講師。
		2011 屏東大武山第二名		
黃世民	2 次	2001 屏東大武山第三名	屏東大武山 2 次	
		2011 屏東大武山佳作		
鄧世忠	2 次	2011 屏東大武山佳作	屏東大武山 1 次	
		2011 台中台中佳作	台中台中 1 次	



附錄六：1997 年～2011 年報導文學獎評審列表

※本列表僅列出表筆者所收集到的評審名單，其中部份獎項因缺乏評審相關紀錄或評審講評而無法收集完整，故仍有待增補。

時報文學獎 鄉鎮書寫		
2005 年 第 28 屆	決 審	陳浩、楊渡、鄭至慧
2006 年 第 29 屆	決 審	舒國治、孫大川、廖玉蕙
2007 年 第 30 屆	決 審	廖玉蕙、路寒袖
2008 年 第 31 屆	決 審	楊照、夏曼·藍波安、鄭至慧

第 2 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		
2001 年	評 審	孫大川、謝世忠、高德義、古蒙仁
原住民報導文學獎		
2002 年	評 審	孫大川、陳義芝、陳敬介、浦忠成、利格拉樂·阿烏
第 1 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		
2010 年	評 審	魏貽君、巴代、啓明·拉瓦、藍博洲、李文吉
第 2 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		
2011 年	評 審	浦忠成、利格拉樂·阿烏、李文吉

耕莘文學獎

2003 年	評 審	向陽、羅任玲、須文蔚
2005 年	評 審	向陽、焦桐、須文蔚

文建會台灣文學獎

2003 年	初 審	彭瑞金、路寒袖、王麗華、王家祥
	決 審	林瑞明、劉克襄、鍾鐵民
2010 年 原住民漢語 報導文學 金典獎	評 審	古蒙仁、蒲忠成、董恕明

2010 中和庄文學獎

報導文學類	初 審	林德俊、林煥彰、陳祖彥
成人組	決 審	應平書、阿盛、羅位育

新竹 竹塹文學獎

2000 年 第 4 屆	評 審	范文芳、黃卓權、潘國正
-------------------------	-----	-------------

新竹 吳濁流文學獎

2006 年	評 審	張德南、陳銘璠、潘國正
2008 年	評 審	古蒙仁、藍博洲、須文蔚

苗栗 夢花文學獎

1998年 第1屆	首屆查無評審委員資訊	
1999年 第2屆	初審	王幼華、黃秋雲
	決賽	陳運棟、何來美、藍博洲
2000年 第3屆	初審	彭金龍、黃秋雲
	決賽	陳運棟、何來美、張致遠
2001年 第4屆	初審	彭金龍、黃秋雲
	決賽	陳運棟、何來美、張致遠
2002年 第5屆	初審	彭金龍、黃秋雲
	決賽	何來美、張致遠、藍博洲
2003年 第6屆	初審	彭金龍、黃秋雲
	決賽	何來美、張致遠、藍博洲
2004年 第7屆	初審	彭金龍、黃秋雲
	決賽	何來美、張致遠、藍博洲
2005年 第8屆	初審	彭金龍、黃秋雲
	決賽	何來美、張致遠
2006年 第9屆	評審	何來美、張致遠、張典婉
2007年 第10屆	評審	何來美、張致遠、張典婉
2008年 第11屆	評審	何來美、張致遠、張典婉
2009年 第12屆	評審	何來美、張典婉

彰化 礮溪文學獎

※ 部份屆數僅有評審報告而無評審清單，故僅列出報告者。

1999年 第1屆	評審 報告	陳篤弘
2000年	評審	林雙不

第 2 屆	報告	
2001 年 第 3 屆	評審 報告	魏貽君
2002 年 第 4 屆	評 審	向陽、劉克襄
2003 年 第 5 屆	評 審	康原、劉克襄
2004 年 第 6 屆	評 審	向陽、魏貽君
2005 年 第 7 屆	評 審	古蒙仁、劉克襄
2006 年 第 8 屆	評 審	康原、楊樹清
2007 年 第 9 屆	評 審	康原、劉克襄
2008 年 第 10 屆	評 審	康原、劉克襄
2009 年 第 11 屆	評 審	康原、向陽

台中 中縣文學獎

1999 年 第 1 屆	評 審	陳彥斌、魏貽君、鍾喬
2001 年 第 3 屆	評 審	陳憲仁、廖嘉展、劉克襄
2002 年 第 4 屆	評 審	查無資料
2003 年 第 5 屆	評 審	廖嘉展、丘秀芷、藍博洲
2005 年 第 7 屆	評 審	陳彥斌、陳憲仁、廖嘉展

2006年 第8屆	評 審	陳彥斌、陳憲仁、廖嘉展
2007年 第9屆	評 審	陳列、劉克襄、向陽
2008年 第10屆	評 審	陳列、劉克襄、向陽
2009年 第11屆	評 審	向陽、陳憲仁、魏貽君

台中 大墩文學獎

2005年 第8屆	評 審	劉克襄、焦桐、陳明台
2006年 第9屆	評 審	王家祥、廖嘉展、陳銘礪
2007年 第10屆	評 審	劉克襄、康原、楊翠
2008年 第11屆	評 審	劉克襄、廖嘉展、阮桃園
2009年 第12屆	評 審	劉克襄、吳明益、阮桃園

南投 玉山文學獎 歷屆報導文學獎項評審清單

2009年 第11屆	評 審	劉克襄、康原、桂文亞
2010年 第12屆	評 審	劉克襄、康原、陳憲仁

屏東 大武山文學獎

2005年 第7屆	評 審	向陽、龔顯宗、李若鶯
--------------	-----	------------

2009 年 第 11 屆	評 審	蘇珊玉、曾貴海、傅怡禎
------------------	-----	-------------



附錄七：社區大學報導文學相關課程開設情形列表

※由於全促會網站尚未使用縣市合併後的分類，故仍保留縣市之別。

※下列開設相關課程與否的判斷，僅依各社區大學網站所提供之課程為主。

※○：曾開設田野踏查、地方文史類課程

X：未曾開設田野踏查、地方文史類課程

縣 市	社區大學名稱		各社區大學網站中之課程資訊
基隆市	基隆社區大學	○	2011 年暑期、秋季 2011 年秋季：口述歷史與訪談入門
台北市	北投社區大學	X	2005 年春季～2011 年秋季
	大安社區大學	X	2005 年春季～2011 年秋季
	中山社區大學	○	2005 年春季～2011 年秋季 2005 年春季： 中山區地方文史調查與寫作工作坊
	中正社區大學	X	2005 年春季～2011 年秋季
	士林社區大學	○	2005 年春季～2011 年秋季 未註明年份：社區文史研習社
	內湖社區大學	X	2005 年春季～2011 年秋季
	松山社區大學	○	2005 年春季～2011 年秋季 2007 年秋季：松山采風暨文史志工培訓
	信義社區大學	○	2005 年春季～2011 年秋季 2008 年春季：後山文史
	大同社區大學	○	2005 年春季～2011 年秋季 2005 年春季：大同文史采風
	南港社區大學	○	2005 年春季～2011 年秋季 2005 年暑期： 南港老樹文史蒐錄與守護行動工作坊 2009 年暑期： 走拍新故鄉－在地文史故事複合紀錄

			南港在地文史寫作
	文山社區大學	○	2005 年春季~2011 年秋季 2005 年春季：書寫文山－文史田調與寫作 2010 年春季： 穿越時空－景美文史踏查二部曲 2010 年秋季：文山學－走讀文山堡
	萬華社區大學	○	2005 年春季~2011 年秋季 2005 年春季： 地方文史的調查與社區發展
	台北市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	○	2008 年秋季~2011 年秋季 2008 年秋季、2009 年春季、2009 年秋季： 尋訪原住民文化
台北縣	淡水社區大學	○	2011 年秋季：八里歷史與文化資產
	萬金石海洋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
	樹林社區大學	X	2011 年暑期、秋季
	三鶯社區大學	X	2011 年秋季
	瑞芳社區大學	X	2008 年~2011 年春季、秋季
	新店崇光社區大學	X	網站無法連結
	林口社區大學	X	2007 年~2011 年春季、暑期、秋季
	新莊社區大學	X	2011 年暑期、秋季
	三重社區大學	○	2007 年~2011 年春季、秋季 2000 年秋季： 認識三重歷史與地理系列－閱讀空軍三重一村 2011 年秋季：在地出外人書寫工作坊
	新北市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	?	網站無課程資訊
桃園縣	平鎮市民大學	X	2011 年秋季
	八德社區大學	X	2010 年與 2011 年
	新楊平社區大學	?	網站無法連結
	中壢社區大學	X	2011 年秋季
	桃園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秋季
	桃園縣原住民部落大學	?	網站無法連結

新竹縣	竹東社區大學	X	2007 年~2011 年暑期
	竹北社區大學	?	網站內課表無標注年度
	新竹縣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	?	網站無法連結
新竹市	風城社區大學	X	2009 年春季、秋季
	婦女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暑期、秋季
	科學城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秋季
	香山社區大學	○	2003 年~2011 年春季、秋季 2003 年：大家來寫村史與社區營造－民眾參與式文史寫作
	青草湖社區大學	○	2001 年~2011 年秋季 2004 年： 大家來寫村史與社區營造－民眾參與式文史寫作 2008 年： 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研究 新竹市海山那魯灣村阿美族人竹編與傳統文化溯源 2009 年： 東山社區村史與田野調查培訓課程
苗栗縣	苗栗縣社區大學	X	2011 年秋季
	大明社區大學	X	2011 年秋季
	苗栗縣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	?	課程介紹過度簡略
彰化縣	彰化市社區大學	?	網站無課程介紹
	社田社區大學	○	2011 年秋季
	湖埔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
	鹿秀社區大學	X	2011 年秋季
	美港社區大學	X	2011 年暑期、秋季
	二水社區大學	?	網站無課程介紹
	永村社區大學	○	2011 年秋季
	芬園社區大學	X	2011 年秋季
	二林社區大學	X	2011 年秋季
	員林社區大學	X	2011 年秋季

台中縣	山線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秋季
	海線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秋季
	台中縣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	X	2007 年、2008 年春季、秋季
台中市	光大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秋季
	犁頭店社區大學	X	2011 年暑期
	文山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秋季
	大坑社區大學	X	2010 年秋季
	五權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秋季
	大墩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秋季
	台中市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	X	2010 年暑期、秋季
雲林縣	山線社區大學	?	尚無網站
	海線社區大學	?	尚無網站
	平原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秋季
嘉義縣	嘉義縣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
	嘉義縣鄒族 kuba 部落社區大學	?	課程介紹過度簡略
嘉義市	嘉義市社區大學	X	2010 年秋季、2011 年春季、秋季
	博愛社區大學	X	2011 年秋季
台南市	台南市社區大學	X	2011 年秋季
	新營社區大學	○	2011 年秋季：東山文史生態踏查
	永康社區大學	X	2011 年秋季
	南關社區大學	X	2011 年秋季
	新化社區大學	X	2011 年秋季
	北門社區大學	X	2011 年秋季
	曾文社區大學	X	2011 年秋季
高雄市	第一社區大學	○	2005 年~2011 年 2008 年秋季： 眷戀她們的故事－書寫女性的生命
	第二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秋季
	鳳山區社區大學	?	網站無法連結
	岡山區社區大學	X	2011 年暑期、秋季
	旗山區旗美社區大學	X	2011 年秋季
	高雄市原住民部落大學	X	2007 年、2008 年、2010 年

屏東縣	屏北區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
	屏南區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
	屏東縣原住民部落大學	X	2011 年春季
台東縣	台東縣社區大學	○	2008 年~2011 年春季 2009 年春季： 魯拉克斯部落耆老生命史紀錄實務 2011 年春季： 大武鄉一部落史編輯、製作部落地圖
	台東縣原住民族部落社區大學	?	網站無法連結
花蓮縣	花蓮縣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
	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
宜蘭縣	羅東社區大學	X	2011 年秋季
	宜蘭社區大學	○	2011 年秋季：宜蘭的史料與史學
	宜蘭縣住民族部落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
金門縣	金門縣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
澎湖縣	澎湖縣社區大學	X	2011 年春季

附錄八：社區大學報導文學相關課程內容簡介列表

社區大學名稱	開設年度	課程名稱	開課教師	說明
【基隆】基隆社區大學	2011	口述歷史與訪談入門	王醒之	學習口述歷史的技巧，並透過實際的田野訪談、資料整理，寫成報導文學，型塑共同的民眾史
【北市】中山社區大學	2005	中山區地方文史調查與寫作工作坊	姚其中等	結合社區文史工作室及社大文史學者，建構並推廣社區文史，強化社區民眾認同。
【北市】士林社區大學		社區文史研習社	官舜弘	
【北市】松山社區大學	2007	松山采風暨文史志工培訓	吳智慶	
【北市】信義社區大學	2008	後山文史	廖守義	
【北市】大同社區大學	2005	大同文史采風	洪斯文	
【北市】南港社區大學	2005	南港老樹文史蒐錄與守護行動工作坊	廖守義等	
	2009	走拍新故鄉－在地文史故事複合紀錄	李志蕃	
	2009	南港在地文史寫作		
【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2005	書寫文山－文史田調與寫作	莊華堂	從作品討論及文史田野調查、口訪中，培養文史寫作能力，開拓地方文史寫作人才，以期未來出版地方文史刊物。
	2010	穿越時空－景美文史踏查二部曲	何文賢	
	2010	文山學－走讀文山堡		
【北市】萬華社區大學	2005	地方文史的調查與社區發展	高傳棋	

【北市】台北市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	2008	尋訪原住民文化	吳智慶	透過實地部落訪查及遺址田野調查，探討平埔族、泰雅族、西拉雅族、賽德克族等台灣原住民的文化及歷史。
	2009	尋訪原住民文化	吳智慶	同上。
【北縣】淡水社區大學	2011	八里歷史與文化資產		
【北縣】三重社區大學	2000	認識三重歷史與地理系列：閱讀空軍三重一村	張志源	以區域空間變遷的角度對空軍三重一村眷村進行文字紀錄與討論，進而思考眷村建築與文化的存續問題。
	2011	在地出外人書寫工作坊	呂東熹	透過對各縣市移民的訪談與田調，書寫其生命故事，呈現 1960 年代後新北市移民的面貌與歷史。
【新竹】香山社區大學	2003	大家來寫村史與社區營造－民眾參與式文史寫作	陳板	藉由田野調查收集民間文化資產，參與村史寫作的文史工作。
【新竹】青草湖社區大學	2004	大家來寫村史與社區營造－民眾參與式文史寫作	陳板	同上。
	2008	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研究	顏錫沂 方柏棟	拜訪那魯灣村阿美族的部落耆老，以文字、影像方式紀錄該部落的文化資料以及現況。
	2008	新竹市海山那魯灣村阿美族人竹編與傳統文化溯源	顏錫沂 方柏棟	同上。
	2009	東山社區村史與田野調查培訓課程	李淑玲 黃美英	經由田野調查、實地走訪與文字紀錄等文史工作，喚起社區民眾對生活周遭的歷史意識，建構社區村史。
【台南】新營社區大學	2011	東山文史生態踏查	黃嘉隆 朱志宏	經由戶外自然觀察，認識東山區的人文生態與產業，以

				深化認同。
【高雄】第一社區大學	2008	眷戀她們的故事－書寫女性的生命	焦婷婷	透過田野訪談與紀錄，瞭解女性在族群經驗和歷史發展中的生命史
【台東】台東縣社區大學	2009	魯拉克斯部落耆老生命史紀錄實務	楊秀英	藉由部落 60 歲以上耆老的生命分享，紀錄流失的文化、智慧與價值觀，並彙整成冊。
	2011	大武鄉－部落史編輯、製作部落地圖	徐德盛 陳俊仁 鄭清謙 等	邀請地方耆老、頭目及文史工作者討論、建構部落史及部落地圖以供傳承。
【宜蘭】宜蘭社區大學	2011	宜蘭的史料與史學	陳進傳	透過講述與回顧宜蘭史料，加以實地田調、耆老訪談，重建宜蘭史的真相。



